

邵燕祥 / 著

一个 戴灰帽子的人

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
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

燕祥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序言

自序

第一章 一九六年

在特赦战犯时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侥幸回城

从“人还在，心不死”到一个苟活者的随波逐流

老艺人信任的朋友，宣传机器上的“螺丝钉”

老相声“四大本”，构成了“大搞封资修”的罪状

主食、副食都不够吃了，小官僚们却在一旁大吃大喝

那么多人，主要是农民，替我们死于饥饿

第二章 一九六一年

我们将成为爸爸妈妈，我母亲将要当奶

奶了

不问民间疾苦，一心还只想写作

戴着枷锁跳舞，职务写作也劳而无功

两条车道沟里的鲇鱼：我和吴小如恢复联系

他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军功章，塞了别人的牙缝

幸存在历史的夹缝里，却常忘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从“你算老几”到“脱帽加冕”

妹妹大学毕业能自食其力，父亲就退休了

跟图尔逊合作译写《十二木卡姆》唱词插叙两位没无闻的人，那时代也还有纯属个人的不幸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自以为和卡斯特罗的心相通

中苏交恶，邻居沙安之处境变得尴尬

居民小组长：息事宁人，还是无事生

非？

第三章 一九六二年

早春似有解冻的消息，但麻木的我已不动心

以文字表达为生命的需要，落入文网乃是宿命

从古装的唱词到洋装的话剧

内蒙古和江南之行：历史与现实疑真疑幻

开排，停排，复排：《叶尔绍夫兄弟》一波三折

刚过了大饥荒，又“整社”不准“开小片荒”了

第四章 一九六三年

被批“烦琐的家务事和卑微的儿女情相结合”

预防政变，丁莱夫将军奉命进驻广播局
《叶尔绍夫兄弟》“内部演出”，我却高兴不起来了

改编“阶级斗争”剧本，远不如亲身挨斗感受深刻

难得一上五台山，跟年轻气象员聚会高山站

对反修波及国内毫无精神准备，还在吟咏“怒书原不作哀音”

半个世纪后暮年回首，检点自己过去的足迹

初到重庆：山水市井间徘徊，川剧里沉湎，历史中遐思

第五章 一九六四年

告别山城下三峡，武汉是旧游之地
李燕、纪维时等的离京，背后有一个“大举措”

南下温暖的广州，却接到父亲病危的急电

写“反右派”剧本。“小整风”挨整。又获“优秀剧目”奖状.....

剧团巡演的总结，变成了涉及男女关系

的批判会

回忆去沈阳看话剧汇演，却像重读了多
卷人生的大书

中国爆炸原子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
下乡“四清”

第六章 一九六五年

苦难的中原大地：西宋庄比土改前的甘
肃农村还穷

一穷二白的小村庄，到哪儿找“走资
派”的“资本主义道路”？

谢天谢地，这个村庄搞了半年“四
清”，没死一个人

摘掉郑某的地主帽子，三户错划富农改
定为富裕中农

多年后泛滥的大吃大喝、公费旅游，几
十年前只是规模较小

对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再思考，但没读
懂德热拉斯《新阶级》

一九六五年初冬的晋西南之行，给我

的“前文革时代”画了句号

尾声

不算尾声的尾声

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特的，值得让别人知道。

—米洛凡·德热拉斯

哀莫大于心不死。

——聂绀弩

.....彼得堡街上的人像鱼，
像鱼一样来往在昏暗的灯光下。

这里不也是吗？在这个城市里，
我们就像无数的直立的鱼一样，
在抽干了水的沟里走来走去——
可没有彼得堡人那样懂得痛苦啊！

—袁水拍

人间忧患诚如海，
沾丐吾身未一瓢。

—邵燕祥

序言

邵燕祥先生这一生，经历了两个时代，四九年前为“民国”，四九年后是“人民共和国”。

民国那一段，战乱频仍，动荡不宁，民不聊生。进入新中国，改元建制，万象更始，天翻地覆，一派新气。然而，没过多久，即一个运动接着另一个运动，无休无止，折腾无已。据专家统计，“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所搞政治运动约有六十余次之多。五十年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邵燕祥，以热烈纯真、意气风发的抒情诗人名世，然而却于一九五七年那场“引蛇出洞”的阴谋阳谋的政治风暴中，一下子成为“右派分子”，顿

时跌入万丈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黑五类”（即所谓“地富反坏右”之“右”），后又发配到渤海之滨的黄骅中捷友谊农场劳动改造。

一九五九年十月，他终于获准回到北京，重返原工作单位，但仍是政治贱民身份，所谓“内部控制使用”也。这部《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忆述的，正是一九六〇至六五年间的一段生活、工作经历，是他人生之路的一个横截面。这几年，经过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大饥荒以后，处在“文革”爆发之前，似乎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社会政治风云依然鼓荡翻卷，暗流汹涌，“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沾了特赦战犯的光，邵燕祥被摘掉了“右派分子”那顶沉重地压在头顶上的“黑帽子”，但特有的政治烙印迫使他不得不继续“夹着

尾巴做人”。这到底是怎样一种苦境呢？他的心情、心态、心境究竟如何？他历经了怎样的内心挣扎？他如何才能在这准良民贱民的地位，获得一种生活的平静、精神的安宁而不至于心理失衡呢？

头上扣着的帽子变成了灰色。此种特殊生存状态、精神状态，邵先生一言以蔽之曰“苟活”。当然，这不过是现在的看法，当时则并非作如是观。那会儿是要极力进行自我改造的；是要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

前几年邵先生一部作品的引言，题为“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倒可以移来说明此书的叙事特点，即取一种双重的视角：一是努力返回历史现场，力图写出以往的生活真实、社会真实、心理真

实和精神真实，完整地重现那个时代的真实；二、自然，个人记忆具有个人性主观性，是有情感有倾向性的记忆，系如今的作者对已逝历史的记忆和书写，这种记忆和书写之目的，是为了记住历史、反思历史、审视历史，也是为了审视自我、反思自我和解剖自我。不如此便会缺失反思精神和历史深度，造成对于事实和历史的回避与掩盖。这种具有个人化的情感意旨和精神指向的历史书写，用邵先生自己说过的话，也可以说叫“寻找灵魂”，找回“迷失的灵魂”。

寻找灵魂、反思解剖难矣哉！鲁迅《野草·墓碣文》有云：“……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在“文革”结束后“归来”的一代作家当中，邵燕祥恐怕是最早对当代历史、对刚刚过去的个人史，自觉地采取认真严肃彻底的反思态度者之一。其实，这也是他重返文坛后包括诗歌、杂感、随笔在内的全部著述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著的《沉船》、《人生败笔》，到近十多年来的《邵燕祥自述》、《找灵魂》，以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皆程度不同地具有这种明确的文化品格和鲜明的精神取向。在《找灵魂》一书引言中他曾说道：“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真诚而沉痛！这是从“瞒和骗”的大网罗中挣脱出来的知识者的真正醒觉的声音，是发自肺腑的痛定思痛的心声。

邵先生还说过，一九四九年后他“从领袖崇拜到参与造神自有思想基础，其中包括斯大林体制文化的示范力量，也许还有东方专制主义传统沉淀下来的臣民潜意识”；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于是也“就在几近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情势下，越陷越深地令笔下成为某种政治概念、政治意图的复述、图解、传声筒”。所谓“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亦即通过个人记忆重返历史现场，拒绝遗忘过去，拯救历史记忆，为他们那代人亲历的那段不堪回首又必须审视的沉重、苦痛、荒谬的岁月，留下一份个人的宝贵证词。

邵燕祥旧体诗《书愤》有句云：“垂垂老矣吴刚斧，西绪弗斯上下山”，何其苦涩、无奈、悲凉、荒诞而又沉痛哉！灯下拜读此著，这两句诗时

时浮上心头，不觉百味杂陈，感慨系之矣。人生实难，是古人一再叹息过的。经历过两个时代，又曾头顶着沉重的政治帽子的邵先生这代人，人生尤难！而邵先生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过去遭受的政治磨难和人生苦难的一以贯之的正视态度与反思精神。他的清醒严峻的理性与生动真切的叙事，使这本书具有了相当强的可读性和深刻的启发性。

这部回忆录要出版了，蒙邵先生不弃，以忘年知己之交，命我写几句话，缀诸简端，真是不胜惶恐之至。藐予小子，岂敢赞一辞！踌躇再三，未尝动笔，付排在即，不宜再拖，遂写下一点文字，乞邵先生以及读者诸君有以教我。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王培元记于首善之区

蜗牛庐

自序

在为这本书寻找书名的时候，曾经想到过“死者与生者”。很熟稔，好像就在嘴边，却原来是苏俄作家西蒙诺夫晚年一部长篇的名字。那里沉淀了他对战争的回忆与思考，全部情节不可避免地围绕着死者与生者体现出来。远比他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同期写的《日日夜夜》深沉多了。这深沉中有着时间的分量。

我这本书，写的已是尘封五十年的身边琐事和琐闻，半个世纪过去了，其中涉及的人，许多已经

作古，偶有依然健在的生者，也已寿登耄耋，垂垂老矣，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必讳言，都将循自然法则以去。如果袭用西蒙诺夫旧题，这就是最表层的意思，一看便明瞭的了。

然而，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书中所写，从开卷前的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前后，全国笼罩在大饥荒的阴影下，更是陷入死神的控制中。据不完全统计，这四五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三千多万，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上下，遍及大陆各省，从老幼病弱到年轻力壮的青年中年，而以农民和底层居民为主。这样庞大的死者群，构成了我这本书反映的时代之底色；可悲并可诅咒的，是我和相当大批的城里人，竟享受着城乡二元化的荫庇，同时又受报喜不报忧的舆论蒙蔽，

长期对这样悲惨的实况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仿佛毫无心肝地苟活着。作为这样幸存的生者，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到无地自容。在被遮蔽的死者呻吟或无声地告别这个世界的背景上，当读者读到书中描述的各样人包括作者的言行、心理和生活琐事时，不要忘记所有这一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地域发生的，从而对其中的曲直、真伪、善恶、美丑做出自己的判断。

不过，为了避免过于刺激，终于没有采用这个书名。

但我仍愿把考虑书名时有过的片断思考写在这里，供大家参照。

2013年9月28日

现在是把这本书命名为《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了。

在老中国，有所谓“红帽子”，原始语义是指在火车站帮旅客提携行李的工人，他们以一顶红色的帽子突出身份。后来说当局或警察特务给谁戴了红帽子，却是隐指共产党的嫌疑了。

我们少年时加入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笑说我们戴上红帽子了，是自嘲更是自豪。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反右派斗争后，在对我的处分决定中正式戴上右派分子这个政治帽子，不禁想起红帽子之说，转眼间“红帽子”变成了“黑帽子”。经过劳动改造，认罪检讨，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人前背后还是

被人叫作“摘帽右派”。于是悟出头上还有一顶有形无形的“灰帽子”。至于几年后又被称为“黑帮”，重新戴上“黑帽子”达十年之久，那是后话不提。

一个人，如土耳其共产党员诗人希克梅特说的，“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头上的帽子却不断换来换去，无可自豪，只剩自嘲了。

人已老，重数走过的脚印，有了对六十年代“摘帽”时期那几年的一些回忆。只是围绕个人生存状态的如实交代，未曾亲历那段岁月的读者或可略窥一斑，但还应该交代一句：我在当时的“摘帽右派”以至在成千上万的“右派分子”中，其实是“非典型”的。

当时有过一个分六类处置右派分子的政策性规

定，第一、二类最重，第五、六类较轻，我属于第四类，保留公职，撤职、降级降薪、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云云。据李维汉回忆，有近二分之一的人被“劳动教养”，关在“大墙”里，同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他们的遭遇，可比我们在没有大墙的地方服劳役，严酷得多了。

我被摘帽属于第一批，在大饥荒波及全国之前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后来又摘了一批人的帽子，基本上是分配外地，基层，遣返回乡或在劳改场所就地消化，极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单位的幸运了。

在同样划右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人颠沛流离，辗转各劳改、劳教场所，风雪边疆，矿井底层，忍饥挨饿，拼命干活，生死一线，听天由命，幸存者有的家庭破碎，有的一身伤病。很快又是十年动

乱，到七十年代末，那些一直没摘右派帽子的才把帽子摘掉。我不但及早生还，且有一枝之栖，苟活多年后，竟得以在有生之年复出，可以重操旧业发表作品，也算是有了一点话语权吧，而我却不能代言于万一。比起那些已经过世，或年已七老八十而大半生丧失了一切公民权利的“同案”，我不但可谓不幸中之幸者，甚至可以说简直在享受着被照顾的优惠了。——我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在依出版方意见，逐页校改过程中，我作为多年的体制内编辑，也深深体会编辑同仁们的工作艰辛。比如我习惯于文革二字不加引号，累得编辑费了多少添加引号的工夫。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何

必加引号？》我认为文革或其全称，作为中国当代史的一个阶段性称谓，已经自然地成为专有名词，它所指称是明明白白的。而原初认定应加引号时，大约正在决议“彻底否定文革”之际，以为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了使人望而生畏的浩劫，实在有伤于大家一贯认同的革命应有的光辉形象，无产阶级也跟着不体面了，所以不该再那么叫；加上引号，就有了类似“所谓”的意味，即虽叫革命，其实不是真正的革命。但我想，“名从主人”是个铁律。周作人之作人有违中国人作人的道德，但不能因此叫他为“所谓”周作人，胡长清名为长清却贪贿俱全一点也不清廉，但也不能因此叫他为“所谓”胡长清。同理，文革作为一定时空中的实体之定名，是一个事实判断，用不着以“所谓”来表示

加以否定的价值判断。道理如此，但对谁去讲呢？读者看到的，是曾经问过“何必加引号”的作者，这回还是都加了引号。

读者通达，该是能够理解和谅解的吧。

邵燕祥

2014年5月17日

第一章 一九六年

在特赦战犯时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 以侥幸回城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夜，渤海边的黄骅中捷友谊农场，雷雨交加，土墙草顶的平房，倚坐大通铺上，我打开笔记本写下一首诗：

真的，这不算异想天开，
海上生出了一片云彩。
把千言万语交付它，
借一阵风把它吹向西北。
西北有高楼，楼上有人在等待，
不要说人家都在我不在；

你没有白白地眺望海角，
我给你寄来一片云——一个大海。
它挟着白热的闪电，迅猛的风雷，
激荡着所有善感的胸怀。
一天夜雨拍打着你的窗扉，
让你想象着海涛澎湃。
让你想象着海边的潮水，
每逢初一、十五准要涨一回。
而我将做一个不速之客，
突然在你的意外归来。

最后的两句，文秀一看就会懂。我们都读过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小说，一起看过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画。在列宾一幅画里，一个应是这家主人的男子闯

进家门，尴尬地成为陌生的来客，在桌前做功课的两兄妹疑虑地望着他，而他的妻子好像也深感意外，因全家都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他为什么没有事先捎信来？是突然遇赦，还是邮路不通，抑或他想给亲人带来个意外的惊喜？……这幅画的题目，有的译为“不速之客”，也有的译为“意外归来”。从哪里归来？监狱，还是流放地？

我在十月的秋风里，从黄骅转沧县，在姚官屯小站站口候车的时候，并不预期回到北京会有“却看妻子愁何在”的欢快，但还是兴奋得跟一同获释的伙伴海阔天空地说这说那，好像哑叭学会了说话一样，就在我们高谈阔论间，听到一声汽笛，这一班车已经开动北上了。

既误车，误了车也高兴，索性不着急，重新上

车，到天津中转，在这个不曾来过的北方大城市，买了一铁盒精装的糖果，就算带给亲人的小小礼物吧。

从车到北京起，这个全国的心脏，就以出奇的安静、平静甚至宁静接纳了我。不但新落成的北京站，出站后拐进的小胡同一片寂静，就是大街上也不见喧哗，人行道上，公交车上，人们好像相约“肃静”，屏口无声。这完全不是我在海边期望的回来后的景象。“十年大庆”刚过去不久，想象该还在天安门广场保留着节日景观的同时，人们谈笑间依然一片节日气氛才是。然而不但不见节日盛装的仕女，好像人们都忘记了共和国建立十周年这件大事，家家门前挂的五星红旗也早就卷起收藏了。

两年前打成右派挨批挨斗时，我也没这样失望过。我在陷入“非常”的境地时，渴望回到“正常”的生活，人们享有私人的欢乐，也享有群体共有的欢乐，那欢乐于我已经陌生了，比如说，就像报纸上反映的那样吧。那“人民内部”的生活，即使不是轰轰烈烈，也应该是生气勃勃的。但是，这里没有母亲在我刚下乡时就写信告诉我的，敲锣打鼓敲脸盆打麻雀的热闹，没有大炼钢铁时条条胡同连老大妈也动员出来砸石块的火炽，也没有文秀写信告诉我的，参加“十大建筑”施工时，人们在脚手架上登梯爬高，你追我赶……过去了，全过去了。

在中国，户口是最重要的。打成右派以后，所谓下放，叫劳动锻炼也罢，叫劳动改造也罢，首先

把你的户口迁出北京这个首善之区，许多人就从此一去不回头，再也无缘成为北京市几百万、上千万直到两千万市民之一了。我郑重地把黄骅县转回北京的介绍信交到派出所警察的手上，他顺手就给落下集体户口，并注明“想当然”的“自黄骅电台迁来”，是因为我现在归属辖区大户的广播局了，如其不然，说来自什么农场再写上“摘帽右派”身份，办事怕就没这般爽利了。

回到老三○二宿舍院，离去三年，“城郭依旧”，因是上班时间，空空落落的。没有遇见熟人，却正好遇见半生不熟的赵无宣—赵无极的妹妹，她正是这两年跟文秀同住一处集体宿舍的室友，你说巧不巧。大概她也感到意外，苍白的脸上表情漠然，她可能正因病休息，我只好烦她带个口

信，给班上的文秀，说我已找过房管科，给分配了九单元三楼三号的一间宿舍，让文秀中午来一趟。随后我跟着总务科的一位老人儿，一起上仓库，借来一床、一桌和两把椅子，就算安顿下来。

那首诗中的“西北有高楼，楼上有人在等待”，从似乎缥缈空灵的云里雾里，还原到现实生活中那间北向小屋中的日常生活。

人的“日常生活”，住在什么样的房屋里，毕竟是次要的，关键还是跟谁住在一起。

公共生活也一样，不看你在简陋的还是堂皇的办公室，端看你的办公室里有什么样的同事。

家里一起过日子的人，是自己找的。

办公室里的同事，就听天由命了。

我在一九五九年重新进入办公室。整整十年

前，我平生第一次走进办公室，曾经带着多么好奇而又自豪的感情！那一年，柳荫到河北正定天主堂里的华北大学，找我们面谈，等于面试，决定调我来北京的广播电台。于是我进入中央台左荧为科长的资料编辑科。今天，柳荫又和蔼地对我说，咱们这回一块工作了，你先到文艺部的资料室吧。他现在主管中央台的文艺广播，表演团体和唱片社。后来我多次想，柳荫心里不知怎么想的：十年前一个十六岁的小青年，成长为二十六岁的“摘帽右派”了？

我也如约找了平生第一个上级左荧，他现在是新建的北京广播学院院长，他说广院人手极缺，我回来正好，不过因为柳荫坚持要我上文艺部，他跟柳荫商量，文艺部资料室是个闲职，学院倒是来了

就排进功课表，我半天在台里，半天到北京广播学院的汉语教研组上班。学院草创，暂时就在离电台不远的一座灰楼，原是电台宿舍，我住过的一幸耶不幸？几年后“文革”开始，我又被关到这里，灰楼成了所谓“牛棚”。那是后话。

我跟另外四位新来的中文系毕业生一起，给大一同学任汉语辅导教师。同学们每周听北大林焘教授的课，回来由我们判作业，讲评。我没参加听课，半年多的时间，只在什么场合，远远看过林焘一眼。后来我从吴小如处知道，林焘是北平沦陷后间关数千里去大后方，上了西南联大的。

我没读过文字、训诂之学，也没学过现代的语法。我一向认为对范文多读多背，多加揣摩，文法、语法自在其中。所读不多，却学语法，越学越

累也越糊涂。我上小学时看兄姊的高三国文，最后附录了简明的文法常识，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的分类，如主语、宾语的句子结构，好像一看就懂了。学英文时，有Digram，对句子进行图解。五十年代初，《人民日报》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针对当时报纸上的病句，较系统地讲了有关常识……这一些，就是我当辅导教师的“学养”根柢了。

这时印尼排华，有大批侨生回国，广播学院专开了一个侨生班，我兼给这个班的学生辅导，主要是改作文。这倒是我的轻车熟路，同学们似乎也还满意。即使有不满意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没到“文革”，学生绝少给教员提意见的。

广播学院新校舍落成，要搬到东郊定福庄去，

像我这样的“半日制”工作肯定不行了。于是我选择全天回文艺部，不再兼做辅导教师。左荧也表示理解，我告别了以邹晓青为首的这个教研组。邹晓青是“进城”老干部，五十年代初大区撤销后，从《东北日报》副总编辑任上，调到广播事业局对外部任职，一九五八年被打成“温邹张反党小集团”一员。主管对外部的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划为右派，他也受了处分。我离开这个教研组不久，温济泽调进来，又跟邹晓青共事了。这是多少有些尴尬的局面，不过我相信他们能够明智地相处。

那时，到处可以遇见“犯错误”的人。文艺部资料室，陈道宗已先我而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没有戴右派帽子，但受了降级降薪的处分，大概是

所谓“中右”吧。我一九四九年来电台时，他也是先已到来，原为北大学生，现在跟随杨兆麟跑时政，笔头快，也有活动能力，适于做外勤，但他一直未入党，最后只好离开时（事）政（治）这一摊，去了文艺部。——后来我才知道，他出身山东的书香门第，他的兄长早已参加中共，后来一直做对外使节；大概因他的父亲与何思源交谊颇深，他被中共地下党物色来做何的统战工作，他的知识分子气在老一辈旧派人物看来顺眼，到革命队伍便显得鹤立鸡群，落落寡合，我就听过文艺部党支部的人说他“清高”，当然是要从贬义理解的。人们说他很难共事，但我没有这个感觉。我们一起帮助柳荫写总结音乐广播（后来又扩展到整个文艺广播）的材料，合作得十分默契。这是知识分子的臭味相

投？落难文人的相濡以沫？还是“摘帽右派”和“中右分子”（没有公开戴帽，也就永无摘帽之说）的暗中勾结？

好在这时人们被更多的热点所吸引或纠缠，无暇多顾我们这样的“死老虎”（后来叫“落水狗”），网开一面，负面的舆论压力暂时没有笼罩到我头上，也从道宗头上移开。

从“人还在，心不死”到一个苟活者的随波逐流

热点，首先是政治热点。我一九五九年秋一回北京，到了久违的中央台，相对于大街小巷和公共场所的萧条冷寂，机关里却制造着“反右倾”的热潮。内部简报纷飞。全都呼应着《红旗》杂志上林彪、康生的宏文，指斥彭德怀是“革命的同路人”，意谓早就跟党不是一条心，到社会主义这个关口，过不去了；或像斯大林说的，在历史转折点，被飞驰的车子甩了出去。宏文力透纸背，我也特别敏感地联系到自己。一九五七年时，周扬作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报告（后来由毛泽东定稿，

题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正式发表），就说到许多在民主革命中是左派的，到社会主义革命中成了右派这个道理，不禁心为之震。后来每读到这样的高论，总像听到字里行间传出的冷笑声，是过了“社会主义关”的幸运者在幸灾乐祸地俯看着昔日的“同路人”倒霉呢。

其实，什么“社会主义关”云云，不免显得过甚其词。因为看简报也好，听批判也好，说来说去多是些经济现象，说是经济现象都有点夸大，多半不过是说市场上有些针头线脑的小百货断档……这样经过几许跳跃式的“提高”，才能上升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层次呢？原来，回到“人民内部”来，大批判的水平，也并不高出右派分子集中劳改场所之互相以鸡毛蒜皮相揭发相检举，那里面

有不少是心照不宣的走过场，以应付管理者挑动被管理者之间互斗的无奈之举啊。难道“人民内部”也盛行此道了么？

被驱出“人民内部”几年之后，隔膜了。

但人民内部，甚至于党内斗争中，竟也出现了惊人之语（半个世纪后应该追认为“雷语”）。邓拓夫人丁一岚，成了反右倾运动对象，当了被告就得先做检讨，这是让被告“自证有罪”的一步。丁一岚交心说，某个观点她也曾有同感，但她只是心里想，没说出来过。一位副主任批判丁一岚时严正地指出：共产党员心里有这种想法也是反党！这位副主任，平时总是面带三分笑，一团和气，平易近人的，不料关键时刻出语凌厉，打你一个措手不及，无话可说。这真可以为天真地响应“交心”号

召者戒了。七八年后的一九六八年，我，丁一岚，副主任……都一锅烩进了“第二期”的“专政队”，我对丁一岚没有任何戒心，对他总还提防着一点。

参加文艺部反右倾“学习”（当时搞运动都叫学习），我也发过一次言。那是批徐曙，我原先根本不认识，他是唱片社的领导，写过唱词《晋察冀的小姑娘》，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从上海走向解放区的老同志，身上确有点所谓“自由主义”什么的，这可不得了，嘴上没遮拦，可不一抓一个准吗。发了材料叫大家准备发言。没想到在会上大家冷场的时候，主持者竟点我的名——是要考验考验这个摘帽右派吧？——幸亏我有准备，按照从报上抄的“社论”语言，空对空讲了几分钟，没想到这份

发言竟登上中央台的简报，变成文艺部（包括唱片社）支部的“会上指出”。隐去发言的个人身份是明智的，不然，让一个“不明真相”的摘帽右派振振有词批判一个老革命的右倾，是合乎逻辑，抑或有些不合逻辑？

还写过一个发言稿。当时文艺界正大批郭小川，《文艺报》先后发表了萧三和张光年（化名华夫）对小川抒情长诗《望星空》的批判。文艺部里的文学组要组织一次“学习”，记得是刘雨岚还有谁，提前通知我去参加，我为了避免随口发言有误，写了几张横格纸的草稿。临到开会的日子，她们又说我不必去了。的确，我当时编制挂在文艺部秘书组，平常跟文学组不搭界。后来听说是分管文学组的文艺部副主任夏之平发的话，原来叫我去一

起开会，是几位文学组里同志自发的，没拿我当外人吧。夏之平是从华东台调来的老同志，她是原华东台台长、现任广播局副局长周新武的妻子，周新武这时也正为“右倾”挨批呢。以她的政治经验，当然以不让我去跟文学组一起批郭小川为宜，这里面包含了对我的保护。——那个发言草稿我一直保存着，曾想送给郭小林看看，在你父亲遭到作协党组围攻的日子，我也曾准备“背靠背”地批判他呢。一时没找到，怎么说的已记不清，但我想，由于我对郭小川有好感，估计我当时的“批判”调门不会很高，用语也不会十分刻薄。

这说的都是班上的事，即“八小时（一周有几次加班晚上学习，就成了十小时）之内”。而毕竟还有“八至十小时”之外呢。

我回到北京以后，还想接着像在农场一样，不间断地写诗。

能够坚持“业余”（在劳改时就是在劳动，不，劳改之余）写诗，乃是托“大跃进”的福，文化也要大跃进，提倡“诗画满墙”，号召村村出个郭沫若。农场也征集诗稿。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之交是高潮，我在一九五九年初写了些颂圣表态之作（以《长江篇》围绕毛泽东的生平写到他畅游长江，企望三峡“出平湖”为代表），高潮过去了，我一发不能收，转而写个人抒情的短章，像日记似的，写满了两本。通过这些不假雕琢的即兴小品，我给自己构筑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在其中遐想，我在其中遨游，城市乡村，上天入地，甚至有原子破冰船向北冰洋驶去，一路划冰而过，

都是要给我被禁锢的灵魂寻找一个可以安顿的寄托。而再怎么虚拟，都无法摆脱现实的羁绊，河边田畔到处的芦苇，到我笔下，我却仿佛听它在秋风中瑟瑟发问：“制纸？织席？——制纸？织席？”芦苇关心的是身后的出路，正如我关心的也是何以为用，可怜的知识分子“求用心切”。唯一能够得到的安慰，不过来自跟亲人通讯，像卷首开篇引用的那首《无题》，既是以诗代柬，也是在风雨之夜平息心中风雨的一番倾诉吧。

凭第六感，我就知道虽然回到了北京，虽然是一起劳改的同案们十分羡慕的摘了帽子，且回归原单位，但绝不是“前度刘郎今又来”，而是“可怜俱是不如人”，只能承认现实，不要妄图有什么作为，具体地说，也不要再写什么打算发表的作品。

写还是要写的，写给自己看，练笔，不要把笔搁生了，这毕竟是我从小选择啊。

其实，在当时的政治词典里，在不忘阶级斗争的人们眼里，这是典型的“人还在，心不死”。

既然不为发表，不为迎合时势的需要，我就可以写我生活中的小感触，不受题材的拘束。

但真要不受拘束地写作，谈何容易！

时时还不免左顾右盼，这是习惯成自然的惊惧，并且也容易滑到“歌颂为主”的老路上去。

又过了几十年，我才从自己的写作实践中悟到，在我心目中不再横着所谓领导和书报检查官，同时也不再晃着“广大读者”的身影的时候，一意孤行地写我自己所要写，甚至仅仅为了写出来，写出来哪怕只给自己看，这才能写出好诗——好诗不易

得，但惟其心灵自由，才有写出好诗的可能。

在汉语教研组，看到吉林大学的学报上，有一篇署名汪玢玲写的关于长白山一带人参传说的文章，是学术研究成果，但因间有田野调查的材料，绝不枯燥，生动有趣，唤起我一些联想，我借此写了一首《人参姑娘》，把采参人死后化鸟，叫着“王刚哥！王刚哥”的悲情故事也穿插进去。但基调是讲故事的闲趣，还不如一九五三年写童话长诗《无定河怎样变成永定河》，写到其中人物时的动情。

大约在这前后，我写了长途放蜂人“追花夺蜜”的短诗。我对蜜蜂一向有感情，小时候就为在雌性蜂王寡头治下的蜂群抱不平，几十年后把第一本杂文集命名《蜜和刺》，把自己的书房命名“小

蜂房”，再后来，1997年巴尔干战火中萨拉热窝周围降雪20厘米，大量蜜蜂死去，我曾写诗“悼亡”：

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千千
万万冬眠的蜜蜂不再醒来
巴尔干的星空拥挤着群蜂
滴下的已不是蜜，而是鲜血

然而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之交所写有关蜜蜂的诗却是失败之作，因为它把旧时“为谁辛苦为谁忙”的牢骚化解成“为人民酿蜜”的套话了。

还有一首写兴建中的密云水库，不是感情不真，而是境界不高，或说没有独立开辟、独立营造

的境界。不过，新世纪之初，我在水库南线村庄里找到属于我的一户“云水山房”，回想四十年前这首短诗，不禁开玩笑说：那是我对密云水库超前的“感情投资”！聊以自慰“诗渐平庸人可想”的遗憾。

说“平庸”，未免有自宽自解之嫌。岂止是平庸而已！面对尘世万象，却硬是要剥离了政治，这是苟活者的随波逐流，自求麻醉，连当时的自己，也感到这笔记本上记下的尽是不咸不淡的词句，没有激情的迸发，没有“舒愤懑”，没有感情的重量，没有思考的刻痕。于是把笔收起了。

说把笔收起，还并没有真的收起，是不再为表达自己而写，不再写仅供自己看的东西了。这支笔纯是成了听命的工具。尊严继续在随波逐流中失

落。

老艺人信任的朋友，宣传机器上的“螺丝钉”

柳荫总认为让我投闲置散，是不符合知识分子政策的。他想让我“材有所用”。一九六〇年春天，叫我到粉楼后面平房的说唱团帮忙。

我所“暂栖身”的文艺部资料组，我最看重的一份资料，是沈阳市文联编的内部本《子弟书》，集中了罗松窗、韩小窗等人的作品，这些八旗子弟接受了汉文化中雅文化的熏陶，以写排律的功底写唱词，把大观园里人的生活和情愫付诸说唱，为小圈子中的人所激赏，不过，也正因为失之阳春白雪吧，竟不能在民间广泛传唱，只保留在文字上了。

这本资料有二三百页，我曾想手抄一册，慢慢品鉴。可是只抄了写宝玉、黛玉故事的《露泪缘》十三回，没再继续下去。至今这个纸质极粗糙、纸色深褐，上面蓝圆珠笔用力刻划的横格本，还躺在我家故纸堆里。

说唱团多老艺人。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建团之初，有从华北大学三部（文艺学院 - 文工团）来的王决、郑青松两位文化人，从唱词到总结都能写，后来他们先后因工作需要调去中央台文艺部，这里就只剩部队来的团长王力叶“有文化”了，但他的工作重点是思想和政治领导，也贯彻于业务领导中，主要致力于改造老艺人，改造曲艺。柳荫在抓说唱团业务时，想到让我助他一臂之力。我到说唱团为老艺人服务，不存在屈尊纡贵的问题，正好

这些老艺人虽也参加政治学习，政治表态，比如反右派时也开会，批判一位打成右派的琴师陈少武，看着热闹，却都是鹦鹉学舌，说完就完了，运动一过，陈老师照样弹弦子伴奏。对我这个摘帽右派，他们欣然迎接，笑脸相向，说实在话，我真像成语说的“受宠若惊”，心想，他们都是上惯了舞台的，善于表演热情吧。日子长了，才体验到他们出于真情，他们因自己文化较低，真诚地尊重有文化的人。反右派斗争之后，政治运动不绝如缕之间，居然还有这样保持着人情味——保持着人味的园地（不是“阵地”）！

但对外——我指的是在演播内容上，在曲目上，那还是不失为宣传阵地，为对内对外政策服务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阵地。

那时候，写作不叫写作，叫配合。配合政治运动，配合宣传任务，配合“中心工作”。

一九六〇年四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出一篇专论：《列宁主义万岁》，是配合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是苏联也有“逢十纪念”的惯例吗？不知道。但看来党围绕着列宁和列宁主义有话要说，赶上有这么一个不显得突兀的机会，可以顺理成章地畅所欲言吧。当时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还有军队的《解放军报》（我至今也不知它是军队总政治部，还是更上一级中央军委的机关报，不敢乱猜），同时各发表一篇有关纪念列宁的文章。三篇大作分别由胡乔木、陈伯达，还有什么人执笔，统一由毛泽东定稿。毛泽东实际上充当了“全国一盘棋”的唯一的九段，也是“全国

一张报”的总主笔。后来有人曾经设想，以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办《湘江评论》时的大笔挥洒，如果后来做报人，会办出怎样一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日报，一纸风行？我以为不用猜，后来除了重庆的《新华日报》，他在延安鞭长莫及外，哪怕是博古当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也还不能脱离毛泽东的影响，更不要说毛泽东直接操刀写下的那些社论。说回来关于列宁的三篇文章，手法也是惯用指桑骂槐，指东说西。纪念列宁者，也是敲打苏共，暗讽揭露批判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也。

说唱团的节目，不管是说的，是唱的，尽管已经登堂入室，不再是“撂地儿”的“杂耍”，升格为体面的“曲艺”，但恐怕高攀不了配合反修斗争的重任。好了，现成有个国内任务，需要以曲艺一

类“尖兵”配合，那就是北京宣布要办城市人民公社，这跟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北方曲艺，简直是配套的内容和形式。单弦又是北京特有的。团里商量搞个能造声势的“单弦联唱”，这个任务竟找到我。为难了。我可以写“合辙押韵”、一韵到底的大鼓唱词，但不会唱单弦牌子曲，就像不熟知词牌就没法填词一样，我怎么给他们的“单弦联唱”写词呢？单弦演员，也是我的芳邻马增蕙鼓励我：你甭管那些，你写整齐的也行，长短句儿也行，我们来处理。有她这句话就好说了。我其实根本没弄清北京市要搞的“城市人民公社”是怎么个构想，但这个创意显然来自农村人民公社，还不是那一套？一大二公，不再拘泥于街道办事处的小格局，挂上一个公社的大牌子，管的地界越大越好；再就

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都麇合到一块儿多热闹，多火炽，多繁荣！岂不是春光荡漾，喜气洋洋，联唱就定题《满城春》，晚上赶出，上班交稿，我再也没有问，听说排练出来，听说录音演播了，我没敢找来录音听听，也不知我写的长短句，经马增蕙们处理，跟曲牌子怎样磨合的，我对城市人民公社的“畅想”，也没有多少创造性，其实可以说，有意无意间，它就是一九五八年春田汉老同志写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的摹仿吧。

让我惴惴不安的心理得以纾解的，是北京“城市人民公社”之议无疾而终，谁也说不清是在哪一个环节上、被哪一票否决，而且更不见首都先行，各地群起效尤。半个世纪过去了，竟也未见有人重

提，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件事。我也不必担心瞎写一通结果会“露怯”了。

我去说唱团，主要是让我帮助相声组记录传统相声。相声组有四位老艺人，侯宝林和他的搭档郭启儒、郭全宝，还有一位说单口的刘宝瑞。由学员成为青年演员的马季、于世猷。每天一上班，有个从理发徒弟转行来的宋红，先到锅炉房打来开水，给师傅们把茶沏好。老师们喝茶是很讲究的，怕还是各有讲究，比如侯宝林喝的特别酳，这是几年后我跟他在“黑帮队”里同班时才知道的。当时我并不太留意。写小说的朋友注意细节，我以写诗而原谅自己的“大而化之”，不过我也有一个“好”，就是不瞎打听，肚子里装的别人的隐私，不能说绝对没有，却比较少，也就不大传话，不介入别人的

矛盾。但又带来一个毛病，不知道谁跟谁有矛盾有“过节”，不知道什么时候无意中说什么话，也许被有关的双方误会，两边都得罪了。

不过好在我有时候得罪了人自己还不察觉，处之泰然。老朋友知我，说我傻，就是这么回事。

在相声组，我不喝老师们的茶，自己也不喝茶，渴了喝口水就是。在一上班大家品茶的时候常常是谈天说地，谁扯起个话题就能说老半天。这样，还没把主题回到记录传统相声上，“配合任务”的任务就来了。

相声讲求滑稽，幽默，没法配合纪念列宁这样格外要求严肃庄重的大事，但讽刺是其所长，毛泽东在延安就强调了对敌人不妨使用讽刺的武器——敌人是打击和消灭的对象，即使讽刺的分寸上出点差

池，也无伤大雅。因此可以放手干。国际上的敌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反对美帝，天然合理，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确”。一时流行的国际题材漫画，就是这样做的。漫画可以做到的，相声也应该能够做到。

五六月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东京。侯宝林提议，搞一个小段子配合一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这样凑起来，虽然前面的叙事只是铺垫，总算中间还翻了两三个小包袱。起了个题目，叫“哈格蒂打前站”，段子不长，一审通过，居然很快付诸广播。侯宝林和大家都受到鼓舞，接着搞了个《艾克外传》，不叫艾森豪威尔而叫“艾克”，并非亲昵，而是轻蔑，也通过播出。于是侯宝林想弄个更长些的，不那么新闻化的段子。这就要以美国

的生活素材作基础，至少拿美国背景做个点缀。可是从一九四九年“别了，司徒雷登”已经十年，广播局这样的要害部门连一个留学美国的都没有，向谁去打听？我忽然想起了李敦白。李敦白，现成的碧眼高鼻的美国人，不是已经回到对外部英语组好几年了吗？

李敦白，二战期间先在斯坦福大学学会了中国话。一般外国人说中国话，最难的是掌握不了四声。他讲话有四声，音调自然，颇难得。一九四六年，作为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职员来到中国，由于特定的机缘，他到了中共突进湖北的中原解放区，大别山下结识了李先念和王震。救济总署撤退，他没跟着走，留下来，到了张家口。张家口被国军攻占，他徒步去延安，进入陕北广播电台，并很快跟

陕北台的英语播音员魏琳结婚了。但世事变化无常，一九四九年初，电台的人都在河北平山等待随军打进北平的时候，有一天来自上级机关的师哲请李敦白跟他一道乘一辆军用吉普出发。李敦白还以为他成了进入北平的先行，或是需要他这样身份的人在作战双方之间做些相应的调停中介工作。他完全想错了，他不会想到从此开始了他在异国他乡六年的监禁。事情说简单也简单，斯大林晚年要开始新一轮的大清洗，以美国间谍罪名逮捕了《莫斯科新闻》主编，这位主编的妻子就是有名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访问过延安，第一个报道了毛泽东称原子弹为“纸老虎”的高论。一个牵连一个，李敦白是受斯特朗牵连的。中共曾经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虽然已在一九四三年解

散，但苏联一个电报，指令要控制李敦白，此间立即雷厉风行执行不误。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苏联共产党开始清理旧案。斯特朗的丈夫早已处决，斯特朗本人无罪开释，于是监禁在中国的李敦白也获自由。我看到的李敦白，就是一九五五年走进西长安街后院的这个已经谢顶的美国人，穿着平常的朴素的西装，但彬彬有礼，对正面看他的中国人，——点头致意。在他归来前不久，妻子才正式跟他离婚。此时李敦白已经又是孑然一身。包括我在内，都觉得对他有某种歉意，人家毕竟是远路迢迢来参加你中国革命的呀！平白无故地关押了六年，正是新中国上升的最初六年。他回到中国的“人民”中间来的时候，乃是中国正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从“人民”革除教门，

并且陆续关进监狱的那个夏天。

五年过去了，我到英语组去找李敦白，说我现在帮助说唱团工作，侯宝林有些关于美国民俗的问题想请教你……他答应得非常干脆，定下日期就来座谈了。

侯宝林构思的，是美国总统对自己的侵略扩张行为信心不足，要乞灵于上天的帮助，让他正式进教堂做礼拜不合适，问美国有没有类似中国会道门之类的迷信，李敦白听明白他的意思，说有有有，于是介绍了一种叫“降神会”的仪式，类似我们北方民间的“跳大神”，四川的“请斋公”，甚至“一贯道”的“扶乩”。轻而易举地给侯宝林提供了一个段子的构架。侯宝林执笔的《降神会》很快就完成了。

那时李敦白公开对外的身份是美国《工人日报》（美共机关报）记者（或特约记者，我记不清了）。没听说美国当局以“里通外国”参与反美宣传责之。倒是一九六七到一九六八年间，李敦白正积极投身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且一跃而为广播局造反派夺权后由“中央文革”任命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红极一时，但也只是一时，旋被“中央文革”关押监禁，这次所谓“二进宫”长达十年，直到八十年代初他带着后来的老婆孩子和被捕期间扣发的工资回到美国。那是后话了。

这一次配合反美宣传，在相声组做得很“成功”。整个一九六〇年春，全国在“高举列宁主义大旗”同时，还掀起一浪一浪“支持各国人民反美正义斗争”的“群众运动”高潮，游行示威什么的

我没参加，对于南朝鲜，少儿节目约我写了一首配合的诗，对于日本，我在相声组出了不少主意，对于土耳其，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我竟也出手了。当时的斗争目标是名叫曼德列斯的政府总理，他的什么作为引起国民反弹。我记得在《译文》上看过土耳其作家拉吉兹·涅辛的短篇《手续》，写政府官吏官僚主义，硬是把一位老妇当作壮丁征去当兵，老大妈到处申诉，却因手续繁冗，拖下来不得解决，故事写得妙趣横生，我据此改成一篇相声《土耳其见闻》，交给马季。他很感兴趣，动手改成演出本，题为《土耳其抓兵记》（这才像相声的标题），其中还加了个包袱，把曼德列斯唤作“慢点儿勒死”，这种渲染暴力的噱头，在一片反这反那的氛围中也赢得一片喝彩，他和于世猷搭档演出

效果不差，录音入库。只是这样“配合”一时宣传任务的节目，由于土耳其的事件时过境迁，很快宣布过景了。

现在回忆一九六〇年的春夏，但觉乱纷纷的，大家都没闲着，折腾得够呛，折腾过后，大脑落得空空荡荡。我当时在历史指派给我的狭小缝隙里，自觉游刃有余，应对自如，少儿部的约稿（如为五一节的“小喇叭”写的《小圆圆的一天》等）都及时演播了，相声组的“集体创作”，高高兴兴地胜任愉快，虽然我并不大重视这些参与的成果，从未找收音机听听有关的节目，但我写的东西得以通过，周围的人满意，我觉得就没白干。这时候都没工夫抱怨我在报刊上还不能发署名文字，但有广播让我当幕后捉刀手，好像也得到了有限的满足，很

阿Q地乐于效命，好像鲁迅说的“做稳了奴隶”，我以为“做稳了‘人民’”，可以跟所有人民一起“指到哪儿打到哪儿”了。不但倾心于古巴的“革命”，这年春天我还作为中国之“人民”的一员，自发向古巴捐款，寄到某单位，连张收据都没有。

老相声“四大本”，构成了“大搞封资修”的罪状

“打”了一阵儿以后，回过头来干传统相声的活儿。马季、于世猷有文化，他们已经趁没有演出的空档，把老师说的传统段子用笔记录下来（那时候说唱团还没配备录音机）。我拿到手，先浏览一遍，有别字改过来，明显的错漏加以补正，有的北京方言特有的字，我尽量找出合适的字用上，手边一本罗常培先生的《北京话单音词汇》多半能派上用场，这让老师们，也包括马季、于世猷感到我还真有点儿文化，遇见什么问题知道该查什么书；又比如刘宝瑞想把老段子《地名对》翻新，想找北京

胡同名，我第二天就把有关的资料备齐，他们十分惊讶。我这点资料工作，使我在相声组“充圣人”——这是旧时对半吊子文人喜欢卖弄的嘲讽和挖苦。大家对我不但没有嘲讽和挖苦，且让我感到，我能帮到点儿上，是个有用的人，很可以自慰了。如果说还给大家帮过什么忙，那就是我推荐了赵少侯译的三卷本《莫里哀喜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读后，发现莫里哀这位法国宫廷艺术家，在他的舞台喜剧中从铺垫到“抖包袱”的技巧，竟跟我们中土相声的祖传路数不谋而合，我惊喜于这个发现，立刻把这份“独得之秘”带到相声组共享。侯宝林识字，并能努力阅读，我估计至少他和马季、于世猷都买了莫里哀的剧本。

那个阶段，我每天上午到相声组的平房去，一

起议论议论已经记录下的老段子，有时听老师们说些相声界的旧事，我读老相声的一些感想和看法，有时也讲出来求教。后来工作告一段落，领导要求写一个总结材料，我就写了一篇相声组议论传统相声情况报告，里面大体上把经过记录的近百篇老相声从内容、题材、体裁作了分类。老团长白凤鸣对这份成果十分珍视，他请示柳荫决定把稿本印出来作为内部资料。没想到，他在那样的时代，居然弄成竖排线装，虽不是印刷品，但蜡版刻印工整，版面疏朗可喜。每卷二十篇，陆续印了四卷，八十篇，第五卷还没出来，“文革”开始，无法赓续。这还不算，一夜之间，这四本老相声忽然变成说唱团在走资派柳荫策划支持下，在反动权威白凤鸣、侯宝林和牛鬼蛇神老艺人，以及右派分子邵某共同

操作下，大搞“封资修”，复辟封建糟粕，向党进攻的一大罪行，印出的“四大本”自然成了罪证。好像一共印了一百套，发送范围很小，这一来，说唱团保存着还没发出去的，大概难逃销毁之灾。发给我的那四本，倒是没毁于“文革”之火。我母亲爱听相声，早就送给她当消闲读物，但也没留住。“文革”当中某一天，有位邻居大嫂来串门，看到床边上的“四大本”，问起来，母亲乘兴说起怎么看着看着都忍不住要乐，那位大嫂说借去看看，就这么流失了。不过，肯定不是拿去告密，交出“四旧”，是街坊邻里拿走传看去了。

现在有关这段工作的文字记载，只有我起草的上述《说唱团议论批判地继承相声遗产问题的情况》（1961年5月），经柳荫审阅，不知以什么名

义送给了中央领导人陈云，他当时正在抓曲艺工作。此件我一直保存，后作为附录收入我的人生实录《人生败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前两年，有一位博士研究生来找我，要问问当年我在说唱团“整理”老相声的事情。听他的叙述，是看了我关于议论传统相声的那篇文章才来的。听他所提的问题，我明白了他的“导向”，他是带着结论来找印证的，那先验的结论，就是我（当然首当其冲是我）秉承上级的旨意，以“记录整理”传统相声为名，实际上干的是篡改传统相声，使之适合极左时期宣传规范和政治需要的东西。他虽没这么说，听话要听音，我又不是完全的傻子。我只是告诉他，我们之所以要记录老相声，拿我和周围有关领导和同事的共识来说，正是为了

挽救它，因为多年来社会上和界内流行着某些一笔抹煞老相声的论调，许多老艺人也视之为畏途，这样下去，传统相声不禁自禁，但年轻的一代还得从老段子里面学艺，我们不能看着它就这样消亡，因此才来下记录的功夫。因此，我们（首先是具体干活的我）当时所持是谨慎从事的态度，并不是对着记录稿大刀阔斧，横加删改，像我们听说过的，五十年代所谓戏曲改革中一度发生过的那种情况。如那总结材料中指出的，要认识到老相声里有些明显有害的附加性的东西，如拿残疾人开涮，拿亲人长辈取笑，对妇女的不敬，对农村人的歧视，在我们继承遗产时是该加以扬弃的。我们重在记录，不轻言整理，更没有往里面添加什么——不管是思想还是语言。当时这项工作，没有悬更高更大更远的目

标，只是为了给说唱团留教材，也为说唱团扩大演出曲目提供备份。那时相声组差不多每周都应召参加中南海的晚会，不能老是《戏剧与方言》、《关公战秦琼》吧，毛泽东要求听老段子，而且要求尽可能原汁原味的。……如果按照现在的规范来做，这样的工作一旦立项，第一步记录工作，就要有录音，根据录音搞出一字不改的记录本；就相声来说，一个曲目，应该搜集不止一个版本，甚至一位演员也会有不止一个演出本，且都要保持原生态。这样近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留和存档，也许根本是同供演出曲目的备份不沾边的，带有纯学术研究性质。在一九六〇年，至少我没有这样的远见和这样的学术规范训练，当时我们的工作也没被赋予这样重大的意义，更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了。

但我既拿不出当时老艺人原生态的相声（今天知识界健在的人士，且曾亲耳听过例如天桥的相声的，最年轻的也只有年届七十的王学泰等几位了）的记录，也拿不出经我手点定的这批相声记录稿，我无法“自证清白”，说我不曾粗暴地对待传统相声，所以只能尴尬地送这位研究生出门，请他再找找可能多少了解当时一些情况的人，比如一九六一年到说唱团工作，对相声研究有得的薛宝琨教授，找找或仍有人保存的“四大本”，比如马季，我估计他虽在一九六六年头脑发热过，但大约不会捐出他保存的这份教材。他虽已故，但后半辈子一直在干这一行，他的遗物中应该有这份曾经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吧。

从一九六〇年春夏之交这一段，我较长时间来

去说唱团，跟团里的人熟识了，一直断断续续有所过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给他们改过、写过十来段唱词，但再也没像上班那样跟老师们一块喝茶聊天。

从这时起，他们一年总有一两次上南方去巡回演出，按当时演艺界流行的非官方说法，叫“抓膘”，本是放牧畜群的民间术语，也被不拘小节的文艺工作者引来自嘲了。因为北方城市中灾象渐显，江南和岭南都可算鱼米之乡，总会对前来演出的人有所招待。那时候不兴订合同，拿演出费，因为人民的文艺工作者，是无条件地为工农兵服务的，但总不能“枵腹”即饿着肚子说唱吧，招待得好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不为非分的。演艺界大兴“走穴”之风，“走穴”之名似是八十年代以后

才浮出水面，但“走穴”之实早已有之。这也符合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理论原则”，新演员、老艺人全可以让人哭、让人笑，毕竟是有一技之长，为他人所不及的。

主食、副食都不够吃了，小官僚们却在一旁大吃大喝

今天这样说陈年往事，可以出之以轻松的玩笑。当时这却都是严肃的选择。作为文艺团体的领导，是为了部属们略可改善生活，就像有的单位开始组织人、车到塞北打黄羊……而一般参加外出巡演的成员，离妻别子，就如灾区农民外出逃荒那样，尽可能把粮票多留几张下来，让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能够多吃一口干的，自己跟着大队南下总饿不着。不是也颇有一点悲壮之感么。

因为，饥饿已经临门。大饥荒的阴影，原是早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到一九六〇年，不经意间，已

经覆盖到北京的天空。

不久以前的反右倾运动里，已经把唠叨几句物资紧缺的人批了个三魂出窍，这时候谁也不敢说不够吃。粮食定量没减少，但没有油水，消化就快了。我上半年在广播学院上辅导课，是十点到十二点，一般从十一点起，站在讲台上两腿就软了，发抖，一直抖到下课铃响。

我曾庆幸从黄骅回来，在乡下时身体有一些症状，不治而愈。一九五八年秋天开始患了胃溃疡，一天也离不开胃舒平和三氧化铝。没想到返京以后，抛开药物，一切好好的。我归功于饮食正常，人家说这里也有心理因素，心情紧张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这是胃溃疡的病因之一。

我在讲台上腿软发抖，显然不是由于当时也不

排除会有的紧张、焦虑以至恐惧等心理因素。但我自知，这是一般性的推论；而我个人当时虽非没心没肺，但已麻痹，如在梦中，并未预见到什么山雨欲来之类的社会危机或个人危机，心情是安定的，甚至宁静的。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来自生理上的饥饿了。

但我像中国老百姓那样，习于自我安慰，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听说一九五九年我离开黄骅农场不久，冬天来了，这个冬天再也没有一年前我们来时正赶上“吃饭不要钱”的小热昏般的节日，而是开始挨饿了。头年冬天“冬闲”我们就已一天吃两顿，这一来，两顿稀汤寡水，李鸿章的重孙李道堪再也顶不住了。李道堪原是播音员中的佼佼者，播音用名李兵，多才多艺，有实力，播音水

平仅次于齐越,与夏青各有所长。他不知是不是饿昏了头,竟贸然出走,在茫茫荒原,摸索着向北向北,以为可以走到北大港,然后想法搭车,往天津亲戚家找条活路。但以他的身体、他的耐力,加上肚里没食,在远离他目标的地方,就走不动了,接着往前走,还是回头归队?这时,追索他的人已经赶到了。

听说这事,我欲哭无泪。

我不敢想象,李道堪回去将遇到什么?在被迫批判他的场面上,我那些同样食不果腹的弟兄们,还有什么底气发言吗?

上帝好残酷!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我们有什么样的原罪,需要遭受这样的肉体 and 精神的折磨啊?

苍天无眼！

如按照中国老百姓因果报应的说法，那我们所有中国人前世都犯下什么滔天的罪孽，要在这辈子来偿还啊？

没有深思的时间。更没有悲伤的时间。

现实生活的日程排得紧紧的。明天就出发，到良乡“十三号工地”去种菜！

“十三号”！这个不祥的号码！这里已经不是工地，这里是一座广播发射塔。铁塔下面和周围，围墙圈起了大片的禁区。像北京各中央机关都在搞“生产基地”一样，这里也成为广播局主要的“生产基地”之一。夏至将届，正是种菜的时令。为什么种菜，还用说吗？补机关食堂蔬菜之不足。这就表明，我们是为自己种菜（那时候远远不

知道食堂管理科在每个集体户口人员身上，每天克扣一两粮食！）。大家还是振奋的。我在大家提议下写了《种菜突击队之歌》，中国音乐组的张定珠立即谱出曲来，然后每天就唱着这支歌下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只管莳弄庄稼就是，我们却还要面对……人事。

我不知道这个“十三号工地”的管理人员是哪一级干部，但想来应属技术管理性质，它在业务上应该主要服从于技术部门的领导。但因有了“生产基地”，常来常往的却不见局里技术部门的人，而是总务行政方面的人飞车来去。有时也有一二名列领导的人，来了可并不跟种菜种粮食的一般干部见面，直接去“办公”。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我家先祖召公在两千多年前总结的话[\[1\]](#)。我们来

到这里，种菜之余，就听到一片对此地以至广播局“干部”层的不满。

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不能容忍任何的官僚，以及官僚们营造的环境中种种不公和不义。我一时忘了我就是由于“以反官僚主义为名，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打入另册的。但也许因为我当时确实只是要反官僚主义，而没有把反官僚主义提升到反体制，对组织仍然采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一“权威”评价，并以此支持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革命者”的信心。

我想到，我应该向党组织反映我所了解的有关情况。我也有顾虑，就是我的政治身份，但我最终是以“公心”打破了怕借题报复的“私念”。我想，过去反官僚主义，真也好，假也好，公开为

文，嚷嚷出去了，构成罪状，那么，我按组织程序办事，写信给机关领导，请他们抓一抓吧。

8月11日这一天，我给广播局局长又是党组书记的梅益，以及机关党委书记陈竞寰写了一封信。

为什么不给顶头上司、直接领导写信？因为涉及的不是我所属部门的事，而且我总认为层层上报，极易成为文牍主义的牺牲。何况如有哪一级领导为了保护我，或为了避免多事，也许会扣压下来。

还有一层，就是我对梅益品格的信任。

大约一九五八年秋后，文秀从下放劳动的沧县回京，上班路上遇到梅益，梅益问：“小邵怎么样？”她答：“还好吧。”文秀面对老领导忍不住多说了一句：“我到现在也没想通，他怎么会是右

派呢？！”梅益接着说了一句：“说不定哪天我也会成右派的。”这表明，梅益对党内生活的不正常，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是亲历深知的。有了这句话，还用担心他对我的进言会因歧视而不予置信吗？

我的信不长，没留底，大意是：听一起劳动的人说（我也目击证实了），机关行政部门一些头头脑脑，以到农场视察为名，飞车而来，飞车而去，中间不干别的，就是另开小灶，大吃大喝，不交钱票和粮票，统由会计报销。

在这封信里，除讲了这些事实外，说从爱护干部角度出发，党组、党委不应看着这些“老干部”犯错误，故提请注意；并说我是经过思想斗争，破除顾虑后决定向上反映的。

我的信从邮局寄出，不久，也从邮局接到梅益的复信，全文如下：

彦祥同志：

8月11日的信今天才看到。前此我已收到了几封信，反映的情况同你说的一样，有些还要严重些。“13号”我到过那里，也受到同样的待遇。此风确不可长。当时我对他们说了，看来还要作进一步的规定。

你说提笔之前“不无顾虑”，我看大可不必。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说，就发表意见，即使有错，也不要紧。谁能说他的每一个意见都是正确的？

看了你这封信很高兴，后面那一点顾

虑，虽然没有阻止你把情况和意见说出来，但如果今后能逐渐减少以至完全取消，就更好。希望能如此。祝你好！

梅 17/8

2005年时，我找到了这封旧信，曾写过几句话，说：“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也许想像不出，这几句心平气和的话，解除顾虑的鼓励，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又是写给一个‘摘帽右派’，并且恰恰是肯定他向党组织提批评性的意见，揭露机关生活中、老干部身上的‘阴暗面’……是多么不容易。——即使到了今天，类似的状况下，你以为容易吗？”我说，这里没说“官话”，“这是一种平常心，惟正直者有之。这也是

一种天真，没沾染官场的世故。……不过，用今天世俗的说法，则是：邵某冒傻气，梅益也冒傻气。”

因此，梅益之被指责为“右倾”，指责为“招降纳叛”就不奇怪了。由于我们这里所谓左右之辨，有着中国特色，混淆不清，我平时不大愿意以所谓左右衡人。不过，在习称极左统治的年代，而被目为右，那是极左视角的右，倒说明其正是持中居正了吧。

那么多人，主要是农民，替我们死于饥饿

机关里也在采取措施应对主食、副食都不足的现实处境。行政部门想出个主意，跟沧县和黄骅两地建立了一份“供求关系”。黄骅靠海有海产，沧县不靠海，却有不少水洼子，连冬天都可以破冰捕鱼。一两年后，机关里面闹起一桩“沧黄账”公案，就跟此刻所谓困难时期实即大饥荒中的一些丑闻有关，我至今也没弄清楚。不过想到，广播局所以跟沧县发生关系，始于一九五八年选择那里作为第一批下放干部劳动据点；而跟黄骅县发生关系，又是由于把局里的右派分子们送到黄骅的农场劳动改造。我既在沧县干过，又在黄骅干过，可以说在

广播局与这两地的“公关”中，也还不期然而然地尽过绵薄之力呢，谁知结果是清是浊？

编辑部在“救灾”中绝对不是主力。但我们也曾被叫出去参加打树叶的活动，据说是帮助食堂搞“叶绿素”，还听说食堂要生产小球藻，好像都没搞出什么结果来。又在食堂里看到一个大木桶，盛满了自来水，插进一根橡皮管子，还通上电，作轰轰鸣，据说是在做“超声波”试验，也是要用超声波达到“又要粮食少，又要吃得饱”的神话效果。但既称科学实验，就不是立竿见影立等可取立刻生效的捷径，即使不肯回头坚决一条道走到黑，也得百次千次地试下去才行，谁赔得起这工夫？终于也以不了了之。在《人民日报》上还看到一些报道，例如邯郸发明了一种“双蒸法”，说可以让生

米煮成熟饭后增加一倍的量。其实说穿了无非是多加水，捞出来再蒸，使米粒因含水而“膨化”罢了。

我并不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看笑话。那时候哪有看笑话的闲心。眼看文艺部一位编辑因为肚子饿“犯了错误”。他住在护国寺街麻花胡同宿舍，晚上回家路上，在护国寺街西口迤北一家副食品店，“拿”了一块点心，被抓住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但记得他身量高高的，当时听说越是身高体壮的男子汉，由于平时食量大，越是容易感到饿，饿不可耐（浮肿也是从高个子壮年人开始的）！我担心，是不是又要开他的会，让大家表态，那可该怎么发言啊？后来好像没听说开什么会。这可能是文艺部党支部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文艺部支部

书记，是秘书组的组长李新，一位中年的“部队家属”。我初到文艺部就认识了她，我和陈道宗虽坐在资料室上班，资料室哪有那么多人的编制？所以是“挂”在秘书组的。李新抗战期间参军，入伍前是学生。现在住复兴门外总后勤部大院。她丈夫是总后车管部部长，但她身上没有所谓夫人气，每天乘公交车（大1路，还是38路？）按时上班，勤勤恳恳，对人也平易和蔼，不板面孔，通情达理的。在今天看，则也近于“古典共产党人”了。我想，如果支委会决定不为那位当代的“冉·阿让”开批判会，李新该是起了主导作用。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明智选择，如按惯例开会，恐怕不仅两败俱伤，而且会数败俱伤的。

虽没开他的会，却把他下放安达了。我听说安

达这个地名，就在这一次。后来才知道，安达：地图上标出的黑龙江省一个小小县份，当时是石油大会战的战场，也就是长期保密一经公布震动全国的大庆油田。

现在回忆一九六〇年秋冬的事情，总觉得一片混沌。绝少晴和景明，时间往往在下午或晚上：打树叶，没多久，就暮色四合了；护国寺街口我也熟悉，那下班路上必然经过的百货橱窗，灯光要比别处亮，是不是也吸引着“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目光？大食堂不管是晚饭时冷冷清清，还是中午的排队长长，也许因为墙高窗小，给人的感觉不是天正黑下来，就是外面天阴下雨了……

也许是因为吃不饱的缘故？就在这种暗淡的感觉中过着早八晚五的日子。

也就在这暗淡的感觉中，对一部名为《太行风云》的长篇小说作了广播处理，供文艺部的“长篇连续广播”节目用。小说作者是时任山西广播电台台长的刘江，由柳荫持来，写抗日战争中太行山一带军民的抗日斗争，我感到亲切，并且直到今天还记得的一个细节，是由于缺粮，闹饥荒，当时干部每人每天发一把炒黄豆，放在兜里，实在饿了嚼几颗。大家基本上都躺在炕上不动，以节省体力来度荒。

那个秋冬，杨沫接受批评意见，给《青春之歌》主角林道静加写了在河北定县下乡一大段，大约三四个章节吧，是为弥补这个青年知识分子不曾与工农相结合的弱点。我把这一部分作了广播化处理，题为《林道静在农村》。也是在一片暗淡昏瞶

的气氛中完成的。

文秀已经怀孕半年多，她跟我同吃食堂，我都感到吃不饱，她怎么能不饿？更别说营养了，偶尔吃到一两条炸带鱼，她把鱼骨架放到暖汽片上烤干，研碎，意在补补钙，聊胜于无。我们商量，是不是出去下一次馆子，稍稍补充些营养，不记得是谁先提的，反正一块儿下了决心。当时下饭馆，有双重障碍：一是饭菜贵得吓人，一顿饭花平时十顿八顿饭的钱。当时我们没孩子，我老父亲还没退休，负担不重，咬咬牙还行；二是不敢堂而皇之地去。简直像是偷嘴，如果遇到哪位积极分子，给揭发了，就能落一个对生活供应不满，对党的政策有抵触的嫌疑，这是跟国家干部的身份和应有的“艰苦奋斗，共渡难关”的作风不相容的，至少要开一

两次会作检讨。好在冬天天黑得早，下班天已全黑。我们乘公交车西行，到终点站的公主坟，找一家小店，悄悄坐下，交了粮票钱票，买了饭票菜票，不言声地闷头吃。

回来以后，这一次“改善生活”的物质因素早已消化净尽，但它的精神因素还在拷问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背着党组织去吃了一次高价饭，而是因为我们背着父亲母亲，我父亲七十高龄了，还在辛苦上班挣那份工资养家，我母亲不时的胃疼、心绞痛，他们不是一样定量有限且油水不足么？！我们置他们于不顾，于心何忍？但要陪他们下馆子，他们肯定不干，即使他们勉强同意，一同上街也困难多多。今天的读者会问，出门打个出租车不就解决了吗？那时候没有出租车啊。由于燃油不足，北京

城里能够看到的一些大汽车，都是在车顶上驮着个大汽包，除了出入中南海的“红旗”，连一些机关的公用车也已经艰于爬行了。

我们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老家儿，却忘了我们几亿衣食父母的农民正在大饥荒中忍受折磨。

我们当时竟以为，广大农村的境况会比我们城里人强得多，理由是他们不但有自留地，还可以利用宅旁园地莳弄些瓜菜，领导号召的瓜菜代，他们实行起来比我们得心应手啊！

错了，完全错了！错在哪里，今天已经不用多说。

我们优游在大饥荒的边缘，农民已经从饥饿线上被赶到死亡线上了。

近五十年后，二〇〇八年清明，我写了如下的两

段话：

我从今天人们观念中对“这个人”，对“这一个人”的铭记和怀念，想到了近五十年前大饥荒中的三千多万死者。那是在和平时期，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统称“三面红旗”），持续到1961至1962年的三五年间，主要是“人祸”（而不是过去谎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所致。其间饿死和非正常死亡约3755万人。大多是农村人口。在某些灾难严重的省份和县區，有一个生产队，一个大队以至一个公社（相当于一个乡镇）全部死绝的（河南信阳一个专区竟死了

一百多万人！)。他们默默地以卑微如草芥的生命承受了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承受了违反法律违反人情违反常识的灾难性后果！

而从那时起的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册历史被尘封到阴山背后。我们，死难者的同代人和后人，由于种种原因，对几千万的死者采取了不可原谅的漠然的态度。例如包括我在内的，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城市中人，特别是大城市中人，当时是靠特别调拨的粮食得以维生，虽有小不足，饥肠辘辘，面有菜色，甚至浮肿，但不致命。我们的存活是以三千多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三千多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

的。然而我们在四五十个清明节，有多少人想到为这些饿死的冤魂烧一炷香呢，其中许多死者已是没有后人的绝户！我们不祭奠他们，谁去祭奠他们？

这是迟到了五十年的觉悟，这是迟到了五十年的良知。

而在一九六〇年那个秋冬，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在昏暗的天色和灯光下，我正和一些“侪辈”如饥似渴地拜读十月间刚刚“欢庆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学习会上，大家不知说了多少歌颂性的话语。记得对外部曾经组织阅读竞赛，每天张榜插小红旗；我们熟悉的一位燕京大学校友，获得一夜间阅读若干页的冠军。当她读到第

四卷最后部分的时候，读到《别了，司徒雷登》，会不会想起他们的老校长？她会从心眼里认定司徒雷登校长是个处心积虑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吗？她会真的相信这个把大半生献给中国教育事业的基督徒，是个居心叵测、诡计多端，以危害中国人的自由幸福为目的的政客吗？

据说，司徒雷登晚年常常朝着中国的方向眺望，并且在给秘书傅泾波的遗嘱里，希望将骨灰安葬到燕京大学校园——燕园。他当时若知道这位燕大学生的最新表现，不知道做何感想。不过，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事情总在起变化，这位燕京校友在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不久，说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和前途，离开中国，到老校长的故乡定居去了。

我无意揭这位老同事的短。在那似乎漫长其实也很短暂的几十年里，我有过不少堪称“人生败笔”的言行，或远远甚于什么“毛选竞读”之类的作秀，更不限于我说过的在我是“可耻的十年”之间，怕是从更早就已开始，不过在反右派斗争把我划入另类后，公私不同场合人格的分裂，人前表现和内心活动的悖论更加突显罢了。

毛泽东的《矛盾论》综合了前人的学术成果和思考所得，也不排除当时陕北一些哲学工作者的参与，总归是值得一读的。我之意识到自己其实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便得之于世界上矛盾的普遍性这一命题的启示。比如，我一方面走来走去的是一个“摘帽右派”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在我的内心生活里始终未变的，则是以一个革命者（而且恰

恰是共产党意义上的革命者）自居，以此为精神支柱，以此为道义制高点，以此为自尊心的后盾。这样，我在从反右到“文革”前后的时空里，都能泰然甚至傲然面对一些趁乱投机的政治小丑、打手乃至身居高位但为我所不齿的人。而在服从革命利益的高调下，则不惜放弃、牺牲了个人的尊严，所谓“不向任何个人折腰，但无条件地俯首向党，‘俯首向工农’”云云。

第二章 一九六一年

我们将成为爸爸妈妈，我母亲将要当奶奶了

如果说摘掉标志敌我矛盾的“右派”帽子就是“回到人民队伍里来”的话，至今我已重新过了一年多“人民”的生活。

“人民”怎么生活我怎么生活，“人民”怎么干活我怎么干活，“人民”怎么说话我怎么说话，一切随波逐流就好——用老话说，就是随遇而安，安于自己的位置，不“越位”。

可马上要迎来我“自己的生活”了。我要当爸爸了。在这份自己的，不与广大人民共的生活里，我的位置很明确：初为人父。

好几个月之前就要做准备，却不知从哪儿做起。总得自己起伙了吧，先买了一个小火炉。有锅没屉，为了买一个蒸东西的竹屉，还要先开证明，因为缺货啊（小手工业都“改造”了，大跃进把农村副业也挤掉了）。文秀跑食堂办公室退伙，就是要求把我们两人的粮油关系退出来，归还到我们户口本上这件事，颇费周折。后来才知道，食堂的基础建立在集体户口上，集体户口上的粮食定量全都交到食堂。打从粮食供应紧张，食堂就按集体入伙的户头，在每人身上每月克扣一斤。自然，大家发现不了，因为发给你的内部粮票，数额跟你定量还是一致的……终于还是退出来了。我们可以凭本（粮油购买证）凭票（本市粮票）自己到粮店买粮食了。

孩子在复兴医院落生，母子平安，那天是阳历二月九日，阴历的腊月廿四。生怕耽搁，过期无效，拿着出生证，就去月坛街道办事处报了户口，找粮油办公室改了本，不但领下了二月份一个人份内的各种票证，还有春节的一份，是我们没想到的，回到家，笑说：“这小家伙赶着过年来了！”

两口之家成了三口之家，小闹闹也算一个人了。

当爸爸的快乐，是无以名状的。什么叫全心全意？总是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认也问心无愧，拿来一比，为那个抽象的人民服务，只是尽心而已，说全心全意是打了折扣的。对眼前这个动不动就放声啼哭的弱者，却是全身心地扑上去，为他付出什么代价都没的说。我要对这一个新生的，除

了哭以外还不会自我表达的小生命负责，怎么疼爱都不过分。高尔基也罢，奥斯特洛夫斯基也罢，说什么连母鸡都会爱它的鸡雏，把亲子之爱贬得无以复加，他们不懂，他们连老母鸡都不懂，又怎么懂得做父母的人！奥斯特洛夫斯基自己没有儿女，挺可怜的，不去说他了；高尔基有儿子，大概他像公鸡一样，昂首阔步走开，把妻儿撂下不管，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什么发言权！

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都是我多年敬重甚至敬爱的作家，但我想起他们认为出于天性的亲情一文不值，跟我的体验和认知严重分歧，而且他们言之凿凿的结论性说法，流毒甚广，尽管人们未必真的相信，但也从不见有人批驳。我不惜用最恶毒的话去咒骂他们了。如果有失礼的地方，以后再道

歉好了。

亲子之情，这就是：爱和责任。

痛感我的责任重大，又痛感自己的无能。但我是兢兢业业，如临如履，时时处在揪心状态中。到了满月，还是把闹闹送到船板胡同奶奶家去了。

许多年后，想起闹闹两三岁，带他上王府井百货大楼，转到玩具部，他一眼看到一辆小自行车，仰起脸对我说：“咱们不买”，这是让我安心，接着目不转睛地看了多时，又说：咱们走吧。当时我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块，抽紧了一下。用“负疚”来形容那心理反应，显得隔着一层。不知道奶奶是不是带他逛商店看过什么，嘱咐他：咱们看看，咱们不买，这样形成了条件反射？我还记得，有一次带他上胡同西口外的高台阶点心铺，说去买“米面蜂

糕”，他一阶一阶上去，一进门，就大声有节奏的念叨：“米、面、飞、糕，米、面、飞、糕……”好像兴奋得不行。吃和玩，小孩子的两个基本愿望，因经济条件、物资匮乏而不能得到满足，这是天下为人父母者的遗憾，也是安徒生讲“卖火柴的小女孩”故事时，把矛盾推到极端的痛心。安徒生“以天下父母之心为心”，不限于一家的亲情，自然是更博大了。但也是以亲子之情推己及人的吧。

上海有个工人作家，我没读过他别的作品，只读过他最早发表的一篇，写他小时家穷，买不起肉吃，有一回从垃圾箱捡回一块带肉的骨头，熬汤喝了，全家泻肚，小妹妹中毒，又没钱治，死了。我相信是纪实，所以能感动人。而感动人的核心，不

是有人中毒而死，而是文中对死去妹妹的痛彻心肺的怀念。

我相信，没有亲情的不是人。因此，到“文革”后期，听说他写了篇《走出彼得堡》，对文艺界落井下石，我总不愿意相信他会自觉做这样的选择，想，是认识问题吧……

闹闹小时候这些旧事，大概都发生在他记事之前，他不会记得了，我也从没对他提起过。就像鲁迅《风筝》一文里，那个儿时把弟弟做一半的风筝抢走毁掉的兄长，多年后向弟弟说起时，另一个当事人早已忘掉了这件事。

我为了平息负疚的心情，告诉自己，从这儿正看出他从小就有自我克制的能力。他是怎么克制的呢？有一次我要给他讲《白毛女》的故事，开了个

头，他就说不讲这个，原来他可能听过，或是发觉故事要朝伤心处发展，他自觉回避了，如果不叫逃避的话。唉，人的成长过程，再细心的父母也不能监控每时每刻每件事。这样想着，我也就采取这样回避的对策，把想不下去的通通放到一边去了。

不问民间疾苦，一心还只想写作

闹闹送奶奶那儿以后，我们宿舍里的生活又简单了。还是上大食堂打菜打饭。有一次，非年非节的，不知怎么有一块肉，我没舍得吃，中午赶着送回船板胡同去，让闹闹尝尝鲜。那应该是在他半岁以后。反正一九六一这一年，整个还是笼罩在饥荒的阴影下。黑市的鸡蛋卖到八块钱一斤，差不多一块钱一个鸡蛋！那时我们不知道全国的情况，更不知农村的情况，以为北京大城市，人口太多，显得“供应不足”；又以为农村里有自留地，有宅旁园地，可以种点这个那个，总比城市活泛。哪知道，北京作为首都，国内外观瞻所系，享受着全国

的支援。我们听说的只是身边有人浮肿，哪知道广大农村已经饿死人！那时候很少有人说“物资匮乏”，顶多是说有些“供应不足”，而从报纸广播了解到的，主要是因为天灾，老天爷不长眼，但这两年没听说什么地方洪水为害，大概主要是旱灾了，时见报道，这就是我在一阕《满江红》的上片里说的：

何物苍天！连年价、与人作孽。
几多顷、禾苗枯槁，旱云明灭。
忽报山东四月雪，又传河北多龟裂。
没来由、更起打头风，横肆虐。

我能做什么？只能仰望万里无云的晴天，如我

在一首新诗《春雨》里写的：

三千米上空风云来去，天涯一似在咫尺之间。长天不见关山的阻隔，寥廓万里而息息相关。

河西走廊一八百里秦川，河套平原到渤海岸边，酿雨的云朵正向东运行，一路把云影投落地面。

是报雨情呢，还是催青？田间低飞过一双紫燕。若及时降下一犁春雨啊，看明天满眼的黧青湛蓝！

但如果高空中雨水有限，还不能遍洒广阔的幅员，那么云啊，就请先带着如油的春雨，去润泽焦渴的他乡邻县！

我并不知道“他乡各异县”的真实灾情，以为只是下不下雨，下雨多少的问题，心目中甚至没掠过“饥荒”这两个字，更不用说大饥荒了。很难想象我若是知道了，我会说什么。有些家在农村或是有亲戚在乡下的同事，应该不是全不知情，但他们都三缄其口。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有些来自农村，“根红苗正”的人，也因为说了一句两句农村真相，打了右派没商量。广播局对外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归侨多，这几年不断从海外寄来的包裹，多是各样的食物，看来他们的家人亲友，虽在境外，对内地灾情了解的比我们所知要严重。

我们太相信舆论宣传了。一九五六年，听说了斯大林的罪行，我们相信这样的事情不会在中国发

生，因为我们有党和毛主席掌舵；一九六一年，我们相信，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继续高举三面红旗”，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还有及时制订的“农业六十条”就一定会克服“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暂时困难。而且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下达指示，要各级干部加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力戒浮夸，“假话一定不可讲”，真是谆谆善诱，各级干部听了能不感动？那么大跃进时各级干部闹出的高指标、放卫星、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等等的“后遗症”，也就会逐步消除了。

那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耳目闭塞的。顶着“摘帽右派”身份、息绝交游的我尤甚。强制施行的思想改造，不止是改造一些思想认识，改变一

些既有的看法，灌输一些“政治正确”的观点，而且改造着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诸葛亮说“苟全性命于乱世”，周作人却说“苟全性命于治世”，是继承并发展了诸葛亮思想吧。我的生存环境，当然是治世，不管“四海翻腾”，“五洲震荡”，大陆是超稳定的。直到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被发动起来，为的是“经过大乱，达到大治”。那是后话。我相信党所教导的“相信党”，就跟千百年来“莫谈国是”一样，不仅写在茶亭酒肆，也应该写在每户人家里。绝对相信，则绝对放心，也正是京剧《失街亭》里两个扫地的老军亲聆的诸葛亮思想：“国家事用不着尔等操心！”你操心那么多干嘛？最为国家事操心的，不是都打下去了吗？还不接受教训？许多年后，已故诗人郭小川的儿子郭小

林，饱经沧桑后，把一些人说成“口吐铅字”，那铅字指的就是党报上的社论和政策方针。广播员当然是“口吐铅字”，且要一字不差，甚至为人师表的教授、教员须练得“口吐铅字”，就是讲话能够登报的，集政、教大任于一身的领导干部，也都是“口吐铅字”。我住在机关大院，早已不自费订报，虽有收音机，并没有听广播的时间，这样，只有在班上每周一到两个下午的学习时间，才经由读报接受铅字的熏陶。

只是积习难改，不能忘情于所谓文学。我还是拿自己的工资订阅了《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世界文学》和《文学评论》，说来可笑，不是为了文艺欣赏，而是为了了解文艺界的动态，包括我认识的和不认识但知名的作家、诗人，

没打下去的，还在写什么……更可笑的是，要从这里汲取力量，什么力量？一早在一九四九到五十年代初，我对新格局下的文艺界力求适应，但屡遭退稿，不免沮丧以至心存畏惧的时候，是我看到报上不断发表原已成名的前辈或并未成名的新手写的不像样的作品，都从反面鼓励了我，重新投入创作，奋起直追，甚至像一九五八年响当当的大跃进口号：比、（学）、赶、（帮）、超！

我后来对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讲经历、讲体会的时候，常常强调了读优秀作品，更不用说必须读经典之作，会自然地生发模仿之心，“取法乎上”等等，隐瞒了不好的作品也会成为从另一边驱使我写作的动力。

一九五八年在沧县姜庄子，看了当时报刊上连

篇累牒谈“毛（泽东）诗”的文章（老实说，除了臧克家、周振甫的注解不论外，那些年我看只有佛雏的一篇确实具有学术色彩）。于是手痒，也写了一篇“论毛泽东同志诗词风格”的札记，近万字，自觉有些新意，化名投给刚刚创刊的《红旗》杂志，责任编辑刘际启到我留下的船板胡同地址家访，据说有采用之意，后来“政审不合格”，泡汤了。嗣后二十年，我再也没生化名发表作品的邪念。

在那前后，每从偶尔看到的《人民日报》上见有郭沫若的《百花齐放》组诗，配以刘岷的花卉木刻。我写了一首《稻花》，副题标为“拟《百花齐放》”，暗中有跟郭较劲的意思，当然我这诗发表不了，他也无从读到，不过我的心态是不大服

气，也许潜意识里还因对他曾有两句诗指我“有一位诗人把你（长江大桥）比作洞箫，我觉得比得过于纤巧”，早就不大服气。说得再挖苦一点，在这样跟没“落网”的人攀比的时候，其实心态几乎无异于两千年来士大夫在皇权下怀才不遇或恃才争宠的味道。正常的人都嗅得出来，那可不是什么好味道！

没“落网”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在反右派后一窝蜂地歌颂毛泽东诗词的作者们，这时也都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在砧板上今天不知明天地过，除了少数人会对我们已落井者再抛下几块石头以外，即使见了我们立即退避三舍的，也是因为要“苟全性命”，并没有“相煎太急”的表现。而我还在服气不服气上以他们为撒气的对象，

是找错了人，远离了人间最可贵的悲悯之心，最起码的宽容之心，鼠目寸光，鼠肚鸡肠罢了。

从根本上说，还是不满于把我划了右派，戴上帽子，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其实质是剥夺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一系列公民权利以至政治权利。但我斤斤计较的，却只是能不能发表作品，可见所见者小，也可见“脱离政治”的毛病是一以贯之的，把我当作政治犯来打，这防范于未然的措施，提前量太大了。

话虽这么说，我现在赖以混饭的活计，毕竟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

戴着枷锁跳舞，职务写作也劳而无功

从一九六〇年起，我和陈道宗就一直在帮助柳荫起草改进音乐广播和整个文艺广播的方案。改来改去，无非要用曾经有过的比较宽松时期的做法，借助于当时一些领导干部（如任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艺的周扬等）的讲话，力求“有理有据”地摆脱大跃进以来的新桎梏。不过，要抛出这个“改进”节目的方案，在当时没有上级领导表态，终究冒风险，因为到那时为止，政治上还尖锐地存在着“高举三面红旗”与“反对三面红旗”的分野。中央台的文艺节目，沿袭着大跃进以来，经过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而更加高调的安排，每天都有一

个题为“三面红旗万万岁”的专题节目，这节目如一旦取消，岂不是颠覆性的行为？

小形势跟着大形势走。随着“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文艺方面也出现了渐趋松动的领导意图。应该不是一般的所谓领导，而是高层。比如柳荫传达，梅益讲：“现在物质生活匮乏，要让文化生活丰富起来”，这绝不是梅益的话，而是来自上面的意旨。这样一来，就可以直接切入具体节目的操作，用不着先提交一个泛泛的从原则说起、试探地进入节目设计的改进草案了。

我和陈道宗都离开了文艺部资料室，我有了一个单人的办公室，陈道宗索性坐到了（中国）唱片社。但我们在柳荫的棋盘上，都是直接间接为中央台文艺广播服务的。

我这回为了找回记忆，从尘封的故纸堆里翻到编写《人生败笔》时索引的老资料，在向“文革”小组交代的时候，写过一个目录，是我曾经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写过些什么东西，其中凭业余爱好写的东西，一直都有印象，而作为职务写作的东西，的确记不牢。看了记录，才想起来，我在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为中央台文艺广播编写过一些节目，《列宁喜爱的音乐作品》有七八个单元，播出后有反馈，故有印象。这一套专题，不但有《国际歌》、《马赛曲》、《华沙革命歌》打头，还陆续请出了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萧邦这些久违的大师的名曲，还有以海涅的抒情诗谱曲的作品，《卡门》中的斗牛士之歌，《浮士德》中华连亭的咏叹调.....

至于音乐小品《扇子》，该是一九六一年夏天的即景即兴之作，不提根本想不起来了；由此又想起还编过一组包括二胡演奏的《王三姐赶集》在内的“赶集”，综编了民乐、戏曲中的小段，中国音乐组组长康普还问过我，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配合开放农产品市场啊！那时候大家都为“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来掩盖物质生活的匮乏）开拓思路，只要言之成理，还是能被接受的。

我完全忘得一干二净的，还有欣赏古典诗歌的五六个小节目，评介了曹操、于谦、杜甫等五六位诗人的作品，捎带简单地介绍作者其人。这是为文艺部拟办的“古典文学欣赏节目”和“古诗欣赏节目”做出总体设计后写的样板稿（也算备用稿吧），时间大约就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后来这两个

节目都胎死腹中，稿子下落不明，不是柳荫就是文艺部的陈开为了避免追究，让它们从人间消失了吧。回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几位古人里，于谦是在“文革”中一度走红的，因为邓拓在《燕山夜话》里提到过他。我让他的《石灰吟》入选欣赏，是不是从那里得到灵感，已经记不清了。我可能是从古诗欣赏节目的宗旨定位在“爱国主义”上出发，并不是着意于被诬受冤而光明磊落。本来文天祥的《正气歌》也是上选，但太长，典故太多，不是小节目能够胜任的。不过，按照“文革”中大批判的逻辑，不相干的人和事，还可能跟邓拓或扩大为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挂上钩，何况近似海瑞的于谦；而且纵使你摆脱了跟邓拓的瓜葛，人家也会说，这是出于“阶级本能”的呼应和

共鸣！

与此同时，发现我同时还编过一组《不怕鬼的故事》（古文今译），加写说明，原是打算作为“欣赏节目”第一次内容的。这个节目所据是何其芳奉命编的一本小册子，他写的序文据说经毛泽东审定。因此，好像把它广播化是万无一失的。但这种想法也失之天真。他提倡“不怕鬼”，那鬼的内涵也许是他早年文章中就说过的不怕这个不怕那个包括不怕鬼、不信邪，或落实为当前的“帝修反”，也许是广泛的“内外反动派”，也许就是他指为“纸老虎”的原子弹。但你说不怕鬼，是何所指，就因你的身份不同，当权者和批判家会根据对你的怀疑，“有罪推定”而另有指认，你的任何解释，基于事实和逻辑，全都无效，归之于狡辩。就

像我改写《克雷洛夫寓言》为诗体，其中《诽谤者和毒蛇》：“魔鬼的筵席上起了纷争，诽谤者和毒蛇谁是头名？”竟被说成是“恶毒地攻击党的庐山会议”，“他把庐山会议诬蔑为争权夺利，把我们伟大领袖和革命左派比作魔王和诽谤者，这是对我们伟大领袖和革命左派的最大的诬蔑和恶毒的攻击。”（见我所在单位“文革”领导小组对我的定案材料。按：“文革”中具法律效用的“公安六条”是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定为第一大罪，可处极刑的）。我在这里竟取代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克雷洛夫成为第一被告，因为老克并不知道你们的伟大领袖是谁啊！可见即使是改编毛泽东审定的，何其芳从古代书籍中选编的故事，照样是冒政治风险的。

主管文艺广播的柳荫，原是三十年代的文艺青年，“九一八”后从东北老家流亡关内，像孙犁一样，先在北平，抗战一起，就奔向延安，后来到晋察冀边区，当《晋察冀日报》的记者，又转到陕北台来。毕竟是在革命队伍中经过历练，对敌斗争打过游击，在内部则整风、审干、“抢救”、“三查三整”各种阵势都见识了，进城以后还有各种运动，经验和教训都不少。因此，这位可敬的老同志，虽在文艺界也面临“调整”的时机，跟大家一样感染了有所宽松的空气，也想就此有所做为，但他比大家多了一份冷静，至少多看了一步，要留有余地。这就是“古典文学欣赏节目”和“古诗欣赏节目”终于半道罢手的原因吧。

我和柳荫的缘分，始于一九四九年他把我调

来。跟我一起调来的华大同学，不管后来在不在他直接领导下，都一直跟他保持着“老”关系，你说老朋友也行，老上下级也行。一九五〇年新年前后，他把我们这几个住集体宿舍的小青年找到他的“京师”宿舍（西长安街原先一家民营京师医院旧址），在一块说说笑笑间，我们得知他出生在吉林省扶余县农家，是独生子，一棵苗，特受父母爱惜，可怕的是为了“好养活”，竟把他一个小手指生生剁掉了。他述说这件往事时，不加一句评论，不带一点怨尤。而他说到萧红写的《手》，却很动情，那是一个小姑娘在家里干染坊的活儿，手上的蓝颜色褪不掉，在学校遭到同学的嘲弄……柳荫流亡到北平，艰难谋生的同时，读了大量的书，那境遇跟当时的孙犁很相似，这也许是在晋察冀跟孙

犁成为好友的缘故。孙犁以小说散文名世，但也写诗，柳荫从青年到暮年，一直以他的蝇头小字写小诗。

柳荫在调档时看过我的档案，知道我爱好文学，爱好写诗。这也许是其后多年我们谊兼师友的一个情感基础。当然除了共同爱好，还有日常的交往。我好几年都在郑佳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从自然多些。十几年后，在一九六一年冬，一个晚上到柳荫郑佳家里聊天，我们还回忆起一九五〇年在他家熄了灯讲鬼故事，于是他又讲了他家保姆从老家带回的一件真人真事，主题陈腐，讲的是天雷殛死坏人，但前前后后情节曲折，像个侦探悬疑短片，柳荫居然把许多细节记得清清楚楚。

两条车道沟里的鲈鱼：我和吴小如恢复联系

我替文艺部作的古诗文欣赏节目的设计搁浅了，中央台的文教部却办起了一个专题节目“阅读与欣赏”，一开办就颇受欢迎，后来将广播稿辑印成册，也销行不错。作者群主要是大专学校的文科老师。其中就有我相熟的吴小如。

几十年来我没问过，当时“阅读与欣赏”的选题是编辑部定的，还是播讲者自定的。比如吴小如讲过诸葛亮《与群下教》，这是“集思广益”这个成语的出处吧，有没有针对独断专行的用意？这样提问是犯忌的，于人于己都大不利。我当时也只是

所谓“一闪念”，很快搁到一边，力求忘却了。我倒发现了“阅读与欣赏”这个节目，跟我原先设想的“古典文学欣赏节目”还是不同，作为文艺广播，我想的总还偏于“纯文学”方面，比如苏轼，首先是选他的前后《赤壁赋》或《夜游承天寺记》什么的，于诸葛亮，就不会选他的前后《出师表》，顶多是看中他的《梁父吟》。两个节目有所谓文学和文章之别吧。我甚至还动过不该有的“一闪念”，在古之所谓文章中，不但多叙事，而且多议论，一不留神容易触红线，那就在“厚古薄今”的罪名之上，添上个“借古讽今”，更严重了。

这时候，吴小如不但成了“阅读与欣赏”的约稿对象，重点作者，也进入陈道宗的视野，约请他

为中央台做京剧欣赏方面的节目，同时替唱片社当顾问。他们走得很勤。有一天我忽接到吴小如的信，说听陈道宗说我回来了，问我怎么不告诉他。我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落到身上，就跟所有的朋友断绝联系，一九五八年初定案戴上右派帽子，我给一些过从较密的老友都发信告知，并说我要下乡劳动了，去向未明，这就是告别了吧。我说下去“劳动”，不说“劳改”，不是个人好面子，想“混同于一般老百姓”，而是严格按照当时的政策界限，不敢逾越。“劳改”是劳动改造的简称，用于对判徒刑的犯人的惩罚；连“劳（动）教（养）”都不能说成劳改，因为据说“劳教”属于行政处分，不是刑事处分。至于像我这样的人，反右所给的是第四类处分，主要是降级撤职，开除党籍，至于发配

我们去劳动，是跟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干部同样，名义上属“劳动锻炼”，既非劳改，也非劳教，据说体现了区别对待。受这样的厚待，你若还要自称是“劳改”，岂不是故意曲解，诬蔑党不按自己订下的政策办事？

一些词语在长期的流行中，磨钝了它的语感，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原始含义。就像“锻炼”，炼是把生铁投入炉膛，锻是把烧红的铁块夹到铁砧上重锤敲打成型，哪是人能经受得起的？平常我们说的，主要指体育锻炼，带有保健性的肢体运动，单杠双杠，或快或慢的跑步，等等，可就轻松得多。组织用干部，有时下基层，有时去救灾，到艰苦的地方或岗位，都说去锻炼锻炼，也有各种情况，一种是要提拔重用了，一种是要下放靠边了。有时内

定了下放名单并不宣布，而号召大家自愿报名。这是考验人们响应领导号召的自觉性。潮流之下，所有的人都会按照号召者的口径，表达决心，就像后来样板戏的警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求把自己的革命意志锻炼得更坚强，好符合组织对每一革命战士的要求，云云。这既是统一认识，又是打预防针，你到了某个地方，某个岗位，不适应，不满意，当初是你表示决心自愿报名的呀，还吃什么后悔药？

至于我辈，连这个后悔药也不用吃。你来不来，不是凭你自愿与否，组织让你下乡“劳动锻炼”，是没有抛弃你，你虽然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大罪，组织还要挽救你，安排你，给你出路，让你在劳动锻炼中彻底改造思想，脱胎换骨，

重新做人，回到人民队伍里来。

我给至亲好友们的告别信，当然不用说这么多，大家都生活在同一空间里，一点就透。发了信也不期望回信，就跟着大队去了沧州。

吴小如一九六一年初给我的信也很简单，不过让我跟他联系，同时寄来一纸诗笺，上面是七绝四句：

初识心惊俱少年，
新诗遥跂捷能先。
归帆误泊狂涛里，
小跌何妨跻大贤。

小如在北大那个环境里，比我在机关里眼界开

阔。光是反右一役，教师学生，打倒以千数八百计，看得多了。加上对我的了解，他并不拿我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来看；而是从俗视我为所谓“犯错误”吧，至于犯了些什么错误，就不深究了。我也不问他这几年的狂风巨浪中，是怎么过来的，彼此彼此。

我记得小如说过，一九五九年的“十一”，他带着孩子们从北大进城参加天安门前的晚会，情绪满高，他还写了七律诗，有一种躬逢盛世胜事的欣悦之感。他到密云大炼钢铁时写的一首诗，是在值了夜班后，踏着朝露走过田塍，天已大亮，他的一句“无限春光有限诗”，让我长记不忘，我相信这是由衷的。

总之在那样的岁月，我感到小如的心劲不错，

没有颓唐，难道他是借以鼓励我？在难得老友一聚时，或许他不愿出现互相诉苦的场面，那是要“犯错误”的。他大我十一岁，是名副其实的兄长，他该主导我们的友谊沿着健康的方向走吧？这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经过十来年思想改造，已经长了的见识。

小如有时到陈道宗他们那里办事，总会上我这里坐坐。到别处办事，只要不太绕远，也会来看看我，带来嫂夫人的关切的问候。我和文秀一九五七年结婚之初去他家时，他们真像长兄长嫂那样，嘱咐我们，要孩子得趁早，最好在三十岁以前，过了三十岁，再操劳“月子”，就会感到体力不支了。他们的四个孩子就都是在二十到三十岁这个年龄段出生的。我们亏得听了他们的话，也赶早生下一儿

一女，倒不仅是考虑晚了弄不动，而是庆幸赶在了“文革”前面，“文革”开始时一个已经五六岁，一个三四岁。设想狂风骤雨猛一袭来，身边的孩子还在怀抱，还在吃奶，那岂不更加手忙脚乱？即使这样，大祸临头之际，我还是深悔要了孩子，一个二等公民，世世代代都还是二等公民，供人驱使，供人鞭挞，供人羞辱，我们对不起无辜的小生命啊。这话我没对文秀说，更不敢在母亲面前说，只能吞到自己肚里，让我的悲伤，我的内疚，我的牢骚，通通烂在肚子里吧。为了亲人，为了孩子，必得忍人所不能忍，坚持活下去，坚持生存的权利。任何的软弱都会腐蚀人的意志，摧毁你的精神，那些迫害者、施暴者还要戳着你的后脊梁，轻蔑地骂：懦夫！

一九六一年的时候，思绪偶有波动，但震幅没有这么大，因为从黄骅农场回来，好像紧箍咒松了一圈，松了一口气；用“宏大叙事”说，就是可以“休养生息”一下，在我们打成右派的人里，第一批摘了政治帽子，且没有发配边荒，而且回了首都的原单位，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都算得上不幸中的幸者了。自然就滋生了苟安心理，犬儒的类型之一吧。

我和小如相处，因为彼此了解，不用装，不用讲什么面子客套，这是使我大感放松的事。在特定的政治环境里，尤其要紧的是，相信谁也不会出卖谁。本来我们没有什么怕人打小报告的，所谓无可告之密，但是习于“密告”的人，不一定是在你这里发现什么机密，他们惯会捕风捉影，断章取义，

又因鬼鬼祟祟，你的话不一定是对他说的，他不知从哪儿听来，片言只语，加上他有意的曲解，无意的误解，报告上去，乃大走样。所以我也学会了尽量少说话，宁肯你说我“腹诽”，我也不愿意上你的小账本。而在像吴小如这样的老友面前，就不妨打消一切顾虑。恢复自由地倾诉和倾听。听完说完之后，发现我们并没有什么犯上作乱的悖逆之心啊，于是都坦荡，都泰然了。——在戴着右派帽子的时候，该是鲁迅说的“欲做奴隶而不得”（改两个字，欲做人民而不得，欲做同志而不得），现在乃有“做稳了奴隶”之感（翻译过来是“回到了人民的行列”，又叫同志了）。

大概吴小如是朋友中唯一知道我当时在家里吃什么的人。他晚上过我这里，有时还没吃饭，文秀

在食堂吃完直接去加晚班（照例是一天三块时间，晚上要“学习”）。我从食堂打来的饭菜，是对付单身汉们的，如果中饭还像点样子，晚饭就是“对付事”。在小煤球炉上加加热，从碗橱端出剩咸菜，我们二人边吃边聊，这就是一顿了，有时还有瓶装的残酒，酒酣耳热，谈兴更浓。我在这样的時候，每每想起在农场过大礼拜，跟同在那里的蔡骧、钱辛波一起上八里外的海堡渔村，小酒馆要上几两散酒，几盘炸小鱼，扯些完全与政治无关的闲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何况我们都是旧相识啊！虽在海边，却不能相忘于江湖，仍然是在干涸车辙里相濡以沫的垂死的鱼！

而如今，我和小如是在北京某座楼上，似乎不同于海堡的酒馆，但又跟杜甫和卫八处士“夜雨剪

春韭，新炊间黄粱”的从容温暖差得多了。只有最后两句境界相近，“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不光说不清对方会怎么样，谁又能预知自己的前路呢？

他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军功章，塞了别人的牙缝

也在一九六一年，得到了萧琦从长沙来的信。他比我略小，是在某军政治部文化部划的“军内右派”，开除军籍、团籍，撕下领章帽徽，扒了军装，发落到娄底“劳动”，那是与劳改农场相邻的劳教农场。三年多后，摘了帽子，但部队不管，找不到接收单位。他在初划右派时已经跟北影厂做学员的未婚妻解除了婚约。这时在长沙拉拉板车，打打零工，流落街头，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原来打右派劳改时如果算是落难，摘了帽子这时是继续落难。

他说，为了糊口，他把去朝鲜挣来的一枚军功章，原先一直珍藏的，也拿出来卖给江湖牙医，据说军功章里含有一定的黄金成分（也许只是黄铜吧），牙医用它给人镶牙。萧琦悲恸无告地说了一句：“为了活命，我用生命换来的军功章，塞了人家的牙缝！”

我和萧琦是通信朋友，大约一九五四或一九五五年，不记得怎么开始通信了。名重一时的爱民模范罗盛教就在他的部队。罗盛教因救一个朝鲜少年崔滢，溺水而死。他是在赶赴上级机关的路上见义勇为的，因此迟到。起先当作一件事故上报。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故当中蕴含的道德意义，对宣传中朝两国军民之间的友谊颇有作用。罗盛教的事迹，最早是由萧琦写的报道稿子。

萧琦爱好文艺，喜欢写诗。这样我们的通信多是交流诗歌方面的看法。一九五五年秋天，我为全国首届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写了一首楼梯体的《青春进行曲》，刊发在《中国青年报》上，是鼓舞同辈的年轻人“为祖国建立功勋”，高昂的基调；但也贯彻了从苏联接受的“干预生活”的思想，在诗里号召：“用我们青春的火 / 把旧社会留下的垃圾 / 燃烧干净！”没多久，萧琦寄来他写的一首《青年进行曲》，也用的楼梯式诗行，形式上比我讲究而规整，诗的内容与我的诗呼应，而更加重了“干预生活”的色彩，用当时的话来说，正如我们评价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所说，战斗性比我更加强了。

萧琦这首诗可能在他们驻防的广西省报或桂林

市报刊出，应当在当时当地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因为诗的思想含量和激情力度，都超过常见的诗作。

就是这首诗，给他惹来了一九五七年的大祸，延及他一生，也没能再摆脱大祸的阴影。

然而，在一九六一年，大家还来不及看得那么远。萧琦来信说，他要结婚了。对象欧阳琤，幼儿园的老师。这当然是值得庆贺的事，欧阳琤能在萧琦这样的困境中谈婚论嫁，这是要有一点勇气，不为世俗之见所蔽的。我从心里敬重她。我给萧琦寄去一点钱，以解燃眉之急。他们寄来了结婚照片，几年后还寄来他们和两个儿子合照的全家福，我祝福他们。我当时以为萧琦的无妄之灾已经过去，他们的小家庭会过上平稳的日子，也就不枉欧阳琤一片患难与共的厚道和痴心。我想，他们自己也该是

这么期望的。谁知我们都缺少清明的预见。更大的患难等在不远的地方，又不光是他们小两口。“文革”十年，萧琦因写过影响不小的《谁是牛鬼蛇神？》一文，又卷入“湘江风雷”、“省无联”一案，竟曾陪过杀场，九死一生。大家从十年劫运中活下来以后，欧阳琤也许不再相信尘世上会有明天，她撒夫舍子，削发入了空门去修来世了。

如果说反右以后的六十年代，吴小如是跟我来往较多的朋友，到“文革”期间，远在长沙的萧琦反成了跟我过从较密的人。他每逢进北京，都要来找我。我有几位湖南的朋友，像文史学者杨弘征、李鸣高，就是经他介绍跟我通信的。

我和吴小如的联系，“文革”开始就中断了。他先下了江西鲤鱼洲，我到他家去看望过，随后我

也去了河南淮阳，一去四年，其间在一九七二年秋，曾写过一首七律赠他：

少年哀乐总沧桑，断句何须咏凤凰：
“放眼天涯龙卷水，吃人世界虎拖
羊。”

涂鸦枉借春秋笔，求友应从生死场。
节近重阳堪把盏，丹枫如画未凋伤。

这首诗无非报个平安消息吧。小如真的够得上是从生死场中过来的患难之交，更是知己之交。当暴徒逼他交代跟右派邵某的关系、他对右派邵某的看法时，他说，他在反右开除邵的党籍之前，就觉得邵不像共产党员——是跟他见到的周围所有党员都

不像的党员！

幸存在历史的夹缝里，却常忘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朋友是不可少的。然而朋友之交只能是业余活动，是精神、文化层面的事。在一天八小时的上班时间里，还要遵照领导的指示，干应该干的工作。

好在让我干的工作，都还符合我的兴趣爱好。比如柳荫让我到说唱团帮助京韵大鼓演员钟舜华润色《探晴雯》，帮助孙书筠润色《双锁山》。我并不熟悉鼓曲的艺术规律，但从文字上做些推敲，还是能够胜任的。人家相传多少年的段子，哪能说改就改呢？固然有雅俗文野之别，但鼓曲诞生在民间，走街串巷过来的，大俗中或有大雅。因此，下

笔之前总在踌躇，尽量做到即使改了个别的字、句，但其平仄不要影响唱腔，人们听大鼓书，是听故事，听唱词，也是要听宛转的唱腔——熟稔的唱腔啊。

经我润色过的这两个段子，都付诸演唱了。是不是比原来的好些呢？我现在说不清，具体情况我已经忘记了，恐怕只有对照原本和所谓润色本才能做出判断。不过我后来想起《探晴雯》中有一处“他们二人的双感情”，原本如此，多年来这么演唱，师傅是这么亲口传授的。但是“双感情”不通啊，说二人成双，他们之间的感情就是“双感情”，艺人是这么理解的，但于理、于文，于汉语造词的法则，都说不过去。于是我咬咬牙，改成了也是俗套的“不了情”，也总觉得不太妥贴。许多

年后，忽有所悟，所谓“双感情”，原是把“伤感”一词凑成“三字尾”，变成了“伤感情”，又在传唱中误为“双感情”的。“伤感情”虽说也不理想，但比文绉绉的“不了情”更容易为市井大众听懂，接受。是不是这样，也有待试验了。

为什么柳荫要抓一下京韵大鼓呢？他没说，我也没问。我想这跟陈云过问苏州评弹多少有关。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他是江南人，长期工作、生活在上海，雅好评弹。他是开国时的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长期主管经济。五十年代初的统购统销，六十年代初抛出部分高价食品（点心、糖果等）的措施，都出自他的创意。这是我们一般群众知道的，至于经国大计中的战略等等，那是经济学家才研究的事，而恰恰也在这类问题上，他跟

毛泽东时生歧见，不免有时“被靠边”或主动靠边，投闲置散。他在“养病”期间，欣赏评弹的同时，也做过研究，据说颇有真知灼见。大跃进后，毛泽东退居二线，陈云和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可能还有李富春，采取“八字方针”调整经济，初见成效。陈云心情好，便又来过问评弹。

这时，大唱毛主席诗词成风，以评弹唱《蝶恋花·答李淑一》，不知经哪位评弹艺术家之手，配曲穿腔，充分发挥了评弹音乐的特色。广播合唱团的独唱音乐家朱崇懋学唱评弹，用他真假嗓相间、收放自如的功夫，通过广播，一曲唱红全国。

我一直喜欢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九四五年秋天乍读此词，奠定了我对他的崇拜之情。用今天的话说，我因此而成了毛泽东的“粉丝”（粉丝

云云，是近年才冒出来的词儿，在演艺界来说，过去内地叫捧角，香港叫拥趸。二〇一三年，读到诗人北岛答记者问，他说粉丝现象是一种邪教。真的振聋发聩，使我悚然而惊）。时在抗战惨胜之初，沦陷区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仰望大后方，哪知道把对影剧明星的偶像崇拜移情到政治人物身上的危害！从那时起，我常用老音乐课本里的一首《关山调》来哼唱“北国风光……”，那原来的歌词很简单：

一万里关山，秋风莽。
忽又听几声胡笳声悲壮。
斜日欲坠，立马高岗，
回头来，望云水更苍茫。

词曲中那份苍茫悲壮之感，深深攫住我的心灵。它与“北国风光……”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寥廓相符。不过一是短曲，一是长调，我就让它变调反复，反正只是我在心里默唱，即使稍稍出声，也只有自己听见。但这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能让朱崇懋来唱，那多好啊。于是把我唱熟了的曲调第一次用简谱记下来，把歌词配好，并给朱写了一封短信，劳收发室送给他。

许多年后，我才臆想，当朱崇懋收到这个下款写了“内详”的小信封，拆开看了我的信，他会如何吃惊！他一定想，这个邵某人，真是胆大妄为！你这样的“摘帽右派”身份，想平起平坐给伟大领袖的词作配曲，这不是对他老人家的亵渎，说亵渎

还不够，是挑战！朱崇懋想按上海已经成功配好的评弹曲调唱“我失骄杨……”，还是层层请示得到批准才敢唱的。你自说自话，看来连柳荫也没请示，就弄这么个东西让我来试唱，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邵某人真的没想到这会引来什么后果。当时根本没想那么多。想的只是这一配歌，词曲谐调，再加上朱崇懋的高明处理，唱出来效果肯定不错。但他没给我回信，我猜想是他觉得我于音乐、于作曲不是专业，遂予搁置。后来见着面，也从来没有跟他提这件事，免得叫他为难。

我哪想到，朱崇懋这一搁置不问，可以说救我出了一劫。若不然，当时就会惹出麻烦，延续到“文革”，更难以逆料了。朱崇懋不但懂得音

乐，他确实也懂得中国政治[2]。

从“你算老几”到“脱帽加冕”

而我却只是一味地浸沉于渐趋宽松的感觉之中。

类似“农业六十条”，一个“文艺八条”传达下来了。那精神也是宽松，即把紧箍咒放宽了一圈两圈，这就可以大缓一口气啊。我只知道这个“八条”是经过反复修改，才从草案变成正式文件的；却不知道其中包含着复杂的斗争，如多年后所揭示出来，并且引发了“文革”中的绝大反弹——“文革”至少在表层上，可以说是从这里打开缺口的（当然，几乎每一次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都是先从文艺领域打开缺口）。当时我只看到《文艺报》

的社论，以“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为题，甚至并没想这是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扩大、发展甚至“修正”，更没想到文艺界那些幸存于反右之后的朋友，在新侨饭店以欢愉之表态欢迎和拥护这篇社论（应该还包括对“文艺八条”的欢呼吧），五年后就被指控为“新侨黑会”。

我对“文艺八条”的记忆，其实很淡薄。只不过在听传达时，记在小本本上了。轮到我听到的传达，已经是第三四手。只笼统知道是来自中宣部某位领导，比如文艺处处长林默涵的居多。而我既没有反复涵泳，体会其深远的意义，也没想我自己怎么落实它。潜意识里这不用“尔等”也就是“我等”操心。然而有一句话，是周恩来在它起草过程中讲的，抑或在其他场合上讲的，反正告诉我们，

周总理批评有的文艺界领导干部在审查节目时随口否定文艺作品，理由却只是他不喜欢。周总理说：“你不喜欢，你算老几！”没想到周总理会用“你算老几”这样情绪化的俗语，迥异于平时做报告即使严厉也仍文雅的风格。当时当地，这是很值得仔细咀嚼回味的。我这人失于浅，自然没能体味出多少玄奥的天机，但由此瞥见了周恩来性格的另外一面，平时非身边工作人员不易接触到的侧面。许多年后，才知道周恩来1961年6月，还有过一个《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到1962年2月又有一个《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很可能是领导在传达“文艺八条”时把周恩来讲话的精神糅合进去，我记得当年周恩来曾为高缨《达吉和她的父亲》辩

护，应该就是跟“你算老几”一块听到的。于是我把高缨原载《人民文学》的新作《大河淌水》处理成广播小说了。

这年，一九六一年夏天，陈毅对高校毕业生有过一个讲话，为大家所传诵，我从《中国青年》杂志上读到，这份杂志我已久久不读了。陈毅素以讲话直截了当、痛快淋漓闻名，比如接见记者“声讨美帝”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属于流传已久的熟语，而后面所说“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则是陈毅新加上的，显得孔武有力，确是元帅的声口。后来这几句话继续流传，就都是陈毅的足本了，而且不再限于指斥外敌，而具有了普遍性，人们对陈毅的好感，这也是缘由之一吧。当然，更重要的是陈毅释放出来的信号。这

一次对大学生们讲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也许当时就没怎么走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嘛。然而有一条是没错的，他这个讲话也给大学生以至大学工作松了一圈紧箍咒。第二年即一九六二年暑期高校招生，好像即使没说取消也是放松了一九五八年以来加紧了的“政（治）审（查）”，不少所谓“出身不好”的考生得以走入大学校门。这不仅对考生和他们的家庭，而且对整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都是功德无量的好事。这个好人让陈老总做了。为什么让他做，而不是别人来做呢？不知道。他是外交部副部长，如果就外事发言，绝对顺理成章。不过他还是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也许他分工多管一点文教？也许他在讲相关政策调整时力主放宽？总之，不但这一次，次年即一

九六二年三月习称“广州会议”上，他做了一个更有名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重要讲话，做了一次更大范围的好人。所谓“脱帽”，就是摘掉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所谓“加冕”，则是承认知识分子已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了。大家记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给几十万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加上“内控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右”以及戴上其他政治帽子的，则达三百万人，与此同时，给全体知识分子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定性。因此，当消息从广州不脛而走时，各地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不得其详，又兴奋，又不敢相信。后来陈毅的这个讲话，我始终没听到正式传达。我倒也不太动心，不是不知感恩，

而是戴了，又摘了，摘了还被人背后叫“摘帽右派”，所以反而看得淡了。现在回想，当时陈毅的讲话里，为海默的剧本《洞箫横吹》主持公道，说不过批评了一个县委书记，县委书记怎么批评不得呢？一句话，给海默平反了。这件事辗转传得很远，我也听说，并记住了。

同样是领导人讲话，比如，我听说刘少奇也曾对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讲过一次话，具体内容同样不详，但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内容，口口相传，我也得知了。他勉励同学们以革命者自期，说起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到苏联去，同去的人里有一个曹靖华，在苏联学习结束后，这一届同学有的回国，有的留在苏联，都是继续干革命，只有曹靖华不，他专门搞翻译，搞文学去了。大意如此。我才知

道，在这位终身革命职业家的眼里，曹靖华即使不算开小差，也是不革命了。尽管他翻译的文学作品，其实也都是苏联的革命文学。在所谓革命阵营里，在共产党内，不是也有专门从事文学工作的吗？比如周扬，比如雪峰，只不过他们首先是革命职业家，然后是从事文学。然则毛病主要出在曹靖华当时可能没有入党，没有一份革命的“政治生命”的履历罢了。

妹妹大学毕业能自食其力，父亲就退休了

我的妹妹邵燕祯，也在一九六一这一个夏天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我记得，好像她就没说过曾经听了什么报告。她最关心的是毕业分配。那个年代学校包分配，但可谓一槌定终身。被分配的毕业生，只能如党所要求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已忘了这句口号中的下一句，“两种准备”指的是什么？如意，或是不如意？），人人要表态，到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一概服从分配。因为对每个人来说，“分配”都是根据“革命的需要”。你要革命吗？当然要，那能不服从革命的需要吗？我的母亲当然是老脑筋，她唯一的希望就是

身边这个小女儿能分配在北京，大女儿本来在北京，一九五八年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她去了湖北，我姐夫去了河南，结束劳动，就一起分到河南了。但是事与愿违，燕祯被分配到辽宁。据说最初的方案是去青海。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右派哥哥的关系，她变成了特别需要到艰苦地方去“锻炼”的对象？我不敢问。后来据说还是党支部里有个老大姐发了善心，给调整到了较近的东北。那时候大学里，更不用说在人民大学这样以调干生（即原来是在职干部，然后带薪上大学深造的）为主的地方，班级里，除了政治辅导员以外，主要是学生支部的党员在做主，一般情况下，辅导员也要依靠学生党员，首先是其中的支部委员们。在确定毕业分配方案这样的重大关头，这些调干生中的党员干部起着主导

的作用。一九五七年春各个高校的“大鸣大放”中，相当充分地暴露了其中的矛盾。在关于党与非党关系“拆墙”“平沟”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年轻的非党员学生对支部主宰同学命运的不平等现象的不满，也是对学校内特别是学生中党群（即党员与非党群众）关系的格局的不满。在这样的格局、这样的机制下，很难仅仅从道德的角度要求同样是比较年轻的学生党员如何做到十分的公正公道。这怨得了谁呢？可是，很快就刮来一阵反右派的龙卷风，鸣放中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都以绝对简单化的方式裁决了。所有这方面鸣放的意见，通通被指控为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攻击了。如只挨批，受点小处分，算是好的了，加上别的罪状，数罪并罚，就划成了右派。反右派过后，所有这一切

一仍其旧，有的可能表现得变本加厉了。

邵燕祯本来是一九五六年从女十三中毕业的。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和毛泽东正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所谓“双百方针”不久，一切呈宽松趋势，那年就是大学敞开口招生，不大讲“政审”的一个特殊的年头。加上我也还没划为异类。她由母校保送为留苏预备生，别人上了大学，她进了俄文专科学校的留苏预备部加强俄语学习。恰恰一年以后，本来就该考虑进行留苏专业志愿的填报，做出国的准备了，不知是单纯由于反右斗争的干扰，还是也有中苏矛盾积聚的因素，忽然决定留学苏联一事作罢，留苏预备部撤销，学生结业重新分配到各个高校，邵燕祯一来二去就到了这个充斥着大哥哥大姐姐的人民大学。在她上大一的第一个

学期，她们也跟着老同学轰轰烈烈地搞反右斗争。其间（多年后我听说的），也有人似不经意地向她问过我的情况，她当然不知道我从一九五七年九、十月间陷入了反右的重围，所以她并没有向学校、向同学、向党团支部隐瞒过我的问题——她根本也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连我事前都不知道我有那么多“问题”呢。燕祯有一个同学万黛，是曹禺的女儿，说她父亲向她问过，不知道你哥哥在反右派运动里怎么样，没有什么事吧？燕祯自然也就她所知，说没什么事。这样将近寒假，对我的批判告一段落，剩下的就是定案和处分了，我向过从较多的亲友好发了告别信的同时，写了最长的一封信给燕祯，一则向她通报我陷落的全过程，二则表示我将接受党所给予的任何处分，并将在未来岁月中按

照党的要求改造思想；三则劝勉她“相信党”，不要因为亲人“犯错误”受处分而有任何不满，首先把此信给党支部一看，并向支部表示自己应有的决心，云云。

从我来说，是卸下了一个重大的精神包袱，至于刚满十八岁但远没有什么社会政治经验的妹妹怎样消化这突来的噩耗，我却撂手不管了，我也管不了了。我曾请母亲多关照一下燕祯的情绪和思想，母亲没说什么，我也不知她怎么跟燕祯说的。在某一个星期天，应该是文秀已经下乡，我还没去十三陵劳动，二月春风似剪刀，但天晴有太阳，燕祯动议陪我逛逛中山公园，一路海阔天空地说这说那，我不是装的，真的已经一块石头落地，因此颇有些若无其事了。回来一想，我才明白，原来母亲不放

心的是我，燕祯约我逛公园，也该是母亲让她陪我散散心。我有张“反右以后，下放之前，家屋门前”含笑留影，大概就是燕祯帮我照的，现场应该还有母亲旁观吧。后来人们都奇怪我在那种时候怎么笑得出来，我自己也奇怪呢，只能说，贾宝玉丢了通灵玉，不也还一个劲傻笑吗！

只是到了“文革”，我才产生“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逆反心理，而在反右之后那段时间，我的放松，一是觉得还是逃离机关的好，不管怎么样都是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二是二老尚能自理，文秀有独立人格，又是要强的秉性，不用我格外担心，两个孩子有母亲和文秀照管，我有什么不放心？这样我就可以像江湖上人说的，豁出去这一百多斤，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

我父亲对我划右的事情，从头到尾未置一词。我想他可能以为我失于幼稚，不懂政治。如果他这样想，那恐怕早非一日，从我倾心革命，中断学业，紧跟共产党，亦步亦趋，他就从来未置一词，大概知道这样的年轻人是几匹马也拉不回来的。他比我三叔大十几岁，二十年代三叔还在读医科学学校时，先是加入了共青团，随后转为共产党员，从杭州“搞群运”，到上海办报主持通讯社，一心干革命，何尝听过兄长的劝阻，然后被孙传芳逮捕。在父亲以至我的大伯父看来，我们（我，还有大伯父的儿子祖培，也打成右派）所曾有的革命迷狂，可能正是三叔青春经历的翻版，也只有听其自然而已。

所以我觉得父亲对我的“自行失足落水”，并

没有特别为我抱屈的想法，从他的沉默，更多是看透一切后所生的悲悯，以为这是在劫难逃的事，不懂政治又要投身政治，一切是势所必至，用不着怨天尤人。他早就对我哥哥说过，政治是肮脏的，哥哥没有听，我更不会听，那么受到的惩罚，就有一半是天意了。这样的臆想，可能多少符合父亲的思维逻辑。不过，毕竟有父子之情，他会对我有所同情，庆幸没有闯更大的灾祸。当然这种同情不必特别说出。我也相信从他那里我是能够获得某种理解的，尽在不言中了。

父亲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如果我们不中断学业，他拼了老命也会供我们到大学毕业的。我和哥哥都不在乎一纸文凭，客观上解除了他的一份负担。他决心在燕祯大学毕业后就退休，可能对单位

也这么承诺，所以默许他“超期服役”。他在燕祯分配工作这一点上，也不置一词（也许跟母亲讲过什么，但也不像）。他前半生中，除了抗日战争中滞留沦陷区的北平，宁肯赋闲，坐吃山空，也不出来就业乃出于自愿外，在二三十年代几度处于“待业”状态。所以他肯定共产党搞社会主义的两大好处，一是不让你失业，一是“公费医疗”。前者他作为留用人员，享受了一九四九年大变动时安民告示所宣布的“包下来”政策，后来规规矩矩上班，到老平安无事，他没活到有大量职工下岗和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年月；后者他因自信健康，又自信学医，一般身体小有不适，自己调理，多少年全勤，得过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全勤奖，他也从未享用“公费医疗”，只在临终送医，大概才用了一次

公费医疗证。我想，他对小女儿一下子发到关外，自然会有遗憾，但他一定是想到，这总强似当年“毕业即失业”的恹惶吧，当然心理就平衡了。

这是对我父亲安然对待燕祯远赴沈阳报到的心情的臆想，应该也是八九不离十的。

燕祯去辽宁后，父亲也就办了退休手续。这时他的实足年龄是七十周岁。

很快燕祯就来信了，她分配到《辽宁日报》的副刊，那里有几位老同志对她非常关心和照顾，比如彭定安夫妇、范敬宜夫妇……从工作上，生活上，都让她感到温暖。这样可以让她不想家，不想北京，安下心来了。这话她没说，是我这样想的。果然，过了不长的时间，她就寄来她采写的通讯，却是用散文笔法，发表在副刊上，我记得有一篇写

旅大人工养殖海带的《海带姑娘》，还有笛子名家陆春龄的专访，笔下有些新意，都是她最早的成绩，表明她的工作得到了报社的认可，对她这样一个新手，也是一个并非所有初来者都能获得的认可和策励吧。

跟图尔逊合作译写《十二木卡姆》唱词

其实不但是初学乍练的人渴望和需要认可和策励，我从一九四六年算起，练笔十五年了；从一九四九年算起，正式参与文字工作十二年了；从一九五九年年底“重新做人”算起，也又一年多了，始终感到自己在不断地处于开始的阶段。我不乏简单的自信，但耳边听到肯定之词，还是沾沾自喜，仿佛添了柴，加了油。在说唱团，我为京韵演员润色的老段子，试唱的反应不错，演员高兴（那是真诚流露的）我也高兴（也不是敷衍别人）。老团长白凤鸣听了个什么演出，《北京日报》向他约稿，他叫我替他写，刊出了，他也很高兴。跟我说起前清

的宫闱秘辛，比如小皇帝同治在太监带领下逛窑子，他讲的就比《清宫十三朝演义》丰富得多，该是得之于宫里人的第一手传闻，我后来很后悔没有及时追记下来。我和这位老团长的友谊久而弥笃，特别是在“文革”当中，既曾有“黑帮队”的同室之雅，又有农田劳役时的并肩操锄；我不时地占他几垅，让他不致太过落后招骂，一切都是默契。这时当然不再闲聊大内故事，我甚至也很难想象他号称“少白派”活跃在京津艺苑时，怎么赢得仕女名媛追捧的盛况，繁华过眼便是烟云了。

侯宝林对我的器重，则是难以承受之重。有一天陈庚来，说跟你商量个事，侯宝林点将，想请你去给他当秘书……没等他说完，我就连连谢绝了。因为我从来没想过将相声当作终身事业，让我怎么

奉陪呢。忘记我陈述了什么理由，只记得最过硬的一条，是说，说唱团来了薛宝琨，足以支撑相声半边天了。陈庚也表示理解。薛宝琨从北京大学分配来，他的毕业论文或研究生论文，就是关于相声的。他来以后，我们很快成了朋友。这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不是张扬之徒，总带着些微笑意，却从不指手划脚，需要他发言的时候，轻声细语，但条分缕析，理据充分，因此有说服力，又有亲和力。他的古典底子好，又对相声情有独钟，他这个专项研究，不是单纯为了写论文，乃有兴趣在焉。这样直到“文革”后他上南开大学执教，仍然就此作了持续的钻研，有专著，为业内人所服膺。他对中国相声半世纪来谁是大师的鉴定，几乎是一言定局，从此再也听不到无聊的炒作。

薛宝琨是一九六一年下半年来的。那时候我的办公室已经从大楼东翼三楼表演团体办公室和唱片社旁边，搬到了剧场后身广播电视剧团。

在大楼东翼，我最后完成的两项任务，都是柳荫直接交代的。一件是起草一份请求为文工团员提高粮食定量的报告。不需要写多少字，但是要把理由写充分，柳荫和从总团到分团的领导层都极重视这件事，因为下面的演员，特别是管弦乐团的吹管乐演奏员，都是体力消耗甚大的差事。有的是半体力劳动，有的索性就是全体力劳动，一个月吃二十几斤，一天还不到一斤粮怎么够。我在报告里如实陈说。报告很快批下来，因为文化部所属团体已有先例，援例就是了。但对我们团来说，虽是后知后觉，后赶上来，也还是个好消息。吹管乐手，提高

到每月四十五斤。我有“参与”之功，每月也得以提高三斤。

我完成的另一件任务，是中国音乐组的订货。还在五十年代初，中央电台只有一个文艺科的时候，文艺科长张晋德就带着老式的钢丝录音机，或请地方台帮助，在各地采风，颇抢救了一部分民族音乐遗产。那时候还没有抢救这个概念，老张应是出于对音乐的爱好，加上丰富广播节目的目的，不辞辛劳地奔走。他在太行时就参与过新歌剧《赤叶河》的音乐创作，是个专业素质很高的音乐工作者。在无锡，他恐怕即使不是最早也属于最早一批为民间乐手阿炳录音的人。他识货啊。那时候有关阿炳的舆论还是诸多负面的，例如挑剔指责阿炳年轻时出入烟花柳巷等等。老张不管这些，认定阿炳

的二胡演奏出神入化，尤其难得的是他在弦上拉出了心中的喜怒哀乐，更准确地说是倾泄了心底的沉哀。这些钢丝录音后来也都翻录在胶带机上，入存电台的胶带库。唱片也出来了。阿炳以“瞎子阿炳”之名传诵开来。可惜他没有留下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有选择的传记。能够写出他的生涯全面情况的，该是苏南名士陆文夫，他在五十年代初的采访，留下了大量翔实的记录。但形格势禁，文艺方针所限，不可能如实地写一个名人的传记，虽陆文夫亦无法突破这个禁区……

话说远了，我当时接受的任务，是把当年张晋德录音保存的另一份民族音乐瑰宝《十二木卡姆》的唱词，转译为汉语。

中国音乐组把库存十几年的这份录音找了出

来，档案中存有当时专人笔录下来的维吾尔语唱词内容，因为一句句是韵文，维吾尔文记录也采取了分行的类似诗体的写法。中国音乐组请来民族广播部维语组的图尔逊·沙基木娃女士，每次她逐句口译成汉语的意思，我再据此写成诗体的大体押韵的汉语译文。只有这样，中央台的音乐广播节目，才可能对这套民族古典音乐稍作介绍，在介绍中略免空泛。

这是一件极有意味的工作。图尔逊有空的日子，多半是下午，她来我这里，我们大约用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弄几段唱词。因为这个木卡姆并不只属于维族同胞，它流行于整个新疆，以至整个中亚直到西亚。歌词中人的行迹远到繁华的巴格达，从草原到集市，从旅途到清真寺，少年追求

者，中年流浪者，还有少女，少妇，各各在马背，在牧场，演出他们生离死别的故事，唱出他们心底的喜悦与悲凉。虽然没有听到唱，只是听那唱词大意，我却感到，那是我从来没在文字典籍中领略过的，上达天听的喜悦与悲凉。

因此，对我来说，写出汉语译文的艰辛之处，不在文字语种的转换上，而是如何传达这种可以上达天听的歌手的感情。也许只有能够译写新旧约全书或可兰经的文字，才能有这样的传神之笔。我凭一点小小的文字功夫，无以当此重任。许多年后的八十年代，新疆诗人杨树，于诗刊《绿风》之外，主持一份综合性的文化刊物，向我约稿，我征得图尔逊的同意，把这份“旧译”加上小序交给他，竟全文刊出。后来听到当地一些朋友的反应，说这

份“译文”，沾上较多的汉语古典的味道，而原汁原味传达得不够，这跟我原先的自我估价相去不远。我想，在特定时期供中国音乐编辑参考是可以的。而这份译文所据的原始录音和相关维语译文，也都并不完整。期待有关方面在对《十二木卡姆》这份经典有了近于理想的录音后，能够整理出“信、达、雅”的译文版本来。

这位图尔逊，汉语表达应该说是不错的，不然我就不可能仅仅从她的意译，体会出原来唱词的意味来。她来北京工作已经很长时间，又嫁给对外广播部一位姓孙的编辑，他们有个小男孩，起名“孙汉维”。只是后来还是因为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的差异，导致夫妇俩友善地分手。再后来听说图尔逊患上一种慢性病，似乎是皮肤硬化什么的，我因离开

广播局日久，就再不知她的消息。据我儿子闹闹说，小汉维比他小一岁，算来该也过五十岁了。

插叙两位没无闻的人，那时代也还有纯属个人的不幸

而我在大楼东翼，靠近唱片社那些日子，唱片社一位年纪顶大的俞士堃，也还不到六十之年。说起来，他在抗日战争中的陪都重庆，曾经办过一个美学出版社，我记得这家出版社出过徐迟的书。可现在看到的老俞，却有些落魄，他跟一位上年纪的合唱队员结了婚，看来也只是做个伴，说不上互相有多少照顾，还总闹些矛盾，比如女方晚上有在床头看小说的习惯。而老俞似有洁癖，对那些辗转借阅的旧书品相十分不满，认为太脏。说脏，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小时候从书摊上租武侠小说，本本都

够脏的，不过内容太吸引人，脏也还是想看，无非看后像便后一定洗手就是了。老俞和他的后老伴，各人性格都已定型，又不能互相迁就，半路夫妻最是难以磨合的。

三人成众，有人的地方就会形成一个小社会，呈现众生相。这里说的老俞，只是一例。

比较起来，我下半年挪动到剧团坐着，那个环境里多的是年轻人，虽然吵吵嚷嚷的，但相对说来没有多少世故，还带着天真的学生气，平时大多直来直去，还没经过“文革”，人们互相之间保持着应有的人情礼貌。我也感到放松一些。

这个放松，自然首先因为我还沉浸在对于整个社会政治环境有所宽松的感觉之中。

在剧团搞音乐和效果配音的一位女同志叫李景

志，公认是剧团最忠厚老实的人，平时不多言不多语，但得到大家的信任。我是在她那里看到了台湾的杂志，刊物名字记不清了，文化类的综合性刊物，文艺只是调料。看惯了大陆一本正经的杂志版式，台湾的刊物真是文章与广告齐飞，文场共商场一色。看一首刊发在边角的新诗，只觉得堆砌了过于密集的意象群，跳跃极大的语法结构，互不相属的词性搭配，更加看得人眼花缭乱。这比我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看到的李金髮花哨多了。好像是一位在美留学的中国诗人的作品，名字陌生，想记住没记住，几十年后想，影影绰绰的印象是不是余光中？但记得后来曾读余光中诗集，他的《白玉苦瓜》等篇，比当年看到的那一首成熟得不可以道里计。因此不敢确认。

李景志手里的台湾杂志，是从她新华社的朋友那里借来的。“文革”开始，自然借不到也看不着了。“文革”中群众有两派以上的组织，李景志当然有选择，但她也不过做做资料工作。我当时在不同派别间虽也有个人的倾向，不过，各派都以跟我划清界限，进而有所批判，来表示各自的革命立场。不过如李景志和不少的人，会上会下从没有对我怒目相向，恶语相加，这是我十分感念的，也是我总结出“世间毕竟好人多”的根据之一。可能正是这个缘故，一九七九年，剧团从“文革”一直到“文革”后持续当权者，在清退“文革”中积累的关于我的“材料”时，就是派李景志出面。我发现清退的材料只占应该清退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的时候，我克制不住自己，在电话里严词抗

议，并且指出我就知道某间办公室里成堆的材料当中，必定有应该退还我的，“你们想拿这么几份东西对付我，其余的你们继续保存干什么用？要么是想胡乱地销毁灭迹？你们要干什么？！”李景志唯唯，还是一贯的和缓的态度。她把我的“反常”的态度汇报上去，终于把应该清退给我的材料全都还给我了。她到我新的工作单位来，把材料交给我，还是一贯的文静、波澜不惊的表情，使我惶愧，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向她简单地表示一下歉意。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她好像是长影有名的“右派”李景超的妹妹，出生在北京书香门第，她也背着家庭的可能还有社会关系方面的包袱，而且个人生活很不幸。她的丈夫跟她感情不合，又在两地分居，因此有家庭犹如没有家庭，有名义上的亲人实

际上没有亲人，长达十年的政治压抑刚刚有所解脱，却叫我把她当作那作威作福草菅人命的专案组的替身骂了一顿！

李景志跟我没有多少个人交往，但对我是友善的，这从她让我看她借来的台湾杂志可知。对这样一位善良的人滥发脾气，这不是“柿子拣软的捏”吗，又一次印证了“人善有人欺”，而我竟是那欺人的人！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自以为和卡斯特罗的心相通

一九八九年春，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总结我近期杂文的特点，是主要针对巨奸大憨。说得不错，这是我反思以后的选择。

而我在一九六一年，并没有利用稍显宽松的气候做些有益的事。我只是故态复萌，想补历代散文的课。准备先从首都图书馆陆续借阅明清笔记。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是第一部，我发现了这位达人一方面具有相当的理性思辨能力，一方面又受当时科学知识之限，因而不能突破神鬼的迷信，有时矛盾得十分可笑。我摘录下来，想做一个对比的

专题。与此同时，我插花着读一些其他的古文古诗，并即兴地写了一篇我对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结句的试解。那个结句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我一反臧克家、周振甫、吴天石三家解作游泳的说法，主张毛泽东是用祖逖中流击楫的典故。投给了《文学评论》，大概这家编辑部处理此文的是专门研究古典的（曾打电话或写信问我引张孝祥词系据什么版本），并不知我的身份，这样就放到一九六一年年终出版的第六期上刊出了。臧克家曾写一短文表示此说亦可通。别人没有反应。到一九六八年的“文革”当中，有毛泽东对若干首诗词的自注流传开来，他说他的“击水”是指游泳，那就跟他早年有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对上号了。我在这里不是为说这篇

企图标新立异的小文，而是要说，我当时对所涉三位论者中的吴天石，不知是何许人也。也是到“文革”当中，我从所谓牛棚出来，听说就在我们初入牛棚的一九六六年，那个酷热的夏天，所谓“红八月”中的一天，在南京，吴天石作为省级机关抛出来的第一批“阶级敌人”，被勒令赤脚在南京滚烫的柏油路上蹒跚“示众”，越走越蹒跚，最后仆倒在地，就这么死去。他的妻子也在当时受迫害致死。后来知道，吴天石是中共的知识分子老干部，曾任江苏师范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党委书记，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许多年后，袁鹰送我一本赵朴初题签的《扬州现代诗抄》，我发现其中有吴天石作于一九六四年的一首七绝，《题赠扬州友人章心如同志》：

南城风物呈新貌，北郭清溪改旧流。[\[3\]](#)

但使主人能醉客，一年一度下扬州。

一年一度下扬州的愿望难酬，倒也罢了，谁知两年以后竟暴死白下街头！所有这些，在一九六一年我写那篇小文同他商榷的当时，是谁也不可能预见到的。

人们，普通人也有主观主义，那就表现在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客观现实上去，甚至用来替代现实，把含义复杂的政治语言，按照自己的简单幼稚的想法去理解，以轻信自欺，求得虚妄的乐观。

我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刚回来时，继续像在劳改农场那样，写一些可以缓解焦虑的诗，直到一九六

○年初。后来有了些职务写作，无暇他顾，也觉得这类“聊以自慰”积久便成无聊。到一九六一年，即使偶有闲情，也懒于动笔，反而又对国际题材，反修和支援“亚（洲）非（洲）拉（美）（各个争取民族独立而反帝反殖的国度）”发生兴趣了。也许潜意识里认为，你的身份是“摘帽右派”，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即所谓“敌情内处”，你即使真诚地歌颂什么，人家也不相信，甚至适用“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逻辑加以否定，何苦去触这样的霉头；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是还没被开除国籍吗，那么我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就国际上的是非善恶，表示我的态度，应该无可挑剔了吧？难道还会说我为“帝修反”代言吗？！

这年四月，古巴发生吉隆滩事件（港台译为猪滩事件），为配合支援古巴的宣传，为说唱团写唱词《上战场》，并付诸演播。这是职务写作，与此同时，还写了政治抒情小诗。我写古巴，带着个人的感情。一九五九年还在农场劳改的时候，发生了卡斯特罗推翻巴蒂斯塔政府的事变，当时中国官方翻译出版了卡斯特罗前些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后在法庭的一份自辩词，题目极有力量，叫做《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在心中默读着：“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我感到卡斯特罗说出了我心里的话，或者是替我说出了我应说没说过的话。这跟我历来在唱《国际歌》时的感情近似。在那首宣布没有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的革命悲歌中，我格外倾心在有一句“起来，饥寒交迫

的奴隶”之后，紧跟着的第二句：“起来，全世界的罪人！”（这是瞿秋白的旧译，后来订正本译为“全世界受苦的人”了），当我的身份沦为“罪人”以后，我把全世界的“罪人”视为兄弟伙伴了。所以我跟着卡斯特罗千百遍地重复着“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正如我曾经跟着左拉，在心底叫喊“我控诉”那样。

我不但倾心于古巴的“革命”，写诗抒情，向古巴遥遥致意，我还写了个信封，作为中国之“人民”的一员，自发向古巴捐款，寄到某单位，请他们“代转古巴人民”。

作为职务写作，我这一年还为唱片社润色了《阿尔巴尼亚艺术家访华演出唱片选集》说明书上的一批歌词。阿尔巴尼亚是我们反对苏联修正主义

的战友啊。我当时不知道，就在这一年，中国政府把一船从国外买来救急的渡荒粮食，因阿尔巴尼亚求助，就在海上改道，全部直接发往那个欧洲的战友国家了。

中苏交恶，邻居沙安之处境变得尴尬

从前一年苏联撤退专家，中国撤回留苏学生，中苏关系一步一步紧张起来。记得去年我们夏天在十三号发射台种秋菜时，大家休息时还在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今年局里音乐厅有一回请刚从苏联回国的电视台首任台长孟启予作报告，她就指出苏联的酒吧到处是靡靡之音，包括流行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什么的。

这不过是说苏联的文化变修，而到了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会上通过决议，将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所谓“焚尸扬灰”。嗣后国内主要媒体一致报道，前往参加会议的中国代

表团团团长周恩来在会上“代表我党庄严表态”，对“苏修”作了斗争。

大家看报听广播，这毕竟是人家国内的事，我们无法置喙。

而这时，广播局的保卫科长迁居到我们单元的三层来了。我们在这里居住不久，人头不熟。也不知道是恰好有人搬走空出房来，还是怎么安排的。原来此中大有深意。因为我们楼上住着对外广播部一位俄语稿件定稿人，名叫沙安之，是华裔的苏联公民，嫁给了一位中国留苏的大学生，一起来到中国，但她保留着苏联国籍。因此受到关注吧。

这样一说我记起来了。这是一位皮肤微黑的中年妇女，已经开始发福。见到她，多是她——有时相陪的还有她很和善的中国婆婆——把一辆童车从楼上

抬下来，晒太阳。及至天已经很冷了，还是不间断地让那个小小的女婴晒日光浴。果然是俄国人的生活习惯。这位婆婆和公公，常常在楼梯上下相遇，总要打个招呼，这其实是中国人邻里之间的常情。那位女士从来不跟左邻右舍打招呼，恐怕主要是语言不通的缘故。后来听说，她是老革命的女儿，在三四十年代送到苏联寄养，并且在那里上了大学，成为苏联公民。再后来，听说她的父亲是沙文汉，哦，我们知道，老革命，但在一九五七年浙江省省长任上，被打成右派了。他这个右派即使不算钦定，但一九五七年年底，领导人在杭州亲自修改审定了江华在党代会上的报告，并批示在《人民日报》及全国党报全文刊载，大标题是“乘风破浪……”什么的。当时印象很深。这次浙江省党代

会上把沙文汉“批倒批臭”，也就意味着定成铁案了。

一年以后，即一九六二年，我因剧本和演出一类事情，结识了从苏联回国的著名导演孙维世，说起沙安之，她不但知道，而且认识，因为沙安之在苏联时也是上的戏剧学院。孙维世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她们被疏散到中亚（或远东）吧，沙安之年纪比较小，她吃了混杂有碎玻璃渣的面食，大病一场，不得不动大手术，这样，病后她的身体一直不好，似还有后遗症，也就不可能从事演艺活动了。听了这番介绍，不禁对这个不搭理人的沙安之产生了同情。一个人，那么小就离开父母，在国外又赶上战争，受那么大的罪，现在回到父母之邦的祖国，语言却又不通。本来可以同父母略享天伦之

乐，偏又逢父母双双打成右派——从光荣的革命老干部，变成了人所不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甚至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怎么所有倒霉的事情都落在这一个弱女子的肩膀上了呢？！

现在又因中苏交恶，苏联国籍失去“牢不可破的友谊”的光环，甚至使她受到某种程度的监控，叫人说什么好呢？！

后来，在“文革”之前，沙安之夫妇和“上有老，下有小”的全家一起左迁长沙，在那里，特别是“文革”当中有什么样的遭遇，就不知道了。八十年代偶从湖南来人听说，她调到那里某个大学后，工作十分出色。但在她放弃苏联国籍后，申请中国国籍遇到波折，有好几年成为无国籍人，这种际遇是过去很少听说的。

九十年代特别是新世纪后，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历史学者唐宝林出版了《拒绝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传》，沙文汉和陈修良的女儿沙受之也发表了有关的回忆。我见沙受之提到兄弟姐妹的时候，没有沙安之的名字，问唐宝林，才知道沙安之不是沙文汉和陈修良的亲生女儿，而是当年一起从事秘密工作时一位牺牲了的同志的遗孤，跟了他们的姓以保全，随后送到苏联去，就没有改回原姓原名。这个内幕，使沙安之的身世更增添了悲剧的色彩。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得知自己的身世的。人之不幸，有如此者。现在沙安之该在八旬以上，我们看到的那个小小女婴，也应该五十岁出头了，祝她们一家健康，快乐！

当时我们对保卫科长住到本单元来，都没有特

别在意，没想到这或有对外侨变相监控的意味。一来我们从不抱防人之心，二来我们对做保卫工作的同志并无恶感。记得最早广播局保卫科有位进城老干部曹海清，跟我们都很熟络。大约五十年代中要调回老家，还到我们宿舍来辞行，说起他给毛主席当警卫员的故事，他手头还保存着毛泽东写诗的手迹。当时我们对毛泽东的诗和书法还不像后来那样着迷，谁也没表示想看一看。现在想来，当时本可一睹“毛体”率意的亲笔，这机会交臂失之。不知曹海清是不是能够一直保存至今，还是在后来中央办公厅按名催索的时候早已上交了。

也是在一九七九年初，接到保卫科长刘庆臻同志的电话，他说他参加了中央台右派案件的复查，给我改正结论的决定已经有了草稿，他在电话里念

给我听，我发现在认定原先定案是错误的的一句前面，宕开一笔，说什么“虽有（什么什么）”云云，我立即打断，说你们还要给我“留尾巴”么？他好像一愣，接着平静地说，那我把你的意见转告给复查组。我也没问复查组都是些什么人，估计当年那个支部书记即使没参加复查组，他对复查工作也必还保持着影响，他是必欲置我于万劫不复之地的，怎么能看我一无挂碍地抖抖衣服拔脚走出右派泥淖呢？还好，下次收到广播局寄给我的书面决定，就把草稿所留的尾巴割掉了。这时我才想起，我对老刘的口气，太过生硬了，一下就把他推到似乎参与故意给我“留政治尾巴”的一伙当中，未免有伤我们过去一直以礼相待的关系，这是经过那么紧张的“文革”时期也没有改变的多年积累的人情

啊！人和人之间，没有恶意，且还有某种好感，多年一贯下来，容易吗？也许只因我在电话中这么一次简单化的带情绪的应对，就毁于一旦了。失悔已来不及，后来三十多年，再也没见着面，无由当面道歉了。

居民小组长：息事宁人，还是无事生非？

前几年，忘了因什么话头触发，有人问我，你“摘帽”回来以后，难道从没感到受着监控？我说没有啊，而且连这么想都没想过，我有什么值得监控的？大饥荒的年头，谁吃饱了撑的？人家接着问，你们宿舍的居民小组长呢？我们住集体宿舍住惯了，竟没想到我们现在住的已是家属宿舍，是有居民小组建制的。于是说，这可得找当年的邻居打听打听。打听来的是对外部一位叫杜甫的老干部的家属老太太，一直是居民委员会的，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

从一九五八年后，我一般不跟不相识的人打招

呼，以免像一切不祥之物那样讨人嫌。无论“文革”前还是“文革”后，我印象中倒也从来没有居委会的人例如居民小组长找过我。

平心而论，我们单元的这位老太太，如果是居民小组长，那她经由多事的五六十年代之交，以迄多难的“文革”时期，都没有无事生非、倚势欺人、谎报“敌情”，搞得一惊一乍、鸡犬不宁，对这一片居民来说，这是一个多么理想的，不可多得的居民小组长啊！至少像我这样一个有“砑”[\[4\]](#)的居民，得以少受许多惊扰，从而少念叨几回罗斯福主张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多么有利于维护稳定的大局啊！也许所有的居民小组都接受了有关部门分配的任务，哪家哪家是“重点”，有什么动静就来报告。当然，这里也有像我这样在大动荡中偏安

一隅的居民的自律：“没事的时候不找事，有了事情不怕事”，这是后来任中央政府驻香港最高官员周南在“文革”后对吴小如说的多年自律的体会。我一般是早八晚五，早出晚归，既不“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甚至也不招来三朋四友，酗酒喧拳。更要紧的是我既不会去银锭桥置放土炸弹，也不会奔向柏林墙、沙头角，连请狙击手把枪口高抬一公分都不需要。如果发现我步入禁区，那禁区乃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呀！“侠以武犯禁”，我们这一类“犯禁”的人，动静不大，笔落无声，确实也惊扰不到居民小组长那里。……愿我们曾经的相安无事的居民小组长，健康长寿；如已不在，愿她安息。

对于另外的一个我所知道的居民小组长，我却不准备献出这样隆重的祝愿。那就是我偶尔回父母亲处，听说的那个地段的居民小组长。在“文革”以前的六十年代上半段，表面看来，居民小组长的权力还不大，不过是走街串巷，传达“（街道）办事处”的各项布置，要想进到人家院里，屋里，多是借着“查卫生”的名义。我父母亲住的路南小院，原是日本普通居留民在原有一间较像样的北屋旁边又随意搭盖了几间破西厢房凑合起来的，不成格局，但其特点是独门独院（这类住户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最为当局所忌，以其“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也）。有一天居民组长“查卫生”来了，一进街门就直奔北屋。一溜西厢房“进深”浅，从窗外一眼就可看透。北屋不然，等于一

明一暗，明的一间有门窗，里边的套间，被南北两家的院墙挡住，白天也得开灯才能找见杂物，我家也是拿它堆放箱子一类东西的，连书架都不能放进去，看不清啊。大概这位居民组长早就存心要一探究竟了——这不是个“暗室”吗？！我母亲劝她说，你别进去了，里面太黑，什么也瞧不见，没想到，越这么说，越是刺激了她的决心，我母亲只好拉住她，“老头子在里头洗痔疮呢！”她竟甩开母亲的手，一掀布帘就进去了，黢黑的，定神一看，果然是我父亲蹲在那里，老人家一心在用温水热敷，对外面的人说什么吵什么，一如既往地不闻不问，直到面对这闯入者，依然淡定，那个居民组长只好搭讪着退了出来。——这叫人说什么好！

母亲说起这事的时候，有些轻蔑地说，她原先

是窑姐，一九四九年解放妓女，嫁了一个工人，所以成分好，当了好几年居民组长了。我说当妓女未必是她的错，多半是自小家里穷，要不就是让人拐骗了卖到妓院。问题是别把妓院里的习气带到“新社会”来呀。不过这一下也好，让她死了这份好奇心。直到“文革”，我父亲已去世，可能由派出所主持，选了两家无房户占住了这一明一暗两间北屋，当中原是木隔扇，现在由房管所给砌墙堵上，里屋在北面另开一门。两家新邻居人性都很好。一位杨叔，一位和叔，分别是市里区里企业中工人出身的基层干部，和婶、杨婶是家庭妇女。我母亲跟他们以心换心，相处甚善，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六年，落实政策，我母亲迁居。二十年的老邻居了，不免依依不舍。那个居民组长在“文革”中，

特别是初期配合红卫兵驱赶、批斗“黑五类”，以及随后所谓“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更加小人得志，擅作威福，气急败坏，恶语伤人，不可一世，“文革”后不知所终。

第三章 一九六二年

早春似有解冻的消息，但麻木的我已不动心

一九六二年新年和春节的假期，都是在船板胡同路南的小院里过的。

西屋虽窄，进深两米多点，但晴天的上午阳光从东窗射进来，直扑西墙，满屋温暖明亮。

南头一间，除留一小门通小套间外，几乎让一个大床占满，那是奶奶和孙子专用的。闹闹不会走的时候，当然在床上时候多，快周岁了，他就要下地活动。一进屋门，迎面靠墙方桌一边一把椅子，对面放收音机的小桌前，还可以放一把椅子或凳子。常规的局面，是奶奶、文秀和我分别坐在这三

个点儿上，闹闹在其间往来，一旦他向别的方向出击，三个大人必有一个起立追踪。爷爷一个人在北屋揣着袖口打坐，偶尔到这西屋来看看。这就是所谓天伦之乐了。

这天伦之乐经常伴奏着收音机广播的歌曲或音乐，不大听什么语言节目。余音绕梁的，多是民歌风的苏联流行歌曲，像伊萨科夫斯基作词的《有谁知道他》：“晚霞中有一青年，他徘徊在我家门前……”还有曾经来过中国的西伯利亚费奥多洛娃姐妹的四重唱《田野静悄悄》，以徐缓的节奏展开辽阔的雪野和如雪一样纯洁的内心感情世界，而我总是借这个曲调填进晚唐的小令：“梳洗罢，独倚望江楼……”仿佛天造地设一般地合辙。

其间，奶奶——就是我母亲，时不时要到北头的

厨房去看看蒸锅，文秀也要去抢着帮一把手，切肉洗菜，大家小家两户的当月肉票和年节肉票都集中于此时此地。这时候往往剩下我一个人单独跟闹闹打交道了。即使他不理你，只顾自己玩，你也不能分心想别的事。

等大家吃过午饭，奶奶哄着闹闹去睡，好像一场以一个周岁孩子为主角的热闹戏才暂时拉下大幕。

在这个家里享受着满足之感，才有这样一阕《浣溪沙》之作：

墙角瞿瞿灶马鸣，
窥窗日暖篆烟轻。
劳人安得此闲情？

水沸一声云外笛，
心飞万里海西程。
天高水阔溯流行。

这颗心总是不安分的，不满足于在家里与亲人相守，还是跃跃欲试，如这首同是写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台历纸背面的绝句《雪晴》：

霁雪西山紫可攀，
崖头松老尚虬蟠？
楼高不尽天涯目，
踏雪相寻欲上山。

雪后，从船板胡同出来，回真武庙宿舍时，经长安街西行，还真的能够看见西山一抹，引人驰目骋怀。

这个开年，距我从劳改农场返京，还只有两年多一点，但闭门索居的我这个人，已经好像忘记了前尘，真的想要“重新做人”——就是像一个普通人而不是由于一顶有形无形的破帽遮颜而自惭形秽。市面上供应虽似充足些了，多方面依然紧缺，我替母亲到东单菜市场买东西，就遇到售货员挖苦一个东北老乡，因为买火柴限量，这“老客”买一包待会儿回来再买一包，几趟下来，售货员拉下脸说：你买那么多火柴干什么，想放火啊？那老乡老实，一时语塞，讪讪地走了。听说在西单菜市场，一个外地顾客遭了抢白，就回嘴说：“你们北京人有什

么了不起，你们的货还不是全国供应的！你们出什么？光出政策，还来回变！”这回轮到售货员语塞了，但他能对政策的多变以至政策的失误负责吗？！

不过，毕竟是在北京，既是所谓天子脚下，又是窗口城市，各方观瞻所系，这一年好过前一年，用不着七八块钱买一斤鸡蛋了（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才三十来块钱啊）。

再就是，听说我原来劳改的那个中捷友谊农场，也把广播局拘在那儿的“右派”都发落了。当然不是他们要打发，而且有统一的部署。大都分配到各省市县去，似乎没有像我和沈纪那样回广播局的（宋绍柏原属北京市台，故回了北京，但另行分配到外单位了）。钱辛波去了江苏宿迁，姚甦去了

南京，马之、贾连城、李道堪去了内蒙古，万淑玲就留在了黄骅。——这都是后来打听到的。后来又陆续听说他们中许多人在分配工作前后摘掉了右派帽子，但后来无形中又等于换上“摘帽右派”这顶帽子。

不过，总之，还是有所放松吧。

而使我好像受到鼓舞，以致有些“故态复萌”的，主要还不是国民经济经过调整而出现好转，已能从市场上看出来，也不是广播局的“右派”们都离开了农场，减轻了我先期离开的负疚心理……而是接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约稿信。

在这之前不久，作协曾派一位名叫曹志的女同志到我们文工团来，通过组织找到我，向我了解这几年的情况，问我对现在的处境有什么想法和要求

之类。我给她的感觉，应该是我对现状表示满意，并且要在这一有利条件下好好工作，同时好好改造思想吧。

曹志我不认识，她传达了作协领导对像我这样的人的关怀。我当时也不大注意现任作协领导是谁，反倒觉得按照既定政策，我们划了右派的人，并不开除会籍，那么领导来了解一下工作和生活情况，表示关怀，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想，《人民文学》的约稿，就是这一“关怀”的具体化了。

我从在黄骅农场写诗的手册上挑了两首短抒情诗，一首《夜耕》，让拖拉机的前灯，照彻“黑虎虎的地平线”，记得写这首诗的时候，我没写“黑糊糊”也没写“黑忽忽”，那两个“虎”字简直是

硬跳到我笔下的一那远处黢黑的地平线上真的隐现着虎视的阴影么？另一首题为《灯火》，宏观地写无边大地山川处处亮着给人温暖和光亮的灯火，其中从“万家灯火”的成语衍化出来的“一万万家灯火”，乃是从邹荻帆一旧作偷来的。许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两首诗几十行竟都写的是夜景！潜意识里或还是“长夜如磐黯故园”吧？

两首诗大概一到即发，这年三月号就刊出了。

四月号《人民文学》也发表了公刘两首诗，所占篇幅跟我相似，记得其一是把中国的太原和越南的太原联系起来写的。王蒙也在《北京文艺》或《新观察》上发表了新的短篇：《春夜》？还是《冬雨》？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

在正常年景，物候是有规律的。

一进三〇二宿舍院，眼睛一亮，那一小片桃树，忽然繁花盛开，就在三月十二日。前两年也是在这一天前后大开特开的。真是“千树桃花一日开”！

得诗一句，要把它续成，推敲来推敲去，那第二句就不满意，分明是俗套，掉到陈旧意境的窠臼里了。我这里还没成篇，却见《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钱昌照的一首桃花诗，打眼的竟是“千树桃花今日开”！英雄所见略同啊！

一天早晨去上班，迎面走来的是部队作家寒风，到我跟前停住，含笑说：“你们的问题快解决了。”说完，意犹未尽地过去了。

寒风的妻子康之行在电台文艺部，他跟上住在

老三○二院里。寒风在南下部队里写的《尹青春》
我一九五一年就从《人民文学》上读到了。一九五
六年在青年创作者会上结识他本人。知道他家是满
族，世世代代在易县西陵给皇家看坟。人平易可
亲。可我从一九五八年起息绝交游，怕惹人厌烦，
一般不跟人打招呼了。寒风主动给我递个信儿，让
我感动。但我并没多想，并非我已经心如古井，压
根断了重出江湖之念，或是老于世故，宠辱不惊，
喜怒不形于色了。不是，都不是。我早就是一副听
天由命的扶不起来的心态。因为一心想的只要能够
写东西，写出来能够变成铅字，就很知足。一九六
一年年末一期《文学评论》发表了我的《毛主席
〈沁园春·长沙〉结句试解》，《人民文学》又来约
了诗稿，我就有乐不思蜀之概了。

当然，某种意义上的麻木，也因为不知道寒风报信的大背景。

后来，才知道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有人倡议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中央派监察部女部长钱瑛到安徽试点。文秀的大学同学董瑛恰恰在新华社安徽分社。她一九五八年（好像是在大抓右派之后）去一个农业社采访，那个旗帜人物是个女劳模，上影拍过所谓艺术性纪录片（或纪录性艺术片）《三八河边》，由张瑞芳演主角。董瑛“不懂事”，在这个劳模头上动土，她写“内（部）参（考）”说这个社有弄虚作假的现象，那不是把省地县层层树立典型的干部官员都得罪了？不打她右派打谁？

要甄别，董瑛的冤枉是明摆着的。

安徽分社社长陈勇进支持为她平反。可是不久钱瑛被召回，甄别一事半途而废。高兴了半天还是一场空。

当时，寒风的话，我将信将疑。我深知自己的文字案件，涉及一系列认识问题，如官僚主义和反官僚主义，写真实和干预生活，领导与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借这些题目整人的，也自有他们一套不讲理的道理，那一套歪道理有权力支撑，不打掉，一大片文字狱翻不过身来。我不过是其中之一。

不过，如果当时有人代表组织让我写自我辩护的材料，我未必不会像新华社戴煌那样搞起书面申诉来。许多年后我听说，老戴是听了社长吴冷西的动员才申诉的，但风一变，就说他闹翻案，又弄到

山西省监狱里关了十几年。幸而我们这里的领导沉得住气，没找我，使我躲过了这一劫一无以名之，姑且叫甄别平反之劫吧。闹来闹去，几乎又成了一次钓鱼。而我之没有上钩，并非我有先见之明，实在是阴错阳差，瞎猫碰上死耗子。这种侥幸之感，其实可能比老戴的上钩更显得可悲，只是个中人往往意识不到罢了。

较真地说，所谓钓鱼，其实就是“三十六计”里的“欲擒故纵”，是策略层面上的“术”，用于对抗性的矛盾。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在“弛”也就是“放”开的时候，如鱼得水；轮到该“张”的时候，也就是要“收”紧了，一放一收，正在得意戏水的鱼们，不用一一垂钓，已经尽入网中，晾到干岸上了。

这是“事后诸葛亮”悟到的“道”。而在事发当时，像我，还是仅仅以所谓形象思维，斤斤计较“钓鱼”的善恶，并且迁怒于千百年来的渔翁钓叟，认为《板桥道情》里的“老渔翁，一钓竿”，柳宗元笔下“独钓寒江雪”的“孤舟蓑笠翁”，都成了阴谋家。我的同情遂永远是在各种各样的鱼类身上。原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是一句简单的比喻，它竟成了千百万人宿命的叙事！

天寒水浅，鱼不上网，这是打渔人莫可奈何的事。

除了不上网，还要不上钩。但文人能不动笔么？

只要有黑字落在白纸上，说不上钩，已经上钩了。

文网文网，收的就是以文字为罪证的待罪之鱼

啊！

以文字表达为生命的需要，落入文网乃是宿命

虽然不曾有鱼死网破的决死之心，但既恋着手
里这支笔，注定是要以身试网的（不用“以身试
法”那句成语，因为此间并没有真正的“法”）。

三月二十八日这一天，是个星期三。我没去上
班。窗外刮着北京春天特有的沙风，昏天黑地，鬼
哭狼嚎的。九单元三楼上这间朝北的小屋，光线暗
淡。

我在床边那个伏案写过无数检查交代的窄小两
屉桌上，捻亮台灯，摊开棕色发黑的粗糙红格稿
纸，用蓝圆珠笔写下标题《小闹闹》。去年二月，

他从落生的复兴医院出来，就回到这个船舱似的小家，一直住到满月。那一个月的情景，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还历历如绘。我不假思索地把它记述下来。接着就写到他回船板胡同以后日新月异的成长。一路顺畅，不打奔儿，写了小闹闹一年一个月零二十天的生活纪实。流水账啊！但世上哪一份流水账里饱含着一个为人父者舐犊的深情？

一口气写完了，在倒数第二段，我设想小闹闹长大了——

那时候，你自然要起一个像样的大名儿，那时候，爸爸将对你说一番别样的话。

涅克拉索夫诗里有过这样几句：

当你长大，萨沙，你会明白，
那时候我会亲口告诉你一切，
我在哪儿学会歌唱，我又曾在何时，
和什么人同声歌唱……

一九六二年，我还没读到这几句诗。是共同的人性，使我们互为印证了。

《小闹闹》写好，没过两天，就抄了一份，寄给《人民文学》编辑部，以谢他们在反右数年后首发我诗稿的雅意。很快，收到他们的退稿，没有附言，就是不用吧。我随手又把稿子封好，寄到《上海文学》去了。我对我写的东西，不会自恋自吹，也不会自卑自贬，我有恰如其分的自信。

早在一九六一年，柳荫同志对我说，经过跟剧团陈庚同志研究，想让我把办公室搬到剧团去。他用的好像是征询的口气，但也没有要我表态。就在默契中决定了。在这之前，他曾经隐约地透露过，我在表演团体办公室打杂，是个临时性的过渡，也为的各团体的负责同志对我有所了解吧。我知道我的身份，故理解他的用心。几个广播文艺团体，负责人多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来的，不像西长安街过来的、编辑部的老广播，本来就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是随遇而安的态度，一既“右”之，则安之？——倒是柳荫更积极地“做工作”，为我创造条件，好回归“业务工作”岗位上来。其间，一九六〇年由我替表演团体办公室起草的，为文工团员申请增加粮食定量（特别是吹管队员请按重体力劳动

定量)的报告获准，算是我给文工团做了一件好事，我的沾光不只是跟着每月定量调高三斤，更重要的是各团队的头头们连带着对我也有了些许好印象。

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的办公室，就在广播剧场后台的二层。从团长陈庚到每一位演职员，更不用说从事编导的同志，早早晚晚，对我都十分友好。学员陈骢，活泼的小女孩儿，有一天在楼梯拐角处碰头，对我说：“昨天梦见你了！”我一怔，她已经跑下楼了[\[5\]](#)。

一九六二年四月，全团去颐和园春游，我一路上产生一个想法，应该为这里的演员们量身制作一个剧本。要把全团的人网罗进去，非一个多幕舞台剧莫办。

我从来认为文学剧本的创作，是难度最大的。曾经给自己定下的预想，是十几二十岁写诗，三十岁起写小说，四五十岁以后写剧本。这个打算还来不及细化，就让横冲直撞的生活给搅乱了。

那时候还没有白手起家创作一个剧本的雄心壮志，想的是从长篇小说改编。有一搭无一搭地物色文本。在六楼资料室遇到刚从书库浏览出来的刘朝兰——这是一位烈士的女儿，一九四九年我初来电台，我们的办公桌正在对面，“文革”后她写的话剧《延河边的孩子们》由“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一时影响不小。一九六二年她还在少儿部当编辑，爱读书，也常来资料室。一是她告诉我新出了两本苏联小说，“内部发行”的，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波列伏依的《火热的车

间》。我对波列伏依有兴趣，却对“火热的车间”兴趣不大，先借《叶尔绍夫兄弟》看吧。这个作家，曾有拍成电影的同名小说《茹尔宾一家》，五十年代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个工人家庭的故事，可读。现在这个血统工人叶尔绍夫家，大哥普拉东也是个老工人，二哥斯切潘曾被德军俘虏，战后进入了劳改营，才释放不久，老三季米特里至今脸上留着战争期间的疤痕……这一家周围联系着工厂内外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人与人之间有矛盾冲突，不是斯大林时期“无冲突论”的产物，有戏，但不是情节戏，而是生活戏，我以为。看了个开头，我决定：就是它了！随之就考虑场面的取舍，进入改编的第一道工序。

我从来没写过话剧。演出看过，也看得不多。

较多的是读过些中外剧本。近年在资料室书库，曾见洪深谈好莱坞的一篇文章，说编剧有模式，列举了几十条，比如乱伦的，就有父女，兄妹，与父亲的情人等几种；误会的，巧合的又有多少种……等等。这当然很能败坏胃口，不过还好，没影响我读剧本，好剧本都是从生活经验和想象出发，不是死按着这些经过归纳的母题制造的。

我曾想中年以后甚至进入老境再写剧本，因为我认为写剧本必须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后，不然你怎么能把混茫万象中的人与事，撮到舞台上，只用一百多分钟，就层层剥皮露出“瓢儿”和“核儿”来呢？

我既学不了莎士比亚，也学不了席勒，那么……

我喜欢契诃夫的小说，也喜欢契诃夫的剧本，《樱桃园》、《三姊妹》、《万尼亚舅舅》，那种生活化——我是说日常生活化的氛围，节奏，以及在娓娓叙事中不乏抒情的散文式笔调。

这可能属于我的偏爱，往往是从阅读剧本的角度，而不是从舞台效果的角度着眼的。难免有不少外行之见，此后若干年，到了时时处处要求“动作”的导演和演员那里，自然就要碰壁了。

不过，我认为《叶尔绍夫兄弟》还是可以多少弄出点契诃夫味道的。

为了给剧中那个心灵受过伤的可怜的姑娘廖丽亚找一首用吉他伴奏独自吟唱的歌，我几乎翻遍了我所能看到的歌曲集。那些战后的流行歌曲太甜，战前的歌曲又有点“隔”，应该是这样一首歌，深

沉而不消沉。我想到了历史歌曲《斯捷潘·拉辛的悬崖》，它的歌词，我在巴金的《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中读到过。这本书其实是巴金早年计划要写的一部大书的开头部分，准确的书名应该是《俄国革命运动史话》，但要出版必须隐去“革命”字样，或是因为无法面世，后头也就没再写下去了。

终于在一本《苏联音乐教程》中译本里找到了这支歌的歌词全文和曲谱。但这支歌在教材书中显然不是重点，配歌不能令人满意。我先把这首歌唱熟，再参考两种译文，一句一句把词配上曲子：

在那险峻的河岸上，有一座悬崖，
崖上长满了野生的青苔。

多少年无人问，不见人烟到来

悄悄屹立了多少年代.....

剧本一具雏型，我就给我们剧团的演员——分配了角色，像煞有介事的，还给学员们分配了B角，这个演员表当然只有我一人知道。

我把复写剧本里最清楚的那一份送给柳荫。他是主张我们剧团该有舞台实践的。一九五七年，还没有电视，仅有广播剧演播经验的剧团，却大胆演出了曹禺的名剧《北京人》，由曹禺在剧专的学生蔡骧导演，获得很大的成功。当时曹禺还不像后来看了什么都表示“真不易”，他对这次演出是真的首肯，冯亦代还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写了观后感。其后不久蔡骧被划右派，使这件剧团的喜庆蒙上了无以言说的混沌。

反右派至今五年了，五年来这个小小剧团赶制了紧跟政治形势的多少节目，其中包括开创性的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是从演播室里直播的。然而五年来没演舞台剧了。《叶尔绍夫兄弟》的剧本能不能给导演和演员们提供一个机会呢？

六月号的《上海文学》刊出了《小闹闹》，放在二条，头条是茹志鹃一篇写四十年代孤儿院的，也许编排上有配合“六一”儿童节的意思吧，这样，发我的东西也不显得突兀了。到“文革”中批判我这株“毒草”的时候，竟指出此文的责任编辑是同为“右派分子”的王若望（当时刊物上并不落责编的姓名，可见剧团“文革”小组为《小闹闹》一文曾向上海“外调”，我也是在批斗会上才听到把我跟王若望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之前一两期的

《上海文学》上，我恰好看到了王若望一篇写挨饿历史的小说。那算他的“亮相”之作吧。一本来在反右后一段时期，心情灰暗，早就决心搁笔了的，大概不止我一个，谁知不过五年，一有约稿，看到重新发表作品的机会，就忘了什么钓鱼不钓鱼的事，立马跑步前来报到了。后来又挨整，怪谁？

但也难怪，写作，并且发表，这本是公民应有的权利，把莫名其妙地剥夺的权利还给我们，这不是应当应分的么！

就是这么天真！就是这么幼稚！

后来我不止一次想过，有人说，性格就是命运，有人说，政治就是命运；那么，一定的性格遇到一定的政治，这就是宿命。

把文字表达当成自己生命需要的，落进文字

狱，不就是顺理成章的么！

从古装的唱词到洋装的话剧

一天柳荫找我，我以为他要谈谈对剧本《叶尔绍夫兄弟》的看法，下一步怎么做等等，谁知道对剧本他一句也没说，他说的是，今年夏天要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看我能给说唱团写点什么。

我知道，现在说唱团的节目里，源自《红楼梦》的，只有钟舜华的京韵大鼓《探晴雯》，白（云鹏）派的看家曲目。去年让我给稍事整理，我以为并没有佛头着粪，但也不是没留下遗憾。得到的教训是，面对口头文学的记录稿，切不可随手点改，要慎重，要三思，要手下留情，万不可自以为是，像改作文的小学老师那样出手。

《红楼梦》作者的卒年，早从报纸上看到两种意见的争鸣。看来定下了。上海《文汇报》发出一篇记者专稿《京华何处大观园》，以手写体标题，从内容到形式都一新耳目。肯定定阜大街上前辅仁大学校园的女生部，前清的恭王府花园，上溯到乾隆朝为明珠府或其前身，便是大观园的原型，无须当真，但是有趣。

看来，困难时期行将过去，大家吃饱了饭，乃有闲情。所谓红学界及其外围，好像全都动员起来，准备研讨的，筹备展览的，落实到小小说唱团，唱京韵大鼓的孙书筠选中了我写的《鸳鸯绝偶》，唱西河大鼓的马增芬选中了我写的《刘老老进大观园》。我还写有《宝黛斟情》、《紫鹃试玉》、《龄官画蔷》，好像没能成为这次纪念演出

的曲目。后来听说唱团老团长，号称“少白派”的京韵名演员白凤鸣说，演出时王昆仑也去了，对说唱团的几个新老节目都给予好评，还问到团里情况，白凤鸣一脸是虽老而天真的笑容。王昆仑在这里不是北京副市长的身份，更不是三十年代初就加入中共的老“特别党员”的身份，他是研究《红楼梦》的内行，他抗战中所写的《红楼梦人物论》，经过整理，正分章陆续在《光明日报》上重新发表。他对说唱团节目的肯定，也等于对我的间接表扬，我自然也是高兴的。我想，白凤鸣老人家向我传达，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没有听过说唱团演唱我编写的段子，却乘兴去故宫西华门里看了《红楼梦》相关的画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旦宅作的人物画。我相信，一百个

画家会画出一百个晴雯、一百个林黛玉……不管他们心目中的这些人物面目怎样，显然都是带着同情着笔的。不但这个画展，穷我大半生所见，似乎没见过什么画家画过贾政、贾赦、贾雨村以至赵姨娘，还有赖大等刁奴恶仆，哦，他们的形象应该在连环图画中有所显示吧。

在我为纪念曹雪芹赶工的时候，还计划过两个唱词选题，一个是《答玉》，一个是《抄检大观园》，都是传统的红楼段子没碰过的。对我也是重头。先易后难吧，我把它们放到后面再写。结果各种主客观原因交集，终于没有写。并不是因为我有先见之明，预料一经落纸，便成“毒草”，但四年后“文革”伊始，我就庆幸这两株“毒草”消失在萌芽状态了。假如曹雪芹生在此时此地，他能不因

《红楼梦》被斗得三魂出窍，七窍生烟？！

不过，在当时，一般读者眼里的《红楼梦》，并不都是伟大领袖眼里的阶级斗争史，而是花月繁华，卿卿我我的软性文学。我在一九六二年也没完全浸沉在大观园内外，我还主动动笔，根据范钧宏的同名京剧剧本为说唱团改编了一篇唱词《强项令》，说的是汉武帝时的洛阳令董宣，断然处置当朝皇姑家一个违法的家丁，不但不卖皇帝姐姐的账，也不卖皇帝本人的人情，“强项不屈”，依法执法。这有什么不妥吗？不料在“文革”中，说这篇唱词提倡抗上，为一切反党分子，首先是为“强项”的彭德怀撑腰。

说话已经到了六七月间，天气大热。有一天柳荫把《叶尔绍夫兄弟》剧本复写件还给我，他什么

也没说。他在工作中慎于表态，是我所深知的。因此我们常常是“尽在不言中”。像我和陈道宗去年为他草拟的有关文艺广播一些总结性材料，他总是反复推敲，一直没拿出手，不然，到了“文革”，就会在他“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这条罪名上加重一笔。可见不是他优柔寡断，而是多年多次的运动式秋后算账，使他心存戒惧，本想做事，经验教训却告诉他“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无所作为顶多是无所作为，有所作为就可能变成“犯错误”以至“犯罪”。因为在这里，正确与错误没有明确的界限，全凭某种长官意志甚至是朝令夕改的、变化多端的权力随意性！罪与非罪，更是无法可依，说你有罪就有罪，说你无罪便无罪，“人嘴两张皮”这个俗语，从来也没有

现在这样立竿见影，体现为“言出法随”的历史现象。可皇权时代皇帝的上谕，还容许臣僚们启奏不同意见呢。

我完全理解柳荫的难处，感到遗憾的，只是不能让剧团的导演和演员们借这个“叶尔绍夫……”过过戏瘾。我把剧本放起来，溽暑如蒸，也不想写什么东西，无非拿些杂志浏览。从《戏剧报》的字里行间，我发现今年春三月广州开了一个戏剧方面的会议，全名颇长，一连串话剧歌剧儿童剧什么的，记不清了。这次会上，陈毅有一个使与会者感到宽松的讲话，好像去年夏天，对应届毕业的大学生有一个受欢迎的讲话，也是由陈毅出面的。陈毅固然性格痛快，不过，掌握社会政治的张弛宽紧，应该是传达中央政策调整的精神，就像经

济调整的“八字方针”一样。一年多来，经济调整见效了，看来政治气候也要有所变化。联想到模糊听说的七千人大会，一度要对右派甄别，寒风的口信，从不对大局深思熟虑的我，不免又乐观起来。

我不记得曾听说我们的团体有人去出席这个广州会议，或向全体传达过这个会议的“精神”。若不是我们剧团因为不属于文化部系统而被漏掉了，或由于搞的主要是“广播电视剧”，而不入会议组织者的法眼（那时候电视剧这个牌子，远不如当下这么吃香，电视剧如今的走红，是最早的从业者做梦也想不到的）；要么就是我当时的身份、位置，还不够与闻有关这个会议的内部情况。这也都早就习惯了。

这一期的《戏剧报》引起我注意的，更有一篇

金山的署名文章：《尊重剧作家的劳动》。尊重二字不闻久矣。岂止剧作家，还有诗人、小说家、几乎绝迹的散文家，以及上不得台面的杂文家！不把你右派就算好的了，还讲什么尊重？！金山的文章，怎样起承转合，举了什么例，讲了什么道理，从哪方面表示尊重……我并没认真细看，有这个标题就够了。我也不问他说的尊重，是指领导干部、文化官员，还是导演、演员。我想，反正这一尊重剧作家的倡言者，他本人无疑会对剧作家是尊重的。我才改编第一个剧本，当然够不上剧作家，但我把这剧本寄给他的话，总会听到他一点意见，不管是肯定或否定。

于是，下决心寄给金山。他的地址不用问，青年艺术剧院就在东长安街上！

把剧本复写稿寄出以后，就像把球踢出去了，不再闻问。

内蒙古和江南之行：历史与现实疑真疑幻

这时，却有一件好事落在我身上。内蒙古自治区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文化界将有一较大的团队前往祝贺。其中如历史学家蔡尚思教授，似乎是来自上海，那么这个团就限于首都人士了。不过这用不着我操心。我只记住广播文工团摊上四个名额，总团决定，说唱团马季、薛宝琨，剧团高方正和我共四个人，跟着这个团走一趟，不带什么任务，连大名鼎鼎的马季也没有演出的差事。这样就很放松了。我过去没在文艺团体待过，也没有照文工团团员的规格“体验生活”的经验。当记者的时候，每逢出差，都要先做案头准备，到地方马不

停蹄，是须带着稿子回来的，因此甚至顾不上去附近的风景点转一转。这一回我想，可算是游山玩水了，虽然，明知道有山无水，但是必定有“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啊！

从旅行的角度看，真的不虚此行。成吉思汗陵，位于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东胜县境内。这里属于地理书上标明的鄂尔多斯高原，过去一说陕北，总是向西北方向找，到了这里，说陕北，却是向南看了；跟着大雁南行，进陕西境，先到榆林，后到延安。这样定位，就觉得我们确实到了朔北，六七月阳光下也要穿两层衣服。四外很空旷，天空很澄净，不由得想起《念故乡》歌词里的“天甚清，风甚凉……”想起了彭斯的名篇、袁水拍译的《我的心呀在高原》。就是在这样充满诗情的环

境里，也还会遭遇现实生活的挤压。不是对我的挤压，我恰恰是跟着大队人马到什么地方去参观，由当地干部陪同向导。下车不久，队伍还散乱着，就发现前边有什么动静，形成围观。我虽已被几年的右派生涯改造得淡泊宁静了，一到这种关键时刻，又犯了老毛病，紧走几步蹭到前边，只见一个当地汉族农民妇女，正被保安人员连推带搽地拖开。用今天大家熟悉的话来说，就是上访遇到了截访。走在我们这队伍前端的，其实没有什么官员，多是些学者教授，大概也没经过这样的世面，愣愣的无话可说。怪只怪那位想要上告的妇女，以为凡乘车来的都是上级领导，而她们还把排忧解难的一线希望寄托在上级领导身上。就闹出这么一场误会。随后的参观，看了些什么，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只有这

两个壮丁把一个弱小的一身褴褛的妇人扯走的背影，渐行渐远，却永不消逝。

在这边远的农牧区，我们这些穿制服的人，都被认做领导、官员，甚至像所有上火车乘坐软席卧铺的，一进包间就被乘务员以“首长”相称一样。

刚住进伊克昭盟专署招待所，在平房院分派了房间，我们四个人在一大间向阳北房，才坐定，进来一位中年工作人员，恭谨地问：“哪位首长是说相声的？”我们都一怔，还是马季反应快，站起来恭谨地低声答道：“我……我是说相声的。”然后来者自我介绍，他是专署的行政科长，领导叫他一定要把接待工作做好，哪位首长有什么要求，一定要向他提出云云。接着 he 表示了对说相声的首长马季同志早就在广播里听熟了……让我们好好休息，

态度十分诚恳，并及时地退出，表示不多干扰我们的休息。

我们是先见到了地委书记兼专员的夫人，以后才见到一把手的。因为这位夫人是汉族，高挑的个子，名叫李影秋，依稀记得她是北京人，在中央团校学习过。现任地委宣传部长，自然要对来自文工团的我们表示关注，谈话间知道，她也曾在文工团待过。我们四个人在整个日程之外，应邀到专区文工团做客。那里的男孩子女孩子都极年轻，有的还不到二十岁，不都是当地人，有从昭乌达盟、哲里木盟来的，有家在锡林郭勒盟的，蒙古族的多，也有汉族的。再问起来，这些小孩子都已经成双成对，是一对一对的小夫妻了。我想，入境问俗，这个地区可能像我们汉族地区的农村一样，还兴早婚

呢。

地委书记兼专员是蒙古族人，高大英俊，脸型及线条属坚毅一派，脸色棕红，看来身体健康。他的汉话说得不错，也到北京学习过，应该入的是高级党校吧。几年以后，文革开始，各地揪斗“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首先想到这位看来十分干练、有魄力的兄弟民族干部，恐怕是首当其冲的“走资派”，那时候还不知道，对所有蒙古族干部来说，还有所谓“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一劫，倘被构陷进去，那结局很难想象。

在东胜县，意外地邂逅了李道堪。他去年离开劳改处所的黄骅农场，一竿子插到了这里。总算结束了苦役性惩罚性的体力劳动，分配到县民政局做

小吏，弄什么表报之类，算是用他知书识字之所长吧。我和他在那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的低矮凌乱的小房间里，互相述说了别后的经历。将近三年的时间，我们各自走过了多么不同的道路啊，说起来已经没有什么激动，像说别人的事情似的，麻木可以消解痛苦。他这时正面临着离婚问题的“考验”——无以名之，就名之为考验吧，这是旁人难以插嘴的话题。

在伊金霍洛旗完成了纪念成吉思汗的大典后，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正式转入观光阶段。

当地有个鸣沙山。后来，这样的地质现象，我只在敦煌月牙湖边见过。整个一座山，黄澄澄的，从上到下表层是厚厚的沙粒。我们脱下鞋袜，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去，走到顶上，坐下来，没人指

挥，却也没人独自到一边去，表现出某种合群的潜意识，也是趋利避害的心理，互相靠拢会更有安全感吧。于是像小时候滑滑梯似的，慢慢滑下来，所以慢慢的，是因为沙粒也有阻力。奇特的是滑行下来的同时，从山的胸膛腹腔里传出沉洪的轰轰之声，就像山下某处藏着一座被深埋的寺庙，而僧侣们如常地在做法事，吹着长长的法号，轰轰的。这是足以唤起诡谲的联想和幻想的崭新经验，也唤起我的诗兴，我悄悄地写了一首七言古风，以为是此行最大的收获。可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山雨欲来时，预料此诗会遭到怎样痛挞，而狠狠心撕碎用水冲到船板胡同的地沟里去了。

去青冢吊王昭君。去包头拜五当召。翻越大青山，听说前两年闹饥荒时，各机关派人下去打黄

羊，多少有助于解除不少人的浮肿，但一不留神就在山路上翻车，不知有多少辆卡车连人带黄羊掉到深深的峡谷中去。这是令人神伤的。但在草原上欣逢雨后的彩虹，乃有若逢吉祥喜庆的快乐，可以在虚幻的快乐中陶醉一时。一路上我还真又写了不少短诗，这些都保存了下来，有几首给了《草原》编辑部的李赐，他经手发表出来。李赐是老北大的，“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文革”后回到南方老家去了。许多年后我从妹妹的同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工作多年的马文蔚处问到他的地址，写信问候，他赠我一本自印的文集。

在伊克昭盟，在包头，在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因为我们是广播系统的，所以跟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一位蒙古同胞、蒙古文编辑部主任塞西常在

一起。他是位老革命，人很真诚，应该说我们相处得有了感情。万万没想到我们离开那里不久，他家竟遭到原先一个下属的仇杀，当场杀死了他的几个亲人，他受伤救活，那心中的伤痕是永远无法平复的了。

原来在世界上一切表面的平静背后，竟能隐伏着不知多少的爱恨情仇！

从内蒙古回来，时近入伏，加上两地的温差，觉得北京很热很热了。

这一年的暑期，我所在的文工团试行休假制度（一九五三年机关曾试行过一次一般工作人员的带薪休假，临到我之前不久，又叫停了）。我先是乘公共汽车去了妙峰山，到山脚下发现季节不对——人家进香在春三月——三伏天顶着毒日头赶山路，准备

不足，知难而退了。退而求其次，改天独自游了潭柘寺、戒台寺，到了我年初打油诗里“崖头松老尚虬蟠”的境界，当时写诗是问句，这回落实，可以加句号了。

这一年的带薪休假叫我赶上了，好像第二年也没再听说一般工作人员的休假。

文秀她们编辑部连这一年好像也没提起带薪休假。现在回想，如果当时两个人能够凑到一起，不知我们会怎样做度假的计划，也许，她会提出带着孩子回上海的娘家？她母亲、我的岳母年初去世，她曾匆匆回去一趟。毕竟从结婚前的一九五六年那次她因采访顺道回沪，中经我打成右派，分别下乡劳动（她算劳动锻炼，我是劳动改造），加上物资匮乏的困难三年，世态沧桑，人事无常，她与上海

家人有六七年的睽隔了。

事实上，连仅有一次的潭柘寺之游，我也是独自行动。那时候我已经习惯独来独往。把自己关闭起来，这样的好处，是心情基本上不受社会动态的左右。大道消息报上来，我并不天天看报，小道消息根本进不了家门。因此，在这个夏天，比天气更酷热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随后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永垂史册的八届十中全会先后举行，我全无所知，当然也就不为所动。却不知两个会议煽起的阴影，已经从四面袭来，行将覆盖整个的大地。

当时不仅我这个身份的人不明晰，就是柳荫、陈庚他们也还没看到有关的文件，因此他们布置工作，都还是按既定的原则办的。我想，九月里宣布

把我的编制正式落在编导组，接着陈庚团长命我到南京军区战士文工团创作组“取经”，我朦胧感到这都带有落实政策的性质，这还是从七千人大会、广州会议的理路一脉下来的。

陈庚出身晋察冀边区的剧团，他对部队文工团天然地有感情，看到推介战士文工团的文章，那个创作组人才济济，生气勃勃，不断出新戏，暗里就把它当成建团的楷模了。说暗里，是因为他似乎不曾公开讲过，我这样猜度，也是以意逆志，但相信所差无几。他不是高调大吹的人，虽有雄心，也知道不是容易达到的目标，怕说出来落空人家笑话，他和柳荫都是这样留有余地的人，后来跟他下乡搞四清，他也在这方面表现得稳妥可靠，他不跟风起哄，不做过头事，不说过头话，连所谓“四不清干

部”即挨整的对象，因他与人为善，也对他有不错的印象，这就是所谓“右倾”了吧。

我到南京，找到这家部队文工团，因为看过他们的宣传材料，凡是见过报的，我就不劳人家再重复了，这样，我也没有得到多少超出原有所知的新情况。可以说收获一般。这不怪战士文工团。我想，一个创作组能够有实力，出剧目，关键在于成员的素质和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相对宽松，这是由大环境和小环境决定的，绝不仅是哪几条具体措施起的作用。各团有各团的构成和特点，学习云云，也是神而明之的事。我是这样想的，我想接待我的人也是这样想的。

在南京这六朝古城逗留期间，成了我一次访古之游。

相对于我，家兄燕平在此定居十五年，算得上是老南京了。他有时间就做导游，他没时间，我就独游。一九六二年的南京，还没有多少游客。本来并非热门的清凉山，更显得远离尘嚣。九月秋阳和煦，我坐在扫叶楼下一块石头上，心境仿佛古人。想想南京天气比北京暖，在北京“冬不坐石”，秋风起了，也怕凉意沁人。正想着，果有一阵暖暖的秋风拂面，这时一只蝴蝶无意间飞到眼前，一起一落间，忽得句云“一蝶如叶坠秋风”。真是多年难得的闲情了。

万里长江西来东去，燕子矶的空阔，使人胸襟大开，这时看到悬崖边上插在脚下的一些木板上写着“退一步想”之类的话，哑然失笑之余，念及这样的提醒没能挽留住决意告别这个世界的那些枉死

之人，自责轻薄，惘然良久。

中山陵，明孝陵，栖霞山，玄武湖，长干里，——走到了，我独喜水西门外莫愁湖，也说不清为什么，那盈盈一水间的莫愁女石像，依我当时的看法，是做得相当粗劣的（后来好像换过了，我重游也没注意），但这并不妨碍我自己的想象。因为在游湖的时候，心里反复吟哦的，是“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是“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北极阁。胭脂井。鸡鸣寺。到鸡鸣寺素菜馆，已经过午，顾客逐渐散去。服务员都是比丘尼，默然不语端盘子，擦桌子。这时却见一个穿短裤的年轻女人，翘起两腿搭在一个餐桌上，在那里颐指气使，再一看，竟穿着警服，至少上身是警服——短袖

夏装吧？这幅图画煞是奇特。这个分明是女警察，她与这家菜馆是什么关系？是“管片”的，还是“驻点”的？她怎么能这样放肆，这样跋扈，这样嚣张，这样没规矩、没道理、没教养？如果说不是在素菜馆，在一群佛教徒之间（不，是之上），比如在一般世俗饭馆，在一般干部群众之间，她敢这样吗？是谁给了她这样在宗教外围褻渎一切的特权？！

许多年后，我想，若在今天，必定有年轻人用手机拍下这个镜头，把这个妄人曝光到网上去！

我抓紧时间沿沪宁线到镇江、无锡、苏州一看，那真叫走马看花了。这是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我一九五四年沪杭行后，第二次“下江南”。在这江南鱼米之乡，大饥荒的痕迹似不明显，而余悸犹

存。但我哥哥在饭馆给我叫了一条鱼，他却不动筷子，只是看着我吃，我当时还以为这只是缘于他那份“较真”的性格，为了“尽地主之谊”来做东不打折扣呢。唉！

然而江山还是美好的。

然而人生还是美好的。

开排，停排，复排：《叶尔绍夫兄弟》一波三折

一九六二年“十一”，像我从农场回来后每个假日一样，回船板胡同度过，这两年更因为有了闹闹，除此没有别的节目了。

还记得四五月间，有一个星期天，听了一场吴小如纪念杜甫的讲演，之后，陪他来我家看望我母亲。饭时，闹闹一周多了，站在八仙桌一边的椅子上，拿起个煮鸡蛋，回手在背后墙上一磕，蛋壳就破了，做这一切的时候，闹闹连头也不回，根本不用看着，就完成了，其熟练让吴伯伯大为称赏。这表明，当时的鸡蛋，已经不用花特别的高价了。

在我当时的眼中心中，这就是经济好转的标志，这个好转是由于我听说过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和执行，是由于放宽，而不是由于卡紧，却没由此及彼地想到这跟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

正是在这个背景上迎来了八届十中全会，迎来了这年的“十一”，过了“十一”，就要贯彻十中全会的决议了。是福，还是祸？

“十一”假刚过，我在班上接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左莱的电话，说他们在孙维世导演主持下，将接受《叶尔绍夫兄弟》这个剧本的开排；约我到“青艺”旁边于村同志家里一会。我如约而去，大家没有客套，一下子进入实质性的谈话。

于村，老演员，仪表堂堂。他后来扮演了《叶

尔绍夫兄弟》中的主要反角，能量不小的投机家阿尔连采夫。于村住在东长安街路北青艺西侧，那客厅比当时一般单位里的小会议室还显得宽大，平常该时有戏剧人在这里聚会的吧。

今天我闯进这个戏剧圈，看来主人们并不在意我是个所谓摘帽右派（别怪我小气、敏感、斤斤计较，我仅剩的尊严对这一点是很在乎的），他们也不把我当作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而像是一个平等的、值得信任的所谓合作伙伴，我也就把他们当作可以信赖的朋友了。

我说的是主人们，而第一主人，无疑是导演孙维世。我在一九四九年“十一”前夕先农坛欢迎苏联文化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副团长西蒙诺夫）的大会上，见过孙维世担任口译时用一种语言传达

另一种语言，同时传达发言者和自己双重感情时的照人的风采。她爽快利落地把左莱在电话里告诉我的重说了一遍。她说，我寄给金山的剧本，金山收到就交给她（她认为不必说明她和金山是夫妇关系），她带到北戴河去，看了以后，以为有基础，就上报了（上报艺术局？文化部？以至中宣部？她也没说），中宣部在“十一”刚过那一次部务会上就决定可以开排，以配合八届十中全会强调的反修任务。

我一下子有跟着剧本飞上云天的感觉。这个剧本是“反修”的？原小说写的是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之后的时期，但其中反面的人和事，如野心家阿尔连采夫的权术与投机，工程师克鲁格洛夫弄虚作假的新发明，恰恰都是斯大林时期产生的

畸形人物和消极现象啊。老市委书记的政治倾向，倒的确是跟赫鲁晓夫的新政格格不入的，但他能够纳入我们“反修”的营垒么？

看来中宣部的领导，以周扬为代表，在我只看到一定时期苏联的生活图景的表层之下，一眼看透作者意在反修——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赫鲁晓夫。证诸后来柯切托夫这位作家主持《十月》杂志所表现的文艺思潮来看，他是站在解冻文学对立面的，可以叫保守派，但他算不算在政治上反对赫鲁晓夫的反对派，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是不是也决定于赫鲁晓夫要不要把“斯大林分子”的帽子给他戴上呢？看来，中方的文化领导已经按照自己的习惯，把他看作“斯大林分子”，从而把他视为“我们”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统一战线的一员。

了。

小说和剧本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具体的，可感可触的，一务虚，就让人困惑。不过，我感到在座的表演艺术家和组织剧目、从事编剧的左莱，似乎都还是形象思维先行的人，不忙于凌虚蹈空纠缠到政治上去。

反修也罢，生活也罢，能够排起来是好事。孙维世离开苏联十多年了，也排了《保尔·柯察金》这样的苏联经典剧本，但能排一个以苏联当代生活为题材的戏，怕也是一直寻找用武之地的孙维世所渴望的吧。

孙维世是个说干就干，拿得起放得下的女将。在她把我拉进工作日程的同时，那个四幕剧的初稿已经由蜡纸钢板刻印出来，原来实验话剧院演员队

已经分配了角色，人手一册，开始熟悉情节和台词。这倒让我吃了一惊，剧本肯定还要修改，演员们岂不要随着改来改去，那背词的难度不是加大了么？左莱告诉我不必担心，演员都有这样的本事。关键是要抓紧时间改本子。

在这晚上的聚会上，孙维世说，中宣部已经决定叫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或副局长）马彦祥、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赵寻负责这件事的日常领导，然后，组织五个人来具体讨论，改本子。这五个人是赵寻、蓝光、孙维世，还有左莱和我。

我这天会后回家时，一路骑车经天安门，在路人已经稀少的长安街上风驰而行，好久没有这样愉快了。因为我的笔又有所用，虽然从这个剧目来说，我只等于提出一个建议，但我也将在改写剧本

当中得到戏剧界内行的认可。我还是能够做点事情的。

实际上是以说话、办事都干脆的孙维世为主导。我们“五人小组”在她家碰过几次头。其地在张自忠路人民大学西侧，路北一个双扇小门的院落，门板褪色前好像是绿的，十几年前那个春天我在半军事化的华北大学受训时，就住在这个旧名铁狮子胡同的原段祺瑞执政府院中，早晨跑步都要经过这里，从来没注意过旁边的小门小院。我这个人当不了兵，没有随时观察地形地物的习惯，更当不了侦察兵，侦察兵哪有不认路，一离开就找不回来的？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个院子不是一般的北京小院，曹禺、欧阳予倩都曾长期住在这儿，以后作

为欧阳先生故居，受到保护。

我们碰头多半是晚间，却没见过金山，我以为他是故意没有见我们，因为他的妻子在工作，他无意于卷入吧。

维世、左莱已经结识，赵寻、蓝光这对夫妇，都是闻名已久的。赵寻戴一副眼镜，很斯文的。我还记得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时，他人还在武汉，因一个名为《还乡记》的剧本挨了批判，我在《长江文艺》上看到过批判文章——不过没读，那一轮的大批判，我只读过有关刘真《长长的流水》的，因为刘真我认识，《长长的流水》我也读过，并且很欣赏。——现在赵寻调到北京，且奉命代表领导来过问这个剧组的编导工作（不知为什么马彦祥不来了），可见“反右倾”不像“反右”那样揪住不

放，而在随后的一九六一年“一风吹”了。不过有一次大家偶然闲谈，赵寻从我们“集体改编”说起，他问“集体”和“集团”有什么区别？我的毛病是嘴快，就说，我理解，几个人在那里干点什么，人家认为你在干好事，就叫集体，人家认为你在干坏事，那就叫集团了。他听了若有所思，我们跟着也转换了话题。我因而感到这位老同志内心深处，还留着什么反党集团、反革命小集团一类的后遗症。甚至联想到一九五五年反胡风时，是不是也有人拿“集团”敲打过他？这纯属瞎猜了，表明我没把他归到整人的一边，是当作“同是天涯挨整人”的。

蓝光，一位和气的女同志，像我见过的一些中年的老革命一样，原来是赵寻的爱人（又过了很

久，我才知道她是光未然即张光年的妹妹）。一九五一年纪念“七一”，电台几位鲁艺的老人儿，如左荧、黄夫妇就曾经排演过蓝光编剧的《同志之间》，演出时我没看，应该是《剧本》月刊上发表的独幕剧吧。从蓝光编剧的《最后一幕》的相关介绍，我知道她曾是抗战期间演剧队里的（中共）地下党员。

《叶尔绍夫兄弟》的改编，比较容易地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根据小说改编，怎么改也离不开原著，不像凭空创作的，作者有自己的创作动机、生活积累、创作个性，硬来“就合”领导或别人的意见，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强扭的瓜怎么能甜？

最后决定由我和左莱执笔，新剧本改为八场

戏，大体上把每场戏的要点定下来，前四场我写，后四场左莱写。我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后面是比前面难度大的，前面是铺垫，后面则是展开，直到高潮和收束。

我们各自回家动笔。如期交卷后，我又是把球踢出去了的心情，我很放心，我没做到的，必然会在维世以至赵寻、蓝光他们那里得到补救。

我收到重新油印出来的剧本，有了像样的牛皮纸封面。八场戏，其中我分担的第一场，整个由维世改写过了。场景选择在一个星期天全家的聚会（是不是年轻一代的安德烈结婚，记不清了）上……既有喜庆的气氛，又介绍了出场人物。

剧本基本上定稿了。后来在边改边排中，我听说夏衍同志通读以后，建议把战争中被俘的斯切潘

一条线删去，果然戏剧情节相对更集中了。整个剧组干劲十足，争取尽快排出来上演。

好事多磨。一天传来消息，中宣部叫停。

真的是某处一只蝴蝶翅膀的颤动，会扇起远方的一场风暴。何况是赫鲁晓夫正在往古巴运导弹！他掀起的风暴，又将使万里外排练场里小蝴蝶的翅膀停止颤动。

周扬、林默涵两位中国意识形态部门的掌门人，联袂飞往古巴前，在机场临时警觉地留下一句话，叫把“叶”剧停下来。我当时听说的理由，不知是他们的原话，还是有关人士的诠释，说在国际风云瞬息万变的敏感时刻，如果我们这里的演出，像前一段时期全国大小城市成百的院团争演话剧《红岩》那样，会形成一个宣传运动，闹不好引发

苏联的抗议，就会影响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斗争的大局（就是后来“文革”当中常说的，所谓战略部署吧），云云。当时听了，我也没怎么闹清楚这里面的三角或多角关系：就算这个戏纳入了“反修”就是反对赫鲁晓夫的一盘棋里，反修不是光明正大的事么，怎么又怕苏联方面把它当作“反苏宣传”来解读呢？既然要反对“苏修”，人家正往古巴运火箭，这时候派两位意识形态大员到古巴去，难道是劝卡斯特罗不要接受赫鲁晓夫这个方案？那不是站到美国一边了？赫鲁晓夫之被指为修正主义，不就是主张与美国和西方世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那么他现在把导弹运到古巴威慑美国，不正表明他接受了“我们的”批评，在改正错误吗？或者，按照党的一贯教导，美帝国

主义是要反的，但不可鲁莽灭裂，像赫鲁晓夫这样做，是冒险主义的做法，然则赫鲁晓夫是犯了“左”的机会主义错误？但不是一直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代表么？他是左，是右？我们要反他的左，还是右？反正他是时左时右，我们不管他是左，是右，反定了！

以我的所谓理论水平，在这样缠夹不清的问题上，也只好不求甚解了。

想一想，周扬、林默涵他们的决策，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们这里什么都是一阵风，乃至一窝蜂。中央实验话剧院开始排新剧目《叶尔绍夫兄弟》了！没人发布消息，但各地院团已经尽人皆知。北京吹来的风，可不是蝴蝶翅膀，那是有来头的，要跟的，非跟不可的。派人来京讨剧本，没有

拿到（的确还在边排边改嘛），有创作实力的如各大区的中心剧院就自己动手，小说虽云“内部发行”，并不属于机密文件。很快就百花齐放，蔚为大观了。在这次叫停之前，文化部已经通报全国，目前只限北京这一家排这个戏。越是这样，越是笼罩了一层神秘色彩，“只此一家”的剧组被多少同行紧紧盯着。现在停排的消息，想必也广传遐迩。

我也就把这件事放在一边了，自然是感到很遗憾，首先是对我来说，重新进入社会的门，本来已经敞开，转眼却又关上了。

等我再听说这件事，事态根本扭转。大家知道孙维世“通天”，其实关键是她不妥协。她并没找大家所说的通天之“天”，她只找了兼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陈毅（人称陈老总），陈毅放开一

马，说排出来看嘛。然后，不知是谁的倡议，找来了康生正在主持写作针对赫鲁晓夫的大批判写作班子全体来看排戏——应是直接看排戏，剧本顶多当作参照吧——请他们从“反修”的政治高度进行审查，居然通过。就是说，不违背“反修”的主旨，同时也符合当时“反修”宣传口径体现的斗争策略。有这样的后盾撑腰，孙维世自然底气十足，这时候周扬、林默涵已从古巴回国，他们看到的，是这个戏不但没按他们临行的交代停排，反而接近登台演出了。最后又不知是谁请示到国家主席刘少奇那里，考虑到不要造成大搞宣传运动的印象，此剧将采“内部演出”的形式。这个内部演出，终于在一九六三年第一季度实现，那是后话。

“反修”大批判是从一九六二年第四季度开锣

的。头一篇文章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记得发表在十月二十八日。已经公开“反修”，为什么还怕人一怕“苏修”指责，因而只在“内部演出”呢？也许是刘少奇留有余地的做法吧，谁知道呢？

这也是后话：在这一次全国范围的“内部演出”之后，在中央一级院团，有曾任驻印尼大使的姚仲明写的一个剧本，剧名我忘了，也是外国题材，写一个亚热带国家的内部权争，我以为是影射苏加诺下台故事的。姚仲明是来自延安的老干部，抗日战争中，曾经写过一名为《把眼光放远点》的剧本，演出过，有影响，一九四九年后，还收进推广解放区文艺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过。

偶尔有剧院的零星消息传来，他们紧锣密鼓地

准备演出，没我什么事了。其间听说孙维世找了从苏联学习归来的作曲家杜鸣心，为《斯捷潘·拉辛的悬崖》写配器，我相信效果一定很好。

刚过了大饥荒，又“整社”不准“开小片荒”了

剧团编导组副组长曹惠跟北京市委联系，我们可以有两个名额，跟着工作组去远郊区延庆农村整风整社。我当然乐于参加。抱着十足的好奇心，想知道农村的整风整社是怎么回事。“跑野外”的地质队，不搞冬季施工的基（本）建（设）部门，照例都要搞“冬训”；农村除非像大跃进那两年，数九寒天还要“大干水利”，上河工，平常冬天都要有整风整社之类的节目，开会，务虚，不让农民闲着，那时候没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不讳言要利用冬闲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所谓冬闲

变冬忙，本来多半指的也是生产性活动，比如搞家庭副业，至少也是积肥等等；白天有的忙，晚上得忙开会。

我从土改那会儿，有十年没参加工作队了。不知道经过这些年的农村变革，基层干部和农民社员的新面貌是什么样。前两年虽也下过乡，但是以戴罪之身，自觉置身于“人民”之外，虽往往不自觉地“不把自己当外人”，但对“人民内部”的人和事，也只限于从老远看上一眼，毕竟是隔膜的。

于是我又带着几分好奇的眼光，兴致勃勃地跟着下乡。我是头一次去延庆，经过五十年代修建的官厅水库，修那座水库前后，还修了一条“丰（台）沙（城）线”的铁路，当时都是宣传过的工程。老友高而公（梁星）满腔热情地采访报道过。

我却除了去八达岭长城，没来过北京西北部这片锁钥之地。

到了延庆，首先由当地领导接见。记得县委书记姓耿。耿书记是工农干部，从言语到表情都看得出来，直率，痛快，比如问起工作队成员来自什么单位，曹惠和我被介绍为剧团的编剧，他反应很快，表示理解，说：“你们是专门搞捏造的。”我听了一怔，不光是我，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他要说的是“虚构”，但这两个字太专业也比较拗口。其实把虚构叫作捏造也未为不可，后来的帕慕克就说写小说的是“职业撒谎者”嘛。没有想象力，没有把谎撒“圆”了让人相信似乎确有其事的本领，就不要写小说，也不要编剧本。过去人们说“做人要老实，作文不要太老实”，其义近之。不过耿书记

不是“作文”的人，他的工作更要求他区别“如实”与“捏造”，去伪存真。我们离去后，听说耿书记遇到了什么麻烦，不再当书记了。以我有限的想象力来猜想，可能是他过于执着地区别真与假，如实与捏造，对那几年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作风不满，甚至有所抵制，因此不能见容于直接上级或同事，才“摊上事”了。想一想，他对于搞真货和搞假象分得那么清，但能容忍像我们这样以“虚构”为业的人，这就体现了他作为领导干部应有的大度。从个人风格来说，质朴务实，平易近人，我真的不忍从坏的方面想象他去职的原因。没有调查研究，我坚持“无罪推定”，甚至聊以自慰地把他视为那一个历史时期常见的“劣胜优汰”的牺牲，并把因他的“捏造”论而取笑他看作浅薄了。

我们进驻的行政村，叫西五里营，靠公路边。西北行，不远，据说就是怀来县，属河北省管了。过去大概也是出京往居庸关、八达岭去的要道，或要道之一。所以附近许多村落以“营”相称，可见原是驻兵之地。兵丁后代，不是好惹的。去年或前年，就是一九六一或一九六〇年，大饥荒的日子里，有一辆军牌吉普车停在了公路边，从上面走下一个当兵的，像回自己家里一样，闯进村北那一片果树园，把成熟半成熟的果子，捋下来兜进麻包里。没想到这里还有看园子的，等他偷得差不多了，一声呼啸，伏兵四出，一下就把这穿军装的押进大队部。问他什么部队的，叫他们部队来领人。当兵的好歹不肯说，那好，就锁进小屋里，看谁能耗过谁。你当兵的再横，在这里孤掌难鸣，没人撑

你的腰，最后也得下跪求饶。半天的义务劳动，替大队摘了两麻袋果实。

这是那年秋季的事。我们来时是冬天，果园里一片寂静，我不是写小说的，没把这听来的故事当素材，但凭我对冬日果园的感觉，写了一首《剪枝谣》。没想到，十年后我在千里之外的淮阳干校，干了一年有余果园的活儿，夏天是背着药筒喷药，冬天就是绕着树剪枝！谁说没有诗谶呢。

隔着公路，北边横着一道山，似乎叫大佛峪，记不清了，山那边，往北就是河北赤城县，赤城那边的人，说话带着山西口音，据说赤城比我们这里更寒苦。

彻底弄清我们所在的方位，是看了一幅草草绘就的北京北部郊区示意图。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部

长赵凡来过一回，讲了讲全市整风整社的形势。我注意到北京舆地最北部的一个角——一个点，叫作喇叭沟门，属怀柔县。当时的直觉是连这么边远的角落也要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其突出表现是在集体耕地之外，到沟边山脚“开小片荒”。党要在广大农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威力所指，真是无远弗届呀——每一寸土地，都是农村工作部和各级党政机关的用武之地，派工作组下去，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却只是牢牢记住了“喇叭沟门”这个有特色的地名，直到四十年后终于到那里去逡巡了一番。

赵凡其人，十分爽快。据说他反对大吃大喝搞宴请，偏偏在他下乡时，下面还是不免摆上一桌，他理所当然要严肃批评，最后说，既然做了，不吃也是浪费，下不为例啊！这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

结合吧。我们工作组里有一位中央戏剧学院的谭霈生老师，后来写过一本关于赵凡的故事，我才知道这位农村工作部长，原来也是北平城工部的老班底，那时他主持中共地下党的平民工作委员会（跟我们地下同志们所属的学委会并行的），专在商业、服务业、小手工业等五行八作里发展组织，开辟工作。特别是像沿街串巷“打鼓（儿）的”（收买废品），最便于进入大小院落，各种住户，可以了解许多一般正常往来所了解不到的情况，这些都在赵凡当年工作的视野之内。这是需要胸怀大志而又不避琐细的人来做的事情。

现在摆在赵凡面前的，还是要胸怀大志，即坚持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又同样得不避琐细，那就是例如批评和杜绝“开小片荒”一类的错误行为

了。

我们在村里的时候，一是大饥荒刚刚过去，二是又开始强调“两条道路的斗争”。社员们对我们讲的，都是前两年怎么吃“玉米芯”当粮食，有根有据，重实证；我们作为工作组对社员讲的，全是社会主义大有希望的远景，是务虚，最后只能落到虚处。要说在吃不上饭的年头，还不让开一小片荒地，解决燃眉之急，我们——至少是我，说这话也嫌底气不足，只好以劝诫的口气，动用“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一丰厚的政治资本。

从我眼里看，我们这个西五里营的整风整社，是在认认真真走过场。该走的几步程序都走到了。没有出现什么高潮，没有出现正反两面的典型案例，召集社员会，不能说来人都是心不在焉，但有

一搭无一搭，话题总是绕开“热点”也绕开“冰点”，你会发现，可别小看了这些所谓没多少文化的社员，他们既代表全家来开会，都是有备而来，以他们历年参与的经验，深知工作组想要的是什么，他们能给的是什么，什么该说也可说，什么不可说更不该说，他们的历练其实并不弱于村干部，他们跟各届干部（在风行“翻烙饼”的年代是一年一换届，第二年再换回来）玩了这么多年，熏也熏出来了。

按照武装斗争时期创立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党建原则，地方党组织也把支部建在每个村庄。一个小村庄就是一个小小的政治舞台。每年都在上戏，每天都有戏码，而重头大戏，则是一年一度的、从入冬到年关的“运动”：有时叫整风，有时

叫整党，有时叫整社，整台上的，也整台下的，或上或下轮流上演主角。从未当过干部的普通社员，也跟着玩儿了这么多年了，心里还能没一本账吗？

切切不可低估了普通农民的智商。

我分到队部大炕上住。这里常住的是一位孤老，虽无家人照顾，倒并不作戚戚状，很是“安贫乐道”的样子，也许是由于生来性格开朗，也许是饱经沧桑，把一切都看淡了。另一位同住的工作组成员丁广洲，一九四九年前是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学生，后来在北京市水利局工作，经常下乡，熟悉基层。从他们二位，还有经常来队部坐坐扯闲篇的社员那里，我听了许多办公室里听不到的故事，还有不少粗口。我知道男社员们爱说荤笑话，还传播一些不知流传了多少年的歌谣顺口溜，成套成套的，

既合辙押韵，又很耐人寻味，曰：“出了的鸡巴，卸了任的官”，鸡巴云云是铺垫，“卸了任的官”没有权力的支撑，没了劲了，软塌塌了，这才是老农们要抖的包袱。确是话糙理不糙。不能不佩服他们人在江湖，身居草莽，可是对魏阙中、庙堂上的事，门儿清，对人与权力的相互关系，在任和去职官员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至少也不陌生的，这也可以叫作“世事洞明”了吧？你说中国农民文化素质低，不具备参政议政的资格，他们可正从历史的高度、民主监督的角度，审视你呢。

且不说农业生产方面的常识，单是从社员们“不见外”的闲谈所得，我就承认“知识分子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包括语言的表达，他们不说“字儿话”，没有长句子，一句话里也不讲究，

往往“主谓宾不全”，但从他们嘴里出来的话，不管说人说事说自己，一听就明白，更不用说有的话十分劲道，耐咀嚼。怪不得一九四九年我到广播电台，发现从解放区来的编辑，爱好文学的，都随身带个小本，那是下乡养成的习惯，他们要记录农民的生动的话语，就像过去中学女生随身小本里记着缠绵悱恻的抒情锦句，立志高远的男青年在随身小本上记录名人名言自我鞭策一样。

但农民并不是一概冷眼看世界，他们有他们的古道热肠。我们虽是官方派下来的工作组，但他们经过观察，知道我们不是官，对我们并不避忌。单位忽然叫我赶回城里，我向他们问路时，他们是那样耐心指点，怎样取道近便，就是要从官厅水库冰上穿过去，他们像兄长似的告诉我，别害怕，现在

这个节令，冰面都冻瓷实了，一步一步别贪快就摔不着。我真就这样跨过官厅水库，徒步到康庄上了火车。

值得一提的是，我这次乘车返京的体验后来都写进了一首《在车厢里写的诗》，那是拥挤得阻塞的硬座车厢，我连座位也没有：

.....没有开水，也没有暖气，
有的是单薄的行囊，恶浊的气体；
脚踩着脚，膝盖顶着膝盖，
破棉袄的肩膀上擦着破棉袄的胳膊，
老人拼命地吧哒旱烟是因为疲劳，
孩子默默地无力哭叫是因为饥饿。
我就侧卧在座椅下的地板上过夜，

俯听车轮的节拍好像钟摆，
我梦见我变成一条无名的鱼，
连同历史的长河一起冻成冰块。

这首诗在一九八〇年春投给一家文学刊物，主编老大姐曾经很郑重地来信问我：这首诗要表现的是什么主题？

我还真说不出什么主题，只是记录了一九六二年年底的一些感觉。记得当时卧在车厢地板上，还想起马雅可夫斯基在长诗《好》里的一个细节，带着几根新鲜的胡萝卜到女友那里去，这是内战时期苏维埃俄罗斯生活的一景吧，相对说来，夸称“土豆烧牛肉”，就是修正主义了。今日中国正在开展“反修”斗争呢。

第四章 一九六三年

被批“烦琐的家务事和卑微的儿女情相结合”

岁月如流。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没觉得有什么年前的门槛，一下就过来了，新年的一月，就是旧年的十三月。

而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却是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头条刊发了唐弢《关于题材》一文，显然是送旧迎新的重头文章。

这个刊物，在一九六一年年末的第六期上刊发了我对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结句（“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试解”一文，我是对之抱着感激之情的。它在业内的确有相当的影

响，若干年后见到贬谪到吉林的老公木（他是第一位就我的诗作写专论的人），他还提到当年读到我谈毛诗的文字。这个刊物是有其权威性的。我每期都要浏览一下，特别是那些我所谓“务实”的文字，看得比较仔细。拜读了钱锺书《关于通感》一文，我还写信去提供一例，说冀东比如乐亭一带口语里就把嗅觉的“闻”说成听觉的“听”，比如“听”到花香云云（“闻”字在辞书里本就属于“耳”部呢）。

这回卷首的唐文，原以为又是空对空的泛泛之谈，正在一目十行地看下去，却瞥见脚注里“《上海文学》1962年6月号”字样，顺藤摸瓜，正文里竟有一大段涉及《小闹闹》：

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我们并不是自然主义者，有什么理由在实践中比所有自然主义者走得更远、陷得更深呢？不幸的是还有更甚的例子。我说的是一篇题做《小闹闹》的小说。如果说自然主义的一个特点是过多地罗列了生活的细节，这篇作品却没有任何为艺术创造所需要的细节，它所收集的只是生活的渣滓，由作者沾沾自喜地表达出来。作品以第一人称总结了第一次做父亲的经验，从“腊月二十四夜半”“妈妈上医院”写起，“三点半开始阵痛”，“三点五十五分呱呱降生”，一直到作者执笔时孩子刚“一年一个月零二十天”为止。全部过程充满了琐屑的叙述，光是量体重一点，就反

复出现，喋喋不休，以数字的统计代替了形象的创造：降生时两千七百克—五斤多点，满月时六斤半，两个半月八斤四两，以后隔十天半月称一次，由九斤而九斤十两，而十斤十四两，而十一斤半，最后是二十斤，等于“半袋子面”。全部过程又充满了庸俗的卖弄，以责备自己的口气衔鬻带孩子的知识，“你会吗？不会。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会，你当什么爸爸哟！”于是艺术作品又变成不折不扣的育婴法：量体重，“填进一张特制的统计表”；喂奶，“不来津”，别叫“含着奶头”；溺湿了，先学“叠尿布的方法”，“别叫尿湿了肚脐”；拉巴巴了，“拉干”还是“拉稀”，“巴巴的颜色

变绿了”，“从巴巴的颜色能看出孩子的肠胃好不好”。全部过程还充满了卑微的感情，例如爱男孩还是爱女孩，像爸爸还是像妈妈，是“闹闹”还是“乖乖”。因为“又不像你，又不像我”，夫妻俩便展开讨论：也许“医院给换错了”，“说不定，真说不定”，“完全可能”，“哦，不会的”。因为孩子“动不动就醒，醒了就哭”，做爸爸的就想到贴一张“天皇皇，地皇皇……”的帖子，“真能解决问题，那我一定会写”。作者甚至以自己这种渺小的情怀，去追拟鲁迅的具有深广社会内容的诗篇，效法鲁迅赠邬其山诗写了这样五言八句：“此儿名小闹，揪拽打撕拏。有尿不让把，无牙爱啃

书。一饿脸就变，所吃食渐多。忽然哭声住，笑口小弥陀。”这个被称做诗的五言八句实质上就是整篇小说的缩影。作者有什么必要借用艺术的形式告诉我们他的公子的这些行状呢？他不是扩大了艺术作品的题材，而是滥用了扩大题材的名义，不加选择地摄取一切，表现一切。婴儿生活里有许多值得描写的东西，然而作品所选取的题材却没有任何典型的意义，它只是以其本身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这就是名副其实的所谓“家务事，儿女情”的典型，是烦琐的“家务事”和卑微的“儿女情”相结合的典型。尽管作品所纪录的事件、时间、地点是属于现代的，但它没有沾染些许具有时代

特征的气息。它不是一件艺术品。

完了。我写了一篇比自然主义文学更自然主义的非艺术作品，这就是结论。

论者在前面不点名地提到了丰子恺先生一篇关于猫的散文，说“作者以烦琐的笔墨和远离时代的情调，毫无意义地为猫传状，向猫祝福，使猫的逗乐在精神上压倒了人的酬对”，然后用左拉《猫的天堂》对比，说左拉“从自然主义里跳出来”，“即使是在这样一篇小小的作品里，我们也能够接触他的伟大的灵魂”。丰老的《阿咪》显然不能跟左拉相比，而我则属于“更甚”之列了。

原来《阿咪》一文就刊发在五月号的《上海文学》上，同一期还有巴金在上海文代会上的一次发

言，对文艺界以文艺批评为名的“棍子”和“框子”，说了自己的真话。后来遭到远比我和丰子恺挨的批判厉害得多的一批斗。

唐弢在《关于题材》中反复申说的，毕竟还囿于文学的命意和品位上，也就是掌握了学术问题论辩的边际。我记得另有两篇涉及《小闹闹》的批评文字，是南北两家（记不清了，可能是广东和河北）省级文艺刊物上发的短文，带有表态的急就章性质，当然没能把问题展开来谈。我都没有细读。

应该说我虽经过政治运动，自认为已经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了，但其实还很缺乏政治敏感，而迂阔地拘守着所谓“区别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殊不知其间只有一纸之隔，一词之差。如果说，《文学评论》发表唐文，就是意在配合中共八

届十中全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恐怕也不算诛心之论。而那两家文学刊物，更是有意识地在赶政治的浪头了。

在政治形成浪头的时间和地点，积极分子们自然要紧跟，多数人是旁观。旁观者有的是对落水者有所同情，有的却是看看热闹，看热闹的人是自忖不会让浪花溅湿裤脚的。

大概就在新年假期后，各团的头头们聚到表演团体办公室来开例会，我因在办公室打杂，也须旁听，一进门，看大家还没落座，民乐团一位副团长正站在那里高声传播新闻：“批的是邵燕祥的一篇小说……”，正说到这里，人们看见我来了，纷纷散开入座，主讲的一回头，也闭了嘴，我当作什么都没听见，赶紧找个座默默坐下了。

我没想到自己会成了全团的新闻人物，往深里一想，我不相信这位胖乎乎的同志平常会读《文学评论》，想必也是听团里什么人说的，或假期间他的战友们之间的传闻吧。他原是中南海歌舞队的干部，出身于部队文工团。文工团，包括我们的广播文工团的成员，多少还是关心思想文化界动向的，特别是谁谁又挨批了，对于惊弓之鸟的文艺工作者来说，这不是又将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杯弓蛇影之境的信号吗？对于大多数创作人员，这可不是与自己无关的闲事，这乃是十中全会文件学习的参照啊！

剧团的团长陈庚，表示欣赏《小闹闹》，说写得“行云流水”，哪有什么问题？看了唐文，为我打抱不平，据说他找了在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

科学院前身)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路坎同志,原来路坎是他冀中解放区的战友,路坎对他说了些什么,我也不得其详,总之是劝慰陈庚,表示他们的刊物对《小闹闹》的作者个人并无恶意吧。剧团的陈铎,是一九五八年十八岁从上海来这里当学员的,小学生时代就积极投入少年宫活动,曾参加少先队代表团访问苏联。他也为我抱不平,说他去找了母校小学的校长、唐弢夫人沈絮云老师,他向老师介绍了我的情况,应该是说了我的好话吧,据说唐弢先生说,想不到邵这样年轻,他记得解放前在北平的报纸上看到过我的名字,以为我是个“京派”。

我跟“京派”有什么关系?

一九四九年以后,整个文艺界,甚至整个文化界,只有所谓左派右派中间派之分。大约上世纪九

十年代之后，才重提文学史上的京派、海派，像我这样的晚辈又不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仍然闹不清其中的来龙去脉。小时候读鲁迅的书，曾有涉及京派、海派的议论，记得大抵是说“京派”近官，“海派”近商，一瞥而过，也没深究两派的名单。按鲁迅这个思路，并不是在上海写作、出书的作家就是海派，巴金不是，鲁迅更不是。我朦朦胧胧地觉得也许鸳鸯蝴蝶派，以及在《礼拜六》、“方块报”上发作品的该叫海派吧？那时候不知道沈从文也写过论京派海派的文章，并为此打过笔仗，然则是正式为京派辩护的了？

我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的三年间，作为一个小小的投稿者，虽向沈从文主编的报刊投稿，同时也向其他跟所谓京派八竿子打不着的报刊投稿。

一个十几岁的初中生，惭愧得很，真的没有任何的派别自觉。

近些年看到姜德明为上海书店主编的一套“京派文学作品专辑”，名列其中的有沈从文、朱光潜、俞平伯、废名、林徽音（因）、萧乾、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李健吾。这该都算京派的骨干了。与其叫京派，似不如叫学院派，按今天的说法，多半是高校中人，从事教学、编辑的多，说“近官”相隔一间。朱光潜大概到抗战期间才挂名成了国民党的什么委员，“近官”了；何其芳则是后来到了延安，所“近”已是共产党的“官”方，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官；李广田是六十年代才当的大学校长，现在的校长有行政级别，本人也就是官了。既然成派，七八条枪岂不太少？如

果要扩大，那与他们相熟的，首先是叶公超，清华大学专授欧美文学的名教授，要算一个吧？他后来倒是明确选择从政，做到国民党在台湾的“外交部”部长还是次长？在“驻美大使”任内由于美国与北京建交，把蒋政权抛弃了，以致蒋介石对叶十分不满，这位“新月派”诗人郁郁以终。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当年长住北京的周作人，算不算京派人物？他够格当大佬，但看来他没参与过上述这些一时俊彦的聚会，虽然俞平伯、废名都出自他的门下，一直执弟子礼，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师生之谊。可惜他到日本占领以后，下海当了日军卵翼下的官，不止是乃兄指责京派文人的“近官”了。

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后，重提京派呀，海派呀，

所指已经十分混乱。二〇一〇年，大学生们问一个国家文物局的负责人（副局长？）：什么样的历史名人遗迹应受保护？那位提到“北京地区的京派文化代表人物”，注意，已经把原来指文学领域的“京派文人”小群落，扩大为“京派文化代表人物”了，然后点名“京剧有梅兰芳、程砚秋等”，“文学有茅盾、老舍等”，看来是以意为之，强不知以为知。茅盾虽在一九四九年出任文化部部长定居北京，但把他归入“京派文化代表人物”，却是头一次听说。至于老舍，虽然生于北京，死于北京，是现代写北京和北京人的第一家，但其实文学史家从不把他归入有特定意义的“京派文人”圈的。

管文物的不一定熟知文学，似也不足为病。但

他在说到第三类应受保护的历史名人遗迹时，指为“是在北京市居住过的民族精英和英雄，比如宋庆龄、郭沫若，以及曾担任过国家领导人的人”，这样说，我就怀疑是否记者的记录有误了。

这说的是北京，至于海派所居的上海，水太深，过去式和现在时的海派内涵，更是说不清——我是说我说不清。因为时间相去七八十年，人们的观念已经大大改变。历史上一些圈子里的人说起海派，有时会带着鄙夷口吻的，而今天上海传媒上已经在大力标榜海派，要打造海派的这个、海派的那个了。

因早年曾疑我属于“京派”，而不惜笔墨的唐弢老师，三十年代虽在上海，大概不算是海派，算不算海派我不知道，但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

天，他也未必会甘为新的海派吧？

由《关于题材》一石击水，泛起的涟漪，并没有漫无边际的效应。一是文艺界人们曾经沧海，若非大张旗鼓的政治事件，没多大震慑作用；二是论者保持了一定的分寸感，不屑于像有些写作班子“秀才”们的大轰大嗡，而力求批判文章带有学术性，引经据典的书卷气却不能吸引浮躁的读者了；三是所选的作品本来没有多少读者读过，发表批判文章的刊物又太专业，充其量只能在所谓业内引起些惊悸罢了。后来官方正式启动大批判，靶子选定为观众众多的电影戏剧，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兵临城下》《逆风千里》，戏剧《李慧娘》《谢瑶环》以至《大红袍》《海瑞罢官》，不但从“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进而引发

狂澜恶浪，一般“干部，群众”既可坐看阶级斗争，又能借此免费观摩，果然政治教育、文化娱乐双丰收，立竿见影。

预防政变，丁莱夫将军奉命进驻广播局

我已经习惯于被歧视，被“围观”（这是近半个世纪后的词汇了），被人在背后议论以至当面指点。但习惯于歧视别人，“看（别人的）好看”的人，也很快就要沦入“降下一级看看”的地步。

因为，天兵天将来来了！

在上级的指挥下，总参杨成武将军从部队抽一百多人派往广播事业局，又将九十七军政委丁莱夫调到广播事业局任党组书记，即所谓一把手。

如此大动作，一定有来头。事情的原委，我当时不知道，六十年代不知道，七八十年代也还不知道，直到本世纪初，梅益逝世后，才从梅益在世纪

之交题为《八十年来家国》的自述中看到 he 郑重记下一笔：

1962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周总理说，你们要管广播电台，电台怎么样？不要出问题，广播电台一广播，全中国和全世界都可以听到。而我们在这里讲话没有人听得见。他还说，伊拉克政变主要是两手，一手是抓坦克兵团，一手是抓广播电台，结果就成功了。

从丁莱夫到任履新那一天起，梅益就从原任广播局党组书记即所谓一把手降为二把手，党组副书记。梅益的局长名义还在，但大家知道，局长是行

政职务，在党组一实为党组书记领导一切的体制下，也得听丁莱夫的。梅益的总编辑名义还在，主持编委会和下属各台的日常业务，那是要看稿子，属于干活和担责的，播出节目一旦出了不管什么问题，都是要总编辑担当的。

杨成武对丁莱夫，不知是怎样交的底，至少关于防止广播电台搞政变的最高指示精神，是不会打折扣的。

当时正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提出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基本路线，告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击了以彭德怀和其他某些领导干部为代表的所谓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就是说把大好形势歪曲为一团黑暗），并因小说《刘志丹》而宣布“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

明”，借此打出一个反党集团。层层传达，处处表态，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箭在弦上，剑拔弩张。以丁莱夫将军为首的军队干部，开进“知识分子成堆”的广播局，岂不就像突破封锁线，打入敌占区？

从此“天下”多事了。

原先的广播局，按照行政机关以至事业单位的惯例，组成党委系统，把党务和人事、保卫以至共青团、工会等政工一摊子包下来。丁莱夫来了，仿照军队的体制，建立政治部，统帅一切。

我所在的广播文工团，是广播局下属的八大部口之一，在总团设政委一人，副政委一人，五个分团各设一名政委。总团政委赵志光，在同大家见面时自我介绍是从新疆调来的；副政委谷枫，不知从

哪里来的，他不像赵志光那样喜欢跟大家打招呼，大家自然也都敬而远之。剧团政委霍文献也不知原属哪部，只知他是阜平一带的人，从小参军当文艺兵，却看不出他是唱歌的，还是演戏的。

这样，我们文工团的建制，就很像一般的部队文工团了。但这些政委一来，实际上把原来的团长、副团长们全都架空了，包括早年也是从部队转业来的干部在内。大概他们转业早，跟这些知识分子相处时间长，有的还合作得不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故也不堪信任。就像有些工农子弟上了学，毕业后成了教师、医生，进入知识化的行列，后来运动中，就照样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打了。因为你受了教育，而所有的学校据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他们给你的是

资产阶级教育，你在他们的教育下树立的世界观，必然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你自然就成了改造的对象。

广播局的八大部口里，作为核心部分的，历来是对内部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部即呼号为“北京广播电台”的国际台，还有一九五八年成立的中央电视台。其编播业务是全天候的。除了搞编务的，和个别的人事干部以外，绝大多数是业务人员。丁莱夫来后，各设协理员一人。中国唱片社也有编辑部，同设协理员一人。其他部口类推。

这样数下来，政委也罢，协理员也罢，不过十几位，不是来了一百多人吗？盖因广播局不但有对内广播，包括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朝鲜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广东话、客家话、闽南话等方

言的广播，还有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广播，以及对亚、非、拉多个小语种的广播，除本部门外，单是发射台就遍及各地，万把人的广播局，各级都要有军队来人“政治挂帅”，一百多人也就星散了。

人虽不多，威势不小。不叫军管，无异军管。来人个个是奉命“加强”什么、“改造”什么的，这是共性。暂时各位来人的个性还没突现出来。政委、协理员们还在摸底，被摸底的人们也在睁眼看这些新来的“挂帅”者的动静：本来是说由“政治”来挂帅，实际上挂帅的就是这些位“政治”的全权代表了。过去只有军代表一说，没有政治代表一说；现在听说来人都已办了转业（丁莱夫是否保留军籍，不详），广播局也还不算军管，不好再叫

他们军代表了。

我和派到剧团的政委没有接触，一时也还相安无事。

《叶尔绍夫兄弟》“内部演出”，我却高兴不起来了

讲政治并不是从设政委开始的。一九四九年
起，全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泛政治年代。我们常
说“政治空气”，成了一个熟语，谁也没想过“政
治空气”什么样，也像空气一样透明，还是有时也
像发生雾霾一样混浊？反正摸也摸不着，却时而被
批评“政治空气稀薄”，时而又感觉“政治空气紧
张”，人人反应不一。到了这时，一九六三年春
天，自然空气，像天道运行一样，还是正常的，逐
渐回暖，而社会生活从小气候到大气候，都给我山
雨欲来的兆头。我对自然天气可以漠然，而对隐隐

约约由远而近的一股强大的政治气流，不免有些惴惴然。

以我的“摘帽右派”身份，又坚持闭门思过，几乎断绝了社会联系，没有什么消息来源，但仅仅从常规的所谓“学习”时间，每周一个半天或两个半天的读报、讨论，从大家欲说还休的话茬里，也能体会到普遍存在的困惑和质疑，以至不同程度的忧虑和焦心。坦白地说，我虽做不到心如古井无波，可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理支撑着，反倒像“没心没肺”那样的略带几分安然。

实际上我这个个体此时已经纳入了全社会“反修”的轨道，我指的是参与《叶尔绍夫兄弟》一剧的剧本改编，不管我自己是从什么角度介入，它是由中宣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作为配合十中全会决

议开展国际反修斗争而安排的剧目，又是经过写“反修”大文章（批判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成组的有九篇，故习称“九评”）的那个班子的审查认可，我也已经是一个推波助澜的马前卒而不自觉。

二三月间，有一天实验话剧院通知我，到二七剧场去看彩排。田汉来了，他的社会身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他同时又是在戏剧界享有很高威望的权威人士，四十多年前人家就搞“南国社”搞戏搞剧本了呀，那时候你在哪里？而且看孙维世对她所称的“田老”敬爱有加，看得出不是出于一般敬老或尊重领导的礼貌，而是由衷的真情流露。维世表现的亲热，像对亲人长辈一样，使我联想到田汉同金山也是多年的同道同行，甚至想，田汉会不会

跟维世的烈士父亲也相识啊？

但我对田汉那天的精神状态感到十分诧异。我没看到他的脸上有一丝笑容，彩排结束也没留下什么意见，一直那么默默的。当时他年过六旬，在我们看是高年了，因此想他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审查彩排有点勉为其难，那也就难怪精神不济了。在我的印象当中，田汉这位人称“田老大”的前辈是精力充沛的，是英气逼人的，是富于浪漫情怀的，是名士风流的，是不拘小节的，是有人请客他会带着不请自来的三朋四友一道赴宴的……怎么可能是这样没精打采的呢？

只是到了一年半载以后，他的名作《谢瑶环》被当作“大毒草”拿来批判，不只批剧本，也批作者，我才恍然，田汉应该是在一九六三年初，甚至

更早在一九六二年，比方十中全会之后，甚至之前，他在三月间广州会议上发言以后不久，在文化界、知识界一片热潮的同时，对这次会议包括他在会上的发言就有人指摘，他大概那时该已经有不祥的预感了。他大半生经历过大革命的失败，南京国民党的囚禁，抗日战争中复杂的斗争和开国后多次政治运动的挤对，他会识风起于青萍之末，何况面对着一空空前巨大的气流呢！

不要轻易责备人们的沉默吧。

不要轻易责备人们的恐惧吧。

彩排就算通过了审查。谁能想得到，在这里负有审查之责的领导干部个人，面临着一次甚至多次名为审查的折磨呢。

我这是交出剧本后头一次看到它在舞台

上“立”起来。剧本经夏衍过目定稿。他看过初稿，曾建议去掉“叶”氏兄弟中一位兄弟的戏，我们接受了；最后他又动手改掉了曾被俘的那个兄弟的戏，线索简练了，不知是否还有别的用意。

彩排那一天，得知很快就要公演了，我当然为此高兴。

向“内部演出”的广大观众公演之前，要在人民大会堂演给中央领导人看，当然更该叫审查。

青艺工作人员李畏来电台剧团通知我。那是三月二十七八

号的下午，办公室的人已经陆续离去。李畏说，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上演，周总理也要来审查，维世叫他来找我。我几乎脱口而出：“谢谢，我不去了。”李畏很意外，说为什么不去啊，周总理要来

啊。我是很尊敬周总理的，自然不愿让人误会我对总理不敬，我现在都想不出，我怎么立刻就回答说：“我怯官儿！”这个“怯官儿”的词汇可是我从来没上过口的，怎么鬼使神差就从我嘴里吐出来了呢？——也许是潜意识里不愿居于被“审查”之列，虽然不是审查我，不过是审查大家的一出戏？也许潜意识里仍是自惭形秽，不愿以“摘帽右派”之身站到党国大员面前？人生在世，确实有些言行是自己没法解释的吧？——于是李畏也不多说什么了，他要赶紧回去报命。他年纪比我大，参加过抗战时期演剧队，特地大老远从东长安街到西长安街来的，我想一是表示郑重，二也怕是涉及保密要求，因为周总理的行踪，是不能先在电话里透露的呀！老同志辛苦了，我很是过意不去。“文革”后

我向人问起他的吉凶，才知道他早就谢世了。

这一次谢绝了看戏，接着还是得到了一次去人民大会堂的机会。因为在那里不只演一场。我去了，才知道演出是在小剧场，也就容纳二三百人吧。

这可以说是“内部演出”中的“内部演出”了。后来听说，在京的中央领导人，除了毛泽东以外，全都到大会堂看了这个戏。不知他们有什么感想。周恩来审查通过的，大家也不会说什么了。许多年后，我想，最早“审查”此剧的是那写“反修文章”的班子，不知挂帅的康生是否曾来，像康生那么刁的人都没说二话，可见这是符合需要的了。

正式演出，中央实验话剧院在位于交道口小经

厂的实验剧场，铁路文工团被指定照原样在他们的二七剧场搬演，还有总政文工团话剧团演给部队大尉以上军官，不知在哪个剧场。二七剧场那里演出时我得到一张票，让我母亲去了，我母亲喜欢看戏，但她可能没看出什么所以然来，不像她看《望江亭》之类那样津津乐道，这让我隐约有点失望。

这个戏在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百场的时候，我又得到一张赠券。那天在剧场里遇到孙维世等人，我才知道，各大区的中心剧院（如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等），后来都照实验话剧院的演出台本拷贝，也都已演了近百场，据说他们还要到各省巡演。我心里暗说，流毒不浅了，虽然当时并没把戏称为“毒草”。时时处处以毒草制造者自居，不期然地成为我的思维惯性。

我们文工团的党团干部都看了内部演出，有些不够级别的演职员，也通过各种方式拿到票；又不是传达内部文件，哪能控制得那么严。没有什么真正的“内部演出”，就像后来也没什么真正的“内部发行”一样。越说是“内部”，大家的胃口吊得越高罢了。

不过，大家还多少保持了“内部”的气氛，看过以后不作议论，仿佛新华社的《参考消息》之“内部参考，不得外传”似的。

柳荫和陈庚也没跟我重提这件事。剧本经过他们的手，即使他们当时心血来潮，决定由剧团试排，他们不通天，注定也会胎死腹中——这是我后来明白的。孙维世他们闯过多少关口啊。不过，因我原来的确曾设想，这是为我们剧团每个演员量体裁

衣的，最后却由别家上演了，总觉得团里的演员们会有遗憾，他们也许会抱怨团领导没魄力，甚至会说我“吃里扒外”……谁也没这么说，倒是我自觉负疚了。

改编“阶级斗争”剧本，远不如亲身挨斗 感受深刻

这时我们剧团在陈庚的倡议和柳荫的支持下，正准备排几个舞台剧，作为舞台锻炼。首先选定的剧目是一九五七年打响的《北京人》，把当年的导演蔡骧从镇江借调回来，重排此剧；他是打成右派以后跟我同在黄骅农场劳动过的，离开农场就安置到镇江，因为他的妻子梅邨已先期下放那里了。又找了一个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老剧本《花园》，间接配合“反修”的斗争。按照周扬、梅益早年为文艺广播规定的“三三制”比例，有了传统的，有了外国的，还要有一个反映现实的。什么叫反映现实

呢？在当时的语境，无非就是反映阶级斗争。农村阶级斗争在文艺作品里的套路，无非地主富农破坏生产，腐蚀干部是主线，后来加上富裕中农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对合作化不满，煽动退社风潮之类，若是他们又跟“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勾结起来，那就更“典型”了。多半是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大队，顶多一个合作社的事，被腐蚀的干部也就是个大队长，到头了。哪个作家、编剧也怕说丑化党员和党的干部啊。那时候说反映阶级斗争，还较少涉及中上层，不必说上层了，就是县级干部也少。编剧的，写小说的，有一个默契，干部都是好的，级别越高的越好，就是有个别陷入阶级斗争漩涡的，也是由于思想认识不清，或受到某种诱惑，立场不稳，在阶级敌人设的“局”里不慎沾包，到

后来真相大白，在打击和消灭敌人的过程中幡然悔悟，回心转意。比如写工厂的戏，总是一个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甚至“喝过洋墨水”的工程师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是阴谋破坏吧，也是保守落后，不肯“跃进”，不肯“创新”，而负行政责任的厂长，竟不幸支持了他，最后是党委书记真正代表党的路线政策，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力挽狂澜，打击了敌人，也挽救了那个犯错误的厂长。这很符合正常年代的政策条文，只是到后来“四清”和“文革”时候，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第一位的任务，才嫌这个套路太“温”了。

而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为数有限，大约一九五八年后才出现了几本。倒是农村题材的写作，有

传统，较成熟，数量也大，可供选择。我从中选到了山西小说家胡正的一部长篇《汾水长流》。胡正是后来人称“山药蛋派”的一员，都是像赵树理一样出身农家，早年参加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或地方工作，编过报，写过戏，语言好，相应地文字也见功夫。聚在赵树理旗下，年纪相仿的有“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五员大将。

我就这本小说的改编，拉出一个提纲，并且争取到编导组里一位富有编剧经验的高方正与我合作，团里又让另一位编剧，且是编导组负责人的曹惠跟我们一起讨论，由我和高方正执笔。在那前后，剧团来了一位部队转业的导演张岚，与剧团实行政委制前后脚。他跟那位新来的政委年纪差不多，都是1925年前后出生，比我大七八岁，他们

两个人的风格却不一样。他是搞业务的，不是来代表共产党、代表马列主义的，也不是要来改造大家的，气质很谦和，跟团里的演职员很快就不见什么隔阂，这从团里的年轻人很快就敢同他开玩笑可以证明。

张岚将任《汾水长流》一剧的导演，他跟我们的接触就频繁了。

领导内定这年第四季度外出巡演。给我们的时间不到半年，够紧张的，于是决定剧本编出一场排一场。为了集中精力，不受干扰，更为了“体验生活”，想找个农村住下来。我陪张岚乘公共汽车到顺义去踩点。走了一两个公社，也下到村里看了，都不理想。京郊的农村，户密人杂，离小说写的山西农村格调太远。而我们的改编，大体忠于原著，

不准备大动干戈，恐怕多少会保留些地方特色。张岚是冀东遵化人，他没去过山西。回来大家商量，索性到山西农村去找一个点吧。

山西的点选在榆次，乘火车在太原前一站下。从来没想到来榆次这个地方，对这里一无所知。许多年后，才知道这是常风先生的老家。常风先生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曾经协助朱光潜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他又是三十年代著名的书评家。常家是榆次当地大户，绝对的大户，宅院一直保存得较好，二十一世纪已经设为旅游景点，可惜常先生早就过世，不得躬逢其盛，但也少却许多由此而来的烦恼。这个地方靠近省会，交通方便，相对于太行、雁北，是山西富庶的地方。我们大队人马并没惊动各各忙于自家营生的社员们，没人围

观，可能一是干部们预先打了招呼，再则这里不是穷乡僻壤，老乡也都见过世面。不错，我们找了一位做饭的厨师，就在太原城里饭馆干过，只是他在我们的伙食标准下，施展不出高超的手艺；但刀削面也就极具特色了。这位大师傅名叫张小眼，这不是诨号，是大名，山西农村里，除了书香门第请先生翻古书起大名以外（比如常风先生的学名是常凤璩，字镂青），民间起的名字都通俗有趣，男孩子可以叫狗七狗八，女孩子名儿叠字多，都是什么花花啦，爱爱啦，每看山西的小说就能跳出一片，多得很。

我和高方正安顿下来，立刻开始“抠”剧本。这时才发现，临行匆匆，连稿纸也没带。就拿出“卫生卷纸”，你一句我一句凑台词，等定稿再

付诸蜡纸钢版油印。张小眼跟我们混熟了，知道我俩是干什么的，看见我们的苦况，常常笑着说：“又在哭剧本呢！”如果说那个时代流行集体创作，其原则是“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笔”，我们所谓改编是二手活，既不用思想，又没有生活，只剩下王朔说的“码字”，还是从原著里拆兑出来的字，挪挪补补，勉强摆出一盘棋来。连我都有这样的感想，高方正进入剧本这个行当时间长，体会深，他当有更多的感触，不说罢了。所以当我开玩笑，说我们的工作是从手纸出发，最后回归手纸的时候，他欣然首肯，没有异议。

如果说我在初读原著小说时，还被其情节所吸引，乡村舞台上围绕农业合作化各样人物的磨擦和较量，“有戏”，但进入所谓改编过程，在小说提

供的框架里，按照“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模式摆弄来摆弄去，很快就兴味索然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这不怪小说家胡正，他虽然心中有公式约束着，但他有农村的生活，一旦沉入规定情境，还会动感情，写出来，可能也会体验到创作过程中一定的快意。而我们，就是说我和高方正，笔下不是我们从心坎里想写的东西，这就变成单纯的技术活儿了。

团里的领导，剧组的导演、演员、职员，谁都没说泄气的话。大家深知，要想外出巡回演出，一个反映现实的剧目是万不能少的。后来在广播剧场试演的时候，谢文秀看后的反应是，怎么满台“叫化子”啊？他是指剧中人全都破衣烂衫。话剧是重写实的，包括服装道具，不像京剧或其他戏曲有写

意的成分，比如乞丐，也只须在正常的民间衣服上贴一块补丁就行了。况且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剧中写的五十年代初，土改以后，实行合作化的初期。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已经出现。农村人口，打倒了的地主，浮财分光了，哪还有好衣裳穿？富农犹有余悸，富裕中农仅可自保，岂敢炫富？贫下中农成了舞台上的主人，但在生活中有几个有做新衣的余裕？江青是最喜挑剔的，但她看过这个戏的演出以后，一句话没说——就是说没有批评，比如说服装太烂，是给新社会抹黑之类。也许是她这时刚刚亮相搞样板戏，所遇来自彭真等有权人物的阻力很大，她还顾不上到处指摘挑衅；也许她给陪同看戏的丁莱夫留了面子。几年后“文革”中，一九六七年一月间她到广播局讲话，可就号召打倒丁莱夫，从丁

莱夫手里夺权，不客气了。

不过，我还是从榆次乡下高高兴兴走的，虽没有从改编工作得到多少愉悦，却有包袱卸下的轻松。我和高方正把最后一场戏完成交差，就告别剧组先撤。演员们总是爱动感情的，不知是谁唱起电影《怒潮》插曲，“送君送到……”唱得人眼眶酸酸的，同时觉得自己不配，因为在电影里这是送一位革命军人，而据说其原型乃是彭德怀，不过大家当时并不知道，直到“文革”中这样揭发，才悚然而惊，唱个歌儿都会掉进陷阱。“文革”又过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那个影片平反了没有，更不知是否真的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之作？电影被查禁的极多，仿佛一直没有认真清理过。

离开榆次前不久，还有一件高兴的事：行前接

到文秀从上海来的电报，女儿在七月二十五日亦即农历六月初五出生。她是赶来“六月六，看谷秀”，还是赶来六月六“晒书”的？有人夸说“一儿一女一枝花”，我也面无惭色地照单收下。女儿按我和文秀原来的计议，取名甜甜。我从心底漾出了似有若无的幸福感。

我和高方正不忙回北京，而要到五台去。方正看材料知道那里有个高山气象站，我们遂决定去“体验生活”。我无可无不可，能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总是好的。

先到太原，到省文联找到马烽、胡正，向他们汇报，《汾水长流》已由我们改编成舞台剧，正在榆次一边体验生活一边赶排。在他们那里还遇见了孙谦，印象里马烽的小说之改编为电影，多半出于

跟孙谦的合作，诸如《葡萄熟了的时候》、《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马烽是我熟悉和尊敬的作家，一九四七年就读过他和西戎合写的《吕梁英雄传》，知道他俩是年轻的老革命。一九五七年以前，我有时去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的中国作家协会，见过马烽，他和秦兆阳都在创作委员会工作，我来开诗歌组的会，就是创作委员会的一个组。后来马烽回山西了，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奉调全国作协，那是后话。

胡正，我过去没见过，在研读《汾水长流》的同时，找来他的短篇集子，一本叫《三年早知道》的，都是写山西农村，乡土风味十足，引人入胜，各篇的人物活灵活现，像出自赵树理笔下，比如“三年早知道”是一个人的雅号，就像老赵的人

物也都以外号行世一样。你听这五个字，就可想见其在乡里间的无所不知、未卜先知和侃侃雄辩之姿。关于我们的改编，胡正态度淡然，并不多问，好像心知肚明，不会把他的作品改好，只能改坏，但他也不计较似的。只有在一切都以革命工作需要为第一位，其余在所不计的时代，才会有这样的人、这样的态度。当然，这是因为胡正是为革命写作的，写出以后，认为自己的作品就属于人民了，不会以之为求个人名利之具。论名，他本已有了，他也不怕我们砸了他的名声。至于利，那时候好像压根儿没提上演税的问题，没有事先的授权，包括改编权、保持作品完整权等等。总之，我原先因自觉剧本改得不怎么样而心有未安，到这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跟我住过老302宿舍同一套房的罗弘道，

是西南大区撤销后来京的，听说我改编了胡正的小说，告诉我他建国初期在重庆《新华日报》，胡正曾是他的直接领导。许多年后，读到流沙河的回忆文章，原来诗人也曾是胡正当年在《四川农民报》的部下，作为从老区来的领导，对像流沙河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关心备至，提携有加，直到胡正返回故乡，他们还时通书信，反右才中断了他们的通讯来往。原来胡正是这样一个口碑甚佳，值得怀念的人，我和他则止于礼节性的拜会，失之交臂。不过，以我当时的政治身份，也不可能与第一次见面的不管什么人互相交心，那是一个因政治运动不断的每一次都从倡导互相揭发开其端，以致人们越来越互相猜忌互相警惕互相戒备的年代。交浅言深，至少在中国，是从古以来的大忌，何况在这样

的年代，使我深受其害，受害的又何止我一人！只是在我，好像这毛病根深蒂固，“改也难”似的。至于再往后的“文革”十年，人们痛苦地发现，在这个新社会里，交际之道，不但交浅言深会受其害，即令深交，亦不宜深谈，所谓“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盖岂止隔墙有耳，“同床共枕”也靠不住。当时流行的政治原则是“亲不亲，阶级分”，斗争策略是找“知情人”，越是亲近的人、深交的朋友，越是调查的重点、逼供的对象，加上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过去仅在监狱和劳改场所利用犯人互相揭发作为考量立功表现的做法，普遍施之于人民群众之间，以告密和伪证造成冤狱遍于国中的局面。多少人触犯《公安六条》中的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

招来杀身之祸。这一套不但用来整治一般干部群众，就是高官也不例外。所以“文革”结束以后，许多复出的领导人大呼实行法治，确是出于身受之痛。不过，随着那一代人渐行渐远，记忆褪色，有些执事之人已经听不到前人远去的呼声了。

难得一上五台山，跟年轻气象员聚会高山站

我在回叙一九六三年事的时候，不意发了这么一些感叹，这些感叹，并不都是当时所有，多半是后来慢慢积累下来，所遇渐多，所感渐深的。但这个“后来”固然至今还没结束，而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简直也说不清。

我们从山西省文联告别出来，向马烽、胡正借了两辆自行车，真也够说得上是“不情之请”了，幸好他们宽以待人，让我们如愿以偿。骑车直奔火车站，买了去文水的票，将车托运。下了火车，取出自行车，一路打听云周西村，便在坑洼不平的乡

村道上骑车而去。其间我因一犹豫，以致摔下车来。好在没有摔伤，骑上车接着走。经验是在崎岖凸凹的道上，要一往直前，碰到沟沟坎坎就势冲过去，一放慢，车轮不是卡住就是仄歪，紧跟着必倒无疑。

云周西村是刘胡兰的家乡。她是我们的同辈，一九三二年生，一九四七年初被杀时不过十五岁。她的身世，她的遭遇，她临刑的表现，都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当时当地的斗争极其复杂而残酷，然而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首先是一群活生生的人，包括尚未开始她真正人生的胡兰子，被血淋淋的铡刀杀害了。过去的宣传只突出刘胡兰一人，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不但村里那一天与她同难的，还有好几个人，而且在这之前，在这之后，在这个云周西村，

以至附近的贯家堡等村，都发生过这样的残杀。铡刀，这本来是铡草喂牲口用的，却当作了草民老百姓的断头台。人对人何以残酷至此？冤冤相报，又何以新仇旧恨连绵不绝？一连串的质疑，一连串的联想，挥之不去。最后我停留在郭沫若为纪念刘胡兰书写的碑文上。碑文写的什么，我不记得了，都是大行的话吧，我注意到郭沫若这回没有倜傥挥洒地大写行草，而是一笔一划地写的正楷，我以为他是毕恭毕敬地做这件事的，显示了他对刘胡兰的敬意。这是我见到的郭沫若最工整，也是最好的字，肃穆而浑厚。许多年后，我听说郭沫若在他被打成“反动学生”的爱子郭世英莫明究竟地死去后，接连多少天把郭世英在农场的日记用小楷抄写了一遍。我没看过这份抄稿，但我想这些字里行间，不

但贯通着儿子郭世英的困惑与思考，应该也融入了父亲郭沫若的丧子之痛。如说书法，这样的书法才是值得看重的。也许郭沫若晚年遗墨里，这两件是最可珍贵的吧。

从刘胡兰家乡回到太原，把自行车还给马烽，出文联门不远，在大街上邂逅了多年不见的公刘。简单说了我到太原的来意，上五台的去向，就别过了。颇有点“口欲言而嗫嚅”，也还是身份的约束。但就此知道公刘已从总政发配他劳改的山西某水库工地出来，调到山西文艺月刊《火花》编辑部。跟他再见面则是又过十几年后的一九七八年，大家更经了一番沧桑之后了。

我们乘长途汽车直奔五台山，没经五台县。从车上遥看县城恍若在云间。在山脚大车店里歇了半

宿，实际是和衣而卧，因为炕上的被褥太脏。本想就闭闭眼睛，实在困，还是睡着了。睡梦中听到人畜杂声，窗外人们天不明已经在喂牲口。我们雇了拉脚的马，驮着我俩的行李，我们跟着赶脚的，一步一步向高处攀去。马是本地的，常上常下，常来常往，走的也是常速。好在我有劳改生活垫底，还能跟上趟儿。初上山时，我和方正偶还说几句闲话，越到上边，话越少，只顾喘气了。

上山前，没看到《清凉山志》，只浏览了简单的介绍，那时候不兴旅游，这些介绍材料极其粗陋不文，但可大致了解，五台者，有东南西北中五座山。我们要去的高山气象站在中台上，这个中台是华北诸山中最高的一座。脚夫把我们送到台怀镇，我们感谢他，他牵牲口下山了。这台怀镇名副其

实，是五台山的中心，有小溪潺潺流过它的怀抱，水至清，我蹲在水边石上洗了手绢。难得群山环绕中有这么一方宝地。从这里有路可通到各大寺院。镇子其实小得很，但也有镶牙补牙的牙医，因想到，“牙疼不是病”，但被小小牙疼干扰的，不但通都大邑，山野之间也不乏人。既来到这儿，大显通寺是必要拜一拜的。也许因为阳历七八月正是伏天，外地来进香的人少了，山里并不热，我们得独享这清凉山里的清凉。在后面禅堂外，遇到一位穿旧西装的中年人，他跟我们寒暄，因知他从内蒙古来，是蒙古族，信喇嘛教，早年曾经留学日本，云云。他把我们带到方丈室，方丈听说我们来自北京，请我们喝茶，拿出方糖来，据说方糖之类是善男信女从新加坡带来的。我心想，别看五台山远处

内地，用道教的话来说，却是“别有洞天”呢。

出显通寺，回到台怀镇上，高方正心细，度量我们身上的钱不多了，于是到镇上邮电局打电报，要求文工团总团的会计给我们电汇些钱来，这样我们从高山气象站下来，就有回北京的盘缠了。

从台怀镇再走上中台，真的另是一番气象。放眼望去，众山多在脚下，是迷蒙的云气氤氲弥漫于无边无际的空间。这里离天近了，离地远了。

高山气象站的全体人员欢迎我们，全体也不出十几个人吧。虽在华北的制高点，却不只是北方的年轻人，还有四川省的娃儿。他们，这些奋斗在气象第一线的尖兵，差不多都是中专生，从气象专科学校毕业后转战四方。他们说，你们来的时候正好，再过一个多月，这里就会降雪，然后是大雪封

山，达半年之久。他们当中一个较年长的，班组长吧，就是在封山的半年之间，跟山下邮电局的女电话员一“听”倾心，爱上了，直到开春，化冻，山上的人下山，这才见面。这成为方正写的电视剧中一个现成的情节。

他们说，我们来之前，他们已经开始为过冬筹划储备粮食，还有其他生活必需品。窗外挂着一串串蘑菇、香蕈，都是这样的储备，休班的日子在中台上采集的。我和方正跟着去采蘑菇，在一片仿佛砂碛的荒凉野地，不但有这些可食的菌类，也还有毒菌，有过去只从书上看到的，所谓“牛溲马勃”的马勃，他们叫马屁蘑，有西瓜那么大的。

而更出奇的景观，是平旷如砥的中台顶上，洒落着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石块，让你想象是女娲补

天时丢弃在这里的，“无材可去补苍天”之石，究竟是造山运动留下的砾石，还是天上降落的殒石？怕还从来没有专业人员注意研究过。我甚至相信，这些石块，打从亘古洪荒，没人动过它们。千年万载，该只有风霜雨雪极细微的侵蚀，没有外部位移或内部变化。

相对于这个大寂静、大冷漠、犹如被人类遗弃的大自然，高山气象站这个纯由小伙子组成的小世界，却是热气腾腾，朝气蓬勃，他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知道自己的责任，知道不能依赖远水不解近渴的外力支援，得靠自己应对这里一切意料中的麻烦和想不到的挑战。

夏天比较好过。但这么高的山上一样有大雷雨，而且好像那大雷雨更加猖狂放肆。对地面上的

人，雷在天上；而对高山上的人，那轰然而至的干雷，却在平地，在对面，它是一个火球，从一溜平房门前滚进过道，又从另一道门出去，爆天炸地一声响，然后滚到不知何处。一怕人不怕人？

我们在高山气象站住了一周，“同吃同住”，却无法“同劳动”，他们的劳动是门专业，我们远远看看，绝不干扰。

难得的是在一天傍晚，太阳落山前的一刻，背着夕阳，到朝东的山崖上眺望对面的云天，奇迹发生了，对面云翳上幻出一个圆晕，中间有朦朦胧胧的影像：这不是“佛光”吗？我招招手，“佛光”中的影像也向我招手，一时仿佛天地俱寂，只有我与“佛光”互相对视，过了或长或短的一段仿佛凝止不动的时间，那圆晕淡化，消失，云海依

旧，暮色四合。

我读过关于佛光的小常识，不过这偶然一次的机遇，尽管不是什么千载难逢，却可能是毕生唯一的了。后来到过峨嵋金顶，还有黄山、梵境山，都像上泰山访日出不遇一样，再没有这样的佛光善缘了。

下到台怀镇，我们还特意上邮电所访问了那对“山上山下，直通电话”的情侣之女方，她笑着说：我早知道你们要来找我了。

说来不好意思，我们的行李还夹带了许多串晒干了的香蕈，多是山上主人相赠的，想想他们一冬天吃不到青菜，更感真情厚意的分量。在他们可称寂寞的生涯中，我们的访问也是个有趣的插曲吧。后来听到学界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相勉，我总会

想起在华北最高的高山气象站里一丝不苟的埋头工作者，才真是默默地“坐冷板凳”呢。

又在台怀买了当地一种特产，小小的木碗，是整块木料剝出来的。髹以深黄色的漆，上面勾勒着朴拙的粗笔花纹。正好给我初生的女儿做玩具。那时候我家孩子没买过像样的玩具。这只小木碗陪伴她度过童年。

我回到北京时，女儿和她妈妈也刚从上海回来。乘的是京沪线铁路因水患停运恢复通车后的第一趟车。

文秀告诉我，购票时人不多，她也就没舍得买卧铺——平时13、14次直快京沪间走27个小时，硬座票价27元，若买硬卧就要40块钱了——所幸上车后果然人很少，母女俩在长椅上休息得很安稳。快

到河北省时天已经黑了。透过窗户能看清路基两边的积水，闪闪发光。火车越开越慢。开一阵停一阵，简直像鸭子在铁道上凫水。列车司机不时下车到前方观察线路。过沧县时，文秀看到了路东的姜庄子、姚官屯都还淹在水里。这是我一九五八大半年滞留的“第二故乡”啊，她也多次来往过，我们能不有所牵挂吗？

本来我还沉湎在五台山和气象站混在一起的，似有几分与世隔绝的意境里，现在一下子回返扰攘的红尘。

关于水灾的报道不多，报上看到的已经尽是救灾胜利的宣传。文秀一路亲见许多村庄还泡在水里，但一掠而过，包括沧县我住过的村，她住过的窠店，有没有人员伤亡，房屋、牲口受多大损失，

都无从了解。整个的灾情报道，强调正面宣传，奋勇抢险啊，生产救灾啊，干部带头啊，共产主义风格啊，每次天灾人祸，在报纸上都化为“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之类。灾难的真相随之隐去了。不能深责那时的记者。时势如此啊！

对反修波及国内毫无精神准备，还在吟咏“怒书原不作哀音”

我们都受制于所谓光明面和阴暗面之说。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早就划得泾渭分明。编辑也好，编剧也罢，也不管你是不是党员，都得把自己的身份定位到党的宣传工作者，我们的眼睛必须只看光明面，因为据说它代表着事物的本质、社会的本质；向群众作宣传，不管是写所谓文艺作品，还是报道新闻，都是要用光明面来动员群众，鼓舞他们的斗志和干劲，而不是向他们去讲述不代表本质的消极现象，这才是宣传工作包括新闻和文艺的党性所在。这样的指导思想，过去是灌输到耳朵里的，经

过政治运动的思想改造，已经用响鼓重槌夯实到我们心里。我们这个职业——不，不是一个糊口的职业，而是我们从事的这项革命工作，要求我们对党的政策方针紧跟不舍，这是唯一的“政治正确”，稍有游离，就犯错误，而且是立场错误——你站到什么阶级的立场去了？你是不是站到国内外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是的，在今天的世界上，不但国内的阶级敌人蠢蠢欲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时起时伏，“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国际上，帝修反——以美国为首的各个帝国主义，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对我们形成包围之势，并且随时准备与我国国内的反动派里应外合，颠覆我们的国家政

权，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不能不心存警惕，保持戒备啊！

一九六三年的夏天，正是中国共产党同“苏修”开展论战的白热化阶段。赫鲁晓夫的第一桩大罪，就是在党代会上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使他对许多“忠诚的党员和正直的公民”乃至大批十八大代表、老布尔什维克大开杀戒的罪行大白于天下。而“九评”文章的第二篇就直标《关于斯大林问题》，论证斯大林是多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建立和巩固苏维埃国家政权建立了多么伟大的历史功勋，在列宁死后捍卫了列宁的路线，在与前后若干反对派的斗争中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极大地改善了苏联人民的生活，加强了国

防，从而领导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战胜了德国法西斯，解放了东欧各国……真是功高盖世，不愧为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云云，云云。

这是我们从《联共（布）党史》中，从《斯大林传略》中，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全国围绕斯大林的一系列祝寿以至追悼活动中，已经听过多遍的“定论”，而赫鲁晓夫却在斯大林盖棺三年以后，质疑以至推翻这一定论，大大违反了我们“盖棺论定”的祖训，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像小学生一样洗耳恭听着由“反修”大手笔代言的党中央的声音。在所有的学习会上，表示着自己对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集团的愤慨，愤慨之一是赫鲁晓夫你也曾经把斯大林叫做“我们慈爱的父亲”啊！你也曾经在斯大林领导

下亦步亦趋啊！你怎么能翻脸把斯大林叫成强盗、刽子手呢？这样的质问在各类会上最是理直气壮，因为它既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它背后的逻辑又符合我们君臣父子关系的传统规范：你管他叫“慈爱的父亲”，怎么他尸骨未寒就揭他的老底呢？不能包着点儿吗？他是强盗、刽子手，你不是同伙吗，怎么一抹脸就叛卖你的老大？真是不忠不孝之辈！叫你修正主义已经是客气的了。这样斥骂赫鲁晓夫的时候，等于已经承认了斯大林是强盗、刽子手这个前提，只不过指给他一条正确的出路，乃是高举斯大林的旗帜，把强盗和刽子手继续做到底，就没有“修正”斯大林之嫌了。

正在这个反修高潮中，有一天朱金贵找到我，说：你不要再跟高而公来往了。我还想问怎么回

事，他却要马上躲开，怕人看见他跟我说话似的。给我留下一个大问号。我打成右派的当时，一般人对 我望望然而去之，但跟我当众说话的人也不是这样躲躲闪闪的呀。何况，十几年前，一九五一年春，高而公刚从翠华医院医治精神病出来，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在办公室里度过，那时单身的朱金贵也和我们在一起，他跟高而公是辽南老乡。怎么十几年下来，竟要我跟老高断绝联系了呢？不过他已调到总编室当秘书，自然消息灵通，或有独得之秘吧？

想来想去，就到老302宿舍高而公住的同一套房里找了樊庆荣，他跟老高同在广播学院新闻系，山东人，山东大学毕业，很老实。一问，他如实对我说，高而公在广院正挨批判。一下就把问题挑明

了。说是从反对苏修以来，老高在各种会上都提出不同意见，他不同意跟苏联这么干。我谢过他，走出楼门，就到对面的楼里去找左荧。

左荧是我一九四九年到广播电台后的第一个上级，当时的资料编辑科科长。那时有关广播业务的第一课，是他给我们上的。在电台当编辑，要不忘广播是诉诸听觉这一特点，还要记住中国的广大听众中有大量的文盲，因此首先要注意行文的口语化；他分配给我的第一个动笔的任务，就是把一篇新华社的通讯专稿“压缩”到多少字以内。虽然不久我就调开，但一直记着他对我们这批新来者的关切，记得他说延安故事带来的新名词，如“小广播”，如“闹情绪”，如“无原则纠纷”，尤其是后者，帮助我摆脱了许多烦恼，因为生活中的“无

原则纠纷”太多，干扰你干正经事，有了这个概念，就会认为某些无事生非，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也就无所谓是非，完全可以不予理睬，既省时间又省心。我一九五九年摘了“右派”帽子回广播局，左荧已经调任广播学院院长，我在新闻系的汉语教研室上了几个月的半日班。我来他是欢迎的，因为学院新办很需要人手；我离开时他也支持，那就纯是为我着想了。我与这位领导，还有他的妻子黄，除了上下级关系外，应该说有一点私人感情在。如今他主持广院工作，高而公就在广院受到围攻，高而公从白区以中央社记者身份进入解放区，后来到军政大学入伍，结业后即到邯郸台，成为左荧的同事，并一起经历了一九四八年的“三查三整”，直到进城后，左荧对老高也是关注和友好的。而公之

到广院，我想也是为左荧所“收容”。有这样的了解，我见了左荧，就直截了当地说：高而公搞不好会犯病，你们一定要注意掌握啊！左荧的态度让我一时放了心，随之离开。

高而公是个极其敏感的人。中学时代已经在北平先后加入“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共秘密党组织，抗战开始流亡到南方，失去组织关系。后进入解放区在军政大学时重新入党。在共产党这个极重革命资历和党龄的队伍里，他时有“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失落感，又因家庭出身为东北系的官僚士绅，乃有“原罪”的压力。“三查三整”中他受到始料不及一也就是全无思想准备的冲击，自卑感长期挥之不去。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一年之交，他与山西广播电台一位女友已经谈婚论嫁，订好来

京完婚的日子，临时对方因为什么具体的原因，希望稍稍推迟，而公心重，连续失眠两夜，精神就错乱了。一九五五年可能由于去一江山岛随军采访精神紧张身体疲劳，又犯过一次。不料到了六十年代，又陷入所谓反修斗争的漩涡，由于他执拗的坚持己见，成了众矢之的。我最担心他再犯病。我想我一提这个担心，左荧也会想起这一串往事。他也许会在党委开会时委婉地发言略施保护吧？幸而这次各机关的所谓反修，止于学习和讨论，没有规定打出多少修正主义分子的指标，类似高而公挨批这样的事，也是主其事者自发的创意，最后把记录存入档案拉倒，“文革”来了才算总账呢。

而公这次成为批判对象，一是他自己跳出来，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带病之身，以一个党员的高标

准自律，忧国又忧党，怕党中央背离了处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正确路线，才“坚持原则”绝不改口的；而从批判会的主持者方面说，上级虽然没要求像往日每次运动那样树立反面典型，但送上门来，正好发挥“斗争性”，不怕“左”，只怕右，有功无过，何乐而不为？

什么反修不反修，我至今也没弄清高而公被他们抓住不放的，是他替斯大林说话，还是替赫鲁晓夫说话，但总之，看来他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对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都是主张中苏友好的，并不是出于国际战略的考虑，应该是缘于他从青少年起就左倾，一向以苏联为远大理想的寄托吧。据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红色三十年代，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左倾，而公就属于这一代，那时的左倾宣传，

对许多过来人是刻骨铭心的。岂但他们这一代，就是我们，如我，四十年代后期的左倾少年，不也是大致一样的心路历程吗？

听说高而公这位老友令人不安的消息，几乎同时，得到了另一位老友的好消息。王金陵给我寄来她和乃父王昆仑合写的昆曲剧本《晴雯》。这个题材我熟悉。晴雯是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为富贵人家女奴却不甘为奴的女孩子。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中列有专章。王金陵应是欣赏她的个性，敢爱敢恨的率真。

我读了《晴雯》剧本，写了四首七绝赠金陵，其一、二首云：

蛾眉亦有横眉日，

一女独违众女心。
诤到芙蓉皆欲裂，
怒书原不作哀音。

暖树争栖入画图，
何如振翮下平芜。
曹侯辍笔真堪恸，
谁破豪门释女奴！

第二首末句，原是“谁写豪门释女奴”，后来吴小如看了，将“谁写”改为“谁破”，义愤更溢于言表了，才与“怒书”之说相称。小如拿给他父亲迂叟玉如公过目，老人青睐，把二诗写了一幅中堂。

昆曲《晴雯》，由北昆（北方昆曲剧院）在长安大戏院演出，金陵约我去看了一场。这次见面后，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才在八十年代再见。

北京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锺鸿，以只有五句的《冬小麦之歌》沦为右派，摘了右派帽子后，不能在市委待了，分到北京某个剧团当编剧，我在戏曲广告中看到她把吕剧《姊妹易嫁》改编成京剧。她听说我也到了剧团，曾来我家，我也向她说起昆曲《晴雯》的文学性很强，大约这是昆曲这个古典剧种的特点。

锺鸿比我不幸，反右派定案后，大约不久就离婚了。她丈夫查汝强，跟她一样，是一九四九年前北平的地下党，随后进了市委，一九五七年时是宣

传部理论处的处长，我在一本什么内部刊物上读到过他的署名文章。锺鸿下去劳改时，孩子是随父亲过，还是放在了锺鸿母亲处，我本想问问，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我看她精神状态很好，不愿向她重提过去。看来她有决心在新的编剧岗位上干下去，并且干出个样儿来，比我有信心。我只是走一步看一步，有点混世的意思，一直觉得在戏剧这一行也不过是“暂栖身”，世事无常，难做长远打算。这话我自然也没向锺鸿说破，互相鼓励一番。她走后不久，介绍一位老大姐来，年纪比我们要大十来岁，是位老编剧，编的多是古装剧，谈吐礼数，文质彬彬，向我借阅那个油印的《晴雯》剧本，后来就没有消息了。这也难怪。当时没处复印，或已有复印技术但不普及，保存资料除非手抄，不免太费

工夫了。

我们剧团的《汾水长流》剧组从山西回京后，正准备在广播剧场彩排接受领导审查，并登广告正式演出，然后，跟《北京人》、《花园》两个剧组一道去外地巡回演出。高方正身为编剧，同时具有很强的办事能力，便又受命打前站，外出选点了。整个剧团几乎都动员起来，包括舞台工作队，绘景，制景，木工房里钉钉凿凿，一片繁忙景象。我却闲下来了。

半个世纪后暮年回首，检点自己过去的足迹

从五台山回京以后，我写了《高山气象站》和《致俄罗斯老橡树》等诗，抒发一种挺身于暴风雨的情怀。我想，如果再被查抄，让我解释主题，我就可以底气十足地宣称，我是写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勇敢与坚韧精神。好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生。

不过，我知道，我现在写诗只能是写给自己看，有一九五八年写关于毛泽东诗词一文，政审通不过的先例，连化名投稿我也不抱希望了。上次《红旗》的编辑就是从我母亲那里弄清了我的情况，我不能再给母亲添乱添堵添麻烦了。

一九六三年，是这个夏天吧，大概灵感来自对苏共的斗争，光未然词、瞿希贤曲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时传遍全国，压过了大量平庸的群众歌曲、队列歌曲，以至准抒情歌曲。我记得，头一年在《人民日报》上向苏共发难的第一篇文章，正是通栏大标题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大气磅礴的号召，是共产党人的圣经《共产党宣言》提出来的，传入中国也已四十多年了。在党所领导的中国国土上，堪称金声玉振，响彻天地，这回又插上音乐的翅膀：“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类解放的新时代，看旧世界已经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混声大合唱，如排山倒海，潮头接着潮头，循环往

复，冲击着倾听的人也冲击着歌唱的人。音乐工作者更关注作曲的得失，强调说曲调是可以独立审美的，而文学和文字工作者，则认为除非先有曲调后填词，否则虽不能说曲调附丽于歌词，但曲调总是由歌词生发出来的。这属于学术讨论了。而像这样一首歌，其风行总有它的理由，那就是确实震撼了听者的心。也许可以说它的歌词和曲调、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一定程度上结合无间吧。

在我不长的写诗经历中，读到好诗，往往会唤起了我的诗情表达甚至是摹仿之心，这是一种内在的驱动；还有一种情况是读到很差的作品，也能引起写作的冲动，那就是来自外因的刺激：这样的诗还拿来发表？于是想攀比，想超越，我来写一首看看！

歌词虽说是广义的诗，但不是我的“专业”活儿，听到不怎么样的歌词，激发不了我的写作欲望。但这一首歌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是也要写一首这样境界阔大，气魄宏伟的歌词。

并且想好，就寄给瞿希贤，请她谱曲！

很快写出来，寄出去。

早在一九五〇年秋末冬初，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北京的诗人严辰、吕剑带头倡议出版了袖珍本的《抗美援朝诗·歌·画》。开会的时候，除了写诗的，还有绘画和作曲的参加。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老大姐，问过姓名，就是瞿希贤。当时天真地相约，我如果写出歌词，就请你来作曲，她欣然答应。不过这个冬天，我只写了几首政治讽刺诗，都是无法付诸管弦的。战争日益激化，后方的宣传度过了浅

层次的社会动员阶段，《抗美援朝诗·歌·画》也就停刊。比较详尽地报道战场情况的通讯、特写登场，魏巍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名动一时。

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间的“抗美援朝”歌曲，记得经文化部向全国推荐的，一是战士麻扶摇词、周巍峙作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是放平词、吕骥作曲的《反对武装日本》：“反对武装日本，反对武装日本……”没有什么旋律，最后索性不是唱，而且高喊三声“反对武装日本！”倒也别开生面。另有一首忘记了词曲作者的《王大妈要和平》，是配合征集和平签名的，民间说唱的风调，琅琅上口，通过郭兰英的演唱，达到流行的效果。

还有一首《全世界人民心一条》，高屋建瓴：“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红旗在前面飘，全世界走向路一条，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瞿希贤作曲，专业水平的确较高，虽然歌词也是口号的连缀，但在队列行进或广场集会中轮唱，此起彼伏，颇见气势。有这样的功底，十几年后写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样“曲调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的歌曲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全世界人民心一条》这首歌的词作者，署名招司，我有很深的印象。四十年代初在沦陷区北平出版的唯一大型文学月刊《中国文艺》，曾经刊载过一篇独幕剧《一只银蜡台》，作者招司。实际不

是创作而是改编。主角冉·阿让，情节就是《悲惨世界》的开篇。那时候我还小，没听说过百年前、万里外的文豪雨果，更没看过《悲惨世界》这部小说。因此招司剧本的这个故事，以神父的人性至情，以宽容与爱，渗透我幼小的心，因之也记住了剧作者的名字。一九四九年后，从什么报刊上得知招司人在天津。后来又听说瞿希贤一九四九年前后曾在京津两地的基督教教会供职，联想招司早年或也是基督徒，或至少是“潜伏”宗教界的革命者吧？地覆天翻以后，就不再需要以宗教为掩护，可以放声歌颂斯大林毛泽东了。

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招司先生的生平，只是作为一个读者的猜测和推想。对瞿希贤先生，也只是知道她五六十年代在中央乐团工作，一九五四年顷

以袁水拍词谱写了迎接工业建设高潮的《我们要和时间赛跑》，那一代青年唱着这首歌去参加“五一”、“十一”的游行和晚会。我当时也正热衷写工业建设场景的诗，私心引为同调。

瞿希贤收到了我寄往乐团的词稿，很快复信，解释说，因为已经写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不拟重复同一主题了。合情合理，表明她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当然，不排除因我的歌词属急就章，不能激发她的乐感，这样回答不致伤害我的自尊，也是可以理解的。她赢得了我的尊敬。

而更赢得我由衷尊敬的，是五十年后，我从一份网文中看到她晚年的反思。她对另一位作曲家秦西炫说过，她最近看到一个材料，才知道大跃进年代中国饿死很多人。当时她在甘肃“引洮（河水）

上山”工地上，应县领导之请写了歌，这支歌当即在工地上大唱起来，后来知道这个工程整个瘫痪，当地也死了不少人。“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

瞿希贤二〇〇八年三月逝世。前此的二〇〇五年，瞿希贤作品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当时观众起立高喊，要求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瞿希贤在场，坚决制止了。事前，她就跟指挥打过招呼：不唱这首歌。而且，她在自己的歌曲集《飞来的花瓣——瞿希贤合唱作品》中收录此曲时，格外注释：“收入此集作为历史足迹”。

是的，历史足迹是不能改变的，但一个人在回首往事时，是可以而且应该检点自己过去的足迹的。

检点平生，我唯一可以略附骥尾的作为，就是在前些年，接到浙江金华蒋风先生征询儿童诗的选目时，我复信说，听他卓裁，只请不要再选一九五一年写的《毛主席开的甜水井》就行了。那是一篇为个人迷信推波助澜的东西。

其实细数我的脚印，这个不宜再做读物的篇目，还须大大扩充。包括了改编的剧本《汾水长流》和《叶尔绍夫兄弟》。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产物，不过一是写国内题材、一是以苏联为背景罢了。

胡正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他和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大都写于那个有很大局限性的极端年代，必然带着时代的烙印。然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十分熟悉农村生活、农

民心理。力求反映生活真实的现实主义，有时也许真的会突破所谓“世界观的限制”——这是恩格斯在分析巴尔扎克这样一个持保皇派政治立场的作家，何以会写出那么多可称法兰西社会百科全书的现实主义巨作的缘故。当然不是说这些作家都是山西的巴尔扎克了，但恩格斯的方法论还是值得借鉴的。

我曾在一篇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文字中为赵树理和柳青一辩，我不同意因为他们似乎没有在农业合作化的时期唱反调，就要一笔抹煞他们的一些代表性作品，我以为这样做是欠思量的。柳青《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绝对是当时当地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赵树理《三里湾》中的笔墨，那些中老年以上的地道农业劳动者，对合作化不是“落后”的，也是观望的；只有一些少不更事的男女，才不假思索

到合作化大潮中随波逐流，但细绎之，他们并非“弄潮”，不过首先是贪图合作化这一继土改后又一次农村的群众运动，提供了更多自由恋爱、欢乐接触的社交机缘，这在马烽、孙谦合作的电影《花好月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也都留下了可资复按的形象化档案。假如我们对那个特殊时代的文学遗留，采取简单化的贴标签办法，就将重蹈五十年代初一本《人民文学史》的覆辙了。

不过，经我们手改编过的《汾水长流》，却不过是对合作化主流叙事的图解，可置不论。公演要登广告，我把编剧中自己的名字化为“夏天长”，回避了本名，倒不是怕人联想这是个“摘帽右派”，而是对这一职务写作的结果，不免有些自惭。经过实践的检验，三个剧目在重庆、武汉、广

州三大城市的巡演中，《北京人》长盛不衰，拥有热情的新老观众，而像《汾水长流》，则不出所料，只算聊备一格。那么，你跟着出去走江湖，不觉得惭愧吗？这样的结果，不是预期的，但也是早就预见的，我们最初就是为了符合“三三制”的比例，剧目中有了现实题材，三者居其一，政治上不犯错，质量上大体及格（达到当时社会一般演出水平）就行了。认真还是认真的，正如此前此后许多“认认真真走过场”的职务行为一样。

其实，这不光是我们笔下的一个现实题材新剧目的命运。中央实验话剧院也演出了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汾水长流》。我本来似乎应该争取去观摩一下，一来二去地错过了时机，他们好像也悄悄收场了。

初到重庆：山水市井间徘徊，川剧里沉 湎，历史中遐思

我至今感激柳荫、陈庚给我这一个随团外出的名额，等于一次小小的休假。精神上更可以放松一下。京汉线转陇海线西行，直到宝鸡都是曾经走过的，转向秦岭巴山，就开始紧盯着车窗了。这就是《长恨歌》里写的，唐明皇撒下杨贵妃一路逃难路上的“蜀江水碧蜀山青”么？白居易晚生若干年，不过是想象之词。同时代的李白，叹过“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那时站在远处，却似乎幸灾乐祸地高唱：“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已经不是当年在沉香亭给风流天子献《清平

调》的李白了。杜甫人老实，从长安奔赴奉先新皇帝的“行在”，最后还是带着妻子儿女，也走上入川的路。为了到成都的地方长官房琯那里求一碗饭吃，先得历经星霜，忍饥挨饿，像《同谷七歌》里写的，甚至不得不拾橡子吃。在那个“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的崇山峻岭里，真难为了这个拖家带口的半百老人，还不忘随时把腹稿记录下来。快把这个车程完成前不久，列车沿着嘉陵江逶迤前行，俯瞰江水，那才叫“蜀江水碧”，一碧见底。一九六三年的嘉陵江，还不曾有肉眼可见的污染，我愿作证。

时序已经是阳历十一月下旬，重庆有树皆碧绿，头一眼就让人愉快。演出在解放剧场，装台我没参加，先游览市容。这是典型的山城，还几乎没

有什么新建筑，让人想象过去不久的历史。一切似曾相识，那些地名——磁器口，沙坪坝，南温泉，北碚，不是都在我读过的书里反复出现过吗，不是都化成我记忆的一部分吗？两路口，在三叔邵季昂从一战区洛阳调到重庆以后，父亲给他的信，都是寄到两路口一家坐商转交，而且把收信人的名字写成邵季航。这些来往的家书，从沦陷区到大后方，不光千里迢迢，还都经过两方邮局的交接，才能传语报个平安。抗战期间，日本飞机多次轰炸重庆，那是交织着硝烟和警报的岁月。抗战胜利，国共谈判，双十协定，那是交织着希望和失望的岁月。

高而公向我讲起过，有一次李四光作演说，朱家骅坐在台上，李四光正讲到什么，朱家骅的座椅忽然散架，这位政府要人跌倒在地，全场浮动。老

高那时的职业身份是中央社记者，但他把这个临场的细节插到李四光演讲的摘要稿里，就像有些演讲记录稿里穿插着括弧中的（笑声）（掌声）以至读斯大林常遇到的（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乌拉声）一样。这个报道当然不是由中央社播发的，而是刊载在《新华日报》上。他追叙这桩往事的时候，带着得意的神情，诡谲的眼光，恶作剧得逞的顽童气概。今天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起疑，那个座椅是不是有人在会前做了手脚，拔出榫子，故意造成这样一个小小事故，那可就形同儿戏，是典型的“左派幼稚病”了。

高而公还向我讲过，枇杷山看夜景最好。后来在徐迟笔下也看到了，大概这是重庆人的共识。登高一望，恍如在一块覆盖无垠的黑色幕布上，用针

扎了无数的小孔，眼前爆出的满天繁星，原来是万家灯火！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不久，在沦陷敌手的北京古城度过屈辱闭塞的八年的人，渴望了解大后方的八年。那时读到张恨水的一组连载文章，逐个介绍当时活跃在重庆的作家文人，觉得非常亲切。国难当头，八方风雨，而聚集在这个被称为陪都的抗战中心，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以至不同政见的人们，克服着物质生活的艰难困顿，在不同岗位上，为打退日本侵略这个共同目标，奔走呼号着，埋头苦干着。至少我看到张恨水的介绍，我相信事实是这样的。当时想，我如果大几岁，如果也在那里，我也会那样干的。差不多半年以后，我就已经设想，我如果大几岁，我会到平西，到晋察冀，到

陕北，到延安，并想象怎样融入那穿军装打裹腿的集体生活了。

像我这样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是没有故乡的。故乡是一方水土，“故土难离”的那个故土。我呢，“生小京门胡同稠”，说礼士胡同是故乡？东四牌楼是故乡？好像不靠谱。当别人怀念故乡的时候，我只能回到自己的记忆中去寻找，亲身经历的，读书铭记的场景、人事，甚至只言片语，一颦一笑，成了我故乡的消息。艾青《火把》中的火炬游行，蔡亮油画里的锣鼓队，那人声鼎沸，火炬通明，还有字里行间画里画外的喁喁私语和潜台词，都属于我心中的故乡。“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甚至寻到历史深处，从沂河畔的春游，“东郭墦”的乞讨，易水边的满座衣冠似雪，越过史记

离骚，世说新语，唐宋传奇，太平广记，直到大明湖秋山红叶，老圃黄花，白妞黑妞余音绕梁，十三妹得得而来，野店前骗腿下马，惊鸿一瞥，又听黑灯瞎火的能仁寺大殿前当啷一响……这些都是故乡人告诉我的故乡事啊！

古往今来的山川城郭，生息其间的男女老幼，凡我认可的，就是我的乡亲邻里友朋，我与他们过从相交，不序年齿，不限地域，更不受时光流转的牵绊。两千年前的苏武，从他“去时冠剑是丁年”，到牧羊北海，饮雪吞膻；一千年前的杜甫，从他“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直到漂泊野渡，“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我息息相通，不时撩起历史的乡愁。

我不会说祖籍萧山的土话和杭州通行的蓝青官话，但母语就是乡音。母语中蕴藏着多少前人的智慧，经验的结晶。我没来过巴蜀之地，但我知道蜀犬吠日，我一来到四川，在第一个雾天，就水到渠成的写下《蜀犬谣》：

蜀水巴山走一走，
蜀犬吠日相传久；
一条蜀犬吠日头，
十条蜀犬跟到吼。

狗叫声高狗屎臭，
摇头摆尾不绝口……
雾散天开江水流，

只见日头不见狗。

尽管有雾，一点不妨碍我们的生活秩序。白天跑了要跑的地方，包括流行的景点，红岩村的黄桷树，歌乐山的渣滓洞，刘文彩的收租院，原汁原味的，重新布置的，以至加工伪造的，尘埃落定，都是一个时代留下的政治符号。一九六三年到此一游，谁能想到，几年以后，十年二十年之后，所有过去或隐或显的政治符号，都要经过一遍又一遍狠狠的搓洗以至翻新。

晚上演出《北京人》的时候，我多半在侧幕条后，把熟知的剧情重温一遍。传达北京古城老宅院暝色四垂的氛围，没有比这个戏更到位的了。初学散文的年轻人，我愿你们好好读读曹禺剧本里几段

场景提示，看看他点到的城墙上士兵的军号声，盘旋到周遭半空的鸽哨声，怎样渲染烘托，融情入景。至于以鸽子为喻，说“飞不动，就回来吧”，那就更进一层了。在大跃进后大饥荒的六十年代，曹禺给红极一时的《红旗》杂志写的文章，居然是大谈对语言的敏感，而不是像郭沫若那样，一心表现自己对政治的敏感！这除了说明这位剧作家是以书呆子面目出现的聪明人，也表明他的确想沉潜到母语的洞窟去躲躲清静。

偶尔看一眼台下的观众，他们屏息不语，场上出奇的安静，人人都要把每一句台词听进耳朵里去，听到心里去。“座中泣下谁最多？”前排后排中年以上的妇女，都不掩饰地握着手帕。曹禺并不是滥情的作者，也不以催人泪下为卖点，是剧中悽

芳的命运打动了许多观众，也不仅是女观众。

戏剧也好，小说也好，打动人的是人的命运，悬念其实也在于人的命运的走向。读者和观众各有各的命运，但他们还要关注剧中人的命运，在哪些节点上，不同时代的命运重合了呢？

经过一九四九年以来十三年的革命，改造，运动，当代的文艺作品强调了斗争，强调了决裂，强调了警惕和戒备，却少了人们之间的体贴、怜爱与同情。观众在《北京人》里预期地或不期而遇地找到了这些于他们已成陌生的感情，甚至邂逅了怀旧，淡淡的哀愁甚至缠绵悱恻，这些与“工农兵”不相容，与“无产阶级”不相容的“没落阶级的思想感情”。散场时，他们一个个默默地走了，或者结伴小声议论着走了，没有过去看过戏后高声

喧笑、吆喝呼啸的，他们都怎么想的呢？

这是“文革”以前最后的戏剧季了。转过年来，能不能上演这样的传统剧目，就很难说。已经传达了对“十大软歌”的批评，我记得的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可能还有《九九艳阳天》什么的。总之，以后又要回到“哐哐哐”“呛呛呛”的钢铁之音了。更可怕的，叫人莫知所从的，是这年夏天某期《中国青年》杂志封面画，在一片金色庄稼的笔触里，据说暗藏着反动标语“反动派万岁”——用今天人们爱说的一个成语，真叫“匪夷所思”啊，当时却硬是要引导大家作如是之想。我们睁大眼睛，盯着那画儿看，把它上下左右颠来倒去反复看，再翻到背面，透过灯光看，也找不出那五个深藏不露的字，谁也不敢说“没有”，只能

说“还得细看”。更没有一个人提出属于常识的问题：“反动派会自称为反动派吗？”

大家还不知道毛泽东刚刚在十二月十二日作了关于文艺的一个批示，说文化部是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一言九鼎，掀起轩然大波。

不在解放剧场看演出的晚上，尤其是《北京人》演出告一段落以后，我就到重庆川剧院去看川剧。过去没有这样连续大量看过川剧，一九五二年秋全国戏曲汇演后，找了各剧种代表剧目的本子浏览，也曾为川剧的文学性倾倒，但那毕竟是从纸面上看，跟舞台上立起来的不能比了。看川剧，真是一种艺术享受。难怪在五、六十年代以《新艺术创作论》等书赢得读者的王朝闻，那么爱以川剧为例来谈文说艺，不仅仅因为他是四川人，确也因为川

剧包含着许多美学原理。而对我来说，这更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川剧季了。“文革”以后，川剧复苏，但我再也没得到像这样充分的欣赏机会。

当时写过几首七绝，头一首前两句“涉江才得见芙蓉，始信王嫱出蜀中”，因吴小如引用到一篇短文中，所以记起来，后两句早忘了。诗题里有观刘卯钊演出的字样，有人以为是写她的，其实那是在去川剧院快入场时，看到一位“川女”，眼睛一亮，有惊艳之感，遂得句云云。汉元帝见王嫱出场，《后汉书》的描写，是“光照汉室”。我所见这位无名的王嫱，不过光照了川剧院门前灯光暗淡的方寸之地罢了。

“涉江”古诗写的芙蓉，应该是指水生的莲荷。而木芙蓉，我倒真的是到四川才初见。请了两

天假去成都看看，在少城公园有大片木芙蓉，不过不是开花季节，自是另一番景象。一个人，再爱花，赏花，哪能走到哪儿，都赶上花开正繁呢？巴金的《家》，写过学生们到少城公园作宣传。从那时起，四十多年过去了，觉慧的同伴，在现实生活中，经过了几番的生离死别，乃至决绝分手呢？

武侯祠和杜甫草堂是照例要去的。我又去城西望江楼，看了薛涛井，买了一小札薛涛诗笺，桃色的，制作并不精致，反见本色。

成都之行，似乎重在访古了，其实因为是独游，也就是哑游，聋游。在重庆的日子，当然跟大家有说有笑，可也接触不到当地的人。许多年后，我才听说了四川在大饥荒的几年里过的什么日子。先后有孙静轩和邹绛两位诗人，到后台看我。孙是

同辈诗人，曾以《海洋抒情诗》闻名，一九五七年诗也潇洒，人也潇洒，但打成右派就一捋到底，关进劳改农场。彼此彼此，这些倒霉经历众目睽睽下不容细说。邹绛是抗战时期的老诗人，四十年代后期常在上海《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读到他的译诗，我们过去没有见过面，现在也只能简单寒暄。同为“摘帽右派”，同病相怜，也是尽在不言中。在演出的间隙，我跟舞台工作队以外的演职员们一起外出参观，在一个路口长途车中转站，遇到诗人梁上泉，我们一起参加过一九五六年全国首届青年创作者会议，我知道他是重庆人，多年不见，互相问候。上泉神情俊朗，告诉我他在歌舞团，主要是编歌剧，我知道他从小在家从祖父学诗，这个童子功，应该有助于他写格律体的歌词唱词。上泉应该

知道我的处境，但他很周到，替我们一行都付了茶钱，算是招待同行，以尽地主之谊。然后匆匆作别。一两年后他果然带着新作《红云岩》歌剧进京演出，他的夫人是这个剧的主角。“文革”以后，他重整旗鼓，又写了关于九寨沟的音乐剧。他虽在重庆，却并没蹚到一九八三年“重庆诗歌座谈会”的浑水里去，这是他的清醒也是清高之处。

告别重庆，我们剧团买了船票下三峡了。

第五章 一九六四年

告别山城下三峡，武汉是旧游之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从重庆登船下三峡。既要体验一下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豪迈之情，也要体验一下觉慧的解放之感，但自然界是一回事，尘寰人事是另一回事。只有暂时把人世的烦忧放到一边。

读过点书的人，在山水之间总会想起一些老书本上的事情和词句，就是所谓人文景观了。但我在船上经过牛肝马肺峡，内心惊喜地发现，这大概没经过文人们的再创造，是不知何时的当地人和来往客商的直观感受，原汁原味，却也挺有意思，长期流传，大家认同了。就像薛平贵一扬鞭，口唱“一

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青是山绿是水……”毫不雕琢。

沿着川江，打眼的也就是青山绿水。在万县（现在叫万州市了）停了些时，那个码头蛮气派，回想该有五六十级以至七八十级台阶，在船上憋了好久，赶紧拾级而上。有一个偶然的镜头给我留下终生的印象，就是有一筐柑橘在台阶上翻了，金黄的柑橘洒开满天星。这回进川，“正是橙黄橘绿时”之后不久，到处可见成熟的柑橘，给人温暖平安的感觉，这是大饥荒过了的丰收吧？

船上无聊，不免手痒，未能免俗，想到“不可无诗”一语，写了一首《下三峡》，却对不住这雄伟的山川。动笔之前，以为应借川江一抒壮怀，长江水突破夹岸对峙的约束，奔涌向东，何等的气

势，但我并没有那蓄势待发，必将一泻千里的底蕴。诗行中规中矩，一篇平庸之作而已。总之，失败了。

难得的一次峡江之行，留下的只是一张站在船头的照片。

照片上表情呆滞，其实深心是喜悦的，因为武汉是我旧游之地，这回重来，不像初访重庆那般带几分好奇，而是仿佛要见老朋友似的。

我一九五四年冬天初来武汉三镇。为给苏联广播电台提供节目，直奔苏联援建项目中的长江大桥工程，那时还只有钻探船在作业：

宽阔的长江上闪闪发光，
是太阳在江心洗它的翅膀。

我们的钻探船轰隆轰隆响.....

那个冬天，我抽空找到了原先汇文中学的高庆赐老师，他在所谓院系调整后从燕京大学调到华中师范学院了。他带我上黄鹄矶头，看黄鹤楼旧址上的奥略楼，当时也留下一张照片，是请那里专给游人照相的师傅拍摄的。时距我在汇文结识这位教导主任已经八年，高庆赐看着八年前一个初一的孩子，成为一个出差跑外勤的记者，他的高兴溢于言表，我也深感他对我由衷的爱护。一九四七年高先生转到他的母校燕京去执教，我到燕京参加五四篝火会，还上他家去拜望，他留我在家便饭，记忆犹新。

一九五七年七月，我再来武汉采访“万里长江第一桥”，又去华师宿舍找他，未遇。我那时麻木，竟没感到当时反右派已经掀起高潮，更没想到加入了民盟的高庆赐先生已经在劫难逃被潮水冲击裹挟而去。我对自己处境的险恶也还没有察觉。后来才知道，早在我出京之前，所在中央台第三支部已经开始对我“外调”。“外调”一词，是“文革”中才泛滥的，一九五七年一般还不这么说，仍说调查吧。党支部书记跟团支部书记等少数人，背靠背（这个运动术语却不是始自“文革”，历次运动中习用不衰）地对我展开调查，对象遍及他们所知的，跟我有过联系的单位和个人，除了发表过我作品的报刊编辑部，多少有点关系的中国作协和北京市文联，竟还有我曾去演讲或座谈的大中学校，

要从同学们的记录本上找出我的反动言论，是筚路蓝缕而又“无微不至”啊！若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信心，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者的深仇大恨，是不会把功夫下得这么细的。我适时地外出采访长江大桥，不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他们的活动可以部分地从地下转入地上了。

我不认为反右派会触及我，一味只是忙于采访，按计划写我题为《万里长江第一桥》的一组报道，万把字，别为四篇，可供工业组“祖国建设和人民生活”中陆续播出，那节目每次半小时，这个报道可占一半时间。

因为把反右派置之度外，在大桥工地上看到这方面的大字报，也没特别关心。有一位写过叙事长诗《赵巧儿》的诗人李冰，当时带职在大桥工地指

挥部，我有一次去指挥部宿舍干什么事，打听清楚，绕道到他住处去，门户洞开，穿堂入室，却不见人，于是退出。后来我想，这次不合时宜的拜访，幸而相左，不然说不定彼此都很尴尬，因为素未谋面，在反右派高潮中，这个不速之客用心何在？邵某要表达什么，传扬什么，煽动什么？又要有劳第三支部的支部书记向李冰同志派员或发函调查了。

要说我只顾忙于采访，也不尽然。我还逛街，出入市廛，如在汉阳的石板路小巷里，踏着夕阳，发现脚下的石板，原来都是人家的墓碑，不免联想，这些都是官僚地主土豪劣绅以至恶霸坏人的坟山之物吗？又按图索骥，找到奎元寺，却只见庙门封闭，门外堆置着尘封的杂物，显然已是多年荒

废，只还没占作别用而已。

田汉编剧的《江汉渔歌》里，有一首山歌，想是他信笔写出的，“大别山头挂夕阳，月湖清浅泛鸳鸯。子期不在伯牙往，流水高山空断肠。”唱的其实是大桥北端的景色。龟山在上，山脚下古琴亭犹在，下临清浅小湖一弯，本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画中常见，今天是横天曳下一条长长的引桥，也算得是工业时代的风景线了。

前一年，一九五六年，我在题为《琴》的短诗里，写建设中的长江大桥，已经在江心涌起的桥墩上“绷上一条条琴弦似的钢梁”：

我们的琴——横陈在长江面上，
江水滔滔，后浪推着前浪……

当代的人哟，将来的人哟，
知音的人们，听我们拨动了琴弦叮当！

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我坐在黄鹄矶头，提笔
送给即将建成的大桥一个新的比喻：《箫》。上为
公路桥，下为铁路桥，远远看去，桥墩上架着的是
一管横吹的洞箫：

洞箫吹出我们的豪情，
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爱……
苦雨凄风我们不叫苦，
惊涛骇浪上多少惊骇！

写好这首诗，寄给《人民日报》文艺部。我结束了在大桥工地的采访，迁往武钢的招待所。还没开始活动，收到电台来电，叫我回去参加运动。八月某一天，这首《箫》在《人民日报》八版刊出，下午我就去王府大街文联礼堂参加中国作协党组扩大大会。对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旁及冯雪峰、艾青等的揭发、批判如火如荼，这一天可能是第十三次会，又扩大了一圈，扩大到让我来旁听了。说“旁听”，因为当事人都属高层，我不像他们早从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就熟悉的朋友们，听着听着，甚至涉及自己。我则感到陌生，不但有些人，有些事，闻所未闻，就是那火药气十足的氛围，戟指声讨的架势，都是陌生的。说不上惊心动魄，但不免一愣怔，缓过神来，逐渐“进戏”，仿

佛自己也从边缘跻入特定的语境中了。

过了“十一”，武汉长江大桥合龙，《人民日报》配合发出了郭沫若写大桥的长诗，一开头就写道：“有个诗人把你比作洞箫，我觉得比得过于纤巧，”我打开报纸时正在办公室，似乎有人悄悄地等着看我会有什么反应，我只在心中苦笑，“现在对我已不是什么纤巧不纤巧的问题了。”说是心中苦笑，因为即令是苦笑，脸上也笑不出来了。中央台第三支部从十月四日起已开始连续开会“帮助”我了。

之前为武汉大桥写过的那首《琴》，老舍先生也曾在一篇谈写作的文章中提到过，大意是说作为比喻不够恰切，云云。我以为，跟郭沫若对“箫”的比喻的评点一样，都属于正常的艺术见

解。且都是在反右宣布我为右派分子之前，并不是落井下石。如果在反右以后，知道我是反党的坏人了，再举这样的例子来批判我，那就是典型的“避重就轻”——“假批判，真包庇”了。

从一九五四年以后，听了不少揶揄之词，自然心里是高兴的，也听到一些这样那样的批评之词，我倒真的没有什么抵触，说不上“闻过则喜”，但人家说到你，批评你，还算看得起你。何况人家说的不无道理。至于对老舍、郭沫若这样的前辈，不妨说我也有某种“‘文青’心理”，挑你的毛病，至少表示，人家还看了你的东西嘛！我跟曹禺没有过从，曹禺的女儿万黛是我妹妹的同学，反右初期，曹禺问万黛：邵燕祥没出事吗？我听说，很感动，这是关心。没多久，我就真的“出事”了，我

相信曹禺听到后，绝不会幸灾乐祸，更不会落井下石。郭沫若、老舍，若是记得有我这么个人，听到我“划右”了，即使因身份不同，说不上兔死狐悲，但以他们的人格推想，对我也会有所同情以至怜悯——虽然我内心并不希望自己成为被人怜悯的，也不会去做乞怜的人。

总之，我对“五四”以来的文学前辈，是尊敬的。不但像前面列举的顶级代表人物，就是在我接触文学过程中大量阅读过的，甚至不上文学史的作家和作者，我也心存感激。没有他们的中介和铺垫，我能一步步走向文学，慢慢明白文学为什么叫创作，并且加入文学创作的马拉松吗？近年有些“体制”外的年轻朋友，以为我这是粉丝式的名人崇拜，缘于我的“体制内”局限。其实，我所崇

拜的不是他们的名声，而是他们多年的创造性劳动和辛勤劳动的成果。说到“体制”，在我心里存在着不磨印迹的人，既有不归属国民党体制的文学家，也有不见容于现体制的文学家。看一位以文学创作为业的人，我首先看他的专业表现，不是先问他的政治信仰。我又不是人事干部，凭什么审查人家的政治历史呢？！

到达武汉，住在武昌一个机关招待所（演出好像是在汉口剧场）。在这里，没有天天去看汉剧。因为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新年前后的武汉天气，阴霾时多。我还是冒着阴寒，沿大桥来回走了两过，公路桥两边成百块桥栏板上的图案，我大体上都欣赏了一遍。桥头堡上的建桥者塑像，我真的曾见之于“草莽之间”，就

是在它草稿阶段。我在当时的工棚里，见到年轻的美术工作者认真地描画，塑造样稿，目不斜视，心无旁骛，聚精会神，那情景历历在目。然而，更唤起我的旧时记忆和莫名惆怅的，是我重来“芳草萋萋鹦鹉洲”，莲花湖畔古琴台，在这里台前水边流连，忽然若有天启，随即决定，我心里酝酿多年写反右派的剧本，从这个场景揭开序幕，那些年轻人的生活故事就以大桥工程为背景，同样可作反右派斗争背景的，还有这座城市里的大学……

我要把我在一九五七年那个所谓“不平常的春天”经历的，写进这个剧本，甚至就把剧本命名《峥嵘岁月》——那一阕有名的“沁园春”里不是说，“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吗？人和人的灵魂是不相通的，相隔四十年，人事各不相

侔，一样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样是“粪土当年万户侯”，却是怎样不同的结局啊！

我暗下决心，把那一段历史如实地搬上舞台。不是按照社论的口径，也不跟着情绪化的牢骚，而是忠于我自己的感受。有前面两次改编剧本的经验教训，把我心中的“反右记忆”写出，该是写我心中的真实吧。

这次在旅途中，有比较充分的时间，有尽多独处思索的条件，即使不能把剧本的详细提纲写出来，也要画一个大致的轮廓。

李燕、纪维时等的离京，背后有一个“大举措”

有一天晚上，我没去剧场，一个人在招待所室内，越坐越冷，正在搓手取暖，李燕来敲门。她是B角，今天不上戏，又有些不舒服，留下来了。我们平时交谈不多，更没深谈过，她却说起她的身世，她的苦恼，她的“原罪”，一句话，她的父亲是被镇压的，她个人的一切痛苦由此而来。她父亲曾经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不幸被捕，后来活着出来，这就是叛徒无疑了。李燕所疑的，是她说她父亲没有出卖组织或个人，却在某次运动里抓起来枪毙了。我不便多问，想问她父亲是不是履行过什么

自首手续之类，又咽下去了。她语焉不详，当然不是要替她父亲掩盖什么，她既然对我倾诉，她是信任我，而且想把事情说清的，但我不愿在她的伤口上再揭一层疤，只是听着她说。我想，如按政策，即使在敌人狱里“自首”过，只要没有出卖行为，没有造成组织破坏和人身伤害的后果，也不该定为叛徒处死的。但这是纸上谈兵，政策要具体的人执行，在不同的情况下，离开政策自行其是的事情还少吗，挟嫌加码的先例还少吗，尤其是在“‘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认识问题”的政治气氛里，我们身历亲经的就不一而足。李燕没成年就参加了部队文工团，一直跟着部队长大，本来幼稚天真，没把她父亲的历史当回事，直到被变相清洗，这才好像明白了一点点。因为她从小受的教

育，都是告诉她“出身不能选择，重在个人表现”，她哪里知道还有一条“阶级路线”管着一切人事安排、用舍升降呢。李燕说得很动情，几乎没有我插嘴的余地，我心想，她是憋在心里太长的时间，太多的不解了。我没能给她什么宽慰，空言无用，只能一般地鼓励她在现有的条件下，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过好自己的日子。

似乎在我们这次巡回演出后不久，李燕和她丈夫老范就举家调往东北，可能是沈阳吧？老范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的《戏剧报》工作，我估计他的调离是受到李燕的牵连，那么李燕除了自己的不解，更会产生对丈夫和家庭的内疚，雪上加霜地备感痛苦。而李燕之被调离，并不是一个个案。以我们的剧团来说，同时列入调离名单的，还有老演员纪维

时，和负责音响效果的李宝昆。

纪维时，年纪比我们都大，当时应该是在四五十岁之间，总之，他在“划时代”的一九四九年前已经成年，并且进入社会，所以大概才有了什么历史问题的吧。他和李宝昆都在四十年代就组成演播广播剧的小团体，在当时的电台广播，但这不会是所谓历史问题，没听说他们演过政治性的广播剧。据说他是纪晓岚的后人，这也不构成他的什么罪名，反右派时抓柳溪，这位北京沦陷时就为共产党地下组织所用的女作家，也是纪晓岚的后人，但一九五七年反“丁陈”时涉案，对她这个出身连提也没提。这样看来，纪维时被调离剧团，可能另有什么政治上的嫌疑，不过也该并不严重，只是不适于在北京居住和工作。他没提不同意见，去了长

春，据说在吉林省台，还是搞广播剧或朗诵一类活儿。恐怕到“文革”中免不了受冲击，但我相信他“皮实”，有耐力。

李燕自然也不言声地走了。我对她说了一声“保重”，她平静地接受了我的祝福。这不是一般客气话的祝福，我感谢她对我的信任，只有那时代的过来人才懂得，像她找我倾诉，而我认真倾听这样双向的信任，是多么难得，有多重的分量。几年以后“文革”期间，我还不止一次想起他们夫妇，不知在辽宁省三派群众组织你死我活的角斗当中，怎样找一隙生存空间。所幸一九七九年后，李燕随老范调回北京，不幸的是，李燕不久就病逝了。她四十多岁短短的一生中，除了懵懂的童年，以及在文工团几年仍不失其懵懂的少女时代，怕一

直不知幸福感为何物吧。现在有人说只要自己找到幸福感，就是找到了幸福，幸福感是那么好找到的吗？一个只从现实中蒙受不幸的人，上哪儿找幸福感呢？

李宝昆也接到了调令，要他去内蒙古的赤峰市，如果换一个不在塞北，或条件较好的城市，也许他就成行了。他是老北京，本来几代人没挪过窝儿，这回真要奉旨远行，而且一去不再回来，到那个赤峰扎根落户，不免认真起来，他找人详细了解了赤峰的情况，听了介绍，视为畏途，下决心拖住不走，办法就是交病假条。他的胃确实有病，是老病号，有了这案调离的事，交感神经作用于病灶，胃病大发作，这是符合病理学常识的。我本来没有胃病，一九五九年在劳改农场却离不开胃舒平和三

氧化铝了，等从农场回北京，胃病霍然而愈。医生就是这么解释的。

李宝昆这样拖下去，也因为他自恃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家中也没有“杀关管”（即被镇压，被判刑，被公安部门“管制”的），所以实际上抗命不走也有底气。拖到一九六六年，“文革”进入“红八月”，广播局政治部开设“政训队”，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以梅益为首的“走资派”，以侯宝林为首的“反动权威”，加上像我这样的“老右派”；还有一部分，来自局内各部门“有砑儿”的人，李宝昆也被送进来了。这时他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直到剧团里的“文革”领导小组，派了胡勇带人到他家所在的胡同里造反，他的家人和邻居才听胡勇揭发了这件大家闻所未闻的事：原来在一九五

○年北京发生了一个轰动一时的，习称为“炮打天安门”的政治案件，为首的似是一个法国神父，被破获后，牵连的人里也有中国人，而李宝昆家是世代信天主教的教民，于是他便涉嫌“炮打天安门”了，这个原始揭发信一直保存在李宝昆的人事档案中，就成了他多年的“案底”。其所以列名于必须从“要害部门”广播局清洗的名单者在此。到李宝昆家抖这份档案，究竟是剧团“文革”小组的安排，还是生性勇敢的军干子弟自作主张，已无可考。直到年底政训队解散，李宝昆出来，特别是到一九七九年以后，真相才大白，原来他档案夹里的揭发信，是他一个本家侄辈单位转来的，这小子也不知犯了什么事（多半并非政治问题），在工厂或公安局审查他的时候，“扛”不住了，想起有门亲

戚是天主教徒，随口把曾经家喻户晓的“炮打天安门”牵扯上，以求“坦白从宽，立功受奖”，工厂保卫科或公安局忠于职守，马上把材料转给了李宝昆当时所在单位。不过，党中央、政务院关注督办的“炮打天安门”一案，哪能拖拖拉拉十几年？早就查清结案了。涉案的疑犯经过那时刚刚建立，尚未“砸烂”的公检法部门审决报批，该毙的毙，该关的关，立即执行，哪容留下一个涉嫌的李宝昆逍遥法外，等候下放？

李宝昆长时期不知道被一纸诬告魔住，但关于那次调离事件的大背景，他却下工夫弄清楚了。我后来听他说过，一九六四年顷，彭真、罗瑞卿一起倡议，要把北京打造成一个水晶般干净透明的首善之区——要求绝对的“纯化”、“净化”导致从“彻

底”到“透底”（鲁迅曾有专文论及）这一思路，值得我辈后人深长思之。

打造水晶一般的北京，雷厉风行地立即执行，并且由有关各部门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国务院是派一位据说名叫李少白的领导干部参与其事。这也是我听李宝昆说的，他与上层无涉，因此他能听到的，想也不属于什么“上密级”的内部行为。只是后来很少见有人提起这件事，故在说起李燕他们调离北京时稍稍多说几句。要补充一点，是我的体会，就是“文革”开始，在“红八月”里，由貌似民间的红卫兵发动，得到公安系统默认以至支持的，驱赶“黑五类”回原籍或下乡等行动，我猜就是上述“水晶化”的余绪，甚至是大规模的施行。驱赶下乡或外迁，虽也造成一些老弱在长途跋涉中

死伤的恶果，但比起在“红八月”首都被打死虐杀的人来，还算是网开一面呢。

南下温暖的广州，却接到父亲病危的急电

武汉的冬天很冷，我在一九五四年底一九五五年初就深有感受，在这个一九六三年底一九六四年初又重复（不是重温，而是重冷）了一遍。坐在招待所的被窝里，做一遍可称激烈的“按摩”，周身才略现暖意。当然，这是因为我们所住的房间是没有取暖设备的。当时不但当地老百姓家，就是一般干部家里，过冬也是硬挺。直到九十年代，诗人徐迟因为耐不住东湖作协宿舍的生冷，每年冬天都要恹恹惶惶如候鸟远飞，有时上北京亲戚家，有时去深圳朋友处，最后一个冬天正住在医院里，从一些迹象看，他将有海南避寒之行，但还没成行，一晚

就破窗而出，跳楼了。徐迟的死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各种外因里，是不是也有对一九五八年选择来武汉的后悔？因为武汉固然有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可以如愿安排采访未来三峡工程的便利，但也意味着要度过没有取暖设备的严冬，恐怕是始料不及的。徐迟离去不久，湖北省委就决定给省文联、作协宿舍也安装了暖气，不再遵循早年毛泽东关于黄河以南一律不发取暖费的规定。其实，省委大院早就破例了。

我们的下一站是广州，岭南是候鸟向往的地方。广州简称为穗，又号花城、五羊城，听来给人温暖的感觉。果然名不虚传，一月上、中旬，没有变天的日子，只穿单衣，有人还是短袖呢。

从北方来，初到广州，既感暖意，又有好奇。

在有名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门前，瞻仰了四株挺拔的木棉，叶子已经脱尽，但一身瘦骨如铁如铜，不愧英雄树之名。于右任有诗，“参天无数英雄树，万井啼寒未有衣”，俱见对民间疾苦的关怀。而我这时，遥想来年花开的季节，挂红朵朵，如灯如炬，那是何等的景象！

木棉挺拔木棉高，
不识人间有折腰。
待到三春花事好，
盛于焰火艳于桃。

只是从俗盼望春天罢了，并无深意。更没有自况的雄心。我只有一米六七的个子，怎么能跟英雄

树攀比。说木棉不折腰，这是铁打的事实。而我，此腰已经折过多次。这才期待春天到来时，能分享普通人欣赏木棉花开的眼福呢。

我早把对幸运的预期，下降到最低限度了。

甚至到萝岗赏梅，想起梅妻鹤子的林和靖，我也降格以求：

萝岗香雪久萦思，
花放南天千万枝。
何必可妻方见重，
未妨为友永相知。

开放的古迹虽不多，但镇海楼总是一方名胜，还是名副其实的崇楼宏阁。楼高可望海，诗云“楼

观沧海日”，很好，但命名偏用一个“镇”字，可见权力者的霸气。

陈家书院，原是陈家祠堂，改名所以保护（祠堂云云，带着宗族色彩，又涉嫌迷信）。这个院落，从外墙到内里，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磨砖对缝，丝毫无损，见出当年的泥瓦匠可不是一般的匠人，他们和这里所有的砖雕、木雕的工匠一样，都是高级技师、工艺师的档次，具有匠心的手艺人，设计者的匠心只有通过他们的技艺才能体现出来。进得院门，给人明窗净几之感，青砖墁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保护得也好。想象《红楼梦》荣宁二府里大大小小的院落，也都应是这样的。九十年代，重到广州，陈家祠堂恢复了原名，但外墙已露破败之象，我没有进去，怕损毁了旧日印象，但想，经

过“破四旧”的狂风暴雨，又这么多年的雨打风吹，能保全下来就不错了。

这也是我的习惯思维方式，所谓“不得已而求其次”，或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把许多尖锐的思想棱角磨圆了。唉！

那时候还没人想到西关大屋的文物价值，我们压根儿就没听说。说起沙面，也只唤起对殖民者的旧恨，对工人运动的神往，只有我还没出息地记得旧书中提到的沙面的花船，这是更旧的旧梦了。

然而我们步入了“花鸟乐园”：一进门，灯光骤暗，轻柔的乐声中，你听不到除了你同来友伴以外的低语。这是什么情调，这是什么氛围，这是年轻人只从反映旧上海或港澳光景的影片中看到的，不期复见于六十年代广州的通衢大道边，在座的也

多是年轻的情侣。比起沉静的陈家书院，又是一方天地。

我们这些稀客，去陈家书院不是怀念往昔，去花鸟乐园也不是享受当今；这一伙，是逛大观园的刘老老，是看稀罕的北佬俗人。可能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没交流过。大家走出来，依然是一本正经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战士！

在广州，我沉湎在自己剧本的一些想法里，跟演员们接触少了。只是偶尔听一耳朵，好像上海举行的华东区话剧汇演中，脱颖而出了徐景贤编剧的《年青的一代》，可以跟东北哈尔滨冒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丛深编剧）齐名了。后者的主角是青年工人，我以为剧中关键词是：一百四十八，料子服，打野鸭，即这个青工垂涎一身价格一百四十

八块钱的“料子（即呢料）服”，以打野鸭子来攒钱，而忘记了资产阶级思想正在腐蚀他的危险。这也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工形象，整个是一小市民圈子里的小市民（刘心武兄会责备我看不起市民和小市民的不良心理了）。而《年青的一代》剧中主人，也是年青人，却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这是久违的格局了，当然，这些知识分子都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们是跑野外的地质队员——这跟我十年前写地质队员的思路相通，倒引起我的兴趣，看他是怎么处理这些年青的知识分子，怎样安排他们之间的思想斗争的……

又听说在华东汇演时，提倡写十三年，因为是辗转相传，还漏掉了“大写十三年”的“大”字，也不知道是谁在会上倡导的，若听说是柯庆施，我

自会更加“上心”。一九五七年底一九五八年初，正当我落马之后，读到《人民日报》转载《上海解放日报》的通栏标题整版党代会上大报告，要“乘风破浪”什么的，里面充斥着最新的口号，后来知道是毛泽东审改定稿，照发全国的。这样的讲话，总会有点来头。我看文章怎么也会在意“来头”？听话听音，未能免俗吧。

不过，虽不知道是谁号召“写十三年”，我却并无抵触，无反感。一九五八年反对“厚古薄今”，提倡“厚今薄古”以来，我虽不知这样提法的来龙去脉，策应了什么政治图谋，但以为注意现实，从现实取材是不错的。我将要创作的剧本，就是要反映现实的，一九五七年正好在十三年之内嘛！——这可就是我的天真了！

说到思维方式，习惯成自然的，就是不认真去琢磨和体会某些政策方针性的东西，而轻易牵来作自己想法的注脚，以意为之的主观主义，它暴露的不仅是粗枝大叶懒于思考的作风，而首先是不懂政治的幼稚，一厢情愿的轻信。须知一项政策方针的确立，尽管不排除决策者有时是拍拍脑袋，心血来潮，但多数有其利益的，以至策略的深厚背景。对于“大写十三年”的底蕴和内涵，我甚至是直到“文革”以后似乎才有所开窍。

我要写的一九五七年，诚然在柯庆施所说“十三年”时限之内，但我的一九五七年之想跟他的十三年之论有什么相干？如有相干，比如他也叫他的写作班子来写一九五七年，那可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和他们左派分子们的一九五七啊！

到广州后，我们先是住在一家名叫“小百花”的旅馆，后来迁往北面市区一处酒店。忘记因为什么，我推迟一两天，等大队人马迁居后，才在一个阴沉沉的早晨雇一辆三轮车去“归队”。

人离不开阳光、空气与水。所以晴天叫“好天气”，说“天气晴好”。人们的心情甚至会受天气左右，晴天，天朗气清，心情也容易开朗。遇到阴天，本来心情暗淡的，会更加阴郁；而本来心情正常的，也会暗淡下来。这一天我的心情就随着阴天而不快，气压低，甚至感觉憋闷。车行过一家医院的后门，围拢在门外的，是一群向遗体告别的亲故们，正在接引遗体出来。一时大觉晦气。

到达新的酒店，见了团里人，安顿下来。吃过午饭，陈庚团长忽然给我一封电报，说家里有事，

你准备一下回北京吧。我看了电报，说父亲病危。哦，我早晨就感到路上所遇不是好兆头。

从广州到北京的火车，要走两夜一天。这时在车上心情忐忑，什么剧本啦构思啦都安不下心来，不知父亲的病情好转没有。他几十年坚持冷水浴，因为自己学医，有病不上医院，都是自己弄些常备药，但他好像也很少生病，我们就这样，一直没想过他也年过七十，总难免有些老年病上身。想来想去，都是马后炮。想放下不想了，却不防不祥之感一阵阵袭来。

为了排遣，一边眺望窗外，一边凑联句，写七律。这样成诗好几首，几十年过去，只记得一句“快风快雨过潇湘”了。一路有雨，斜打在车窗上，而我称之为“快风快雨”，明显有违自己当时

的真实感情，是勉强矫正心里的忧烦。十六岁“参加革命”离家以前，我实际上处在青春逆反期，在亲近母亲的同时，对父亲是敬而远之的。后来我成年，工作了，回家也少，到家也极少跟父亲单独说话儿，好像他对我也有几分“敬（？）而远之”了似的。但有一点，无论如何应该感谢他的，就是在我一九五七年秋落马以后，他没说过一句涉及反右派事件的话，该是怕加重我的心理压力。也许他对这个运动有自己的看法，对我招致这一劫难也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什么也没说。我自己在若干年后，为人父了，惦记儿女的一颦一笑，仿佛所谓十指连心，想到父亲对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儿子的祸福休咎，能都压在心底，不露声色，这需要多大的坚忍和抗压的耐力！我从小在家庭环境中没有遭

受专制的压力，得以在宽松的气氛里成长，父亲只在我十岁那年暑假，给我讲过《四书》，但也从来没拿儒家礼法那一套规范我的思想和行为。我记得的，他对我课外看什么书，并不干预，但实际上他是默默地关注着，有一回我借来一本《笑林广记》，他告诉我书里有些下流的东西，让我不要看了，明天还给同学；还有一次，我上初中一年级了，他偶然发现我破坏了课本的整洁，我是一边听讲，一边用铅笔在课文周边点画，这样一片铅灰狼藉，大概他恰恰也是心情不佳，就此发了脾气。事后一切恢复原来的秩序，彼此相安无事了。

人们常说“严父慈母”，我的母亲惜老怜贫，对什么人都是和蔼的，对子女更不用说了，我的父亲其实也并不严厉。他早年计议要让我们几个孩子

都能循序在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为此辛辛苦苦准备了远期的学费。只是由于日本人入侵，钞票贬值，一切化为泡影。但他的用心是按照现代社会的要求培养孩子，可以说这几乎成了他终生奋斗的目标。可能这是他在少年时投身上海同济大学预科直到大学毕业，所受西方式教育铭刻在心的情结，也许是他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像有的同学那样出国留学，不无遗憾而形成的情结。

一代人，带着自己饱经成败的人生记忆，从世上走过去了。可能他们的记忆，他们从记忆中抽绎的人生经验，都没有来得及，或说没有得到机会，跟亲人、儿女分享。试想，像我这样的人，年轻的时候，哪能有倾听老一辈细说沧桑的耐心呢？

回到北京站，二十分钟就到船板胡同家里，才

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两天，正就是我路遇不祥时咽气的。家人怕我着急，电报上只说病危。我终于没能在父亲临终时再见一面。这时，我想起若干年前讥为“迷信”的“心电感应”一说，信乎？不信？人体本身有生物电，而人的精神格外紧张或亢奋时，会不会与自己亲人间，发射或属定向的信号呢？难言之矣。天地宇宙之大，还有多少领域是我们所未知，至少是未深知的呢？宇宙的起源，生物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还有多少没能说得清的缘由细节呢？

哥哥、姐姐、妹妹分别从南京、郑州、沈阳来了。我们从厂桥大街的嘉兴寺起灵，去八宝山安葬。平生只到过一次嘉兴寺，在那里看到在北方抗寒生长的竹子，沿南墙，都细细的，很孱弱。兄弟

姐妹四人，在父亲犯病弥留时，都不在身边。后事全靠谢文秀操办的。她替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尽孝了。当时还是棺木葬。又以两倍的价格替母亲买了一个紧靠父亲墓穴的寿穴。但一九八六年母亲去世时，这个八宝山的民间公墓（指区别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外围部分），已从八宝山大队主办改归官办，大约隶属于北京市民政局吧。官办的标志，就是你虽有原来大队的发票，也不承认你买来的穴位的产权，说是有文件。一问是“文革”期间北京市革委会的文件。我们说，“文革”已经结束多年了。这文件还管用吗？回答是：反正你们当年买的寿穴不算数。要把母亲的骨灰盒安放，还得重新交钱。又过几年，大约一九九三年吧，这个官办公墓在内部公告栏通知：包括我父母的墓在内的那条线

上，因要开一个东门，修一条路，死者们也要“拆迁”，必得重新购买穴位，不然，过了期限，就作为无主墓处理了。幸亏我们每年春天去八宝山为父母上坟，看到了这一通知。如若没及时去，岂不是连祖坟都找不到了。总算赶上了迁坟，又交了一笔钱。交一次钱管二十年，算算，二零一三又到交钱的年份了。

当然，用我的重在隐忍的思维方式来考量，也还有差堪告慰的，就是父母的坟虽然有如上的经历，但在“文革”十年动乱中侥幸过关。“文革”前，我每次去扫墓，都要在附近走走看看，毕竟都是父亲在另一世界里的高邻啊。其中我记住了一位墓主—阎述诗先生。三十年代在汇文中学执教，我没有赶上，我在校时甚至没听说过。后来发

现张光年（光未然）当时写的歌词《五月的鲜花》，救亡运动中传唱不息，原来就是阎述诗作曲的，而阎老师并不教音乐是教数学的，该也算是业余创作吧。从延安来的老作家雷嘉，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他青年时代，从日本占领的关外逃亡到北平，曾登上古城的城头，朝东北望故乡，迎风高唱《五月的鲜花》：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上洒遍了志士的鲜血……
敌人的铁蹄已越过了长城，
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

这首歌唱出了难民有家归不得的悲愤，也唱出

了一代青年不当亡国奴，抗战到底的决心。

阎述诗先生也是在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间去世的，所以跟我父亲的墓相隔不远。我父亲的墓碑是请吴小如书写的，只有姓名、生卒年月以及儿女孙辈的名字。阎先生的墓碑上有精心结撰和书写的对联，可惜经过“文革”，竟被捣毁。捣毁，是以“革命”的名义吗？是以“除四旧”的名义还是以“打倒反动权威”的名义？是当地公社或大队的“革命群众”干的，还是外来的笼统称为“红卫兵”的年轻学生干的？如果是学生，是二十六中（即汇文中学），还是别的大学中学的“革命小将”干的？没有记载，没有追究，没有历史，没有责任。一笔糊涂账！而且几十年来讳莫如深。

这些是后话。当时我们怀着“入土为安”的心

情安葬了父亲，同时对周围的墓主们也怀着绝不敢亵渎的敬畏之心。

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们兄弟姐妹也不可能安详地忆旧，更不必说欢聚了。外地的回归外地，最感遗憾的是母亲，她多么希望孩子们都在跟前啊，这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了。

写“反右派”剧本。“小整风”挨整。又获“优秀剧目”奖状.....

陈庚准我办完父亲的后事，就不必回广州。这样在三个剧组结束巡演返京以前，我可以有一段不上班的自主的日子。我下定决心在这段时间把剧本赶出来。

家里只剩我和母亲两个人了。家事不用我管。我把剧本写开手，一路顺畅，第一天写了一幕，四天把四幕剧写好了。

这个写“反右”的剧本，没有再精雕细刻。本来私心里也是为我们剧团的演员量身制作的，但我没像上次那样，把稿子交给柳荫或陈庚，不是怕他

们为难，不好表态，不好下决心……而是恍惚感到气候变了，随着国际上反对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国内更加强阶级斗争的宣传和部署。那时候，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关于文艺的批示，还没传达到我这一级。那是指斥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于是柯庆施得风气之先，大倡“大写十三年”，还在华东话剧汇演上给了田汉“好看”。我是模糊听说的，不得其详。

可是近在北京的中国戏剧家协会出事了。说是从剧协办的春节晚会引起的，导火线则是诗人顾工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不知是不是直接上书毛主席），揭发春节晚会上如何如何，我到现在也没见过这封信。晚会上如何了呢？我猜是说参加者们穿了些漂亮衣服，然后是跳了交谊舞（一九四九年以

前通称交际舞，后来除了各级政府设“交际处”外，一般不用这两个字）。我虽这么猜，却又想，中南海不是一周办两次舞会，也都是跳这个交谊舞么？不敢想下去的，是按照鲁迅总结的公式——“文豪则可，吾辈则不可”——或许“首长则可”，而“吾辈”剧协成员以及各协会的文艺工作者专业主要就是唱唱跳跳的“则不可”么？

剧协主席田汉，刚在上海吃瘪，春节晚会可能没来吧。替他承担罪责的，据说是剧协秘书长李超，开始一遍一遍检讨了。孙维世是活跃分子，这样的场合她不会不来凑凑热闹吧？她在苏联长大，舞该是跳得好的。想打听一下，也无从打听，我不知道本团有谁参加那个晚会了。

这样，面壁猜想，就围绕着“政治正确”的揭

发者顾工了。他是部队的诗人，五十年代崭露头角，他以部队入藏为题材的诗集《喜马拉雅山下》颇有特色。反右之前，在一些文艺活动中曾见过面。记得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国作协借团中央礼堂搞过一次朗诵会，顾工登场读自己的诗，效果不错，看得出他是习于此道的人，或亦是在文工团待过的宣教干部。据说大约一九五八年，他被下放青海军马场，但不是由于政治原因受的处分。在那里苦度几年光阴，回京以后，力求表现自己改造有成，这次上书就是突出的一例。

不能不佩服顾工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好。他部队的上级应该也是这样看，那么他就可以将功折罪了。不过，一般舆论来自一般群众，群众不一定都学习得好，因此在春节晚会事件之后，特别是责令

晚会有关人员检讨，株连甚广，界内就以手抄本流传着当年顾工写给特定对象的一首爱情诗。我也得以浏览。使我惊艳（现在人们爱用这个词儿）的是，我发现这首从未发表的抒情诗，比同一作者所有公开发表过的诗都写得好，这也证明了好诗必须出自真情，并写出真情。这样的诗，淹蹇掉了实在可惜，我当时没有抄下来，后来又找不到别人的抄件了，很有些追悔莫及。

以这首涉嫌隐私的诗作的广泛流传，侧面回击了诗人造成很大打击面的告发之举，或可叫作“温柔的惩罚”吧？

而剧协春节晚会一事，从有关人员检讨，进而引发所谓文艺整风，可就不那么温柔了。文联和各协会都网罗到文艺整风这场运动里。开动宣传机

器，“大批判开路”，这回找的靶子是一批拥有千百万观众的电影，不但有阳翰笙编剧的《北国江南》，还有根据左联烈士柔石小说《二月》改编，由夏衍在片名中加上“早春”两个字的《早春二月》（反右时曾指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为大毒草）；接着是夏衍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林家铺子》，以及田汉编剧的京剧《谢瑶环》……

我们广播文工团不属于文联和各协会，也不属于文化部，但一听要在文艺工作者中整风，自然不言自明地闻风紧跟。要整风，就是整人，要找该整的对象。记得一九五五年反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声号令，全国各地直到基层，都要反出各种各样的小集团来。按这规律，整文艺的风，我又是“没

跑”的了。当时文工团总团似是由副政委谷枫抓这件事，但他不出面，却派了分管音乐团体的总团副团长（他是改政委制前的干部，已成相当于“留用人员”的傀儡）到剧团来，参加剧团政委主持的全团会，宣布“小整风”开始，责成我依照整风精神作检查。我现在回想，什么整风精神？并没跟我这个“摘帽右派”见面，在动员会上也无一语及之，可见剧团的“革命群众”也是不知情的，只能从报纸上越来越浓的火药气息揣摩这次“小整风”的“精神”。其“精神”无非动员大家打起精神整人而已。

剧团政委霍文献，来团一年，大概从一开始就明确我是“敌我矛盾”之人，是应予打击的靶子，总不忘敲打敲打我。比如有一次他在全团的总结会

上，为了突出他来后的政绩，对大家做了一番安抚性的表扬，说到我和另一位编剧，“他们两个这回出差，也……没有违法乱纪的行为！”是我连累了那位，让他在政委心目中，也成了个随时等待抓“现行”的潜在犯罪嫌疑人！

对于这类写检查的要求，有历次运动的要求就够用了。无非是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也就是个人与党的关系，摆没摆正？首先是对划为右派是否心服口服，总跟组织的要求存在距离吧？再就是对具体的代表组织的人，比如在剧团，政委就是党的化身了，这个认识是不是牢固？这些方面当然会有差距。现在全国处在“学大庆”的热潮中，对照起来，差距就更明显了，比如大庆精神中“四个一样”的一条：“领导在和领导不在时，（劳动态度

等等)一个样。”我就没做到时时刻刻如在政委眼前一样，何况有时还对政委的批评心怀抵触：我反省自己从来没有违反过宪法和法律，怎么动不动把我跟“违法乱纪”扯到一块儿呢？！

还好，这个检查没让弄到全团大会上去，只在编导组小范围念了一遍，大家按习惯发表了些批评和希望，交卷了。

虽然“交卷”了，这次谦称“小整风”中的又一次无端挨整，却使我在回北京几年后又一次警觉，旧案未了，大难还在后头。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把你揪出来鞭打一顿。我可以豁出去，但连累妻小，连累母亲……家人将何以堪，叫我不寒而栗。这次“小整风”的际遇，没告诉母亲，但看得出文秀心理压力极大，她们编辑部并没有这方面的动

员，文艺整风暂时还整不到“新闻工作”那块儿去，她不知道我们团里是怎么运作的，我并无隐瞒之意，但也不愿意向她一一细说，一怕她为我担心，二是自己说起来也嫌腻味，这样反倒加重了她的负担。看得出她忧心忡忡，我深感负疚，而无可奈何。这样下去，何时是了人啊？

不过，小整风搞了搞，告一段落了。也好，让我们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非常事件、非常状态，不说预先演习，也总算有了精神准备。

大家把一点情绪纠结于那位诗人身上，其实所见者小；我只看到自己命途危舛，所见亦不大。都是燕雀难知鸿鹄之志。剧协春节晚会导致了文联系统的文艺整风。这是当时就知道的。后来才知道的是，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

告，引出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文艺的第二个批示，毛泽东惊人地指责文联各协会已经沦入“裴多菲俱乐部”边缘的说法——而据说可怕的“匈牙利事件”就是一帮作家、记者在这个以十九世纪爱国诗人名字命名的俱乐部里酝酿出来的！

这一警告，对文艺工作者，固然无异于一声旱天的干雷，怕还不止对文艺工作者起着威慑作用。

此时已在一九六四年，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思路已近成熟（一九六五年一月陈伯达就将其写进“二十三条”即《目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了），这次已不再满足于像历次运动那样零敲碎打，抓一批小角色，而要“擒贼擒王”了，故文艺整风先对准了文化部，具体到人，至少点名三十年代以来所谓“四条汉子”中

的“三条”，即田汉、夏衍、阳翰笙，单把周扬闪开。

我想是因此之故，这回文艺整风（或如我们非直属文化部系统的文工团，叫小整风），对一般冲击过的人，水过地皮湿，未大动刀兵，免了组织处理这一节。

大约四五月间，有一天接到文化部的通知去开一个会，到会上只见到一位可算是认识的人，即剧协的刘乃崇，我们曾同团去兰州参加土改，当时也不在一“片儿”上，后来集中兰州总结时，他将书摊上淘来的一册《花儿选》赠我了。土改后再无联系，又经反右沧桑，我同他握手寒暄，不无愧色。后来开会，才知道是要举行全国“优秀剧目”授奖大会的预备会，与会的尽是各有关院团的相关人

员，实验话剧院不知是谁来，反正左莱没来，我怀疑是把通知错发给我了，便坐在一边悄没声儿待着，好像听说《叶尔绍夫兄弟》也在获奖之列，但因是内部演出，就不列入公开发表的获奖名单了。散会时，新华社从南京调来的女记者潘荻对我说：你们这次得奖的，可能破例发给奖金呢！大概因为她在南京认识我哥哥，向我透露了这么个内部消息。到底是总社记者，消息灵通。不过到正式发奖那一天，这个传言未经证实，我相信不是潘荻妄猜，而是曾有此议，但基于反对物质刺激的既定之规，最后终被否决了。早在一九六三年大举“反修”见诸“九评”之前，就传达过林默涵一个讲话，林也必是传达上面什么人的意旨，大略说苏联变修的原因之一，便是从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化领域

开始，“三名（名作家，名记者，名演员）”、“三高（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是祸根。

为什么在整个文坛大肆整风，硝烟弥漫之际，要搞一次现代剧目的评奖授奖呢？可以说是例行的公事，计划内的议程，也可以说是呼应“大写十三年”的提法而不露形迹，获奖剧目中就有上海《年青的一代》，但获奖的不只是上海市的出品。我当时对这件事，并没深想。深想也者，也不一定是故意求深，但有心人启发我们不妨从深层次思考一下。已是在许多年后，人们指出周恩来挂帅制作大型革命历史歌舞《东方红》，正是让文艺界拿出自己为革命服务的实绩来回答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论。那是从三十年代聂耳就开始的革命传统

啊，又岂限于十三年！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不是成为共和国的代国歌有年了吗？它的歌词还是“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写的。而作为《塞上风云》电影插曲，那影片可是在以“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为首的党内电影工作小组运作之下出品的啊！但这都是潜台词，谁也没法从《东方红》气势磅礴的大歌舞中分解出来，加以挑剔。知者自知，心领神会，不知者自不知，也无须告之。

周恩来总理在倡议和从头至尾抓《东方红》（当然通过周巍峙，但总理无疑是“主抓”）这一过程中，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心理活动，恐怕不但当时周巍峙以下全体演职员，更不用说直到今天的我们难以知道，就是邓颖超也未必知道。

对一九六四年文艺整风关键时刻的这次话剧现

代剧目评奖，亦应作如是观。事后诸葛亮们的“哥德巴赫猜想”，亦不过是孟夫子的“以意逆志”罢了。我们亲历者能够证明的，只是此事的确得到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不是一般报道中常说的领导关怀，而说亲切，就是有突破常规之处。按照常规，在颁奖后，领导人照例上台跟大家合影。而周恩来并没上台，是在一间大客厅，跟每个获奖者一一握手之后，仿佛随机站成排拍照，他也不占据正中的“主位”，而是偏居到从右数第二三位，随意而自然，就像他到首都剧场看过北京人艺演出后，甚至跟演员们一起到王府大街（请注意：不是王府井大街，那一段路就叫王府大街。后来才并入王府井大街）上散步一样。我不能指出他确切的位置是右起二还是右起三，我保存的一张老照片已在“文

革“中被收缴，不知所终了。若想从中看看周恩来跟文艺界人尤其是话剧界人的亲切关系，可以到新华社摄影部找存档的老新闻照片。无怪乎许多年后张瑞芳还呼吁党政领导人，跟他们建立像周恩来那样的关系，自然，这期望就像某些文化人盼着重现《高轩过》[\[6\]](#)的诗中意境一样落空。这不怪后来的领导人，有些历史镜头可一而不可再，可遇而不可求，不可复制，重复出现就成作秀，甚至会以弄巧成拙告终。因缘凑泊，像周恩来与当时重庆文艺界、话剧界的相煦以湿，互相支持，那是在抗日而又反蒋的第一线形成的“同志加兄弟”之谊啊！

剧团巡演的总结，变成了涉及男女关系的批判会

对我来说，什么获奖，这是临时加的外场戏。我的重头戏始终是在所属单位，人是“单位人”嘛。

原来单位搞小整风批我，也是临时加的戏码。按习以为常的节目单，巡回演出归来要做总结。而总结的主持者是没跟大家外出巡回的政委。我们外出两个月，他也秣马厉兵两个月了。出我意料的是，重点抓了一对男女演员的“生活作风”。一个是有夫之妇，一个是有妇之夫，那时还不兴“婚外恋”之说——可能有意无意间还维护着对简称

为“恋”的“恋爱”一词的纯洁性，而婚外的男女之情，习惯思路都属“奸情”。“文革”中不用说，要打倒什么人，最便捷的一途，就是揭其“奸情”，一下便可把人“搞臭”，在堂堂的“文革”“十六条”里，就标举着要把各类斗争对象“斗倒斗臭”或“批倒批臭”。“斗”与“批”容或有某些政策分寸之别，而必须弄臭他则一。人在舆论中“臭”了，在群众中就失去威信，没有影响，跟他正式的罪名交相为用，可望其“永世不得翻身”了。为此，就要去翻批斗对象的档案，从陈芝麻烂谷子里搜寻有什么“臭事”[\[1\]](#)，抛档案是一大武器。而在前“文革”和后“文革”时期，都曾流行过中国几千年来传承不辍的“捉奸”。我记得在我们平均文化程度

不低的机关团体里，积极参与“捉奸”的，还有燕京大学的校友呢，可悲也已。

说起人家来，我振振有词，但每逢这类场合，我也不是什么光彩的角色。不是说我也参与“捉奸”，而是在批判会上，也照例要发言。我虽然没有热衷于追问细节，变相地一饱窥私欲，置人家的自尊于不顾，但我逢场所作冠冕堂皇的发言，俨然旧礼教的卫道士，想起来也恶心。

其实，我从小在家庭和学校，没受多少旧礼教的熏陶，尤其是有关男女大防的教条。倒是在例如巴金的《家》里，同情觉慧他们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对“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持批判的态度。仔细搜寻我受的儒家影响，有一句“发乎情，止乎礼”，倒是深入我心。但面对旧礼教下的畸形

家庭及其中的人际关系，像庐隐小说里乱伦的描写，对那儿子和继母之间所谓乱伦的感情，我却抱着同情的态度。

这种朦胧的被称作“反封建”的态度，可能因为没有提升到理性的高度，终于不堪一击。一九四九年后，按说进入了应该更加彻底“反封建”的阶段，谁料一下子就跌到完全相反的语境了。

那是一九四九年夏秋之间，我们刚参加工作的这些青年团员，接受团总支的布置，由团支部开一次关于树立正确恋爱观的讨论会。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竟还指定我做重点发言。我刚满十六周岁，跟屠格涅夫《春潮》中小主人公差不多年纪，他发现他暗恋着的邻家少女，原来在和自己的父亲相好……而我一直忙于“干革命”，根本没有这

些“私心杂念”。命题作文，只好从书本到书本了。大概所谓党八股就是这样诞生的。我记得找了一些有关的参考书，像什么蔡特金夫人谈妇女问题等等，生拉硬扯，勉强成篇。说的时候不知所云，说过之后自己也忘了。但我还记得的，是我引经据典地批判了苏俄初期大约二十年代流行过的“杯水主义”；又记住了一句话，却忘了出处，到一九五三年我奉命开办《贯彻婚姻法特别节目》时，还曾念念不忘，生怕弄出差错来，那句话不知出自何典，但显然来自苏俄版的马列语言系统，大意谓：“我们主张婚姻自由，但不主张恋爱自由。”也不知道是不是翻译有误，直到今天在我心里还是一个问号——难道我们听惯了也说惯了的“自由恋爱”、“恋爱自由”是反马列的范畴么，就像

他们的经典著作里批判什么理论小丑宣扬的“爱”？

这个会，没有人作结论，我估计，所有的人，或至少是大部分人跟我一样，一脑门糨糊，不知所为何来。但也许个别人心里一清如镜，那多半就是首先向团总支倡议开这个会的人。我后来模模糊糊听说，这个会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针对一个女团员疑似跟她一个直接上级“好”上了，或有“好”上的趋势。不说清楚我们哪能知道呢？无的放矢地各自说了一通之后，并无任何实效，因为过了几个月顶多一半年，那一对真的申请结婚了。

对于此类私人感情方面的问题，无论是教条的旁敲侧击，还是丛林式的围剿打击，好像真也是一

时“有效”，但其效也“有限”。我们剧团大会批判的一对，共此患难以后，各自离婚，正式结婚。至今五十年了，琴瑟谐和，允称佳侣。前几年，有一次大家见面，女方见我还含笑指责，“当时那么道貌岸然……”颇让我不好意思，我确是因为以“摘帽右派”之身，什么场合都得随俗表态，当时就明知这样会伤害人，但我怎能以此自辩？几十年过去，她还记得清清楚楚，可见伤害很深。她说：“别人这么说，怎么也没想到小邵也跟着这么说。”她当时的情人，后来白头到老的丈夫想必也是这样看的。想想后来在“文革”中他们对我的友好和善意，我的愧悔是无法表达的。

回首这些年轻时的旧事，我不禁又想起我曾讥议过的那位燕京校友。你可以说他低级趣味，

借“捉奸”来宣泄某种性心理。然而还有一种可能，因他在燕京时就属于“进步学生”，已经入党或将要入党，所以有一种位居革命的以至道德制高点的自我感觉。那时候，延伸到五六十年代，持有这样心态的人并不少。我还认识一位原为地下党的青年工程师，在工厂里，也曾筹划过“捉奸”的行动，却的确是出于维护社会道德风尚（在所谓万恶的旧社会，这叫“风化”，作为社会中坚的士绅对一切“有伤风化”的现象必然嫉恶如仇）的动机。这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精神状态。因此，以为自己有权在法外惩罚一切非道德行为的社会义务。抓住小偷扒手不是交由公安部门，而是暴打一顿，这在各个时期都不少见。到了非常时期，比如“文革”来了，上有号召，要求身体力行地参与运动，中小学

生甚至大学在校学生，于是认定教师们都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代表资产阶级“统治我们的学校”，个个属于罪大恶极，不但该打，而且该杀。在社会上对“黑五类”，施以暴力是天经地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是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什么宪法，什么法律，什么基本人权，公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甚至被毛泽东当年视为“党的生命”的政策，包括政策中的“区别对待”等等，都可以置之不顾。林彪是副统帅，也是金口玉言，说过“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然则“我是（革命）群众我怕谁”！林彪又说了：“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敞开打吧！从无产阶级的自豪感，到无产阶级的优越感，绿林好汉式的“正义感”，

再到无产阶级可以无法无天.....

现在人间的戾气，动辄暴力相向相加，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大搞“你死我活”的余绪。

那时候，不是连“红小兵”也不断地“斗”字当头——或开会“批评”，或要求写出“检讨”么！那时理直气壮地“批评”过同学，或向老师密告过同学的，和曾被同学密告、围攻、被迫写过“检讨”的“红小兵”，以及因种种缘故未能加入“红小兵”的同学，今天也都已经五十岁上下了，他们同学相见，可曾“相逢一笑泯恩仇”了么？

回忆去沈阳看话剧汇演，却像重读了多卷人生的大书

华东举办了话剧汇演，并且首倡“大写十三年”，犹如在文艺界刮起一阵旋风，又一次证明柯庆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各个大区当然也要急起直追。一九六四年四五月间，东北三省也在沈阳举办话剧汇演。他们虽在华东之后，却抢在其他几个大区之前，是因为他们的话剧队伍力量相对雄厚，而且有一位曾任大军区政委、现任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充当“大导演”，那就是周桓。

周桓应该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军政干部。他热爱话剧，常常接见编剧、导演、演员，据说还常常去

排练场，不光是看彩排，审查，提意见，还真的出主意，帮助剧组打磨一出戏。

我和高方正得到去沈阳观摩的机会。去以前，就听说过周桓其人其事，到那里以后，知道他在话剧界以至整个当地文艺界的口碑甚好，颇受尊敬。

东北这次汇演，我不记得是由哪个领导部门牵头主持的了，反正周桓成了汇演的灵魂。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有人把我们介绍给他，当时他周围簇拥着一些工作人员，后来人们告诉我，其中就有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张志新。此时下距“文革”开始两年，下距张志新被捕三四年，下距张志新在盘锦被残酷处死十一年。

“文革”中没听说周桓的消息，辽宁的“文革”十分激烈，群众分成三派，一直发展到真刀真

枪的武斗。其中有一派是军区支持的。周桓的夫人，据说名叫李甜（这个名字有特点，所以我记住了），在省妇联工作，也属于“走资派”之列吧，听说受冲击了，但还是没有周桓的消息。“文革”以后，毛远新被追究刑事责任了，任仲夷任辽宁省委书记期间，突破重重阻力，为张志新平反，仍然久久不闻周桓的消息。直到这个世纪，前几年，人们在网上开始议论高岗事件，逐渐披露某些当时上层的动态，其中若隐若显地透露，在五十年代中共中央处理高岗问题伊始，周桓作为东北局高层会议的与会者，曾有一个揭发的发言，在依照北京的口径揭发高岗的问题时，涉及了张秀山等东北局领导核心的几位，对张秀山等人被认定为高岗“五虎将”一事，可能起了作用，而这样的罪

名，据说是包含水份的。不知周桓原属哪个部队，却多半不是老陕甘边区的。鬼使神差，他卷入这个涉及历史和现实诸多谜团的“高（岗）饶（漱石）事件”，而这一事件由于所涉当事人的复杂情况，在八十年代平反大量党内高层冤假错案的高潮中，并未列入议事日程。直到本世纪之初，才掀开一角厚厚的帷幕，不过一切都还在若明若暗之间。周桓掉在这个泥潭里，为功，为过，是据实批评，还是借机诬陷，要待历史来作结论。如果他还健在，应该百岁上下了。

历史真的是严峻的裁判者。不用说周桓，就是比他的职位更高得多的人，权力和影响也大得多的人，在历史的面前，历史的脚下，都只是渺小的一员。当然，你生时可以为所欲为，“哪管死后洪水

滔天！”（那才是真个的“历史虚无主义”）；但任何人都要接受最后的审判——不是基督徒说的上帝，而是历史的审判。

当时哪会想这么多。在汇演上天天看戏，挺热闹。都是编剧、导演、演员们认真弄出来的。不过，几十年过去，通通忘记了。只记得两位作者，一位是崔德志，他五十年代就以青年编剧的身份，参加过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还有一位是木青，跟中央台少儿广播部的果青是老同事，一九六〇年曾写过支援古巴反美的歌词《哈瓦那》，一度大为流行。最难得是在会上见到了邓友梅，反右派以前，他在北京市文联工作。一九五六年，在“双百方针”的催生下，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在悬崖上》，别致之处在于，女主人公是一个混血女郎，

我看小说时，不知怎么就联想到徐的那篇《吉卜赛的诱惑》。像这样别出心裁，出奇制胜，遭到抨击，是必然的。邓友梅出身贫苦，一小被日本“抓劳工”浮海，侥幸回国，参加新四军，这样的出身，这样的革命资历，本来不该划成“资产阶级右派”的，但一是市文联的负责人求功心盛，二是他有这样的作品成为把柄，三是他的嘴好说，也就难逃反右之网了。

反右后经过一段劳改，邓友梅被发落到鞍山。我未详问他的境遇，但他来看戏，表明他是在哪个剧团工作吧。他还跟过去的风度差不多，大概处境尚可。他最悲惨的遭遇是在后来的“文革”当中，不止一次地触及皮肉；大约也是“文革”中，他跟远在北京新华社工作的妻子离婚了，之后到了一家

修理钟表的小铺里学艺谋生。我们重见已是一九七七年在北京了。

邓友梅在丁玲主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现在全国作协所属鲁迅文学院最早的前身）的同学陈淼，当时也在鞍山，我跟他过去不认识，但知其名，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一九六二年辽宁《鸭绿江》月刊上发过一篇散文，题为《过秤记》，写的是在北京也极普遍的一个新现象：街头常有些老弱妇孺，看着一台磅秤，招呼过路人来量量体重，收两个小钱。陈淼的文章，以第一人称写他自己，每每抗不过称一称的想法，因为太关心自己的健康状况了——这也难怪，当时大家都吃不饱，尤其体大身沉的汉子，体重更明显减轻，虽然还没见别的明显的症状，比方浮肿等等，但饥肠辘辘，“肚里有数”，

人还是好生恶死的，这时不免关心起包括体重的健康指标来。花钱不多，至少闹一个明白。但天天这样过来过去量体重，哪怕每次只发现减少那么一点点，形成的精神负担，可是日益加重，层层累积。作者写出了这个负作用的明朗化，把人们在对大灾难无能为力，无力回天，无可奈何时的患得患失，举重若轻地刻划出来。我后来想，若编一本散文选，在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这三年的大饥荒时期，除了直接控诉挨饿苦况的文字以外，这一篇旁敲侧击但恰中肯綮的文字应该入选。这位人和文都朴实的作者，本人就是个大个子，又犯腰肌劳损或脊椎的病，当时已是斜倚在沙发上，我一九八三年去大连时，听说他已在旅大市委文艺处处长任上去世了。愿他安息。

话剧汇演组织与会的人去抚顺一游，我高兴地报名。十年前我在抚顺当驻点记者时，在那里生活过一两个月，但只是围绕着几个矿转来转去。最常去的是露天矿，站到边上心旷神怡；还有龙凤矿、老虎台矿……就需要下井了。而与抚顺咫尺之遥的大伙房水库，想去没去成，后来写了一首诗《在大伙房水库工地上》，寄托了心向往之之情。这回到了抚顺，原来并不让我们看什么“煤都”气象，只是让我们乘船在大伙房水库上一游。为什么叫大伙房，从老老年口口相传，薛仁贵征东，大伙房曾设于此。这也只是寄托着人们对口头文学中英雄人物的景仰罢了。对于来作绕湖游的这些编剧导演们，大概没几个人会对薛仁贵津津乐道了。英雄人物云云，帝王将相，历史人物，随着时间褪色，也是一

个规律。文学作品，一代又一代传诵下来，同样有一个逐渐淘汰的过程。实际上，作品一旦离开了大量读者的口诵心惟，成为仅仅是一个书面的存在，即使数字化了，不担心水渍虫蚀，也就如同存放到博物馆的库房中去了。我这个人经常说这样让人扫兴的话，是挺讨厌的。这其实也就像鲁迅说过的，到人家给孩子过满月，一开口就说“人总是要死的”，虽是大实话，毕竟煞风景，其不讨人喜欢是必然的。然而人何必总想着讨人喜欢呢？时时刻刻，说话行事，都以别人是不是喜欢为依归，这么活着累不累呢？！

东北的话剧汇演结束，我和高方正没有马上回京。因为我们捎带着采访任务。当时在东北，在沈阳这样的老工业基地，厂矿里持久的群众性技术革

新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叫作“技术协作”，不但厂报矿报上轰轰烈烈，就是大型的党报，也连篇累牍大张旗鼓地打气加油。

我们到沈阳市总工会去，请他们介绍一下情况，并给我们开介绍信，访问一些典型人物。所谓技术协作是由工会系统来组织的。我们在总工会听说，剧作家海默也来沈阳“体验生活”，在总工会有一间办公室。我和方正去那个办公室看了一下，没人，也不锁门，实际上海默并没有来。

一直到“文革”中海默在批斗会上惨遭打死，我也没见过他。但我知道他曾是四十年代育英中学的校友。大约四十年代初，不迟于一九四二年，他是育英的高中学生，我当时在育英小学，在灯市口油房胡同北口，是育英学校的二院。初中部叫一

院，在油房胡同西侧；油房胡同东侧是高中部，叫四院。四院是明代的严嵩府，五十年代之前，格局依稀如旧。府内有个小花园。训育主任黄子彦先生就住在花园一间小木阁里。海默当时和中共地下党的同学就在这个小花园计议了去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事。我看过他写进西山跟地下联络站接关系的回忆文章，似是《红旗飘飘》上刊出的。他编剧的电影《母亲》，表现一位中共女党员在北京地下工作中的经历，跟我所知道的几位地下党老妈妈的情况差不多。这个影片中有大量的北京外景，至少我们北京人看来格外亲切，因之其中活动着的人物，也让人觉得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大约一九五九年，他写了电影剧本《洞箫横吹》，也拍成片子上演过了，庐山会议后一反右倾，不知是编剧有什么“右

倾”言论，从而波及剧本，还是有人发现剧本的问题，然后殃及作者。总之，海默陷入重围。我没看过这个剧本，也没看过影片，但记得报刊上有不止一篇批判文章。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前后，不知怎么一个契机，陈毅调看了这部影片，发表简单的评论，说没什么问题嘛，等于给海默口头平反了。这回在沈阳，虽未见到我这位缘慳一面的学长，但相信他到处走走，会写出新的影剧作品来。谁会逆料两三年后，不过四十多岁的海默竟落得在批斗会场也是舞台上生生打死这样一个悲惨的下场！

在沈阳，我们还采访了劳动模范尉凤英。她年纪不算大，评为劳模已经多年了。在工厂里，在社会上，似乎没人对她有什么微词。访谈之间，她也并不是那种能言会“谰”的人物，给人的印象是朴

实、本色。印象尤深的是，她是一个孝女，服侍常年生病的老母亲，无微不至，这些都有许多记者写过访问记，光荣榜，不必重复。五十年代评选的劳模，还多属这样靠老老实实在干活，或有发明创造，而不是卖嘴起家的，当然，也都经过政审，但他们通过政审，是因为出身世代穷苦人家，或是血统产业工人，无可挑剔，而不是什么开会“讲用”讲出来的事迹。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长处就在劳动岗位上，他们的优势也就在车间、工地上。并不是每位劳模都适于提拔为官。正如不是所有专业上拔尖的科学家，都适应职业政治家的角色一样。不幸的是（我是说不幸），尉凤英在“文革”中遭到了这样的提拔，直到进京成为什么高级官员，也许只是挂名的闲差，但有职级在，既脱离了她熟悉的行

当，无可贡献于社会，成天待在政治场面上，又是“文革”中绝不正常的是非之地，恐怕她的困惑和苦恼，胜于“做京官”的乐趣。想象不出，尉凤英在七十年代的北京，能有什么样的“幸福感”吗？“文革”以后，她又被打发回了老家。我想对于她来说，这一起一落，都是窝囊事。

在沈阳，采访尉凤英，听她说自己的成长，像是一场“忆苦思甜”，心情很沉重。

在沈阳也有一件快意的事，随着舍妹（她在“文革”开始后，把邵燕祯改名邵焱了）所在的《辽宁日报》的同志们，到鞍山附近的千山去春游。五十年代有一个反特片——《古刹钟声》，就是以千山为背景，在那儿拍摄的。我在鞍山的时候，跟在抚顺一样，只在高炉、平炉之间串来串去，可

供游览的地方，只去过“二一九公园”，二月十九日是鞍山易帜的日子，不是指从日本膏药旗换成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而是指从青天白日满地红，换成了一色红旗——那时候五星红旗还没设计出来呢。

在游千山的时候遇到邵焱（燕祯）副刊部工作的同事。其中后来八十年代曾经恢复联系的，有一位彭定安。我在五十年代就读过他的署名文章，是学术方面的。原来他也沦为“右派”了。其实他有与中共很亲近的政治背景，他是老党员彭涛的侄子。彭涛在三十年代做过中共北平市秘密市委书记，五十年代，如果不是第一任，也是早期的化学工业部部长。彭定安读过我一些幼稚的习作，因我那时主要是写诗，他试探地问我，跟邵洵美有什么

亲缘关系？他虽跟邵焱（燕祯）同事，却好像没问过她。这是彭定安的心眼吧。因为在当时，邵洵美已成反面人物。我们谈五四以来的文学，都知道鲁迅讥骂邵洵美的公案，这样提起的话头，即使我与邵洵美是同一笔“邵”字，我也不会因而认为他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自然告诉他，我与邵洵美没有关系。到了本世纪，邵洵美的女儿绡红定居北京，我告诉她，曾有人以为我是邵洵美家的人，那么，我们就是兄弟姐妹了。邵绡红后来对我说，她在国子监的一幢碑上看到历数百家姓氏源流的碑文，发现他们家和我们家的谱系还真是近得很。这很有趣，但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诗人之女，在晚年做了一件大功课：她费了许多心血，搜寻亡父佚失的各体文稿，其中有的是用笔名，有的发表的刊物难

找，有的未刊稿几近佚失，终于得出稍全的文集，让我们看到邵洵美其文其人较近真实的面貌，也为现代文学史丰富了资料，填补了空白，其功不可没。

彭定安是极其勤奋的学者。“文革”后，他得以一逞长才。八十年代他写了篇幅巨大的《创作心理学》，当时在大陆，是带有开创性的。他先后出掌辽宁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东北大学文学院，在行政事务冗杂的情况下，不但新著迭出，而且还写作了百余万言的长篇小说。我知道他本来身体不算健壮，又这样燃膏继晷地拼命，时间于他多么宝贵，不敢再以一般的问候打扰他了。

中国爆炸原子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下乡“四清”

从沈阳回到北京以后，为免授人以柄，不能够交白卷，勉强写了一篇工厂“技术协作”题材的广播剧：《光荣的称号是工人》。

我已经记不得，这个广播剧本送审了吗？更不用问，通过了吗，播出了吗？

因为剧团将全建制到外地参加“四清”——全名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四清”自然是简称。但四清的内容也有变化。最初是清账目、清仓库等等纯经济性的，如同各单位搞“清产核资”似的。轮到我们这一届，已

经升格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一九六三年五月发布的第一个四清文件，简称“前十条”，到我们这一届，遵奉的文件就是“后十条”了。与此相伴的，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搞出来的总结材料，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叫作“桃园经验”，是让大家学习、模仿以至照办的。其中有些是在过去下乡搞运动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甚至发展到极端的，例如访贫问苦，是从来就这么提倡的，加上“扎根串连”，就吸收了在白区或敌占区地下斗争时秘密工作的经验，因为这时候对全国农村阶级斗争形势总的估计，已经是“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了。不在“我们”手里，在谁手里呢？在阶级敌人手里，这些阶级敌人已经不只是“地、富、

反、坏”四类分子（加上个“右”，号称五类分子，似是稍后的事情），而且有乡村里的基层干部，包括党支部书记什么的，这些阶级敌人，下面有“根子”，就是地富反坏了；上面也有“根子”，在区里，在县里，这已经初步透露各级都有“走资派”这一思路的端倪。

我们出发前夕，十月十六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紧接着，苏联的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人逼宫下台。真是一派“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架势。

在国际政治史上，这诚然都是要大书特书的、影响深远的历史大事件。然而，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我们面临着夫妇俩同时外出“四清”半年，把一对兄妹一大的三岁半，小的刚一周——留给年届

花甲又病弱的老母亲一人，怎么安心？真要把“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这革命口号翻过来，“个人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怎么办？幸亏有我从小叫“鸡市口大姐”的老太太答应来给母亲做伴。我叫她大姐，她比母亲还略大些，是我从小叫“干妈”的更老的老太太的长女。我这位干妈其实跟我外祖母是早年的邻居，都是家门不幸，同病相怜，像姐妹一样亲密，我外祖母比她大十几岁，不知怎么就论成两辈儿了。我们家跟干妈家成了“世交”。鸡市口大姐慨然允诺搬来相助。这样，至少每个星期六和星期一，我母亲和这位大姐一个出外勤，接送全托的闹闹，一个在家里哄着幼儿园还不收的甜甜，可以有个分工了。这样安排后，文秀稍稍放心，我也多少安下心来。文秀老抱怨我不操心

家里的事，她怎么知道我住在四清村庄的小窝棚里，夜间空闲下来，听着北风，不免牵念两位老人和两个孩子，都在自然和社会的风雨飘摇中；我们勉强安心了，两位老人可是要对一对小家伙的健康和安全负责，这是多沉重的担子，压在她们的肩膀上啊。想也没法想下去了。

回过头说下乡的事。从严格的阶级阵线角度要求，我是不够去搞包括“清政治”在内的“四清运动”的资格的，然而我也混在里面，将成为工作人员了。我是“既来之，则安之”，且去看看。这跟当年去参加土改的心情已有不同。因长久不下乡，仍产生了新鲜感，是跟当年相似的；但当年壮怀激烈，以为自己是走向朝鲜以外的另一个战场，去执行一项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样

的情怀如今没有了。

我们剧团和整个广播文工团一起，到了河南安阳集训，地点在安阳城内二中。不知道学生都上哪儿上课去了。偌大的校园里，晃来晃去的，是两批人：一批是我们北京来参加“四清”的；一批是地方干部，有来自封丘的、长垣的，也有范县的，等等。他们也是参加“四清”的，但比我们多了一课，先得清一下他们自己，我们也掺合进去。然后，把我们北京来的，跟这些本身经过“四清”，已是“轻装上阵”的地方干部混合编队，一起下乡。

当时上有由洛阳地委书记张立木挂帅的“四清”工作团总团，领导各个分团。听了张立木的动员报告，下面就分小组动作起来。我和团里的年轻

学员张大个（张建民，是大个头，已经英年早逝，愿他安息），分到一个组里。第一个阶段是在重温报告的同时，解除顾虑。我和张大个没有自己“洗手洗澡”的问题，自然心安理得，地方干部摸不清运动的底，冷场是必然的。特别是在河南，据说这里的基层干部，每逢离家上县开会，比如“三千会”（三级干部会），离家时都像“三吏”“三别”似的，留下不叫遗言的遗言，而且把头发剃光，因为到了会上，常常不免要被揪着头发批斗。一九五八年以前已经如此，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这样的情况发展到极致。表面上看，在座的还沉得住气，其实心里大概都在扑腾。大家不说话，张大个是学员，暂时还没什么经验，只好我来发言。要动员大家自己交代这

样那样的问题，我不能采取虚声恫吓的老办法，我不掌握任何具体的实际材料，调门提高了怎么下台阶？只好是规劝为主。我从河南说到白居易，我从白居易说到他对农民疾苦的同情，“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他一个封建时代的官，还能体会农民饥一顿饱一顿和青黄不接时的难辛，我们共产党员还不如白居易那样反躬自省吗？在大饥荒的那几年，我们做到了一尘不染，不取民间一针一线吗？我们真的那么问心无愧吗？……

历史老人在九天之上俯瞰下界，会看到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人，在给一群围桌而坐的党员干部上课了。历史会发出讪笑么？

这种苦口婆心的空话，在曾经沧海的基层干部

那里，确实只是空对空。然而，别的组不知施了什么法术，见效了，推出典型引路了。多数是检查多吃多占，据说也是在小组里经人暗示或明示，“抛砖”引出来的“玉”。后来据说有的小组里开始揭发出“不正当男女关系”问题来了，于是在会前会后，在饭场上，人们就指指点点，我也跟着人的指点看过去，当期的女主角穿着朴素，表情淡定，完全不像传说的样子。好在这些事情都没发生在我所在的小组。在这次长达几个星期的集训中，没发生打人、揪头发的状况，甚至也没有骂阵，整个是很文明的。慢慢大家也就松懈了。

留心看看这个校园，在北京找不到这么大面积的中学，沿着远远的院墙，一排排高高的白杨和其他乔木，这时叶落得差不多了，更显挺拔虬劲。老

式的二层楼，不是一幢幢，而是长长一排，红漆门窗，楼上楼下各一道长廊。格局有些面熟，啊，像北京和平门外老师大附中附小的教室楼，也像不久前观摩的《早春二月》镜头里的校园，不知在哪儿拍的外景。这样一说，大家都有同感。剧团的人们于是争说《早春二月》，说扮女主角陶岚的谢芳，说小说作者柔石，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二十年代的事，如果小说有原型人物，那陶岚该有六七十岁了，于是有了调侃我们的导演张岚的打油诗：“张岚不算老，她比陶岚小……”张岚是厚道人，听大家没大没小的玩笑，也只是嘿嘿一笑，大家则开怀大笑。

也许地方干部中有人有包袱，还没卸下来，而我们站在干岸上，已经流于闲扯淡了。这就是鲁迅

说过的，“人的灵魂是不相通的”吧。

一声令下，大家立正，要出发各自进村。这时我们已由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内部简报上宣扬的思想武装起来。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我将去的那个村庄是这样的吗？

第六章 一九六五年

苦难的中原大地：西宋庄比土改前的甘肃农村还穷

我们“四清”工作队在一九六四年年底进村。我们分团被派往浚县，过去好像听也没听说过的豫北小县城。原来三点水旁边，是个“睿智”的“睿”字，近年简化了。县名的由来，不能说跟大禹治水没关系，城东大伾山有禹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曾在这座山上眺望滚滚浊流，勘察疏导黄水的路向。而比这更早的传说，是完全无实迹可考的，说这个穷乡僻壤，竟是嫦娥姑娘的老家！美丽诱人，然而虚无缥缈！

有古籍可以查考的，则是浚县古名黎阳。

这都是后来我们才有闲情一顾的事。

想起参加土改，也是这么一级一级分派下去。

这回，我们原剧团的人马分到了城西，我将去的村子叫西宋庄，由张岚任工作组长。另外南边的晏庄，东边的高庄，分别由副团长辛跃先和编导组副组长曹惠负责。而西宋庄好像是个中心，陈庚和霍文献都在这里蹲点，他们没担负具体的名义，但有他们在这里掌握，加重了工作组的分量。

我只是一个工作组员，按说不应该有多少思想负担，但跟土改时相比，我内心有一种紧张，准确地说是悬念。土改时进村，认定阶级敌人就是少数地主分子，或加上反动富农，顶多再有几个破坏分子，而村子里有我们的基层干部，有团结在这些新干部周围的基本群众，抬头一看，上面还有像青天

一样笼罩着的本县、本省和中央的党和政府！把自己化入土改工作队的集体，自感有一种理直气壮的压倒的优势！

这回却不同，还没进村，已有一种茫然之感。这种感觉，不是来自我之“摘帽右派”的身份，这身份我已经暂时搁在一边了，现在开始扮演工作人员，而且因有经验的积累，比没下过乡的年轻演员和学员更快地进入了角色。那茫然，某种程度的心虚胆怯，其实是一两个月来学习上级文件的结果，是“桃园经验”，中南局领导人的讲话所传达的，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带来的压力。“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不知道我们要进的村，是不是属于这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又在谁们手里？那就是常说的政权变色，会是一种什么景

象？前两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判说，有人刮“翻案风”、“单干风”，同时还有人刮“黑暗风”，把形势说得黑暗一团，但那时我们没听到什么具体的案例，“刮风”的人是怎么说的。可这回我们亲耳听到的是，祖国大地三分之一的地面已经不是一团而是一片黑暗了，另外三分之二的天空，还不是乌云乱翻了吗？

我们是在傍晚进村的，应该不是刻意选择。从安阳到浚县，从县城到城西，依照工作团和县领导共同安排的日程表加在一起，路上的时间，一天也还够紧张的。大概只是通知村里有工作组来，有男有女，大致多少人，我们一进村，就把我们分别引到两处空房，这就是分给工作组的男女宿舍了。

用旧小说的套语，就是“一宿无话”。第二

天，一整天干的就一件事——“号房子”，把大家分到社员们家里“同吃同住”。这些都是领导操心的事，我们组员们只管扛上自己的行李跟着向导认门就是了。

在村里遛遛，一眼望去，尽是土屋草顶，有些有院墙的小院，可能十几年前是富裕户的宅院，格局犹在，大约土改分给了贫农户，这么多年没有修葺，也破落了，还不如我记忆中土改前的光景。

记得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二年那一冬春，我在甘肃参加土改，那村里的房屋还是整整齐齐的。可这里是中原大地啊。哦，这里土改前，就遭过“水、旱、蝗、汤（恩伯）”的祸害（西宋庄一九五三、一九五六年还遭过两次水灾）。

也许土改后有过兴旺的日子：打倒了的地主不

说了，那已经开除“人民”之外，而占当局统计数字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在农村是贫农、中农这个大多数，不管是土改的获益者，分田分地分房产的贫农，还是没分到什么但也无大损失的中农，以为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勤恳耕耘，发家致富了。没两年，一哇声地喊：“不能走那条路！”（这就是李準名篇的篇名）于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脚跟脚来了，又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人们失去了产权，生产的自主权，甚至也失去了生活的自主权，干活，过日子，都没有心劲了。河南如此，甘肃当然也不会两样。我的记忆都是老皇历了。到“四清”的时候，工作组如果进了我土改所在的皋兰县白茨滩，你访贫问苦来到农家，老大爷还从筐箩里

抓出大把的干枣招待你吗？吃晌午坐到老乡炕上，还能吃上冬果梨拌炒面吗？那时候吃派饭还能面对一大碗热腾腾黄灿灿的糜子干饭，上浇绿色的酸菜和鲜红的辣子。甚至还能吃上臊子面！这可不是“地富”家，而是中农，派饭多去中农家（贫农家境差些，就免了他们做饭的差事），去谁家派饭，等于工作队认可这是“自己人”！富裕中农也欢迎派饭，到他家去吃过饭，就解除了警报，让他们安心。

我在西宋庄队里最初的派饭，是在饲养员郑孝贤家，从大嫂的介绍看，她们平常最好的菜，就是炒萝卜条了。有一天忽然给我们上了一碗肉，说：“马肉，吃过吗？尝尝！”这是出格的优待，我们露出些惊诧的神色，主人大嫂看出来了，连忙

解释，就是队里那匹病马！我想起来了，这是一匹老马，不见它驾辕拉车干活，总是拴在道边，默默地耷拉着眼睛，没精打采的。没想到哪天拉到汤锅，然后挨家挨户分了肉。我怎么吃得下，找个什么借口离开了吃饭的炕桌。组里的地方干部老邢，听我说起这件事，没答茬，但是宽厚地笑了，大约笑我少见多怪，也笑我错过一个吃肉的机会吧。当时进村不久，还没到十分馋肉的节骨眼，所以有了这份清高的表现。

这时我们每个工作组员都在“访贫问苦”，像王光美他们说的“扎根串连”似的，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可以当“根子”的对象，队里唯一的孤儿，名叫王顺利，小时候从安徽怀远县领来的。我没弄清细致的人际关系。应该是队里的中农老秦家闺女，

在一个灾荒年远嫁到安徽，但这孩子不是她的。孩子知道自己的来历，很要强，长到十几岁，不在秦家吃闲饭，出来另立门户，借一家人的西山墙，三面用席一围，糊上黄泥，搭上草顶，这就是一间屋了。王顺利给人打短工，自己回到小屋，有一口锅，就这么孤苦伶仃的，可不高的个子，壮壮实实，虽然皮肤黑，脸上却没有菜色，一说话总带着笑，还有几分腼腆，怕是平时没人跟他说话。我找他问这问那，他表现得非常友好。我顺势问他，我到你小屋里住，你欢迎不欢迎？这大出他的意外，他说怎么不欢迎，可他一想，也说他那儿条件不好，我说，条件好不好，你能住我就不能住？这么说定了。我就搬起了行李住过来。事后跟工作队的组长报告，他们也没怨我先斩后奏。在原先的房东

家，大嫂说，你就还在我们这儿吃吧。顺利在家有一顿没一顿的，你就别难为他了，说的在理，我就照办。王顺利听说，还有点抱歉似的。

对门姓秦的老大爷，总穿着一身黑布大棉袄，王顺利管他叫“姥爷”，见了我，有了笑容，顺利应该是他在外的闺女的养子，安徽日子也不好过，从小送回娘家帮助照应的，老人看我跟孩子相处不错，也不拿我当外人，我走过他家门，叫我进去说说话儿。我才知道他还是“军属（军人家属）”，他有个儿子在新疆当地委书记，不过工作忙，多年没回家了，偶尔有信来。从军队转地方，能在六十年代初做到地专（地委专区）一级干部，一般该是抗战胜利前入伍的，那时浚县还是沦陷区，他多半是离家投奔八路军，要不就是一九四二年河南大灾

荒时流落在外辗转参军的。他的妹子大概就是一九四二年流落到安徽，王顺利的年纪，是一九四四或是一九四五年出生的。我怕揭人伤疤，既没向王顺利刨根问底，也没向这位老秦大伯重提旧事。我也没向人家说过自己是怎么来怎么去的嘛。工作队打过招呼，不向社员们说明我们的单位和身份，社员们好像也自觉不问。几个月里，天寒地冻，秦老人有几回伤风感冒，我知道以后，都给他送去几片APC，我想是他平时不用药，一用药立竿见影，老人对他的外孙说：你们的邵同志是当先生的——“先生”是对医生的尊称。我苦笑，只好不否认也不承认。

我在访贫问苦当中，甚至没提问过三年大饥荒的事情，因为这里直到现在还没摆脱饥荒的影子。

这个西宋庄，划为“特重灾队”，粮食定量，每天每人六两“原粮”，就是带壳的粮食，这样的六两，一脱粒就没有六两了。

一穷二白的小村庄，到哪儿找“走资派”的“资本主义道路”？

说实话，上头叫我们下乡参加运动，如果去掉动员群众整干部或者动员这一批干部整那一批干部的“阶级斗争”的成分，那的确是让我们体验民间疾苦的必要的一课。甚至让我们看到了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三农问题”，倒真是懂得了农村和农民，就懂得了中国问题的大半。这回在河南，举一反三知道了农村怎么穷，苦苦挖掘干部的“四不清”一首先还是从经济“不清”入手，要查干部的“多吃多占”。那时候村干部只有年终分配时的补贴工分，村里更没有社办企业，要想贪污也没处

贪污，结果查出的，顶多是在冬天长夜里，从仓库偷一把豆子炒了，在队部“坐黄昏”，就算是大大优越于普通社员的特权享受了。那时候不会发生先分蛋糕还是先把蛋糕做大的争论，不是因为农村的干部群众理论水平低，而是他们多年来根本没见过蛋糕！

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我无师自通地联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管谁掌握生产资料，也要发展生产力，提供必要的、足够的生活资料啊。可惜我的想法到此为止，没有联系广阔的实际，也就没有导引出可以让我由糊里糊涂变清醒的思考。只能由“昏昏”回到“昏昏”了。

我所在队的生产队长张法云，是个典型的老农

民，他的双腿上都胀满了“静脉曲张”的青筋，如果不是成年累月苦重的体力劳动，想要这个“效果”都难。但在运动那一步上，也要求他坦白多吃多占的错误行为。不交代过不了关。他最后说出一件事：他把村里一条小毛渠上当踏脚板的一块木条拿回家干什么用了，也不知真的假的，反正大家再也没追究，没证实也没证伪。算他过关了。按照政策文件上的话，叫作“下楼”了，放下这块小木板，等于放下包袱，可以“轻装上阵”了。

“轻装上阵”干什么呢？一九六五年一月，新的政策精神下来了，简称“二十三条”，指出“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不是像我们学习讨论体会的肃清“四不清”，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整顿好基层政权，而是批倒斗

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工作队上上下下好像都说不清这个应该各级都有的“.....当权派”在哪里，连霍文献政委这个在团里每会必作说教的政治思想工作专家，好像也懵住了。他也好，比他官大一级而使她有所收敛的陈庚也好，在党政机关或部队里，独当一面，都算得“当权派”了，他们在一九六五年一月，是不是把这个“走资派”的名头跟自己联系起来过？反正我们，我指的是包括我在内的这群文工团员和工作组员当时从来没往这方面想，我猜他们也没这样想，他们打死也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观故意呀！

把眼光放回到西宋庄，要找出后来才简称为“走资派”，当时谁也叫不利落的什么什么派（可不像左派右派叫起来干脆，也不知是上头谁搞

出来的新名堂)，可上谁家去找啊？不愧为毛泽东所封“一穷二白”的这个西宋庄，扩而大之，四四方方一座浚县县城里，能找出几分资本主义因素？

谢天谢地，这个村庄搞了半年“四清”， 没死一个人

这些不去说他了。但直到今天，我都以为我们的工作队，在陈庚——主要是陈庚掌握下，是有水平的。无论在哪个阶段，执行“桃园”那一套经验也好，执行“二十三条”也好，都没出大幅度的摇摆和振荡。就是说，政策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我”是处在要弄清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问题这个大圈圈里，但力求稳妥，不搞大轰大嗡。结果在一点上站住了，邻村搞死了人，我们这个村没死人。这在动辄出人命的基层政治运动中，是既完成了上级任务，又可以向干部群

众交代的了。

比如，乍一进村，带着“草木皆兵”的革命警惕性，处处搜索敌情，我们因为不敢信任原来的民兵是不是“在我们手里”，而当地干部大概也意识到不被信任，并没派民兵加强巡逻以“保障运动正常进行的秩序”。于是我们男队员，一度组织起来轮班巡夜，替代了村里的民兵。我也参加轮值，无星无月的冬夜，没有“四不清”干部“坐黄昏”了，悄悄穿行在村里小巷子间，也看不到一星灯火，家家户户紧闭，沿着土墙，仿佛听到鼾声。这里有暗藏的敌人在黑夜里密谋吗？有“四不清”干部在销赃灭迹吗？记得我当时写过一首题为《巡夜》的拟民歌体诗，事后展示一下，可以看出“为政治服务”的写作，是怎样“源于生活又高

于生活”的：

民兵放哨定初更，满天星斗满天风，贫下中农坐黄昏，发言热烈炉火红。一枪在肩责任重，警惕在心脚步轻。为什么谷草垛边人影闪？为什么灌木枯枝发响声？星星眨眼我不眨眼，天寒地冻心沸腾；忘记了正是冰封三九夜天，忘不了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

民兵查夜到二更，一草一木在心中。两道村街交十字，贯穿南北和西东。拉锯战时这里时接过火，土地改革这里交过锋，封建的残碑垫了路，私有的界石填了坑，电线拉到磨坊里，石碾子石磨都歇了工……屋里风箱响，锅中热气蒸；骡马在槽猪在圈，

来“拜年”的黄鼠狼啊，不许近鸡笼！

民兵巡逻过三更，三星正南天地静。小村庄的心脏砰砰跳动——党支部窗前一盏灯。公路边电线嗡嗡响——千里迢迢向北京。听——看一看——听——阶级敌人也没睡觉啊，隔墙有窃窃私语声……

四更。五更。东方明。早霜预告大天晴。留下末一行巡夜的脚印，敲响头一遍报晓的钟。

在这里留下的不仅是我“紧跟”的败笔，这不重要，因为这类案例多了，我个人就有的是（例如恰恰十年前反胡风时我写的《就在同一个时间》）；而有点“化石”价值的，是它留下了当时

那种疑神疑鬼的忐忑心情，以及夜过坟场吹口哨壮胆的记录，证明我和某些像我一样的工作队员一开始真接受了，至少并不怀疑从中央到中南局对形势的估计。至于这种估计，在毛泽东是真有所据，还是他虽伟大却也受蒙蔽，抑或为了论证十中全会上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命题的正确性而硬要大造舆论？在那次会上说过，干革命的，干反革命的，都要制造舆论；为了大搞你死我活的，捍卫革命路线的阶级斗争，难道不要大造阶级斗争形势怕人的舆论来唤起群众吗？

重提这首诗，诗里倒确有一些实际感受。我睡在王顺利的小茅屋里，不但门关不严，四围到处漏风，棉被裹在身上，棉衣盖在被子上，也抵不住袭来的冷气，不免在半夜醒来。这时听到隐隐有连绵

不断而又似有若无的声音，细听是有节奏的，枕上琢磨，像是哒哒的响动，难道有人趁夜深在发报么？发报的声音能隔墙传到我这里，显然不会太远，于是猜想，我的近邻是个有围墙的院子，但因听说住的是个“兵痞”（自然是国民党军队的兵），故也不曾上门访问，那院主人也极少出门，我偶然间远远见到过一两次，蓬头垢面，精神萎靡，他的老婆也这样，一向倒忽略了。难道是他还在这小村庄里深居简出，并且通过无线电跟外界联络吗？后来有几夜我故意不睡，强睁眼睛，等到夜深来验证，无风的夜晚，好像没什么响动。有风的日子，那有节奏的响动就出现了。难道发报人要借助于风声来掩盖发报的哒哒声么？这样过了三五天，我对张岚讲了这件事。他人仔细，还到我住的

地方来看过，正赶上白天，他仍侧耳倾听，果然又有动静。循声找去，走到不远的公路边，那金属的颤音大了，原来是电线杆上的电线在风中振颤，近处听是嗡嗡的，越远越显出若断若续来。这样就解除了对那个名叫秦述贞的社员夫妇的怀疑，没有造成新的冤假错案。这就是《巡夜》一诗里有一句“公路边电线嗡嗡响”的来历。许多年后，大约是一九八七年上半年，我的杂文发不出来了，于是试写短篇小说，其中有一篇题为《听一听那是什么声音》，就是由此敷叙出来的。

记得当时我还写过《派饭谣》，“宁吃贫下中农的蔓菁饭，/不吃地主富农的炒鸡蛋。/宁吃清白干净的萝卜片，/不吃来路不明的羊肉面。”云云。我们进村后，没有见识过地主富农四不清干部

的拉拢腐蚀，村里人也许能勉强拿出一客炒鸡蛋来，羊肉面是绝对变不出来的，一上集？上县？不是逢年过节，集上没有羊肉卖，跑一趟县城办货，还能瞒过“群众雪亮的眼睛”吗？我这样虚构，因为自以为是在写诗，毛泽东有句眉批曾流传出来，倒可以借来自辩：“须知这是写诗词啊！”见笑了！

现在想起这些，尽现当时的猥琐尴尬之状，像是荒诞派或黑色幽默的小说。而在当年则不但是我，想来别的参与巡夜的工作人员也都是认真的。我们进村时，固然自己灌了一脑袋的“敌情观念”，看看村里的光景，工作队和村干部两造，也真是互相戒备的。就是所谓基本群众，也不像是土改时那样“南望王师”似的由衷切盼，夹道欢迎或

至少是夹道观望。我们是傍黑摸进村里且不说，天亮以后，全村也冷冷清清，也许社员们不知这回的工作队葫芦里要卖什么药，会不会又“翻烙饼”，鼓动村民闹成一锅粥；也许有几分好奇，正隔着门缝窥探。反正很有些日子，连半大小孩儿都少见。最早出来的是贫农杨太祥，他总站在街口自己那单独一间屋的门前，含笑向工作队的人致意。陈庚跟他搭话，他自我介绍是复员军人，知道老陈是老八路以后，对首长就表现得更亲热了。杨太祥身体不好，作为劳动力干活不大行，挣不了多少工分（本来这里工分值就极有限），日子过得紧巴，但他的群众关系，还有跟干部的关系好像不错，在村里当个贫农，也不像要趁运动谋什么利益的样子。我们大家跟着陈庚，也都对他表示友好。他算是陈

庚“访贫问苦”的对象无疑，他的出身和现状也最符合王光美经验所指的“根子” 的资格。不过，后来想想，他好像并没向工作队检举揭发什么“四不清” 的问题。

我找的“根子” 也没完成典型的“根子” 的任务，向他问起村里“领导层” 的情况几乎一问三不知。他不是装的，因为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边缘” 地位，不可能了解“中心” 发生的事情，只管干活吃饭，街谈巷议的闲言碎语也传不到他耳朵里。除了为一天两顿干的还是稀的打算，村里的咸淡用不着他操心了。今天先进的人们可以指责他不具有公民意识，安于做草民、顺民，甚至是鲁迅说的安于做奴隶的处境，但历史就是这样，王顺利和跟他同样状态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就是在一个特定

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包围里度日的。他还有一个特殊的条件，就是外来户，即使对秦家姥爷来说，他也不属于亲支近脉，原先也是秦家“嫁出门的女”在远方收养的嘛。对老秦家，乃至对全村的父老，他都抱着感恩的情结。他人诚实，我甚至想，就是有人收买他，要他无中生有地揭发什么人，他也不会上钩的。

这个王顺利，他就不想改善自己的处境，提升自己的生活吗？我想，我们在整个“四清运动”中，尤其是在结束运动临走的时候，没少宣传，经过“四清运动”，西宋庄会怎么怎么出现新面貌，广大社员们的生活会怎么怎么一步步更好，就像我们在土改时尤其是土改结束时，离村以前对村民们许以幸福的愿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

明天”，早晚走上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种田用上拖拉机，收割用上康拜因……后来谁为食言自肥表示过歉意么？

我还记得我们离村的时候，王顺利表现的依依不舍，他是相信了我们，相信我们不会欺骗他的呀！几年以后，“文革”中期，接到王顺利的一封信，他不识字，必是托人代写的，告诉我，他现在到浚县县城里修理自行车了。他希望我帮他买一辆自行车，因为在县里买不到。接到他的信我很高兴。他进城找活儿干了，可见他不是安于现状，在一棵树上吊死的那种人，穷则思变，值得祝贺。西宋庄虽属城关，但距县城也有十里地，他一下不可能在城里找到住所，每天早晚来回，有辆车就方便多了。工业品紧俏，他那里新车旧车都买不到，但

让我犯难的是北京买自行车也是凭票，我没有任何门路，只有从单位分到“车票儿”是唯一渠道，但广播文工团是个大单位，五个分团，什么时候剧团才能分到一张购车证，分到剧团的票券，又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呢？如果能分给我，就是我买来送给他也是应该的，但天上不会掉票证，说这种便宜话有什么意思？

而王顺利是把这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让他失望了，让他深深失望了。时过近五十年，他也已经是快近七十的人，他后来日子过得怎么样？什么时候成的家？儿女也早该成人了吧？

我们，首先是我，在充当工作队成员的日子，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才会让王顺利和其他社员会因我们来自北京，而误认为我们有多大能耐，这是表

层的欺骗，而我们又以不能负责兑现的官话空话废话去忽悠他们，这是实质性的欺骗。而王顺利们对我们这些陌生人以诚相待，使我，也许还有我们，欠下了终身难还的感情债、道义债、人格债！

摘掉郑某的地主帽子，三户错划富农改定为富裕中农

这是后话。再说我们在西宋庄执行“四清”的任务，实际上还是围绕着经济“四不清”，也就是所谓“多吃多占”。这个阶段，在胡家森和我这个三人小组里共事的地方干部老邢，起了驾轻就熟的作用，不止是说他的算盘打得出神入化，他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其中体现的对国情，对运动中的政治生态的洞察和应对，简直是我们身边无言的示范、身教的楷模。用老话说，则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了。在几个月同组共事的全过程里，他没说过什么不得体的话，但也不是成天板着面孔，他

也有农民的幽默，但点到为止。他是长垣县樊相公社的干部，这个公社之得名，是汉高祖刘邦早年以屠狗为业的老战友樊哙。老邢在公社好像不是领导，但我估计他在哪个领导手下，都不卑不亢，既不会得到格外的重用，却也不会沦为打击对象，更不会成为替罪羊。我们之间，没有以北京来人和地方干部这样的身份，互相深谈过；不过，我想，他对我也好，对胡家森也好，怕都琢磨透了。我很庆幸，跟这位萍水相逢的合作者，不但没有闹过磨擦，而且彼此——我相信，怀着在“阶级斗争”年代里难得的善意和友好。他今年应该在九十岁上下了，有他这样修养的人是会长寿的，遥祝他健康快乐！

按搞运动的常规，固然有以不了了之的，但一

般都要有个交代。算过细账以后，到了退赔阶段。那些芝麻绿豆账，就是“坐黄昏”时多吃多占的炒豆怎么赔？老邢和一群有经验的人已经把明细表开列出来了，一笔一笔清清爽爽。拿什么赔？有人把家里睡觉的棕床也扛出来了。可怜六十年代中期的乡村干部，真是穷得叮当响啊，干部如此，群众可以想见，所谓多吃多占也只能是炒黄豆消消夜了。

对照我在土改后期经历的分胜利果实的盛景，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候，不管被斗户扫地出门多么凄惶，错斗户多么冤枉，但按照我曾经认可的多数和少数的逻辑，“一路哭何如一家哭”，占人口多数的贫雇农受益，那真是像过节一样的喜气洋洋，压倒了少数人家倒霉的晦气。

但今天，“四不清”干部退赔，标志着运动的

胜利，不但干部群表情冷漠，理应额手称庆的“广大社员”也一样。你说是因为退赔之物太寒碜，还是别有一番心情？这一段没我的事，我也不问，最后怎么收场，若真把干部家睡觉的棕床抬到队部，除了警示后人以外，还有什么现实意义么？

为了核实这一段仅凭记忆的往事，我找出当年在运动后期作为职务写作，让我采写的《西宋庄解放以来阶级斗争情况纪要》一文[\[8\]](#)，其中“四清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一节，概略地叙述了西宋庄“四清”始末。虽然不乏套话，但有关“四不清”程度的结论和最后的运动成果部分，是当时如实记录的，比我现在的印象式回顾显得准确，抄在下面供参考：

在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同时，自然灾害造成了新的困难。西宋庄一九六一年秋田被淹，一九六二年除个别小队麦季自足外，麦秋两季全部减收缺粮，一九六三年又遭受特大水灾。

正如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所指出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时起起伏伏，有时并且是很激烈的。在我们遭遇暂时困难的几年中，农村中的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的进攻。西宋庄也不例外。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以至一九六三年，流窜之风、弃农经商之风、偷风、赌风，盛极一时。特别严重的是，不仅有热心搞小自由的社员群众，而且

有干部和党员在这股歪风邪气下同流合污。所有在职干部，所有担任干部的新老党员，都犯了程度不同的“四不清”错误。这证明党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特点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和正在用“和平演变”的方法，打进来，拉出去，即篡夺领导权，腐蚀干部，从而恢复资本主义；这一严重的事实，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

党中央适时地决定在全国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中共安阳地委社教总团从一九六四年冬在浚县开展运动；一支由二十一人组成的四清工作队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晚进入西宋

庄。西宋庄的四清运动历时半年，发动了群众，组织了贫下中农阶级队伍，解决了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以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和“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帮助干部从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角度认识自己的“四不清”错误，并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工作队经过调查研究，与贫下中农群众结合，弄清西宋庄全体干部，除一人属于三类（问题较多的）干部外，全部都是二类（较好的干部）；经过整党和改选，建立了新的领导核心。郑春贤当选党支部书记；杨太林当选大队贫协主席；尚玉章当选生产大队长。党支部和各青年、妇女、民兵组织都进行了整顿，发展新党员三人（杨太林、

郑尚贤、常民生），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建立了少年团和儿童团。整顿后，原有党员全部重新登记。同时，在四清运动中查证了阶级成分，评审了四类分子，对摘掉郑树檀夫妇的地主分子帽子，经社教分团、县人委核准摘掉郑树檀的帽子。原有的三户富农，经查明属于错划，重新审定划为富裕中农。

此文最后还提出一些展望：

四清工作队还推动了深翻土地、剪除芦根、根治西大坡千亩草荒，倡议了养种苇田，为开展编席事业准备原料。这两项措施对发展西宋庄的农副业生产将发生应有的作

用。

西宋庄在运动后期已经初步呈现新的气象。四清运动的深远影响，将会逐年逐月日益显著。西宋庄的劳动人民将在党的领导下，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不断创造新的成绩，写出新的历史来。

这里值得说一说的是地主分子郑树檀摘掉地主帽子这件事。在“西宋庄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上，郑树檀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份材料前面部分有所记载。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浚县就建立了中共领导的新政权。全县划为六区，西宋庄归一区（城关）管辖。第一

批干部做了征收公粮等工作。一九四六年秋天国民党军队占据浚县城，一九四七年三月底，乘着刘伯承、邓小平部在西宋庄西面的白寺坡、火龙岗一带歼灭国民党快速联队一万余人，浚县的中共党组织由山东阳谷县随军南下，重回浚县。五月，全县掀起“反奸复仇镇压运动”，口号是：“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杀人者偿命，欠债者归还。”同时，结合反奸复仇，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中确定的打击面是“八大家”，其中就有郑树檀（地主）、郑树楹（地主，当时本人已死）。“那时候干部群众对划分阶级成分的概念并不十分清楚，一般笼统地认为地多，觅了人的（指找人帮工）就是有法儿的（指有致富办法的，也就是富人，候补的斗争对象了）”。除个别户浮财未动外，八大家的土地和

部分浮财都作了分配。“这次土改，群众称之为大轰大搞。”

随后近两年，这一带处于国共两方拉锯状态。直到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国民党地方武装基本被肃清。下半年西宋庄“第二次土改”。“西宋庄这次土改……采取简单的办法，按照每人平均五亩地的标准，抽多补少，不进不出者为中农。阶级成分虽经三榜定案，但不准确，有错漏。如郑树森、郑树楹两家地主，借口当家人已死，只剩寡母孤儿，就把地主成分轻轻卸掉；郑树檀前两榜都划为地主，他却施用诡计，将“地权（土地所有权）”分散给亲戚，所留自有土地数恰恰全家每人五亩，在三榜定案时竟赖掉了地主成分，划为中农。”“于是，西宋庄在和平土改中成了没有一户地主的‘白板

庄’ ” ，所以叫 “和平土改” ，据说是 “没有正确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政策，也没有充分发动群众” 的缘故。

为了纠正这种现象，一九五二年麦收后，由一位区长率领负责三个村庄的工作组，在西宋庄进行土改复查，划定郑树檀、郑思达（郑树楹之子）、郑思廉（郑树森之子）三户为地主。全村召开了群众大会，斗争了郑树檀和一个由地主改划富农的李文祥。

在这次 “四清” 中评议四类分子，主要是看这些年来是否 “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不 “乱说乱动” ，这是守法方面的要求；再就看是不是参加劳动，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然不止自食其力，还要不断出 “义务工” ，其意义当是虚实并

举、体脑并重吧。

在这方面郑树檀及格了，平常不言不语，见干部就低头垂手。连他正在中学的儿子也改造成这样谨小慎微的人，从西宋庄近二十年的传统看，地主帽子是要传代的，郑树檀家可能做了足够的精神准备。

这次评议不追溯历史。不过我们从侧面了解，郑树檀是地主家庭出身，但长期不在家，土改时是把他从教师工作岗位找回来批斗的，戴上地主帽子以后，原来所在的学校也就把他除名了，学校少了一位老师。村里多了一个唯唯诺诺的劳动力。

运动初期并没宣布要搞评议，待到上级核准摘掉郑树檀地主帽子，郑似乎有些意外。尽管没有同时摘掉他老伴的帽子，他也没说什么，连问都没

问。为什么没给他老婆摘帽呢？我模糊记得，不是因为什么政治表现或劳动表现，而是村里指标只有一个。给郑树檀的实际意义更大些，他不必再出“义务工”，也不用再逢年过节听干部的训斥，算是恢复名义上的公民身份了。而这些，本来都是郑树檀作为一家之主，把老伴也代表了。家长的地主帽子摘了，等于一家都把头顶的锅盖掀了。一写到这里，我想起我摘掉右派帽子以后，还叫“摘帽右派”。乡村里可有“摘帽地主”之说？不知道。“文革”期间，又“横扫”包括地主在内的牛鬼蛇神，黑五类（由四类分子扩大了），郑家是否也照例回炉重炒？是不是直到一九七八年后，才真正有了“解放”的感觉？

在翻查《西宋庄解放以来阶级斗争情况纪要》

四清以前部分时，我发现了我写到的几位村里人的名字。王顺利自然没有。而他的姥爷秦祥志，名列于一九四七年土改工作组确定的三十二户贫农之中，是作为“发动和依靠对象”的。还有我进村后吃派饭的头一家，饲养员郑孝贤，我所在小队队长，静脉曲张严重的张法云，他们不像第一批贫农名单里的郑春贤等人，二十年来一直是西宋庄的领军人物，他们一辈子都没当过大队干部，是实实在在不脱离生产劳动的社员。

我前面把秦祥志说成中农，不知是怎么得来的印象，很可能是因为他对村里事务不即不离的态度，颇像“自种自吃”不求人的老中农。也许因为我们找贫农户扎根串连时没有把他当重点的缘故。在后面说到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的时候，又见到

秦祥志的名字：“西宋庄当时看来似乎是敌人的天下，贫下中农群众的心却向着共产党、解放军。老贫农秦祥志（军属）就曾多次为我党、我军送情报，并掩护我地下工作人员，因此得到过‘八路军李政委’的赞许。”

这都是血火交织的四十年代的事了。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占据浚县县城后，“西宋庄也随之建立了伪保政权，回乡不久的兵痞秦述贞任伪保长”。这个秦述贞，我在前面说到，就是我住王顺利处的邻居。我甚至无端怀疑过他，却只是因为进村不久人们就指着他家的院落，说住着个“兵痞”。他就任伪保长，时在回乡后不久，那么，他当兵还是抗日打鬼子的时候。抗日军人而被村里人叫成兵痞，也许是游手好闲，卖壮丁入伍的，即使

是卖壮丁，不是被抓壮丁，但同为穷人，本来也应该获得同情的。他在一九四六年当的想必也是个短命的保长。他既不在村里基本群众名单里，也从未列入打击对象中，应是有自知之明，早早退出了小村庄的政治舞台。现在还独门独院地住着，不像是土改后分到的地主房产，那么该是祖业，属于不进不出的中农，又在军队里染上丘八的毛病，贫而不农，格外显得落魄，就是我们看到的形容猥屑、蓬头垢面了。

我提到的杨太祥，是一九五四年从部队转业回村的，带着党员介绍信。那时西宋庄支部已经有党员十人，团员二十一人。据说那一段乡里“领导强”，村里“组织生活比较健全，组织作用发挥得比较突出”。我们进村看到，杨太祥的精神面貌是

好的。

多年后泛滥的大吃大喝、公费旅游，几十年前只是规模较小

一九六五年开春以后，村里准备春耕了，运动步入后期。工作队的节奏也慢慢舒缓，大家有些松懈下来。有些闲工夫，扯闲篇，“精神会餐”，勾起馋虫。本来我们在新年前后就不再吃派饭，工作队自行开伙，化整为零，分小组，我和胡家森、老邢在一个锅里抡马勺。当然还是简单地基本吃素。有一天，可能是陈庚跟我和胡家森说起，我们“改善”一下吧，我们自然赞成，计议就在我们院落的东屋，白天工作和活动的地方，找上东边高庄的曹惠参加，就四个人了，人不能多，把平时亲近的张

岚，同组的老邢也都排除了，是不得已，怕招摇也。有一天入夜，北屋饲养员孝贤那儿也没动静了，我们才开始煊锅。真像偷嘴吃似的，但后来想想，也是掩耳盗铃。在一片清静而肃杀的夜气里，不用说锅铲声，单是无声的肉香菜香，就会漫出窗缝，弥漫一院子。孝贤也罢，别的社员也罢，谁管你工作队吃什么夜宵。当年村干部半夜吃炒豆，吃的是集体劳动所得，不是也没人问吗？集体云云，徒有虚名，遇到集体受损的事，可不也就是“吃咸不管酸”吗？——想想这是小吃小喝，也就懂得为什么各级干部大吃大喝成风，从村吃到区，从区吃到县，一直吃到……大饭店！城乡普通老百姓，可不只是望望然而去之？

在豫北这个一天只有六两“原粮”的“特重灾

队”里，我们这一次小吃小喝，虽不犯法，略有违纪，但是禁不住道义的拷问。特别是对老房东郑孝贤，我们有意瞒了他，后来许多年，一想起这件口腹之事，就觉得对不起大嫂，她们是在把炒萝卜条当好菜的，她们是把常年不见荤腥偶然分到病马肉当做好菜盛一大碗送上我们饭桌的！对不起啊！

说实话，在许多大会小会的场合，我被勒令作各种各样检讨的时候，不免言不由衷，敷衍衍衍。但想起这次我们开玩笑说的“夜宴”，想起没能帮上王顺利的忙，长久内疚。现在想起西宋庄，常常重温的是我站在村边王顺利那间破茅屋外，四顾苍茫，冬天，有几棵树，也都只剩干枯的枝杈，但每到傍晚，暮色袭来，还有一批寒鸦绕树飞旋，让我心里浮现“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的断句，寒

鸦没有千万点之多，村里村外也无流水，但那份荒凉，古人已经道尽了。

这个西宋庄，留给我的印象，始终跟第一天黄昏进村分不开，老是笼在一片灰蒙蒙的烟雾里似的。其实这里属于干旱少雨地带，我们一冬一春，也享受了不少响晴天，但阴暗之感挥之不去，按照反胡风时批判胡风们的“阴暗心理”一说，我这大概也是阴暗心理？

渐有闲心，有时到村外散步，大片麦田已经返青，沿着地边走走，抬头远望，看不见一点“现代”的符号，像董希文的油画、钱松喦的水墨画所点染的卡车、高压线铁塔……在我们村东路边，可以看到普通的电线，包括电话线，还有些电线杆是没修剪干净的树干，开春冒出新绿的叶芽，可以

叫“绿色电杆”了吧？而村西天空的风景线上，没有电杆和电线。我们说，拍古装电影，不论是道边送别，还是金戈铁马，这里是上选的外景地，不怕穿帮。古典景色唤起古典诗情，我写下一阕《采桑子·野望》：

天低野树遥如荠，
芳草离离。
新麦离离，
四月梢头乍挑旗。

南风风我千畦绿，
天也无涯。
地也无涯，

无限春光有限诗。

写这阕词当在四月，离我们五月告别西宋庄不远了，心情是放松的，自由的。虽不光辉灿烂，但也绝不阴暗，会带来一丝“有风自南”的清新温煦之感吧。

声明一下，末句点题的“无限春光有限诗”，是从吴小如兄下乡偶得的七绝中借来的。谁会想到，过了一年，一九六六年八月“审诗”会上，勇字当头的批判家，竟指这句话是我抱怨党限制了我的自由：“春光不受限制，你写诗受限制！”其实那时我觉悟不高，还真没有向党提出创作自由的问题。到底谁有“阴暗心理”呀？

我在这阕词里，西望“天低”处，就是工作队

临走建议西宋庄“根治西大坡千亩草荒”的所在。我不懂农业生产和农村基本建设的事，也不曾参与这个建议的提出，一走之后，不知当地落实了没有。一年之后，“文革”开始，即使蔓延到这里有个时间差，过个两三年，西宋庄人还有治草荒的心劲吗？也因为“文革”骤起，我们剧团的人再也没谁回到这里看看。“文革”在许多地方颠覆了“四清运动”的结论，按说西宋庄没有在“四清”中大翻个儿，或不致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反复，但“文革”中事，谁能想得到，谁能说得清呢？“文革”又过去四五十年了，谁知那里发生了多少变化，没变化是不可能的。

离开河南以前，我们路经汤阴，拜谒了岳庙。小时候看《精忠说岳》，一开头就觉得不能引人入

胜，说在上天那里，大鹏金翅鸟如何如何，大鹏金翅鸟就是岳飞的前身，大不若我看“三国”、“水浒”，英雄人物很快就亮相了。从神鸟托生以后，又从发大水写起，描绘岳母刺字的细节，小孩子哪有看岳飞“成长史”的耐心？除非爱读《西游记》的，欣赏孙猴儿怎么从石头里迸出来，又怎么走出花果山水帘洞。我是没把《西游记》看完的，我觉得九九八十一难，看它闯过八九难就知其余了。但大鹏金翅鸟这个意象我记住了，后来还在萧红书里看到过，她也是从岳飞传听说的吧。

过安阳又去看了袁世凯墓。这个被陈伯达冠名“窃国大盗”的人，毛泽东在五十年代说了一句话，把他的墓给保存下来了。

从河南回北京的路上，又有些茫然，不知下一

步该干什么。在“四清”中后期，剧团政委霍文献心血来潮，关心起他本行的政治之外的业务来了。他跟陈庚商量，是不是放我们编导组几个编剧，离开工作队考虑一下剧本的事情。陈庚想同意，征求我们包括张岚的意见，大家都同意。我甚至勾勒了一个写“四清”的剧本的轮廓，当然不是以西宋庄这样“温吞”的原型，而是综合内部通报过的一些阶级斗争突出的案例。我甚至给剧本命名“一个小村庄的政治舞台”，主要场景则选在城乡之间的一处大车店，这里交通方便，五方杂处，车船店脚，三教九流，正是各样暗藏的阶级敌人栖息联络之所，从他们这里生发出“打进来”、“拉出去”的种种“和平演变”情节。这里有关“和平演变”的驳论，既是来自“反修九评”和中国共产党对国际

共运的“建议”，更切近的则来自有关“四清”的文件。这是会让首创“和平演变”之说的杜勒斯和后来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布热津斯基都会惊诧的，他们万万不会想到他们设想的石破天惊的大戏，会在“一个小村庄的政治舞台”甚至浓缩到一个“车马大店”开幕演出吧？

但这个脱产搞剧本的计划，被参加社教总团领导的广播局副局长金照一语否定了：继续搞“四清”，什么“车马大店”！金照一九五七年时管对内部，此时管对外部，八九十年代离休以后，担任过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领导。

对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再思考，但没读懂 德热拉斯《新阶级》

结束“四清”，回到北京。文秀也是这时，从搞“四清”的山西回来。她说“四清”在徐向前元帅的老家，五台县大建安村。那儿离阎锡山的老家定襄县河边村不远，她也去看过了。

她给我带回了一个当地特产的砚台，圆形的，没有任何雕饰，但实用。

回到北京，拜见了母亲和鸡市口大姐，她们也松了一口气。甜甜五个多月没见，明显长大了，头发长了，黑亮黑亮的，早就不是胎毛了。时近两周岁，什么话都会说了，见了我们并不认生，大概因

为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奶奶和“老姑”不断向她和哥哥念叨爸爸妈妈吧？

我自告奋勇去幼儿园接她哥哥，幼儿园在西四石碑胡同，那时还没改名“育新胡同”。从那里出来，先坐两站车到景山，三步并作两步登上万春亭，把闹闹放在石桌上站着，他高兴得撒欢。直到出了景山，又上了公交车，还在兴奋状态，话特别多，看车上是女司机，男售票员，大声问我，怎么这个叔叔不开车，他不会开车吗？半车人都听见了，年轻的售票员脸嫩，闹一个大红脸，挺尴尬。我忙用话岔开，说叔叔跟阿姨倒着班开。心中暗想，这孩子若看到皇帝穿着特有的新衣游街，一定也会叫起来：“他怎么光着屁股哪？”

不像巡回演出回来，大搞总结。“四清”的总

结在河南做过了。团内暂时相对平静。我多往广播大楼六层的资料室跑，名正言顺的是看地方报，找采访或称体验生活的线索。在华北，《山西日报》办得版面活跃，许多年后才知道，当时的《山西日报》，是吴象在那里抓吧？常有典型报道，大块文章。比如陈永贵，当时还有晋南绛县的年轻人周明山——“文革”以后，陈永贵大红，直到上升为当朝大官，而周明山却偃旗息鼓，不知什么原因？

“文革”前的资料室，在六层楼上，分成图书和剪报资料两个部分，工作井井有条，而且窗明几净，上六楼来的人不多，来了也很安静，是个很好的去处。还有个吸引我的地方，是可以开架阅览，进书库就地选书看。在那里“立雪”而读的书里，印象最深的，就是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9\]](#)的《新阶

级》了。浏览全书以后，发现此书还是一九六三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我读它晚了两年！作者是老南共，铁托的老战友，原是二号领导人。过去不知道这个名字，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跟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划清界限，多年不交往，我们普通读者就更隔膜了。一九五一年“内部”听过一个录音，是伍修权带队去联合国“舌战”，为参加朝鲜战争辩护，当时南斯拉夫代表起而支持中国，却遭到伍修权以“叛徒”斥之，不留余地。一九五五年，苏联跟南斯拉夫恢复外交关系，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作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各国共产党议论蜂起，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不同凡响，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其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我是在大、小“参考”上看到的。后来

反右前后，所有认同铁托这一观点的都被划为右派了。“匈牙利事件”时，又指南斯拉夫是幕后的黑手。中国共产党反对“苏修”的“九评”中，就有针对南斯拉夫和铁托的一评，把《南共纲领》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说得一无是处，一文不值。所批判的《南共纲领》虽是近年出品，那批判的声口，却俨然斯大林、莫洛托夫再世。言犹在耳，事虽过而境未迁，我拿起这本陌生作者的陌生作品，薄薄的小册子《新阶级》，并没从头看起，以为也跟铁托一样，是揭露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社会出现了一个大搞特权的“新阶级”（“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不是跟“九评”的论断差不多吗！？一九五六年，我在《中国青年报》的“右派”朋友，不是也就公开批评中国

的“小白桦树”即特供商店了吗？我匆匆浏览，忽略了德热拉斯不仅批判了斯大林时代官员特权的横行，不但批评了苏联，且遍及东西方，包括铁托当政的南斯拉夫在内！

也许不光是由于阅读的仓促，还因为我当时能够接受“九评”式的论点，认为是苏共党内的一部分官员形成了特权集团，甚至特权阶层（级），但并不认为整个苏联共产党就是在“十月革命”后产生的“新阶级”，在剥夺了原来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的财产，“消灭了阶级”之后，岿然一峰独秀地垄断了全国一切资产和整个国家的政权。就像我若干年后在国内“反左”时，长期认为左倾只是党内的一条路线、一种势力之所为，而整个的党则总是在“既反左又反右”的“两条战线斗争”中保持永

远正确的一样。

“文革”初起时，到处流通一些毛泽东不曾公开发表的文字和讲话记录之类，多半是从“走资派”家里抄家流出，或是干部子弟出于不同的目的而有意识地透露出来的。记得其中有提到“死官僚”和“特权”的地方，在给陈正人的一封信里，并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之说。这使我回顾一九五六年我和一些友人反对“官僚主义”的时候，还没提到这个高度，我连官僚主义者所涉特权都没提到，当时心目中的“官僚主义”也还只是局限于他们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脱离群众或强迫命令，压制群众，严重的则从革命意志衰退向“非革命化”蜕化变质而已。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我在“文革”开始时，

一方面受到以革命的名义的冲击，一方面我的私心是肯定“文革”甚至欢迎“文革”的，这里有从少年时青春叛逆心理带来的基因，也有五十年代初期积累起来的虽然概念不清却是拂之不去的“反官僚主义”情愫，还有表现为“完美主义”的理想主义憧憬，很容易煽动起来的小资产阶级要求“纯粹”、“彻底”的绝对化狂热性。我的肉身 in 城里机关中经受着批判斗争，我的魂灵却飞到城外校园里跟揭竿“造反”反工作组的学生站到一起，工作组的口号和施为跟反右派时的做法雷同，这时毛泽东对“造反”的支持，使我看到了希望。对毛泽东战略部署的误读持续了很久。我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写的剧本《27号岗》，虽写的是苏联生活，情节主线跟我心目中的中国现实如出一辙。我在剧本里把

希望寄托在大学生和工人身上，他们面对的，是满嘴官话官气十足的大学党委书记，以及他背后没有出场的官僚集团。这个思路里，混杂着“九评”和围绕“反修”的舆论，英国记者贝特兰等关于共产国家中特权阶级的分析，还有如上所述对毛泽东的误读……假如德热拉斯知道我对他的误读，一定会无言长叹。

一九六五年初冬的晋西南之行，给我的“前文革时代”画了句号

说远了。回头说我们的“开门七件事”，头一件事还是剧本，演员队等米下锅呢。

夏天，我们在报上看到农学家林桂棠到非洲种茶的特写《马里种茶记》，林桂棠因他的专业表现，不但得到马里共和国政府的感谢，而且受到派出单位农业部的褒奖。我和高方正到福建的福清走访了林先生任所长的茶叶研究所，对林先生本人，对那个研究所的氛围，以至对研究所所处的环境，印象都非常好，后来常感叹没有机会重新造访。当时商定，高方正写个电视剧，我写个广播剧。回北

京后，分别提了计划。剧团政委看我给未来的广播剧命名《播种到天涯》不以为然，一撇嘴：什么意思！大笔一挥，改为：《49-60茶花香》（原来49是指中国，60是指一九六〇年建国的马里）。我生怕写出剧本来，也遭到这样的命运，犹豫着，迟迟没有动笔。

说话已到了一九六五年秋冬之际。高方正的《马里种茶记》剧本交没交卷，我也无心过问。他好像并没有完成任务如释重负的愉悦，也许还在跟导演一块打磨剧本吧。

我和刘臣中结伴去山西了。此行是奔一位临猗县的老饲养员王传河而去。他的事迹早在《山西日报》宣扬过，不像陈永贵、周明山那么显赫，但像陈、周他们，都有改山造田，群众场面多，外景不

可少，不像饲养员的戏，围绕着槽头，排演时便于操作。我们也得为剧团、剧组的成本设想。编舞台剧的时候，木工房师傅赵振栓就对我们半开玩笑说，你们编剧在剧本上随便添一笔，我们就得忙一阵子，可不是嘛，加这一笔，不是布景，就是道具，都得一凿一斧干出来。王传河的故事，当地早编了戏曲，出版了供农村发行的小人书，我们不管这些，要直接接触老模范，拿第一手材料。

我们经太原、临汾、运城到临猗，落脚在一户名叫李叶叶的女社员家，她丈夫在风陵渡那边当医生，在村里算是“工干”（工人干部）家属，是在外面有收入的，生活较好，也在她家派饭。除了吃饭睡觉，我们就一头扎在牲口棚里，在那儿还巧遇了中央台文艺部常肖梅的哥哥，常肖梅学音乐，不

久前才依她的志愿调走。她哥哥是从澳大利亚某个大学，专程来到这里，但不像我们专注人事，他是研究畜牧的，重点不在人，而在牲灵了。各干各的，不能相帮也互不相扰。

我们一直没去王传河老汉的家，他也不回家。我们看材料的时候就知道，他为了夜里能照护好大牲口，不搭床板，只摆一个条凳，醒着睡着都没法翻身，他要的就是这个，时刻准备惊醒。他老伴是个勤谨瘦小的妇女，王屋山下的人，是灾年流落到这里的。

如果王传河光是饲养经心，牲口膘肥体壮，下地、拉车，保障队里的生产，那评个劳模没问题，编戏却没看头。看头就在有阶级斗争，有人要找借口撤他的职，好进行破坏。而他以“一颗红心”粉

碎了阶级敌人的阴谋。[\[10\]](#)

当时各级组织的宣传部门是这么总结的，省报省台是这么报道的，剧团书店是这么宣扬的，我的广播剧《槽头风雨》也是这么写的，还有我自发填的一阕《沁园春》：

结社当年，击鼓传锣，十度春秋。

惯挑灯絮草，多醒少睡；解衣抱犊，共乐分忧。

公论如碑，丹心若镜，步履铮铮记去留。

披肝胆，纵身离圈侧，心在槽头。

是非憎爱恩仇，似泾渭分明岂乱流。

誓铭心革命，毕生不改；献身集体，到死方休。

惓惓利人，悠悠忘我，俯首甘为孺子牛。

层楼上，看人间正气，磅礴神州。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四日）

尽管笔下豪气干云，但出入于牲口棚低矮的檐下，心胸总归是憋屈的。走出牲口棚，村里的街道也窄窄的。有一家新起的砖房，据说就是从村里出去到区县当区干部的，要退休回家了，跟古时候致仕的大官回归故里倒有几分相似。只是现在的大官，县以上的很少回乡，多在城里落户，领先实现城镇化了。有人看我把县官也叫大官，有所质疑，也许

过些时候，我对乡官村官也会以大官相称。在等级分明的社会，权与钱是衡人的尺度，乡村两级（村级在国家行政系统中不列级）的干部即官员，其可用之权，到手之财，比起平头百姓，究竟如何？至于其在行政建制层级里的位置，从上面看，是基层，从普通居民看——更不用说从被拆迁户、走街小贩之流首当其冲者看来——也是高高在上之辈呢！

在李叶叶的小院里，我听着有线广播喇叭里的新闻，关于王杰排哑弹、救战友而牺牲的事迹，我写了一阕同样豪气干云的词：“生为人民生为党，死如王杰精神好”。

但很快豪情就受挫了。一天傍晚听到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们熟识的播音员又在用训练有素的抑扬顿挫在宣告，在声讨，在

判决。在屋里听屋外的广播，不可能逐句听清，但关键词打进耳朵，还是字字干钧的。想必有来头，不知来头有多大。姚文元其名，反胡风时就知道了。一九五七年初，他写了一篇谈诗歌中不良倾向的文章，在《上海文学》三月号发表，里面有一段提到我，我对他的印象自然加深了。但我对他并无什么恶感，不是我有“闻过则喜”的襟怀，而是我感到他的文字仍然属于学术批评的范畴，我自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后来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和升温，他一篇接着一篇的批判文章出来，不再像对我们的诗歌倾向问题采取的态度，对艾青、丁玲、冯雪峰等，一个个点名，“单个教练”，口气狠得无以复加了。因为这时已在他得到毛泽东青睐之后。那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他就《文

汇报》一个版面安排提出质疑，即对毛泽东在青代会上讲的一句“凡是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没有放到头版头条突出地位。这篇短文引起毛泽东注意，命令中央党报转载，表而出之。姚文元就从上海市委宣传部一个普通干部脱颖而出。在一九五八年，姚文元把他在反右前后写的批判文章，汇编为《文学中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一九六三年又修订为《文学思想论争集》，两次出版，我都买来学习了。未能免俗地翻到涉及我的段落，虽只是围绕《忆西湖》一首诗，却发现已经一改再改，先是把最初版本里的“邵燕祥同志”的“同志”二字删掉，后来就把原先曾有一些温和的语气改掉了。倒是没有往里面添新料。我直到“文革”中还一直注意保存着当时当期的杂志

和这两本书，以为有暇时仔细对照当有所得，但后来事繁书多，加上眼界和心胸渐次开拓，连原先也曾长久保存的一批姚氏大批判单行本都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但我始终认为姚是个有才的人，能认真读书，勤于写作，也懂得思考，不是全无逻辑思维能力的莽汉，如果换一个处境，换一个大环境，而不是误入庙堂，奉命作文，如鲁迅说的“从指挥刀下杀出去”，那么随着社会的开放，无论做研究，做批评，都会有所成就，比掺乎政治的命运好多了。这是可惜的事。自姚而下，再没有哪个写手，能让我产生惜才之想。

这次来临猗，我们在运城小作勾留时参观了不远的夹马口电灌站。从岸上走到电灌机房，是一条好几米长的窄窄独木板条，走上去时不免心惴惴

然，可是迈出第一步，就不容你退缩，还是走过去了，回来的时候心就不那么紧了。这种心情并没写进我的新词里去，词里是歌颂体力劳动的民工的，“漫道神工鬼斧，算来输与钢锹。多情日月，高悬照我，志在移山。”跟那前后不久写大寨的“不辞劳，何辞苦，敢辞难！”同一机杼，是晕眩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口号声中的“梦笔”。

那一趟晋南行带回的诗词稿里，还有一阕《江城子》，“枪声惊洒满天霜。胆开张，血如汤。烽火台边，拂晓练兵忙”，是沿路所见，不能说是梦笔了，见到什么？“烽火台边”，错了，不是什么古烽火台遗址，而是废弃了的砖窑。脱离生活，露怯了。不知这算得上错觉引起美感么？

我在一篇题为《天鹅湖》的小品文里，说过“四清”期间，每到团长陈庚的住处开会或聊天，入夜走出门，有月亮的晚上，总看到几十米外右前方枯树后面，有一片粼粼闪光的水面，在月光下冻结了，寂寂无声。像煞了天鹅湖。因为是冬夜，寒气袭人，也总是没过去一看。后来一个下午，心血来潮，过去找，哪有什么湖水，是孩子们打“冰出溜”的车辙罢了。我于是想，错觉有时可以产生美感，当然是虚幻的，如同现在的媒体宣传力求无中生有造成的“幸福感”似的。

美也好，美感也好，哪怕是错觉，哪怕属于虚幻，都不会伤人。但我半年多以后由此遭到的打击，便绝非虚幻的了。

转眼到了一九六六年春，有一天荣宝斋到广播

局院里兜售文房四宝，更主要是一些本册。像荣宝斋这样的小众生意，为什么会想起送货上门，开拓市场，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就是常来的主顾不怎么来了，销路日减，只好找新的买主，一次性的也行。广播局是他们想象文墨人多的地方。不买点什么，对不起热心的售货员。我买了不多一些大幅的册页。文人故态，手痒难耐，回去就抄了九首新词，送给了陈庚。没想到——谁能想到？——“文革”一起，这九张册页就落到“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之手，上纲上线，怎么解恨怎么说。一九八六年纪念“文革”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审诗》纪其事。王蒙拿去发表在《人民文学》八月号。他见我说最后检讨反毛泽东的错误时，归结道：“毛主席早就指出，旧体诗词这种体裁束缚人

的思想，又不易学，不宜在青年中提倡。我近年来热衷于此，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对毛主席指示的违抗……”王蒙问我当时就这么说的么？他大概觉得这样是通不过的吧？但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十三日，星期六下午，对我的三场批斗会最后一场，大家都已厌战，女同志急着下班接孩子，谁想就我的“最后陈述”继续纠缠下去，明摆着大失人心，于是“文革”小组奏凯而归，革命群众同志们尽欢而散，我也如释重负，蒙混过关，后来在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那天下午，叫我就这《词九首》写出书面检查，我也是照那天会上的答辩写的。

尾声

不算尾声的尾声

我这组关于六十年代的文字，本来打算写到一九六五年就收梢的。可是从那年秋冬一下就跳到了一九六六年夏秋的“文革”批判会。好像鬼使神差，“文革”是绕不开的。

“文革”，一万个人心目中，就有一万种“文革”印象，“文革”解读。莎士比亚不过一摞剧本罢了，“文革”是深入千家万户的，皮肤上的血痕，心灵中的烙印，没一处没有“文革”的阴影，就像前几年笼罩大地的饥饿的阴影一样。

归根结底，“文革”的根子虽然植于深广的时间和空间，不仅在上层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更在底

层各类“草民”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文化心理中。不过，正像十一届党中央有关决议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发轫于菊香书屋（北京中南海）、刘庄别墅（杭州西湖）、滴水洞（湘潭韶山），然后自上而下，一呼而起。一般叫作“文革”研究的课题还得从高层内情切入，这就如同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其研究对象是从作品入手，探讨创作心理，思情意蕴，结构布局，等等等等。而我们，不论是亲历者或后来人，只是作为这一巨大（如果不照某些人那样说成“伟大”）的作品的读者，直接的、间接的读者。所谓间接的读者，就是通过别人叙述或转述，得知一些片断，一些情节和细节；即使是所谓直接的读者，其实也只

是各自读了一小部分，自己感兴趣或不得不读的那些，你没读到的部分，不一定是你不感兴趣，是人家告诉你，某卷某卷是“内部参考”读物，你就会被排除在外了。不过，至少在当时，没人争那一部分阅读权。因为摊给你必须读、“天天读”的那一部分已经够多，够你消受的。所以读者叫“受众”。所有的文艺作品，按照当代“接受美学”的理论，都是由作者和读者双向运动完成的，在这里，读者一方怎样“体会”，怎样“理解”，是很重要的。大家读时间淘选的经典作品，常常发现所谓“一遍拆洗一遍新”现象，隔一段时间重看，就有新的心得，看到了字里行间以至文字背后的东西，或是发现了过去忽略的某个侧面……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起算，据说“文革”十年，

有人认为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就已结束，那么就是三年。对于经历过的人，恐怕都像一支古典的抒情歌曲说的：“一万种情怀，安排何处？”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所以我原想完全绕开。

绕不开，我就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我的感受的记忆中，捡拾二三碎片。

这一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了关于焦裕禄的长篇通讯，新华社三位记者署名，郑重推出的“正面报道”。我看了十分感动。通讯第一次“正面”报道了河南东部兰考县的穷困面貌，新来的县委书记不得不到火车站去挽留出外逃荒的农民留在家里“生产救灾”。——后来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明知挽留不住，焦裕禄是到站上给大家

送行的。他当时说过些语重心长的话，即使报道出来，也不会有什么负面作用，但那样一来，好像作为地方干部工作不力，把本乡本土的难民推给外县外省去了，这不增加了别处的“盲流（盲目流窜者）”吗？自然就须改写了。我在河南“四清”八个月，早就听说这个中原大地，因为天灾人祸不断，年年春荒时节，农村里家家户户都有逃荒的历史或逃荒的准备。所有的窗洞都开得很小，临走和把泥一糊就跟门锁配套了。许多农民早起没有叠被褥的习惯，一是没有像样的被褥，再就是随时可以打起铺盖卷上路。居家过日子，不做长远打算，一切成了临时性，说什么“安居乐业”？“旧社会”的苦况，李準的小说里写过不少。“新社会”的状况，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小说

中也有过真实的描写。一九五八年及其后的大饥荒中，各地农村限制外出逃荒，除非带上大队或公社的路条，寸步难行，就跟朱元璋时代不许农民离家十里以外的禁令似的，结果有机会外出逃荒的，好歹捡下一条命，躺在家里的不过是等死。焦裕禄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当然知道得清清楚楚，他把逃荒的送上车，也就是放他们一条活路。这是人性，人情，焦裕禄的可贵之处！上级知道了，会批评他“不顾大局”甚至违反纪律，焦裕禄把这责任承担了。以致一九六六年记者还要替他遮掩这件事。把送行改为挽留，这才符合齐心协力、自力更生的宣传口径啊！

我当天下午把这篇报道作了广播处理，变成一篇可由演员配对白，可以加音响效果的“广播特

写”，及时在中央台播出，于新闻节目反复播出的播音员的朗读之外，又吸引一些爱听或只听文艺节目的听众。电视剧组成立，立即上马，其中上车站一场，我到西直门火车站参加了外景拍摄；从车站回到县委，焦裕禄主持县委会议，我也充当了群众演员，这回群众演员演的都是县委会的干部。电视剧突击完成，很快播出。从兰考弄到一棵泡桐树苗，当完道具就栽到我所在二楼办公室和“大排（演厅）”之间的天井，当时几尺高，泡桐长得快，到一九七八年我离开剧团时，它已经冲天而起，冒过四楼的楼顶了。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记得我还写了一组为焦裕禄图片配的短诗，如《永远的藤椅》，焦裕禄办公桌前这把椅子最知老

焦的甘苦，他的肝炎发作，疼痛难忍时，就坐在这把藤椅上，把疼痛的部位顶在桌上。……接着三月纪念雷锋，我又写了一组短诗，以期有以配合，但都未能用出。这几年除了外出采访外，根据书面材料，还改编过一些广播剧，如关于张思德的，自然是为了给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文做形象注脚。那时候谁知道张思德的死还别有缘故。

但像我由菡子同名作品改编的广播小说《万妞》，我至今相信其题材具有生活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真实性。不仅因为作者说她取材于真人真事，那个新四军战士寄养在皖南老乡家里的小孩，本来就取名“皖牛”的；更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事情不仅一桩，而且不限于抗日战争时期，不限于皖南新四军面临北上的关键时刻。我相信在那特定的历史时

期，当地的军民关系确实曾经亲如一家。

新四军北撤的时候，在墙上留下过这样的大标语：“倘和我们过不去，不要为难（害）老百姓！”

不久前，我在《新民晚报》读到傅秋涛将军的女儿傅寰写的一篇忆旧文，说那时父母随新四军北上，把她托养在老乡家里以后，辗转过好几家，其中第一家孩子多，把她混在其中，以为这就不显了，而国民党军队有当地人报信，说他家多了一个孩子，把这家主人抓走，逼问红军团长傅秋涛的女儿是不是在他家，不在他家，就得交代出她的下落，硬把这个坚不吐实的老实农民打死了。一九四九年，小姑娘已经长到九岁，她对养父养母依依不舍，坚持让最后一家养父送她到上海，见到了傅秋

涛，父亲给她改名叫“还”，归还的还，后来写成“寰”，人寰，就是世界了。

以世界的视野，以历史的高度，可以看到人之所以为人，天生深藏于每个人心底的人性和良知，高于一切俗世的利害，高于政治、高于战争和革命。

人民，伟大的人民，他们以伟大的人情、人性，保护了原本陌生的孩子。

中国现存的作家，不管是来自国民党治下的巴金，还是来自共产党治下的赵树理，不管他们曾有什么样的信仰，他们是对得起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

但巴金，在一九五八年以“拔白旗，树红旗”，“惟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为口号

的大批判中，已经遭遇过硝烟炮火，一九六二年他在上海作家代表大会上的一个发言，据说又受到批评。我还知道新华社的“内参”已有记者“参”了巴金一本，说巴金想方设法要让女儿逃避下乡，云云。这是什么信号？

北方的赵树理，据报纸广播宣传，已经让自己的女儿告别北京，回老家学习剃头理发。后来我们从严文井的回忆中得知，五十年代老赵初调到全国作协，住进东总布胡同作协宿舍，并不因全国闻名而免受歧视，当时的干部子弟学校育才小学，分配到作协的名额，就轮不到他的小儿子。赵树理被称为农民作家，生于农村，懂得农民，但他是受过教育的文化人，为什么下决心让孩子去当体力劳动者呢？恐怕是这些年的经历，让他做了这样的，以为

可以避害免祸的选择吧？老赵虽来自太行老区，可也没少挨批，当然有些可以说是他“自找”的。一九五九年，他就农村问题替农民说话，上书中共中央，结果被转回作协党组，构成若干次批判会的内容。他写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故事的《赖大嫂》，在一九六一年大连一个关于小说的会后，作为所谓“中间人物论”的“黑典型”提出，直到“文革”期间，还是江青等批判文艺界“黑八论”时不忘敲打敲打的，这些敲打终于化为后来的拳脚殴斗，使倔强的老赵终于不支。

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作协下属的《诗刊》、《文艺报》、《人民文学》已经先后停刊，这是文艺整风的一项成果。一九六六年春天的此刻，已经没有刊登文学作品、文学批评、文学动态

的全国性报刊可读，文学不知怎么卷入政治的狂潮。我的身份使我耳根清静，什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从来没有传达到我这里，偶一听说也不得其详；然而，听说有一个文件涉及了我，说中宣部为了表示革命不落人后（具体地说，是不让部队抢了先进），也提出了一份四十篇“问题作品”的名单，要各地组织批判；而我的《小闹闹》榜上有名，还有苏策写的《白鹤》……想打听也没处打听，我不能让我信赖的朋友落一个“泄密”尤其是“向右派分子通风报信”的罪名（一到运动升级的关口，我也跟着升级，这时在会上会下如果还叫我“摘帽右派”而不直称“右派分子”，就有“右倾”之嫌了）。

然而，后来，包括“文革”大张旗鼓、大动刀

兵，对我进行大批判当中，居然并没有人引经据典，说中宣部的文件还点过我的“毒草”云云。要么是最初的传闻有误，只是出自有心者的揣测，但当时说得有鼻子有眼儿，不像是随口的猜度。那么，就是中宣部很快被“砸烂”，因为它被封为“阎王殿”，说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是当时恋栈的阎王搞的“假批判”，固然不做数了；如果出自当时的“小鬼”之手，现在他们奉旨“解放”出来大造阎王们的反，要从事更大的功业，也就顾不上再抓一些小小的毒草了，要立功也要像姚文元那样抓吴晗那一级的“大毒草”啊！——附带说一句，旧中宣部在遭到“砸三旧”（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之前，发没发过关于四十篇“问题作品”名单，这桩疑案，现在可能只

有我一个人还没放下，作为大运动的一个小细节，重提一句，供有考据癖的人参考。

不但是现在，就在一九六六年当时，包括文艺界在内的人士，兴趣或说关注点，早就从什么文学界这劳什子转移到“国家大事”上去，说什么“盖文学，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是曹丕煽惑那些略有自我膨胀之嫌的文臣、智囊们，好来为他效力就是了。

不管已经点名的批判名单上有没有我的东西，但我已入炮火射程之内，是不言自明的。地富反坏右，无可遁逃。静候其变就是。所以看来我是镇静如常。半个世纪后，回头检视当时的心理状态，脑子里想些什么？我认为当时的真实状态，脑子里，时而空空的，时而满满的，但没有逻辑思维清晰的

理路，我已经放弃思考——不为自己的处境担心，该来的总要来的，瞎操什么心，可怜无益费精神！好像我已在有意识地储备精力，来迎接宿命的一击了。

但，潜意识中的恐惧，才是形成这一些表层现象的根源。我发现这一点，是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这一天《解放军报》上在对称的位置刊出了分别署名何明、高炬的两篇篇幅不长但分量很重的文章，后来知道有一篇，高炬吧，是关锋化名写的，取义“高举……”也。以研究老庄等哲学课题出道的关锋，也不甘当学究，又不能免俗，用这样俗而又俗的寓意来取笔名，也是可叹惜的。

这是今天我在说风凉话。而那个早晨，编导组集体学习（学习为名，实际已经“停产闹革

命”了)，读报。我是一口北京口音，照例我来念报上的重点文章。我念东西从来不打结的，不料这天连着打了两个结。我乃发觉，这种心不在焉，表明我方寸已乱。说不受时事干扰，已经受到干扰，还不是一般的干扰。

人们将来读“文革”前后的大事年表时，会发现，四月十六日、四月十七日、四月十八日，围绕着《北京日报》、北京市委，正进行一场生死搏斗。《北京日报》刊出的对吴晗一版批判文章，被宣布为“假批判”，这个“假批判”是由邓拓组织的，其中也有他执笔写的一篇文章，发表时化名“向阳生”。这件事不是由《北京日报》负责，而是市委书记彭真的问题。邓拓预见到将要临头的羞辱和鞭挞，自杀了。我们许多人都是事后很久才

知道的。八月间我到了广播局的“政训队”，遇到邓拓夫人丁一岚也在，她当时还为邓拓之死保密，她以绝大的坚忍表现了她作为老党员的纪律性和她与邓拓生死如一的同志感情和夫妻感情。

可能是文工团的领导不愿我们这么多闲人留在机关里学习，不事生产，光是读报，再加议论，反易生事，于是我们又出发“体验生活”去了。目的地是山东五莲县，属临沂专区，我原不知这个地名，前些时报上介绍了他们是一个民办教育的典型。我们当然不是去采访什么民办教育，那太不合时宜，太与党和国家的动向脱节了。我却还是有兴趣的，每到一处新的山水，都会给我新的启发。

五月十日出发。晦气的是，在新车站（即北京站，建于一九五九年，是“十年大庆”的“十大建

筑”之一，我们老北京不能忘情于老车站，还老是叫它新车站），就听广播喇叭里播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这叫我们还能安心去领略“沂蒙山，好风光”吗？难怪陈铎要用袖珍小收音机藏在被窝里听广播——被抓了个“偷听敌台”的罪名，好在为防扩散，没有就此接连开会。但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剧团里面也仿佛进入一级战备了似的。而我们顺路去一个全国知名的下丁家大队参观学习，干部带着在村里走动，同时介绍阶级斗争形势，指着一家紧关的门户说，这是个错斗户。我心里不禁一惊，“错斗户”是跟“被斗户”等量齐观，要加以戒备防范的呀！更加重了此行的沉重之感。

七月初，广播局内，文工团内，大约都在以丁

莱夫为首的广播局党组领导下，按照当时我们并不知情的《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布置好了。政治部抓总，在文工团，是两级政委为首的党组织组成两级“文革”领导小组，严阵以待。于是电召我们回京参加运动。我们却也乐得结束这段让人二心不定的日子。

从烟台乘船，跨渤海北上，进天津港正当早晨，但这个港口的早晨，蒙蒙晨雾无声，一眼看过去，没有古典的诗意，也没有工业化的诗意，甚至没有政治的诗意。我站在船舷上，见有小船由东向西逡巡而过，船上的人手持长竿，从水面表层下钩起什么——仔细看去，钩起的是人的尸体！这比出发前在车站听到姚文元的大批判，更觉晦气。大家都看到了，大家都没说什么。这个画面，成了沉淀于

我记忆深处的一个关于“文革”的符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 邵燕祥著.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2014.7

ISBN 978-7-5399-7349-4

I. ①一... II. ①邵...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1238 号

书 名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著 者 邵燕祥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 邮编 :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 //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349-4

定价 3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 周厉王残暴，召公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王不听，三年后国人暴动，王死于彘。事见《国语》。

[2] 这是我今天对他的评价。当时跟他只有一般工作关系。他是从上海随合唱队调来北京的。以他的年纪，自然在“旧社会”就干过事。到我们一同进了一九六六年的黑帮队，我才恍忽听说，他曾服务于“军中”，如同今天的部队文工团，他的婚礼是在当时南京空军的励志社举行的，不过是借用俱乐部的场地罢了。但总之在“旧中国”曾经“风光”过。后来我们一道下干校，当文工团全建制调回北京时，只剩我们两个留在淮阳，分在不同的班。后来我还是先调回了，他一直熬到“文革”结

束，干校收摊。他举家去了美国，并不是在那里从事“反党”活动，而是作为退休老人，组织那里社区的合唱活动。至今念道朱崇懋，耳边依稀响起他唱《草原之夜》的歌声，此曲的演唱无出其右者。

[3] 《诗抄》原注：王渔洋《浣溪沙》词上片：“北郭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

[4] 砑，音zha，第三声，须“儿化”，系北京方言，俗语，雅化就是指瑕疵，污点。

[5] 关于这个女孩子，以后怕无由再写到她，故在这里赘上一笔。一两年后，新来的总团赵志光政委，发现她民歌唱得不错，曾夸她可以媲美郭兰英，于是大家友好地叫她“赛兰英”。她从剧团调到民乐团民歌组，确也显示了她唱歌的长处。不

久，听说她结婚了，又跟着年轻的丈夫去香港了。再就是听说她在香港也到什么场合唱歌。最后在“文革”中听说，她不知何故被害死了。再也听不到她的消息，只留给大家一串问号。

[6] 《高轩过》，李贺一首诗的篇名。高轩，华贵的车驾，借指贵客。有一位著名诗人曾受到领袖人物召见，若干年后写文章以这首古诗为题，寄意期待再有“礼贤下士”的领导人过访。

[7] 现在人们有时写成“糗事”，其实糗不念臭，指干粮，跟“臭”不沾边。

[8] 收入《找灵魂》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9] 斯特凡·德热拉斯，现译吉拉斯。

[10] 此书脱稿后，一位家在临猗的友人来访，说起

王传河其人在“文革”中的表现，令我大吃一惊。原来在十年动乱中，王传河居然成为晋西南一派势力很大的群众组织的领军人物，那个组织标榜武装保卫毛泽东革命路线，因而参与夺权、武斗，不一而足。